

[加] 伊莎贝尔·柯鲁克 [英] 大卫·柯鲁克 著

十里店

——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



北京出版社

I711.5/1
7300/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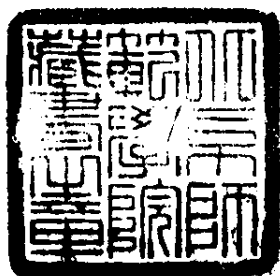
十里店

——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

[加] 伊莎贝尔·柯鲁克 著
[英] 大卫·柯鲁克

安 强 高 建 译
燕 凌 校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84497



北京出版社

884497

TEN MILE INN

Mass Movement in
a Chinese Village

by Isabel and David Crook

据美国纽约众神书店 1979 年版本译出

十 里 店

——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

〔加〕伊莎贝尔·柯鲁克 著
〔英〕大 卫·柯鲁克 著

安 强 高 建 译

燕 凌 校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 51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41,000 字

1982 年 6 月第 1 版 198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500

书号：10071·380 定价：1.10 元

致 谢

首先感谢对我们推心置腹的十里店老乡，以及不仅是我们的译员，也是我们的研究伙伴的工作队和边区干部。我们还要向为我们开展工作提供方便的边区政府和党委领导人，阅读了我们的原稿并提供宝贵意见的中国和西方友人，以及为我们翻译文件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致以谢意。最后，我们还要对经常鼓励我们，以及为我们润饰原稿时表现了编辑技巧和充沛精力的玛琳·巴尼特，杰弗里·福德以及詹姆斯·佩克表示衷心感谢。没有这些集体努力，这本书是写不出来的。

序

柯鲁克教授夫妇的记实著作《十里店》，生动地记录了1948年2月到5月间在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政府所在地武安县九区一个村子里的土地改革复查、整党和民主运动的全过程。读着这本书，它把我们带回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带回到人民民主革命的火热年代。

柯鲁克夫妇是我们同甘苦、共患难的老朋友、好同志。他们在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年代，远涉重洋来到中国解放区，深入群众，亲临现场，进行了认真细致的采访和调查研究，以他们流畅的文笔，为我们一个有代表性的村庄的群众运动作了真实的记录。我们自己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他们替我们做了。他们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事社会调查的科学方法，他们的为人和工作作风，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同甘苦，共患难”，这不只是指在解放区那一段生活；在我们建国以后三十多年间，依然如此。现在，他们以古稀之年，仍在为办好北京外国语学院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趁《十里店》中译本出版的时机，我愿代表原晋冀鲁豫解放区，特别是十里店的群众、党员和干部，也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柯鲁克教授夫妇表示衷心的祝贺和感谢！

薄一波

1981年10月

张磐石同志给安岗同志的信^①

安岗同志：上周我挤时间把北京出版社送来的《十里店》中译本印厂校样匆匆看了一遍。觉得把它用中文译过来出版，还是有必要的。

作者以他们的亲身经历的“一个村庄的革命”为题，把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土地改革的一个重要阶段——即土改复查和整党运动，在十里店的发展过程，历史地、真实地记载下来。全书二十三章，几乎每章都可以单独地成为一个美好的故事。其中人物（不论是工作队员或农民群众）的活动，包括他们怎么说，怎么做以及其心理状态、立场、个性，作者都用他们自己的活动的事实和语言，使之栩栩如生地活跃在纸上。在重要事件的结尾，作者往往仍用纪事的手法，而不是泛泛空谈，轻轻几笔，却能点出事情的本质，有的还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这是难能可贵的。

最近期间，我重读了赵树理同志写的反映当时晋冀鲁豫边区土改复查的小说《邪不压正》，对照起来看，《十里店》作者的纪事是比较准确的。因为老赵同志是用小说体裁，写出了当时运动发展的一个横断面，而《十里店》则是以报道的手法，写出

① 张磐石同志和安岗同志都是当时工作团的负责人。

使人喜读的报告文学。当然老赵同志对农村和土改，是很熟悉的；而生活在西方国家的《十里店》作者们，初到解放区不久，就能把对他们说来十分陌生的，不容易为西方资产阶级偏见所淆惑的人所愿理解的土地改革这类“奇事”记载下来，而这个记载又能做到和老赵同志差不多一样地把它如实反映出来，应该说是极不容易的。这只能说是作者们同情中国革命和他们进步的唯物主义思想以及坚持深入实践的丰硕果实。中国人有“旁观者清”的古语，我想《十里店》的作者对于中国的土改运动，也是“旁观者清”！可以这样说：这本《十里店》不仅正确地向西方人民宣传了我国土地改革运动的真相，对我们人民也是一本宝贵的革命史料（关于土改的史料我国出版的不少，《十里店》应该算是其中的一本好的），也是教育我们后代的好教材。正象作者为中译本写的《前言》中说的那样，它将有助于“促进实事求是的报道态度，刻苦而科学的调查研究风气”。而这些正是现在在我国农村建党整党和党如何领导农民为社会主义为现代化奋斗所必需的。因此，它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仍有重要的意义。

译者安强、高建同志，他们都很年轻，当然并不可能参加过土改，但他们译得很好，称得上是准确，流畅。尤其是在使用群众语言和赋予革命感情方面，有很好的表现，青年一代在这方面比我们强。我想说的一点是，校正的工作也很关重要，没有参加过的人，特别是没有那时的笔记查对，好多人名、地名和重要事件是译不准确，甚至是译不出来的。听说何燕凌同志校阅过，他是当时的参加者，从书中看，他这个校阅可能下功夫不小。因此我建议把校阅者的名字也能列上。

此外，我还想到两点：

一是成立贫农团和农会后以及工作队撤走后，仍应明确要由共产党领导，不可模糊为“贫雇农打天下”等等。二是应明确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农民即使是贫雇农，作为党员，也不能只是为人民服务，甚至也不能只是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而模糊自己是组织中的一员，更不能模糊党的性质。在当时我们的工作中，也不是不知道，或不理解这些原则，而是在群众发动起来后，积极引导和促使群众觉悟的工作做得不够，因此不可避免地迁就了由我们工作中以某些左的观点所导致的群众的左的情绪，这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之处；作者的反映是真实的，后来是由党来纠正了自己这方面的缺点。

还有一点：这个工作团是在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下，由我负责的中央局宣传部，人民日报社，以及晋冀鲁豫文联，新华书店等单位组成的。范围是当时武安县九区的农村。人民日报社人多（当时报社以三分之一的人坚持工作，轮流参加工作队，兼任采访记者），便以报社为主组成几个工作队，参加者有外国朋友，也有延安来的老同志如杨之华同志等。这次参加土改工作，对于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和文学艺术界深入实际，体验生活，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在太行山出现的又一个范例，收获也很大。特别是对人民日报社一批骨干后来的成长和发展，是起了相当好的作用的，值得纪念！这在《十里店》一书中，虽然只有部分反映，但我想它对所有当时在武安县九区参加土改复查的同志均会有亲切之感，而且对于在各个解放区参加这一工作的同志，也会引起亲切的回忆与联想。

张磐石

1981年10月27日

作者为中译本写的前言

将《十里店》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使我们惊喜交集。一方面，我们感到是一种极大的荣耀；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惶恐不安，因为，这将把两个西方人（一个加拿大人和一个英国人）所写的关于中国土地改革的书，给对这场运动了解得深刻得多的中国人民来评价。我们不禁想起一句英国的谚语来，“不要教你的祖母怎样煎鸡蛋”。我们是绝不敢“班门弄斧”的。我们只希望中国读者能指出其中的缺点和遗误之处。当然，如果某些内容能引起他们的兴趣或者他们认为有价值的话，那就更好了。

写这本书，花了很长时间。如果没有许许多多中国同志孜孜不倦的帮助，要完成它是完全不可能的。这里，首先要感谢的是十里店的群众，他们是那样百问不厌地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另外，还有许多干部，从基层组织的同志到薄一波同志（他当时是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杨秀峰同志（他当时是边区政府主席）、张磐石同志（他当时是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长，主管武安九区的土改整党工作），以及其他许多同志，无法在此一一列出。然而，我们必须提到的是由安岗同志（他当时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率领的主要由人民日报记者组成的土改工作队的同志们。还有外事训练班（现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前身外事训练班，当时设在靠近石家庄的一个小村子里）的教员和学

生们，他们帮助我们翻译了大量的文件。在翻译工作中，我们要特别感谢李棣华同志（他当时是薄一波同志的英文秘书），他参加了农民和工作队召开的许多会议。他有时蹲在露天的石台上，有时坐在农民家里的小凳子上，把农民们太行口音很重的、我们根本听不懂的土话，流畅地译成地道的英语。

如果说，在有了所有这些帮助后，这本书还费了很长时间才写成的话，那么，出版它所花的时间就更长了。在中国刚刚解放的时候，七十年代出现在西方的那股“中国热”还不存在。这样一部书，即使是在最好的出版时机，也根本不会成为畅销书。这种风险，使最初的出版商望而却步。但是，他们同意出版以《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为题的关于十里店 1937 年至 1947 年（我们到达那年）这段历史的书。以后，又出版了我们写的《阳邑公社的第一年》（十里店后来成为该公社的一个大队）这本书。但是，我们一直认为，只有《十里店》这本书，才是最有价值的。

多年来，这部书在英、美出版商手中辗转传阅，但无法出版。一直到引起了在纽约的众神书店工作的詹姆斯·佩克的注意后，才有了出头之日。他给了我们很大鼓励，但也提醒我们，尽管该书的手稿在过去几十年间曾经反复修改和重写，但要出版，仍需作进一步的修改，主要是要作大量的删节。我们当时正忙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教学工作，于是，就冒昧地向他提出：“能否由你来作修改呢？”他与他的同事，特别是玛琍·巴尼特，欣然同意了。今天这部书能同读者见面，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们的努力。

这一漫长的过程是很有意义的。1947年当我们从英国第一次进入中国解放区时，我们充满了幻想。初次接触这个“英勇的新世界”，真使我们为之目眩。经过三十多年后，我们才体会

到了一些在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但在1949年6月30日听广播毛泽东同志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中说到“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象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时，我们发笑了，当时我们认为：“他很谦逊，他是一位诗人。这不过是写文章的辞令。”现在，我们对他当时的见解才开始有所理解：尽管土地改革、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整个中国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更复杂的斗争仍在前面。

当把这本书呈献在中国人民面前时，我们看到，在经历了大搏斗的剧痛后，中国开始了新的长征。她面临着重建自己的经济，抵制道德败坏，恢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以及恢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所有优良传统，特别是在土改斗争中所执行的群众路线的传统的更加伟大的斗争。今天，我们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乐观情绪，这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这种乐观的态度比起1947年来，更为清醒、冷静并具有坚实的基础。因为它是以实事求是为根据的，而不是建立在曾经一度深深地禁锢了許多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盲目信仰和夸夸其谈的基础之上的。

如果这本书能对促进实事求是的报道态度，刻苦而科学的社会调查研究风气（没有这种态度社会进步是不可能的）做出一点微小的贡献的话，我们的努力，以及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中外朋友们的努力，也就算得到最好的回报了。

1980年11月

于北京

作者介绍

大卫·柯鲁克生于伦敦，在英国和美国受过大学教育。西班牙内战期间，他加入国际纵队英国旅作战。1938年首次来华教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远东英国皇家空军服役，尔后，在伦敦大学的东方、非洲研究学院学习中文。

伊莎贝尔·柯鲁克生长于中国的成都。她是一位加拿大传教士的女儿。她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获得心理学学士和硕士学位。毕业后，她回到中国的西部和西藏地区进行了大量的人类学考察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在英国一家兵工厂工作，尔后，加入了加拿大军队。

1947年，柯鲁克夫妇来到中国解放区，研究土地改革运动。1949年，他们作为外事训练班的工作人员进入北京。这一外事训练班后来发展成为北京外国语学院，柯鲁克夫妇也就在那里工作至今。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国际友人柯鲁克教授夫妇于1948年春作为观察员采访河北十里店村土改复查和整党运动的记实性作品。作者翔实而生动地描绘了工作队深入发动农民的过程，反映了落实党的土地政策后，翻身农民的欢乐情绪，报道了消除左的割封建尾巴运动的消极影响的过程，以及整党后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崭新面貌……

目 录

作者为中译本写的前言	1
1. 到达十里店	1
2. 工作队来到十里店	16
3. 发动尚未翻身的农民	25
4. 党员的自我批评	37
5. 串连贫雇农	45
6. 寨上划阶级	56
7. 选举贫农团发起人	71
8. 宗派主义	84
9. 寨上评议党员	89
10. 群众评议党员	95
11. 组织贫农团	108
12. 建立贫农团	118
13. 党和群众	130
14. 建立农会	141
15. 制服老虎	149
16. 傅高林的问题	165
17. 革命知识分子的一些思想问题	169

18. 村人民代表大会和新的村政府	175
19. 第二次划阶级	187
20. 斗争对象	192
21. 丈量瘦地和肥地	197
22. 摘帽子	210
23. 模范家庭妇女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222
24. 查窟窿找补丁	233
25. 找更多的填窟窿的土	247
26. 填窟窿	255
27. 既往不咎	266
28. 民主领导的一些问题	273
29. 党支部面向未来	281
30. 分配果实	293
31. 全村的总结	312
32. 工作队回村检查工作	323
33. 展望未来	328

到达十里店

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内战的中期，我们乘坐一条驳船，沿大运河顺流而下，穿过无人区，进入解放区。踏上华北辽阔的土地，一个新世界就展现在我们面前，在那里，一亿四千多万人民正在同蒋介石进行着最后决战。这一年是1947年，是蒋家王朝二十年腐朽反动的统治行将复灭的转折点。封建势力在中国，即使在最小的村庄，也处于崩溃之中了。

我们很快就发现，为了表达这一革命的社会的思想和状况，解放区的人民创造了不少新词。其中，几乎没有比“翻身”这个词更能有力地表达革命过程的实质了。

从字面上讲，“翻身”就是“躺着翻过身来”。其意思是说，自己站起来，获取应有的权利，享受应得的东西。在个人与社会的这场变革中，农民最关心的是土地改革。共产党人着手改变中国旧的传统土地关系之日，也就是开始改造整个中国社会之时。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砸碎无所不在的地主阶级统治的枷锁，意味着第一次获得牲口和房屋。这是一场激发农民破除久已养成的卑怯心理和改变附庸地位的斗争，奋起反抗长期压迫他们的人的斗争。

中国人说的“解剖麻雀”，就是对某一具体事物作细致全面的调查研究，借以找出对同类事物起支配作用的一般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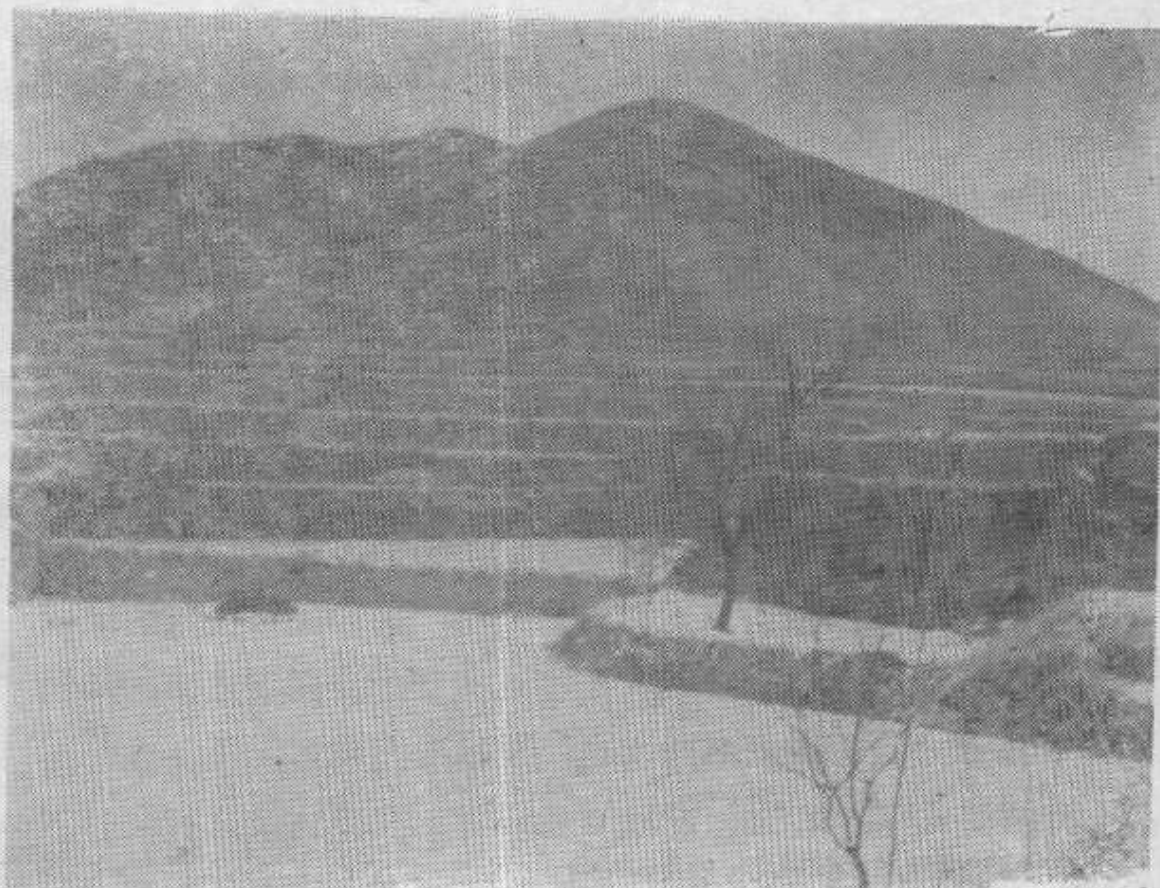
律。我们也本着这一方针，对十里店这个中国村庄进行了调查研究。虽然这里有许多独特的东西，但对于了解整个解放区内无数村庄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来说，它仍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缩影。

1947年11月，我们到达十里店。这个村庄与另外一些村庄组成了一个解放区的首府。这一解放区称为晋冀鲁豫边区，包括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四个毗邻省份的广大边境地区，面积为八万平方英里，人口约三千万。十里店就在北京西南约275哩，上海西北约600哩的地方。它位于该地区的主要贸易、交通运输线上。这条运输线把十里店与它东边二十哩的武安县城联在一起，并且通向邯郸城——京汉铁路上的一个车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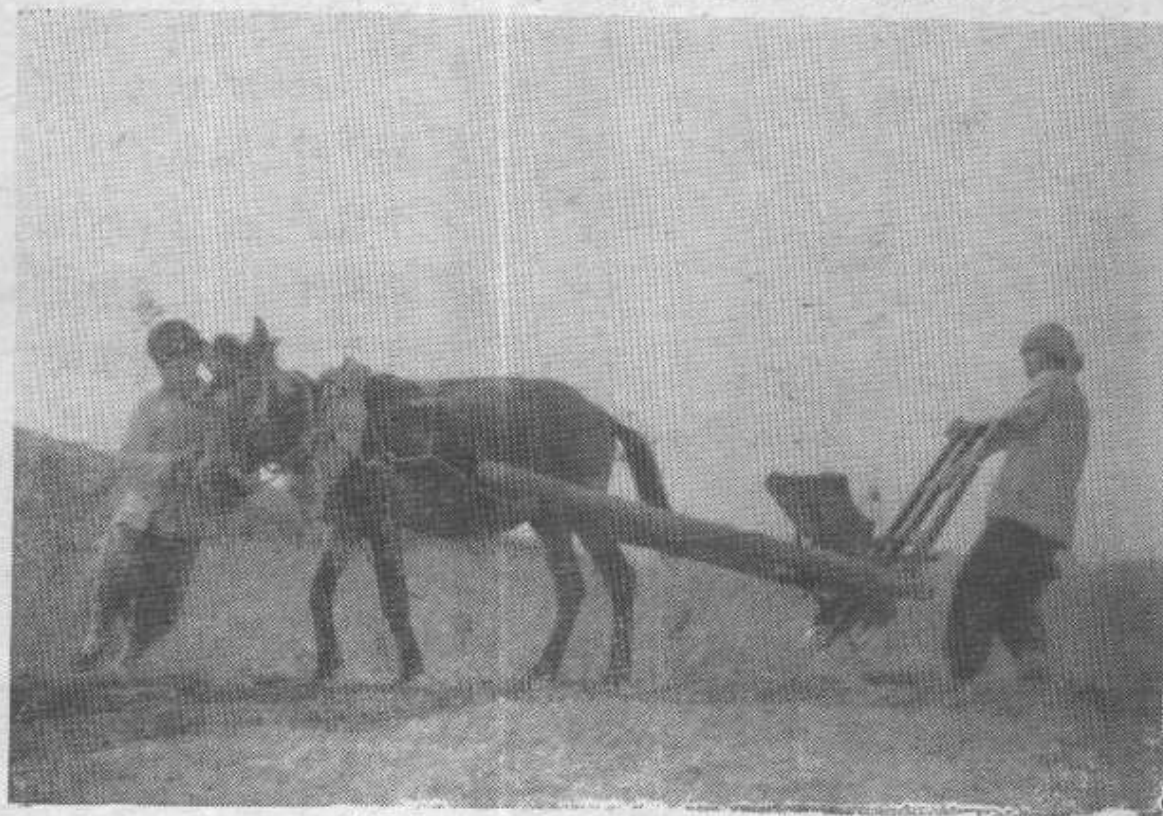
十里店在洺河之滨。在村东，沿着一年干涸九个月的河床，有一条古老的土路。山坡随着河谷变窄而陡峭起来。人们花费很大力气在山坡上造起了梯田。一个个山头久经风雨侵蚀，光秃秃的象个“和尚头”。

再远一点的地方，与其说是一个村庄，不如说是两个村庄。在河谷里的是主要村子，通常叫“街”；从这里向东北顺着山坡往上走，是“寨”。鹅卵石路一直铺到大石头寨门。山坡的下半截被削成了断壁，寨门的石房的后背正好倚在上面。这寨子曾是地主用以统治下面村子里的农民的城堡。

坐着骡车，通过别致的南城门，我们进入了十里店。考究的拱门上面写着粗大醒目的白字：“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大救星”。这是一首填上新歌词的流行民歌里的一句歌词。有的标语则是痛斥蒋介石的。在另一堵墙上有一块黑板报，用粉笔抄出当天的新闻。这些新闻是从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上抄下来



农田后面山麓的丘陵，乱石遍布的山坡上有着一个个瘠薄的农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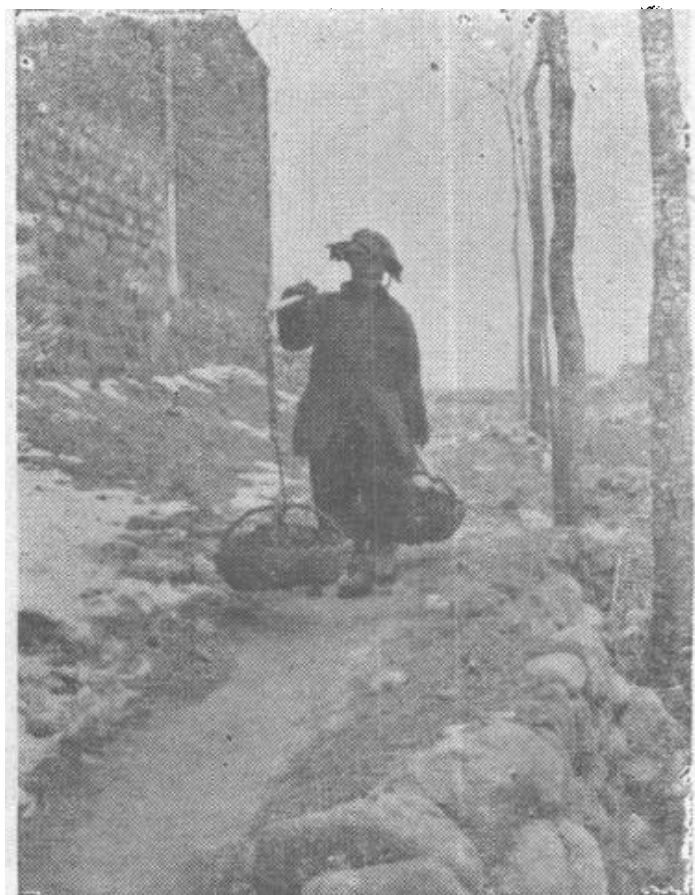
种谷子，一个小男孩在前面牵着骡子。

的。这家报纸还常常为供黑板报采用而刊登一些通俗易懂的短文。

尽管村中街道是公路的一段，街上只有一家起眼的商店，就是供销合作社。此外，还有几家供过路旅客和小贩吃饭歇脚的小饭铺和客店。其中有一家羊汤店，由于它是赶车人的一个好的落脚点而远近闻名。

这些地方都成了村中的社交中心。男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店前，妇女们则围坐在店门口和房檐下纺纱，搓线，或把新染的布一块块地晾起来。孩子们到处乱跑，他们尖声尖气的喊叫声与村里其他声音——车轮轧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发出的辘辘声，卖油条小贩唱歌般的叫卖声，驴子的吼叫声，镐头和锄头

上中农老王用扁担把肥料送到自己的地里，
他曾被错划为“斗争对象”，后来得到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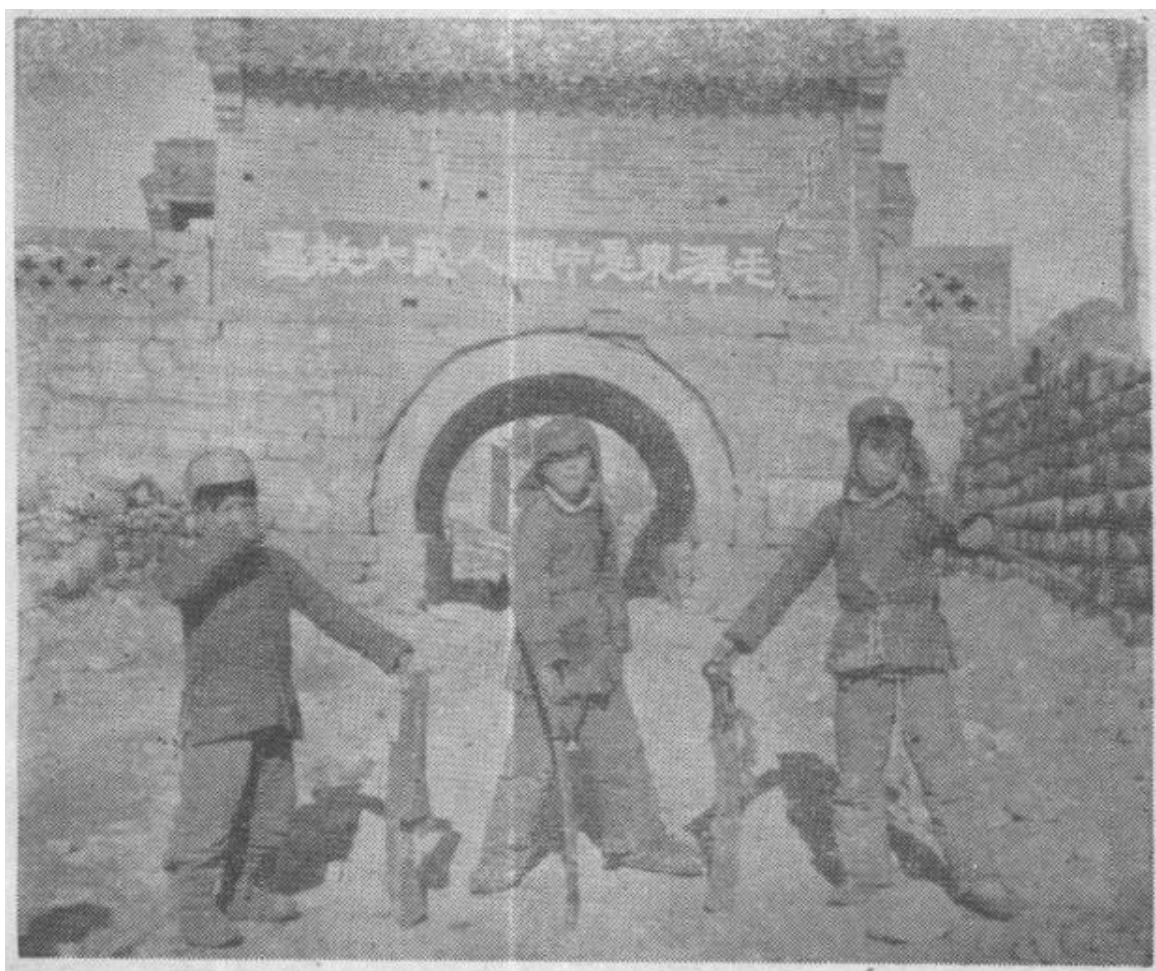
在山边敲打石块时不时发出的断断续续的铿锵声交织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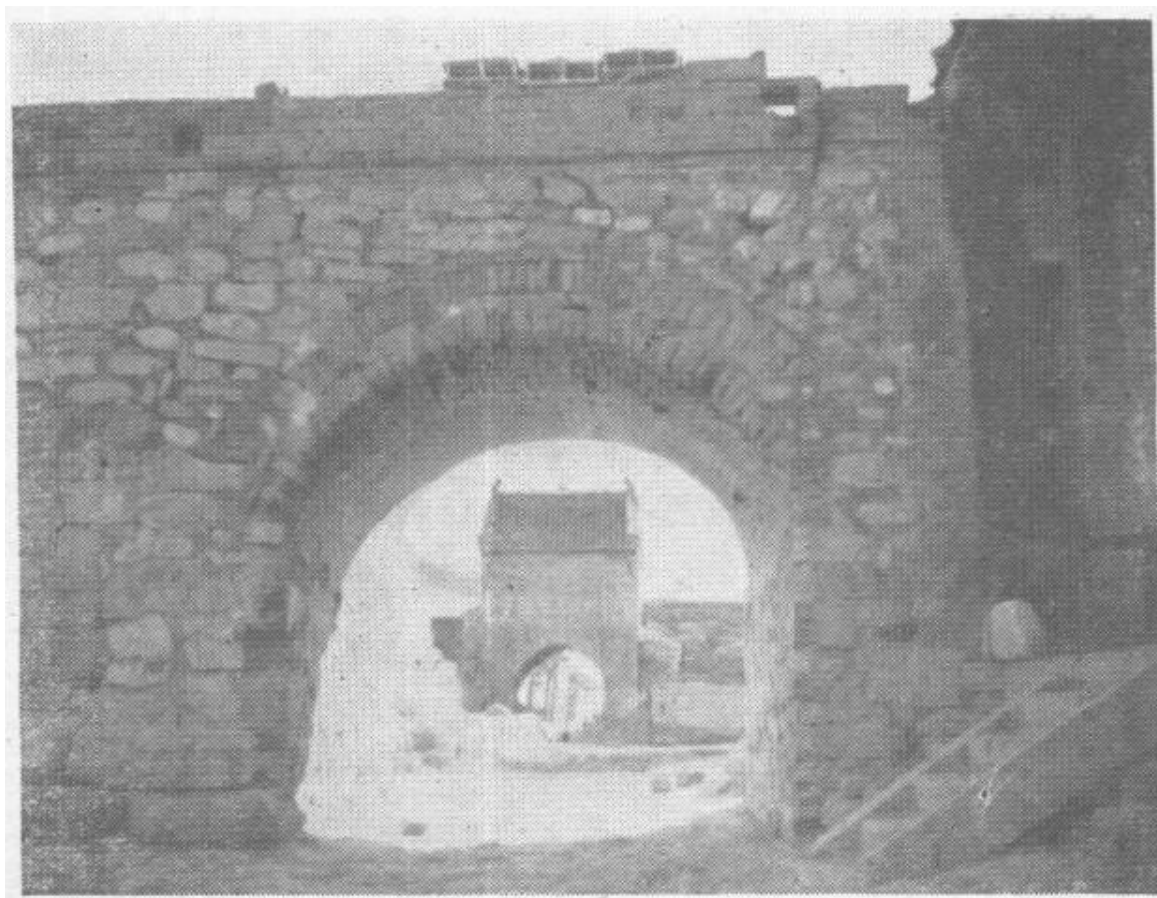
我们在来到十里店之前，提出了到一个村子里研究土地改革的计划。在等待正式批准我们的要求的日子里，我们应邀住在十里店边区政府的招待所里。实际上，这个“招待所”是由几户农民分散的住房组成的。我们用一间当卧室，另一间当餐室。

村里的干部和党员已被告知我们是来解放区参观的外国朋友，这样，我们得以在村中自由行动并受到大多数老乡的友好接待。他们不厌其烦地回答了我们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我们是在一个重要的时刻来到十里店的。中国共产党在1947年9月召开会议，起草了一个旨在对封建土地制度进行彻底改革的土地法大纲。这被认为是激发全体农民的生产热情和把战争引向最后胜利的关键。土地法大纲中包含在三种情况不同的地区内执行土改决议的具体指示：在老解放区，那里的封建势力已基本上被铲除，但是土地占有还不公平，民主制度不健全，而且许多党支部是不纯洁的（领导权落到地主、富农或其

三名儿童团员，他们在村口站岗放哨，检查过往行人的路条，并向十里店的治安员报告可疑人物。





十里店的北大门，从门洞中看到的是南大门。

它“阶级异己分子”手中)；在“半老区”，那里需要采取迅猛、有力的手段来推进土改；对新解放区的指示指出，那里开展大规模土改的条件还不成熟。为了制定执行土地法大纲的各项具体计划，各个边区的中央局随即召开了会议。

我们到达的时候，晋冀鲁豫边区正在召开土地会议。这次漫长的会议不仅研究了推进土改运动的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法，而且，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了“自我整风”，为他们今后领导土改运动作好准备。

会议结束后，我们同边区政府主席商讨了我们的计划。他向我们建议，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去研究一个为执行土改决议而组成的试点工作队的工作。其中，有一个工作队很快就要进

驻十里店——一个典型的老解放区村庄。我们也认为这个村子是我们进行工作的合适地点。

那时离工作队进驻十里店还有六个星期的时间。因此，在从1947年12月初到1948年2月这段日子里，我们收集了有关这个村庄的十年(1937—1947)的历史情况和封建土地制度变革(在以前十八个月中基本完成的)情况的材料。收集这些材料依靠了集体的努力，参加这一工作的人因时期的不同而不断变化。经过与我们的中国同志的共同努力，《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成书了。

从1948年2月26日到4月15日，十里店掀起了一场全面贯彻土地法大纲的运动。由于十里店是老解放区，土地法的某些条文已付诸实施，无须一切从头做起。因此，这场新的运动称为“土改复查和整党”运动，或简称为“复查”运动。我们得到了观察和研究运动进程的便利条件，唯一的限制是我们自己对耳闻目睹的种种的理解能力的局限。我们获准参加各种会议，有老乡的会议，也有工作队的会议；也可以查阅大量的资料：村里的文件，各种统计数字，对工作队的指示，等等。此外，我们目睹了村中大部分日常生活的进程，也参加了许多解决村里日常问题的会议。这本书是我们在七个星期中亲眼看到的“复查”运动的详尽记录。

十年的斗争给十里店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在各种改革开始之前的1937年，村里百分之七十的农民的生活都是极其悲惨的，一年里大部分日子靠树皮、野菜和“稀得可以照出月亮”的稀粥餬口。按经济发达国家的标准衡量的话，十里店没有一家富户。无论地主还是农民，都穷得可怜。尽管如此，他们之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灾荒年间，死亡或逃荒的，因贫困无力抚

养子女而不得不把他们弄死或卖掉的，为饥饿驱迫而到军阀队伍里当兵的，因交不起租而坐牢或因欠债而丧失自己微薄的家产的，都是穷人家里的人。灾荒对于地主和富农来说，正是趁机占有抵押品和夺得土地的极好机会。

1937年的十里店，有一千四百多人口和将近七百亩地。如果把这些土地平均分配的话，每个人可分得半亩地。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八户地主和富农占地一百二十亩，另外，外村地主还占地九十亩左右。四十户上中农不仅过着富裕的日子，而且每年还有所节余。剩下的三百七十三户人家仅仅占地二百一十八亩。

村里平均每十个人才摊得上一头牲口。如同土地占有的情况相仿，最富有的二十户人家每家有两头牲口，剩下的农户，平均每四户才有一头驴，用老乡的话说，每家只有一条驴腿。事实上，大多数穷人连一根驴毛也没有。

贫穷把无数农民赶上了背井离乡的道路。穷人有的土地的确太少了，难以糊口。结果，每逢农闲时节，碰运气能找到活干的话，烧一个月的砖胜过种一年地。但是，这种营生时有时无，难以维持稳定的收入。尽管如此，1937年干这种营生的人，仍有二百零一户之多。其他人则到别的村里揽活干。如果没有这种额外的营生，许多贫农家庭就难以维持他们最起码的穷苦生活。

共产党来到以前，十里店就在这种畸形状态中跛行。长期以来，土地就被不经济地分割成了小块。因为根据中国的继承传统，土地要在所有的儿子之间平均分配。为了避免陷入这种土地分散的困境，大多数地主和富农竭力靠作买卖和放高利贷来增加收入。每一代人因袭的目标就是靠购买、占据抵押品和

别的方法增加家产，使儿子们继承遗产时，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一份象他父亲继承遗产时一样多的财产。由于高利贷（由雇佣的流氓恶棍之流掌管）可以获得比搞生产高得多的利润，因此，它就成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可行的办法。因而捞取高额利息被认为是效忠于家室的德行。

这种以资本去放高利贷，而不去发展生产和建设的作法，不仅严重地损害了早已停滞了的经济，而且，助长了村中损人利己的歪风。为了生存，人们进行着你死我活的竞争，这种竞争毁掉了真诚的互助精神。

1940年，日本军队在洛河流域进行了扫荡，烧杀劫掠，赶走了当地的国民党政权。日本人来到之前，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一直来往不断地驻扎在十里店。当他们逃到武安县城时，在老乡们记忆中留下的只有这些国民党军队犯下的野蛮罪行，而没有任何抵抗侵略者的事迹。尽管日本军队从未占领过十里店，但是，在一次扫荡中，他们洗劫了这个村庄，杀害了十个老乡。

随后，就象农民说的那样：“西边出了太阳。”共产党领导的一队队的八路军，从位于太行山的心脏地区的根据地向东开来，组织农民起来自卫。

1942年至1943年，正当对敌斗争蓬勃发展的时候，闹起了饥荒。多少年来，饥荒是中国农村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它给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带来死亡和瘟疫，又使更多的人沦为乞丐。它使农民家破人亡，父母因为不愿亲眼看到亲生儿女被活活饿死，而被迫将他们卖掉，送人，遗弃甚至弄死。

1942年至1943年的饥荒是历史上罕见的。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邻近地区的农民所遭受的苦难，其规模和惨状更是笔墨难

以形容。然而，共产党人号召农民动员起来战胜天灾和敌人。正是在这场与可怕的灾难所作的斗争中，新成立的农会在村中成了最有力的群众性组织。在第一次大的运动中，即“挖掘地主藏粮”的运动中，农会胜利地大大减少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的行为，并给急需的群众分配了胜利果实。这场斗争加强了贫农与中农之间的联系。这种经受过锤炼的团结，为农民掌权的最初尝试奠定了基础。

然而，这些最初的步骤是在灾情最严重的关头采取的，它们减轻了某些痛苦，但是不能根除苦难。一些人仍旧讨饭，卖儿卖女，上吊自尽。在十里店四百多户人家之中的四十九户，五十九人终于饿死。

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彻底改革，显然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毫无疑问，正是贫农与中农才最紧密地团结在新建立的地下党组织周围，而且，党在以后领导的历次改革运动中，也正是从他们之中吸收了新鲜成份。四十年代初，在组织群众战胜了天灾和日本侵略者以后，共产党制定了一套新的税收制度。根据这一制度，赋税按比例地在占人口百分之三十的富户中征收。这样，就免除了百分之七十的农民所负担的赋税。农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好运。许多农民头一次发现他们有足够的种子播种了，再也不必象过去那样，在粮价最高的时候向人家借种下地，而在收获季节，粮价最低的时候还帐。通过这一简单而又彻底的改革，一下子免掉了农民负担的债务。

随后的历次运动，主要目的是动员一切可能的资源和人力去增加生产和支援前线，先是抗日，后是反蒋。对于西方人士来说，这些运动的名称听起来非常奇特——“查黑地运动”，“填

平补齐”、“挖防空洞”。然而，这些丰富多彩的新旧中国语言的混合物，形象地体现了这场伟大变革的实质。

在这一系列改革的过程中，农民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和社会。从本质上说，这种新意识来源于阶级的划分（或划“成分”）。中国共产党关于划分阶级的理论和实践，可以追溯到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期。此后，虽然作过某些细微的修改，但划分地主、富农、中农或贫农的基本原则，是始终不变的。阶级成分是根据是否自食其力，剥削他人或自己受剥削而定。

在旧社会，农民的苦难以及他们对压迫者的仇恨，通常会突然爆发出来，但是，最终却表现为对个别地主或富农发泄个人不满和仇恨的徒劳情绪。宗族关系以及其他种种陈规陋习常被用来掩盖阶级冲突，然而，这种对压迫者的仇恨在中国农民的心底仍然不可避免地爆发出来。共产党人并没有引进阶级斗争，他们只是设法引导农民意识到阶级斗争的存在，进而以此解放整个国家并建立新的社会秩序。

作为共产党领导的改革的产物，一个新阶层——“新中农”出现了。当我们到达十里店时，村里大约三分之一的农户由贫农和雇农上升到“新中农”之列。贫农仍然占全村总农户的三分之一，但他们都有了土地。尽管财产很少，生活大大低于普通标准，但是，他们总算可以生活下去了。而且，债主或地主家的狗腿子上门夺走他们仅有的门板、被子、饭锅或瓦罐等等的威胁也不再存在了。原先的地主和富农，如今只占有他们自己过去占有的土地的六分之一。在十里店，再没有靠剥削他人为生的人了。

十年时间，对于造就这一切说来，并不算长，特别是处于

外来侵略和内战之中，就更是如此。困难是巨大的，错误是难免的。但是，首要的任务完成了，封建主义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无论到哪里，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伴随着土地所有制的改造，进行了深刻的社会与政治变革。通过互助组的形式，劳动力初步得到了有效的利用。农民受到鼓励，一组一组地自愿结合起来，共同劳动，共同使用农具和牲口。在十里店，为发展农业生产，组织起了互助组；为当地土布着色而开设了染坊；并在村边半里路的地方烧起了石灰窑，等等。所到之处，我们都看到了这种合作的办法所产生的热情，以及它对生活的其它方面如社会、政治和教育所产生的有益影响。由于缺少资金而在冬季常常发生严重萧条和无活可干的现象，而今也正在消失。

一些旧风俗，不是正在消失，就是发生了很大变化。祭祖不再是村中常见的活动了。封建家长制正在被削弱。由村政府收税，村办小学开课，新成立的互助组解决农忙季节老乡缺少劳力和牲口的问题，以及在农闲季节筹集副业资金的问题，因此，宗族组织再也不能标榜自己的作用了。对宗族的忠诚开始让位于阶级的团结。这不仅明显地表现在农民对旧的权力结构的憎恨上，而且表现在对领导他们摧毁旧势力的共产党的坚定信赖上。

然而，问题依然存在，有些甚至很严重。尽管有一百二十五户贫农上升为新中农，但是，在这样一个素有扼杀女婴的恶习的社会里，新中农里的许多光棍汉仍然无法成家。家族间历年对立的痕迹依然存在。村里百分之九十五的农户姓王、傅、李。当村干部做了一些不得人心的事以后，李姓或傅姓的老辈就会咕哝，这与大多数村干部姓王有关。本族亲属之间

残存的感情联系，仍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本族内部的阶级矛盾。

以往的一种更为有害的旧作风是干部专横跋扈。大多数干部都表现得非常勇敢和刻苦，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包揽一切，而不是“发动群众”，这是一种需要极大的耐心的工作。他们过分依靠少数积极分子来进行各种各样的斗争。党从长期的经验中认识到，群众是多么的不同和复杂。只有少数人在政治上是先进的，另外的少数人是落后的，而大多数人则处于中间状态。要把运动引向胜利，就要使政治上先进的分子与绝大多数人紧密地一起工作。如果在群众运动中缺乏这个必要的基础，干部只是向群众发号施令，而不是引导他们，就会发现自己是孤立的。积极分子如果不在大多数群众之中深深扎根的话，就会走向右或左的极端。这关系到民主的问题。

然而，在1947年冬季造成恶劣影响的是“割封建尾巴”运动。这场运动是几个月前发动的，旨在解决那些还没有彻底翻身的农民缺少土地的问题。这些农民几乎占十里店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由于害怕报复而在过去的斗争中表现消极，或者出于对宗族的忠诚而站到了地主或富农一边。这一部分数量颇大的农民需要发动起来。但是，这时已没有现成的财产和土地可以分配给他们了。因为，尽管在过去只有部分农民被发动了起来，尽管地主和富农采取了巧妙的逃避策略，绝大部分财产和土地还是被分光了。那时候，十里店已经没有靠雇工剥削占有惊人数量土地的人了。

当时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就是这种情况：为了争取战争胜利，分区和县政府的大批的共产党干部想方设法去发动那些尚未翻身的农民，以使他们分到应得的土地。在从地主或富

农那里已经得不到任何东西的情况下，就从还有土地和财物可分的农户中人为地划分出来了一个叫做“封建尾巴”的新“阶级”，（这是完全违背共产党划分阶级的原则的），从而开展了一场“割封建尾巴”的运动。所谓“封建尾巴”是指某些人所拥有的不是靠自己或父辈及祖父辈的血汗挣来的生产资料。如果他的上两辈中有人是地主或富农的话，那么，他的土地和财产就被认为是从人民手中掠夺来的。在许多村子里，几乎百分之二十五的中农因此而象地主、富农一样被划为“斗争对象”。

这条左倾路线后来被称为“贫农路线”，并作为把中农排斥出革命阵营的重大错误而受到批判。事实上，“贫农路线”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中共中央的赞同，党和政府的政策一贯强调要依靠贫农、团结中农。

十里店的共产党员从来没有完全按照这条路线办事。的确，他们有克制地领导了“割封建尾巴”运动，“斗争对象”除了受到一些政治上和社会上的歧视外，经济上受到的损失是有限的。

尽管如此，极左倾向的危害在十里店也是很明显的。那些指望从被错划为“封建尾巴”的农户手中获得土地的贫农感到失望，有些人感到被新的村干部欺骗了。而在另一方面，中农感受到了极左路线的威胁，甚至那些未被触动的中农也人人自危，担心有一天会整到自己头上。

中农又把破衣烂褂穿了起来，并且，注意在人前不吃白面，而只吃糙小米和玉米。有一个新中农，因为害怕有一天自己的驴子会被“斗争”走，就把驴子卖掉，而用自己的肩膀往地里背粪。别的中农则很少往自己的地里施肥，担心土地早晚会被收走分给贫户。生产，不可避免地下降了。

为了纠正这些偏差和发展农业生产，太行区党委接连下达

了三项指示，紧接着就在农村中召开了会议。

一月中旬，武安县第九区召开了干部和农民代表会议。其目的是纠正“贫农路线”的极左倾向，并消除中农担心没收土地分给穷户的恐惧心理。

主持会议的区干部听完汇报后，引导代表们讨论了贫农与中农联合的必要性。最后，制定了打消中农的恐惧心理的计划。

十里店的代表回村后召开了会议，传达了区上会议的决定。接着，各个互助组又召开了会议，逐条讨论了如何使那些放松了冬季生产的组员挽回失去的时间的措施。

一条崭新的标语出现在十里店北大门的门洞上方：“贫农和中农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

如何使这诗一般的语言成为现实呢？如何在不损害中农利益的原则下，把其余的贫农的生活提高到中农的水平呢？如何发扬民主？如何纯洁和加强党的组织呢？这些就是摆在十里店和其他村子面前的问题。

在1947年底至1948年初的冬天的土地会议上，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制定了在边区那些最早解放的地区解决这些问题的计划。为了获得指导复查运动的经验，中央局派出了试点工作队。其中有一支工作队在1948年2月25日到达了十里店。

884497

工作队来到十里店

2月25—2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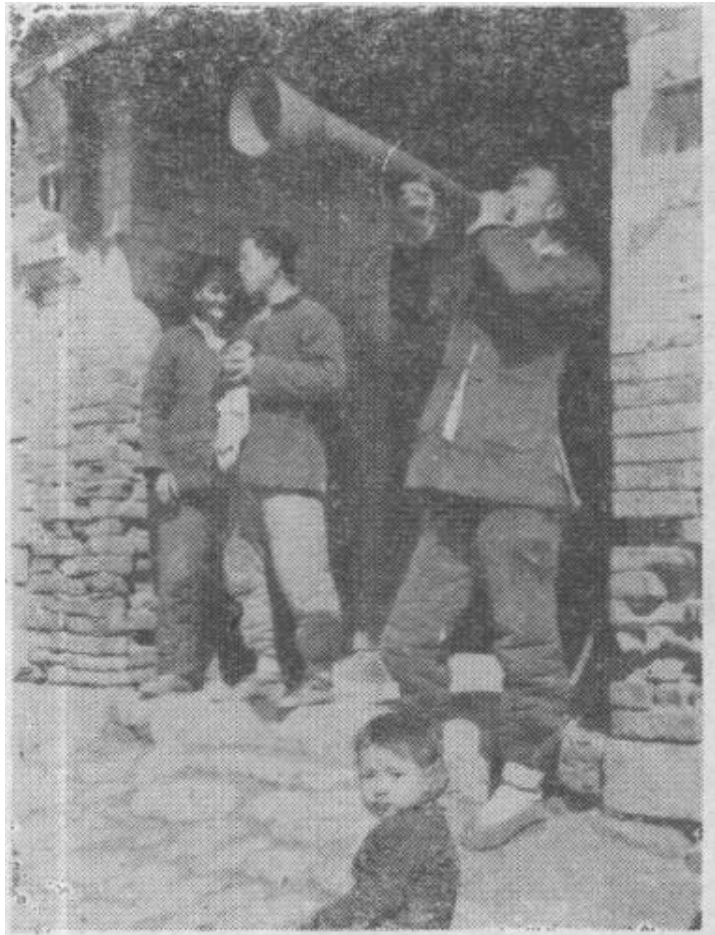
工作队有人建议先派一名侦察人员装扮成小贩进村，但是工作队否定了这种意见。相反，他们派出了一个由三人组成一部分工作队员。从左起：吴舫，何燕凌（秘书），冷冰，罗林（队长）。



的先遣小组，于1948年2月25日下午到达十里店。一名队员找到村里的党支部书记王绍贞，向他讲明工作队的来意，并了解了村里存在的问题。另一名队员则到边区政府的各个机关，了解当地情况。

第二天，其余的工作队员都来到了十里店，开始走访那些还没有“站起来”，即还没有翻身的农民。当天晚上召开大会，向全村农民介绍了工作队。

寨上和下街的男男女女，沿着洒满月光的冬小麦地的田埂，朝着村里的古庙走去。（寨，是原先的地主的城堡，它从小山上俯视着构成村



通知村里人来开会。最左边为傅便则，站在他旁边的是傅长亭。

子的主要部分的下街。)除了“斗争对象”——原先的地主和狗腿子——以外，每个农民都被邀参加大会。

许多中农忐忑不安地到会，担心这次运动的矛头会指向自己。一些贫农则渴望能从那些较为富裕的同乡手里分得土地和牲畜。有些贫农则抱着他们久已养成的淡漠心理来到庙里，心里嘀咕着，“以前我没有分得多少东西，这次，我也不指望能得到什么。”



在庙院里举行的大会。

一些老乡之间存在着私怨，一个人对他的邻居说：“这次我也许能报仇了。只要能出得这口气，我才不在乎以后会出什么事呢。”一位老农道出了村里上了年纪的人的共同看法：“又要乱了。只指望他们别把村长搞掉，他是历任村长中最好的一个。”

这个晚上，要把本村的党员以及工作队一起正式向全村农民作介绍。党员之中，除了七名过去是公开的以外；其余的都是地下党员，这连他们自己家里人都不知道。滋滋作响的汽灯照亮了毛主席的巨大画像，画像下面，坐着整个支部的二十八个党员。有个党员惴惴不安地说：“人人都夸毛主席领导的党。当他们发现我这样的人也是共产党员的时候，也许会笑话的。”

然而，党支部书记心里却很踏实。他对大家说过：“有些政

治上的落后分子当然想把我们赶下台去。但是，我们还是本区的先进党支部。我们在过去的斗争中是积极的，而且，在对待斗争果实的问题上也是问心无愧的。”

村里人聚到庙院内，有些人坐在自己带来的砖头或小凳上，有些人蹲在地上，都盯着这支前来领导他们执行新土地法大纲的，由十二名男、女队员组成的工作队。

会议从介绍工作队员开始。头一名站起来的是队长罗林，他来自南方省份湖南的农民家庭，是一位身材魁梧的人。他看上去沉静而耐心，性情温和，但老乡们后来得知，他也有那种有名的湖南脾气，偶尔也会勃然大怒。老乡们很难听懂罗林的湖南口音，因此，工作队在十里店期间，他很少在大的集会上作长篇讲话。

接下来介绍每个队员时，都赢得一阵欢迎的掌声。工作队秘书何燕凌是《人民日报》要闻版和国际版的编辑，他身材修长，戴一副钢架眼镜，看上去象个毕业不久的学生。吴舫是工作队里唯一的女队员，在《人民日报》图书馆当研究人员。她出身于长江沿岸的一个地主家庭，抗日战争时期到成都的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学习。她在那里参加了学生运动，后来到了解放区。

随后站起来的八名队员也是做新闻工作的。此外，有两名队员是武安九区的党员干部。杜宝国是一位最近才识字的雇农。张青秀，本来是个中农，三十二岁上自学了文化。共产党在村里建立合作社时，他是最早的积极分子，后来，负责组织区里的合作社。

最后被介绍的是吴象，他才二十七岁，是前线记者。多半是由于他讲话通俗，简明，因而在这个晚上被推选为工作队的主要发言人。

吴象说：“我们是边区共产党中央局派来的工作队，是来帮助你们实行土地法大纲的。”他以简短明白的语言解释了土地法大纲的主要精神：

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当地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它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

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①。

吴象的讲话表明，虽然工作队刚刚进村，他们已经了解到一些农民的愿望和顾虑。他指出土地法大纲将给每个农民带来好处：

“这个土地法大纲是根据全体人民的要求制定的，它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

“它会给贫农和雇农带来好处。我们知道，村里有些人还没有真正‘站起来’，没有翻身。听说有个人只有一亩半地②；有一家六口人只有十亩地，还有一家两口子 and 老母亲挤在一间小房里。象这样的一些‘窟窿’不填上，就说不上彻底翻身。

“土地法大纲对中农也有好处。中农有三种情况：有些人收支相抵，有些人入不敷出，有些人略有节余。根据土地法大纲，入不敷出的要补给土地，收入相抵的保持原有土地不变，略有

① 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261页《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注释。——译注

② 当时这个村子平均每人有三亩地。——译注

节余的，在他们自愿的条件下，可以让出一些土地给他们的穷哥儿们。但不要求他们出让牲口、农具或其他财产。

“我们了解到过去村里有些中农被斗争了，被没收了财产。这是错误的，必须纠正。中农的土地所有权必须明确地加以肯定，这样，他们才能安心种地。

“至于那些受到过合理斗争的地主和富农，他们必须自食其力。这样就能把他们改造成为社会上的好人，有用的人。因此，必须给他们生产资料。

“可见，在毛主席领导下制定的这个土地法大纲，对每个人都是有好处的。”

从庙台上，吴象环视了一下挤在院里的老乡们。在灯光照耀下，站在人群前面的人们的脸上闪着亮光。在月光普照下，甚至在站在后面的人们的脸上，也可看到闪着亮光。他开始说明工作队执行土地法大纲的具体计划。

“毛主席说，我们要依靠贫农和雇农，使他们与中农联合起来。他们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当家作主。

“我们先要把老实、纯洁、可靠的贫农雇农组织成一个团体。他们可能认为自己不善于讲话，难以胜任。其实，他们错了。看看赵庄的靳福有吧，他过去只是个开山地的贫农，现在当上了村政府委员，而且是很出色的一个。

“贫农团成立后，就要改组农会，然后选举村政府。”

讲话结束时，吴象重申了工作队进村后多次讲过的意见：分配土地只是一个步骤，并不是最终目的，目的是增加生产，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赢得战争的胜利。

吴象说：“现在，由冷冰同志向你们介绍村里的党员。”

院里顿时活跃起来。似乎只有习惯于作报告的冷冰是唯一

不动声色的人。他说：“十里店共产党支部有二十八个党员。”接着，宣读了手里拿着的名单。每个党员在被读到名字时都站了起来。当原先的地下党员站起来的时候，在人群中引起一阵嗡嗡的议论声。

“谁料到有这么多！”一位老人含糊地咕哝。

在头一天的党支部会上，冷冰已经说明党员将会受到教育，而且党的队伍要重新整顿。这时，他当着老乡们的面宣读了中央局《告党员书》中规定的十条守则：

1. 坚决执行土地法；禁止一切违背土地法的言论或行动。
2. 执行党的一切决议和政策；不允许任何向党闹独立的现象。
3. 遵守贫农团、农会和人民代表会议的一切决议。不允许违背这些决议。和群众一条心，不脱离群众。
4. 分配土地和财产时，党员不得多要多占。
5. 党员不得偏袒家族、亲属或同姓，也不得偏袒军属或烈属。党员犯罪时，必须交由人民法庭进行审判，各级组织绝不能因其是党员而加以袒护。
6. 珍惜土地、斗争果实和公共财产，禁止损坏和滥用。
7. 全党必须团结，必须与农民、群众团结起来。不得与农民算旧帐。不得破坏群众之间的合作，挑起事端或参加农民中的宗派活动。
8. 坚决依靠贫农，紧密联合中农。遇事与群众商量，走群众路线^①。不得消极怠工或违反纪律。绝不允许强迫命令或独断专行。不得发号施令或包办代替。
9. 宣传土地法，不得逃避职责。
10. 忠诚老实，实事求是。不作与事实不符的指示或报告。不要两面派，不阳奉阴违。

违背这十条的党员将受到党和人民的严厉惩罚。

冷冰的目光从纸上抬起来，对着老乡们说：“大胆批评干部和党员，帮助他们改造自己。但只能摆事实，讲道理，不许打人骂人。决不能象过去对待有些地主那样虐待或者打党员。如果党员犯了罪的话，可以把他们送交人民法庭。必要时，也可

① 刘少奇说：“群众路线是我党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他还强调说，要彻底贯彻这条路线，每个党员的头脑都必须牢固地树立四个观点，他说：

第一，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我们的一切党员，以及参加我们队伍中的一切人员，只要是忠于职务并多少著有成绩的，也就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不管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与否，也不管他们担负的是重要的领导职务，或是普通的战斗员和炊事员、饲养员等职务……

第二，就是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再无自己的特殊利益。

第三，就是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人民群众自己的解放，只有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斗争，自己起来争取，才能获得，才能保持与巩固。

第四，就是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我们的同志）必须有足够的知识，还必须是十分有经验和十分机警，才能很好地去启发群众自觉和指导群众行动，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

在一切群众中，通常总有比较积极的部分及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部分，在最初时期，积极分子总是比较占少数，中间与落后状态的人总是组成为广大的群众。按照群众路线，必须照顾多数，即是必须照顾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否则先进部分就会孤立起来，什么事情也办不好。我们在群众中提出的行动口号以及斗争形式、组织形式等，都必须是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群众能够接受的，所谓启发群众的自觉与自动，主要地就是要去注意启发那些中间与落后状态的群众的自觉与自动。只有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有了觉悟，有了热情，起来行动的时候，才能有群众运动。

我们必须特别注意教育、团结与组织积极分子，使积极分子成为群众中的领导核心。但是我们绝对不是为了组织积极分子而去组织积极分子的，绝对不能使积极分子从中间与落后状态的群众中孤立起来，而是为了要经过积极分子去吸引与推动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即是为了最广大的群众而去组织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如果中间与落后状态的群众还未自觉，我们就要善于去启发他们，并要善于等待他们；如果我们不愿意等待，而冒冒失失地率领少数积极分子前进，我们就会脱离群众，我们就要失败。

——参见刘少奇《论党》中“关于党的群众路线”一节

以在本村组织人民法庭。

“我们工作队刚到，对十里店的情况了解的还不多。希望大家不论什么时候都毫无顾虑地找我们谈情况。”

工作队宣布散会。尽管夜已经很深了，老乡们仍然三五成群地议论着不走，工作队员也参加了他们的谈话。渐渐地，人群散开了。农民们穿过田野往家里走去。

工作队员留下没走。为了节省煤油，他们灭了油灯，聚在石头筑成的庙门口讨论着这次会议的效果。

队长罗林首先发言：“收尾的话要更明确些。当然，邀请所有的人来找我们谈问题是没错的。但是，重点应该是鼓励贫雇农来。我们要使他们敢于讲心里话，这样，他们才能与中农合作，真正地‘当家作主’。现在贫雇农还很胆小，还没有翻身。那些已经真正‘站起来’了的人，不用鼓励就会找上门来的。”

有一名队员说：“我认为，用不着请什么人来谈问题。我们不想陷到村里的日常事务里去。我们应当花更大的精力来帮助群众组织贫农团，改组农会，选举新的村政府。群众中的具体问题，应当由新的村干部，而不是由我们来解决。”

农民出身的年轻队员杜宝国说：“我觉得群众未必领会了中央局《告党员书》里提出的十条，因为写得不够通俗。我们应当把最容易懂的几点挑出来，或者，干脆把整个文件用口语重写一遍。”他的建议得到一致赞成。

最后，罗林说：“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开了个头。会议结束后，我听到一位老农民说，‘他们的话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明天我们走访贫雇农的时候，就知道他们究竟是怎样想了。”

发动尚未翻身的农民

工作队员走访贫雇农有几个目的：了解他们的经济状况如何以及党的干部是怎样对待他们的；进一步向他们宣传土地法和共产党的政策，更重要的是发动那些还没有翻身的农民。

经邻村贫农团的介绍^①，工作队找到十里店的一位贫农，通过他又了解到村里九个互助组中还没有翻身的两三个贫农。工作队队员挨家走访了这些贫农，并请他们之中看上去确实没有翻身而且单纯、老实的人介绍和他们一样贫穷、一样老实的朋友和邻居。

通过走访，工作队一开始就了解到了，几乎所有贫雇农拥有土地的数量大致相同。只就拥有土地的面积来说，很难说村里谁还没有翻身；以前的斗争果实确实在贫农和无地农民中分配了。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这种经济上的翻身是赐与的，而不是赢来的。落后的农民本应觉悟起来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却消极地等待分给土地。

然而，也有农民在私下埋怨说，他们分到的土地不好种，不是石头太多就是太零散，或者离村子太远，难以施肥。这些都是很要紧的，因为农民种地来回都靠步行。他们靠肩挑扁

^① 邻村即赵庄，工作队的部分成员是先在赵庄参加过复查运动，然后又转到十里店的。——译注

担，晃晃悠悠地把肥料送到地里，或者把打下的粮食担回来。有的有毛驴，有的同别人伙用一头。享有四分之一头毛驴，叫有“一条驴腿”；有半头驴的叫有“两条驴腿”。很少有人能享有一条骡腿。马，根本就没听说过。村里仅有的几辆大车是属于互助组的，而不是个人的。只有在公路上大车才能用得上，因为土地太宝贵，不能在田里筑比田埂更宽的路了。

村里的住房都很差。不论哪个阶层，所有农民的住房不是租来的就是借来的。房间狭窄，屋顶漏水。十里店很少富裕户，因此在以前被叫做“叫化子”村。在1946—1947年的土改运动后，村里几乎没有什么象样的房子可拿来分了。最坏的可能要数村南头王义老汉住的那间小草房了，在里面站着挺不直腰，躺着伸不开腿。

至于一般的政治情况，工作队对看到阴暗面是有精神准备的。一位上级党的领导干部曾经提醒他们，在边区的地方党支部和村政府中，蔓延着腐化之风。工作队员在走访中鼓励老乡畅所欲言地评论干部，这很快就得到了农民的热烈响应。他们尖锐地批评前任村长王克斌和傅高林，以及前任支书。有位农民说：“我们毙了李发奎（国民党的帮凶）；但是，王克斌也不比李发奎好多少。”

然而，所有的批评都针对着以前的干部，而没有对现任干部提出批评的。工作队怀疑老乡们不敢评论现任村政府，就极力鼓励老乡们大胆讲话。但大多数人仍旧一口咬定：“我们村里的干部都是好样的。”或者说：“我们的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事事总同我们商量。”

据罗林观察，“也许这些干部确实非常好，也许他们很坏，以致农民害怕他们。不要过早下结论。”

那些没去直接了解干部问题的工作队员反而首先了解了真相。他们专心地倾听贫农谈论他们的土地情况和取得土地的斗争。干部是他们谈的故事中的重要人物。这样，就逐渐地弄清楚了现任干部没有什么大问题。也就是说，他们不曾祸害人民，不曾贪污大的款项，不曾接受地主的贿赂，也不曾向老乡敲榨勒索。

这样，一些老贫农对土改和干部就感到很满意了，因为他们还没有去掉在旧社会养成的宿命论观点。这些农民觉得，他们能生在分给自己土地的时代，就已经是相当幸运的了，只求能让他们安安稳稳地享受这点福气。他们根本没有奢望想再多得到一些什么；他们并没有真正翻身。

正如一位老农对罗林讲的，“以前，我一寸土地也没有，我所有的地块都是干部给的。他们是好干部，关心老百姓。”

罗林回答：“你们应当首先感谢的是共产党、毛主席。是毛主席教导你们怎样翻身的。”但是这位老人坚持说干部都是好人。

然而，一些农民在讲到历次运动时，谈到了干部和当地党员的缺点。例如，在一次谈话中，一个工作队员向其他队员讲述了一个名叫王来顺的老乡批评一名干部徇私。他是这样说的：“土改期间，有一个农民得到了三、四亩好地，另一个农民多得到一处房院，另一个得到三间好房。据王来顺讲，这都是由于他们是农会主席傅常寿的亲戚。”但他仍然认定村长和治保主任都是好人。

第八互助组的几名贫农向工作队员抱怨说：“我们组里连一盘磨也没有，可是在从村长家到南门的大街上他们却有五盘。我们组想从斗争果实中买一盘磨，但我们得到的却是一盘破旧

的没法用的磨。因此，给政府磨面的订货都到了别的互助组手里。去年冬天，村治保主任从磨面中挣了一大笔钱。”

罗林渐渐地对村里财产分配情况有了总的印象。他对工作队说：“人们占有土地的数字表明，各阶级现在大体上是相等的。但在过去的运动中，‘填平补齐’的政策没有彻底贯彻执行。有些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取得额外的，更好的，或者起码比他们以前的更靠近村子的土地。”

“以民兵连长来说吧，他家有三口人，原来有七亩地。但是去年春天，他用三亩薄地换了七亩好地。现在，他家一年每人大约收获七石粮食，比村里每人平均的口粮高一·三石。”

“前年出卖查黑地运动的斗争果实的时候，村长王喜堂买了南门外的六亩好地。很多人出价要买那块地，可是到头来还是让他搞到手了。尽管规定要把房屋分给那些需要的人，但是，当时暂借给了新成立的边区政府，除了政治指导员外，谁也不准进王喜堂的新房子。”

“有些军属翻身的水平比一般人高得多，但是，仍有不少人家有‘窟窿’需要填补。”

农民对历次运动和干部还有其他意见。有人宣称对地主的斗争不够彻底。他们说农会主席傅常寿保护了他的那个过去放高利贷的名声很臭的富农叔叔。他的叔叔被列为“二类斗争对象，”然而，尽管他失去了政治权利，但并没被“扫地出门”。傅常寿使他在政治上和社会地位上，而不是在经济上受到损失。

对干部最大的意见之一是，他们搞经济斗争不够彻底。一个贫农老大妈伤心地说：“有些斗争对象吃的仍然比我们都好。”其他农民抱怨说，一些地主仍旧住在他们原来的房子里。在割封建尾巴的斗争中，第六互助组组长把从组里的斗争对象那里

没收来的六、七头驴子分给了贫农，但后来他又把它们还给了斗争对象。现在，他受到了一致的批评。

与此同时，工作队开始听取那些被错斗了的中农甚至贫农的意见。有一个曾经要过饭的人（降为贫农了的地主后代）被定为“封建尾巴”，因为他的祖父剥削过农民。六十岁的傅勤一直干石匠活，却被划为“二类斗争对象”，因为他父亲在旧社会当过副保长。人们对他父亲的坏脾气、骂人话记忆犹新，而且他在短短的任期内结下了一些冤仇。尽管有些老乡认为把傅勤定为斗争对象不合理，然而，他们过去一直没有勇气说出来。更有甚者，当他家被列为斗争对象时，他儿子因在前线作战英勇而获得的立功奖状也被拿走了。他的同伴们以前只敢在私下表示愤愤不平。现在，他们公开地表示了不满。

工作队一面访贫，一面鼓励那些尚未翻身的农民联络他们的亲友邻居开碰头会。非正式的碰头会出现了，有些是由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几家人组成的，有些是由某个互助组或村里某片的全体贫雇农组成的。也有些会由贫雇农和中农联合召开，有的则由中农单独召开。

分在村里各个片的工作队员，可以随意按照他们认为最合适的方法去发动那些没有翻身的农民。无论在访贫中，还是开小组会时，或者在群众大会上，或者在教育党员的会议上，他们都一遍又一遍地阐述相同的观点。这样，他们就通过集零为整的方式推动了全面工作。

2月28日晚，工作队长罗林召集南头一片的十四名贫雇农开会。人们都挤在贫农王文盛和他残废的老伴的小屋里。有的歪靠在炕上，有的蹲在门槛上，也有的坐在半尺高的小凳上。这小屋从来没有到过这么多人。



罗林一开始就提了个问题：“我们现在要干的是什么事？”

一些农民叼着长烟袋琢磨着。过一会儿，王文盛作了回答：“我们要执行土地法大纲。”

“那为什么把你们这些人叫到这里来呢？”罗林又问。

“因为你们要使我们这些老实贫农当家做主，”一个人答道。

“还有，我们还没有翻好身，”一个人补充说，“我们这些人过去都是地主的奴隶。”

“就是现在我们也没有象样的住房和家具，”另一个人说。谈话渐渐地脱离了罗林的问题了，为让他们畅谈下去，罗林并没有打断他们。

那个人继续说道，“地主的房子、家具和土地都没有分给穷

人，还得去买。只有那些有钱的人才能买得好地来种，买得好房子来住。我连一双筷子也没有得到，但是到了支前和帮助军属时，啥都有我。”

白胡子老汉王义，是王文盛他爹，他住在本村最破最小的一间屋里。他说道，“出卖斗争果实的时候，我想买一只水罐，我好不容易借了钱去买，干部还是不卖给我。可是，他们想要什么就可以买什么，他们有钱又有权。”

罗林说：“从现在起，该是你们贫农当家作主了。可是，为什么你们还有窟窿要填补呢？”

“这是由地主和——”说话的人犹豫了一下，接着说下去，“干部造成的。”

“那我们上哪去找填窟窿的地呢？”罗林问。

“到那些没有被彻底斗过的地主那里去找。”这时答话变得快起来了。

“对，就是这样，”一个农民说，“地主从来没有被彻底斗过，他们的房子还没有被全部没收。而且，还有一些没有被挖出来的‘防空洞’。‘防空洞’指的是那些在斗争阶段替自己亲戚或地主收藏财物的人。”

差不多每个人都同意这个意见。但是罗林担心他们也会想从他们的同盟军手里夺取土地，因而问：“对中农怎么办呢？”

“当然不能拿中农的。”王文盛说，“如果我们拿了中农的，那就再没有人好好干活了。但是应该要求那些所得超出需要的中农拿出一些来。我们可以同他们商量。”

“对那些多得额外果实的干部怎么办呢？”一位老农问道。

“对，他们应当交出一些，”另一个人说，“那些分得太多果实的军属也一样。”

“粮食仓库的阁楼上，还有一些从上次斗争中得来的果实，把它们分掉怎么样？”

一个人说：“我们不想比别人多得，只求分得公平。”

“对，公平分配——就是这样！以前可从来没有做到过。”一些人附和着。

“你们在过去为什么从来没有想法翻身？”罗林问。

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只听到一个农民打火点烟的声音。坐在罗林旁边的一个人递给了他烟袋杆，罗林吸了两口，又还了回去，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王文盛终于答道，“嗯，这怪地主，也怪干部，也怪我们没有团结起来。”

“那好，既然你们现在团结起来了，谁来领头呢？”

“我愿意，”王文盛说，“但你们先要给我们权力。”

“我能豁出去不要命，但我没有本事。”他旁边的一个年轻人说道。

“只要你们给我撑腰，我也敢豁出去。”王文盛说。

“是的，”另一个看着罗林说，“只要你们不走，我们就什么也不怕。但只要你们一离开，我们就又没有主心骨了。”

罗林向他们保证说，只要贫雇农还没有真正翻身掌权，工作队就不会离开。他向他们解释了在村里建立贫农团，团结所有的贫雇农捍卫自己的权力的道理。贫农团将按照更为民主的方式着手改组农会。然后，还要由每十二户推出一名代表组成村人民代表大会。当所有这些民主机器都正常运转起来的时候，农民们将选举新的村政府。那时，他们就可以确信选举是公正的，干部是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

“你们可以罢免坏干部，选出好干部，”罗林继续说道，“而且，只要你们团结起来，那些被赶下台的人伺机进行报复的危

险就不存在了。首先，贫雇农必须团结起来；其次，你们必须与中农团结起来。一旦掌了权，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因此，当前最要紧的是团结起来。

“回到家里，把这些事再想一想。如果那些穷邻居还没有翻身，大家多方联系，团结起来。同时要向中农讲清楚你们不打算斗争他们。另外，种好你们的地是很重要的，往地里送肥，打田埂，别让生产下降。”

工作队很快就看到以组开会比单独访问有很大优越性：它可以使人们从人数上产生一种安全感。在组里，农民互相打气，一个人的话可以启发另一个人。过了不久，他们都批评起干部和党员来了。

据农民说，过去村里选举时，如果党员候选人得的票数不多的话，干部就威吓农民。干部采取高压手段迫使他们的候选人当选的事，特别明显的有三次：

在选举村财务秘书时，地下党支部提出让在八路军呆了五年的退伍军人张兆林当选。然而，多数老乡主张让精通珠算的李宝善当选。他们说：“兆林在算帐方面比我们强不了多少，他能当什么财务秘书？”对此，村政治指导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我们应当选那些被证明是忠心为人民服务的人当干部，而不是那些算盘拨弄得快的人。”显然，他说服了大多数人，因为张兆林当选了。到后来，连那些反对过张兆林的人也承认他干的很好。但是，李宝善的一些支持者一想起选举的经过，仍旧耿耿于怀。

在另一次选举中，干部提名让傅常寿为农会主席。当看到他们提出的人不受欢迎时，他们一再把选举的日期往后拖，使劲给他拉选票。最后，老乡们得出结论，除非让步，否则选举

将会无限期地拖下去。这样，他们选举了傅常寿。

第三次在村里引起公愤的是选举王南方，他被党支部提名为劳动英雄称号的候选人，但他比第八互助组推举的候选人少几票。村里的党员顿时慌了手脚。区委曾告诉他们必须在这次选举中起带头作用，因为要通过表彰在工作中特别努力和有成绩的人来推动生产。干部想当然地认为夺魁的一定是共产党员。他们当即宣布这次选举作废，并加紧进行为王南方拉选票的活动，然后重新进行了选举。这样，王南方果然当选了。这样一次同一个紧密团结的互助组进行对抗的活动，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愤怒。

老乡们也开始就个别干部政治上的缺点和生活上的不检点作了就事论事的批评。令很多人感到气愤的是年轻的政治指导员王绍贞贪污了一支老式步枪。王去部队探望他哥哥时，在前方得到了这支枪。当时部队缴获了蒋介石部队的现代化美式装备，老式步枪就被淘汰了。因此，深知武器对提高村里民兵士气的重要性的营长，把枪作为给十里店的礼物送给了王。王绍贞回家后却把枪卖了，用卖枪的钱和自己的积蓄为自家买了一所房子。

农民们说，王绍贞还利用职权撕毁了他弟弟的婚约。他弟弟已与南阳邑村的一个姑娘订了婚，但是，后来他又爱上了十里店的一个年轻寡妇。为了使他弟弟脱身去娶那位寡妇，王绍贞起草了一份解除婚约的公函，并盖上了村政府的印。这件事惹恼了许多人，因为在中国，订婚几乎与结婚一样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老乡们对治保主任王林荣的批评也同样严厉。据一位农民说，许多人不愿意出村，因为他“一句话，三瞪眼”，没人敢向

他要通行证。更糟糕的是，他一旦心血来潮，就会毫无根据地诬告别人是国民党特务。当有些民兵的武器损坏了的时候，他就指控两个民兵是特务，故意破坏武器。尽管这没有证据来证实，王绍贞和民兵队长还是让人把那两个民兵捆起来，打了一顿，又关押三天，并且不许任何人去探望他们或调查这件事情。

据一名受害者说，这样做的动机并不是为了民兵的安全，而是为了报复。因为受害者曾公开批评治保主任通奸，从而把全村人心照不宣的事揭开了。王林荣爱上了一个失去音信有三年之久的战士的妻子，村里一般都认为这个战士已经死了。在通常情况下，男人这么长时间不回来，她就有权离婚。但这种时限对现役军人来说是可以延长的。另外，不管怎么说，王林荣早已有了妻室。这个战士的妻子找到村长说，她要跟人同居。这种厚颜无耻使村长大吃一惊，他臭骂了这个女人一顿，但她回答说：“那我可要自己看着办了。”此后，她就和王林荣同居了。

另一个众矢之的是合作社经理傅培玉。在傅培玉所在的村中东片的一次会上，一个农民说，“在查黑地运动中，傅培玉买了四亩地。”在那次运动中，土地的售价大大低于市价。因此，人们都争着买进。言下之意就是，傅培玉因为是党员而买到了土地。

“去年，当他开始管理合作社时，”这个农民继续说，“他说他没有功夫去种那块地，又以高于买价七倍的价钱把地卖了。”

另一个人说：“就是，他经常耍手腕，去年的参军运动中，大家曾动员他兄弟入伍，但他让他兄弟吃鸡蛋使疥疮发作，这样，就不要他了。”

从屋子的尽头传来了一个妇女的愤怒声音：“虽然他老婆

是妇女代表，可是不准她参加区里的会议。他说只有婊子才去开会，还说如果她去开会的话，就不必回来了。”

“还不只是他一个，”另一名妇女说，“别的干部也是一个样，他们都看不起妇女。他们甚至连开什么会都不屑于对我们讲。村里斗地主时，我们有一份，但斗争得来的一针一线也没给过我们。”

一位贫农说：“傅培玉全家都落后。我的房顶太矮了，站在炕上，就会碰到头。去年，我正把房顶加高，傅培玉他爹说，邻居抬高房顶对他们家不吉利，因此我必须保证他家三年走好运。如果他家有人生病、死亡，或倒了霉，都要怪我。我当然担待不起这些，结果，我不得不把房顶又降低了。”

全村农民议论纷纷，批评着干部和党员。几天后，工作队对十里店干部情况基本了解清楚了。这时候，武安九区工作团负责人安岗来到村里检查工作，工作队汇报了他们了解到的情况。

详尽地讨论了他们的工作以后，安岗总结说：“我们必须鼓励群众敞开展议党员和干部。不过，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揭露问题，而不是使群众和干部更为对立。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对待干部的政策与对待地主的立场是不同的。必须给党员、干部以机会进行自我改造，重新组织他们的队伍。

“最大的错误莫过于仅仅根据性格来判断人。比如，仅仅因为一个干部的态度、脾气不好，或者搞‘破鞋’而批判他。如果一个干部有这些缺点的话，他当然必须改正。但我们必须从政治观点上来判断干部：他们在阶级斗争中表现怎样？对于反封建采取了什么立场？这些才是关键问题。人们往往在这个问题上把事情搞乱，”安岗说，“我们决不能让他们把我们引入歧途。”

党员的自我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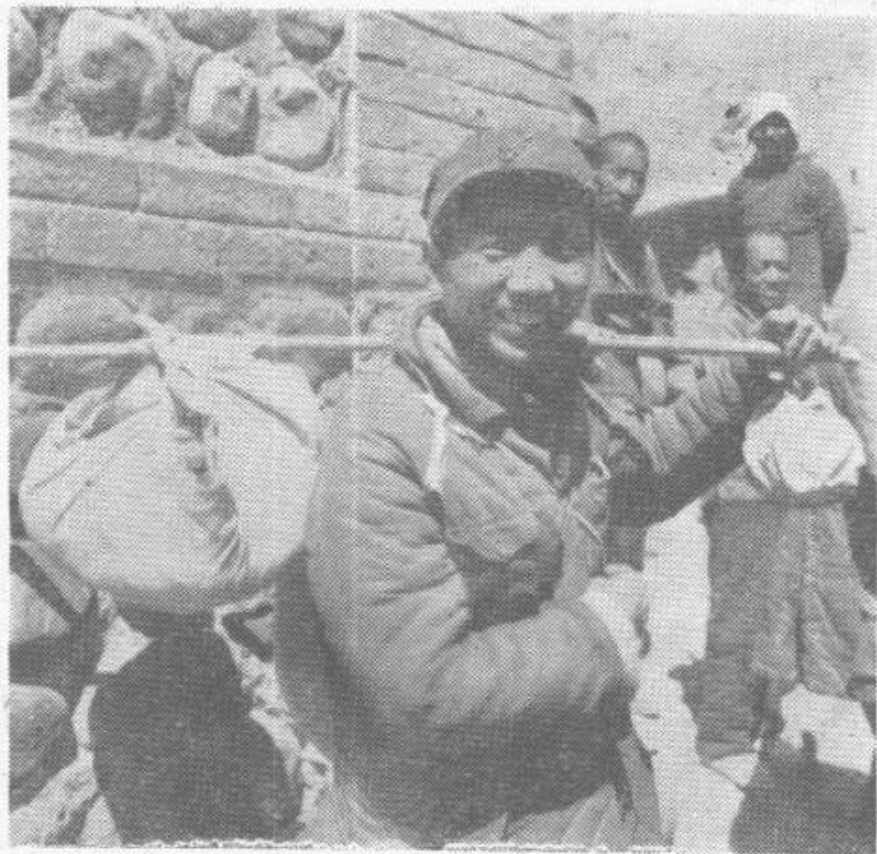
2月26—3月10日

在党的地方组织方面，特别是在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方面所存在的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则没有获得解决。……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首先重要的，是在党内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

——引自毛泽东1947年12月25日的
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当工作队其他队员访问贫雇农的时候，冷冰开始了教育农村党员的工作。除非在村里实行充分的民主，否则土地法就无法执行；除非党员带头，民主也实现不了。特别是党员干部，由于他们在村政权中的关键地位以及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更是如此。

对党员的教育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要使他们看到自己有哪些错误，这些错误是怎样形成的，哪些严重，哪些不严重。第二个阶段，要改组党组织，执行土地法。第一阶段又



工作队的冷冰，他负责党员的教育工作。

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关门整党”，党员将和冷冰在一起开十三天的会；第二步是“开门整党”，党支部开会要吸收群众参加。然后，党员和非党群众将在一起解决问题，互帮互学。事实上，这种互帮互学的精神将贯穿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因为，即使在关门阶段，群众的批评意见也将由工作队传达给党员。

1948年2月26日，即整个工作队到达村里的那天，冷冰就开始召集党员开党内会议。他宣读了中央局为贯彻执行土地法而写的《告党员书》，包括当晚将要向全村宣布的党员十条守则。冷冰善于流畅地宣读文件。在十里店，连党支部书记王绍贞读《人民日报》也很吃力，其他党员的文化程度还不如王绍贞呢。冷冰讲解中央局的指示时，显然不是杂乱无章，而是有条有理。他对疑难之点作了解释，然后，引导党员讨论了十条守

则对每个人的切身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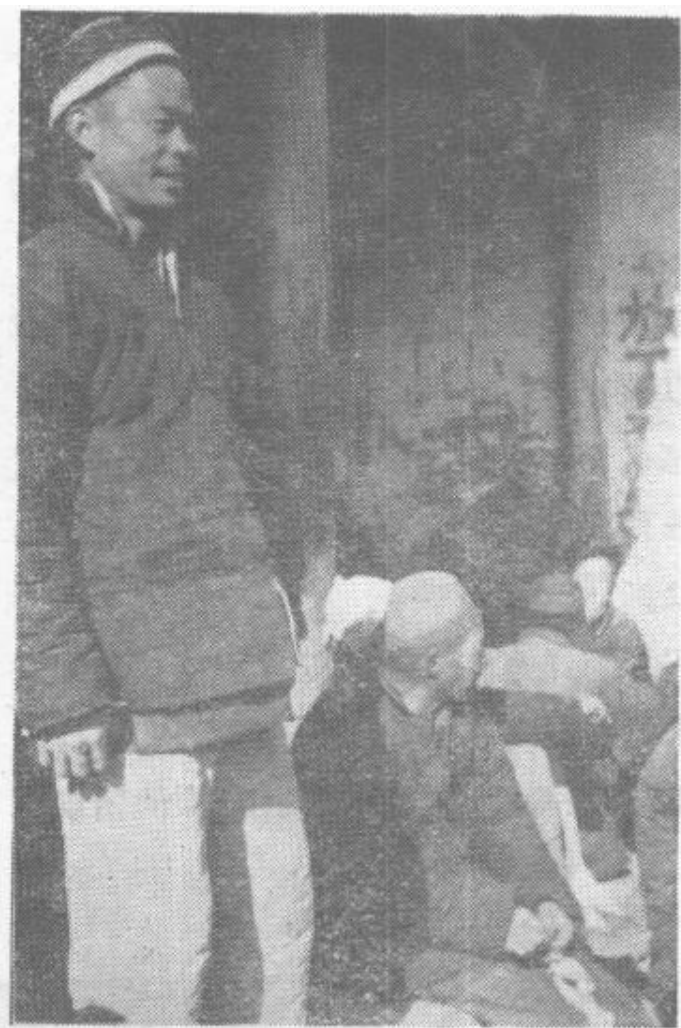
身兼村政治指导员和党支部书记的王绍贞，和身兼副支书和村长的王喜堂，颇为自信地听了传达。他们表示愿意接受检查、改造自己，并表示，希望老实农民起来掌权。王喜堂说，别的村的党员干部可能盗窃了斗争果实，“但在十里店这儿，我们的帐目是齐全的，可以核查。”

王绍贞指出：“不管怎么说，我们支部是武安九区的模范支部。”这些保证给了冷冰一种实际上是没有根据的印象，而是党员串通一气隐瞒真象。

冷冰接着宣读和讲解了毛泽东在12月25日作的报告中关于整党的部分。当他要求党员对自己的过错抱老实态度时，一些党员含糊地回答说，犯过“命令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

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兼政治指导员王绍贞，
他曾批评自己滥用职权，使民主“走过场”。





当了三年多时间村长的王喜堂，曾在党的会议上就自己的独断专横作自我批评。

冷冰觉得这些党员不够严肃认真，特别是王绍贞，对自己的错误轻描淡写，满不在乎。

但是，在头一天晚上的全村大会上，党支部就看到了工作队和老乡们是多么严肃地看待土地法大纲。当听到号召他们当众检查和自我改造时，他们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模范党员了。

从此，冷冰开始注意到关门会上的一些进展。在后来的几天中，村长王喜堂承认自己不

够民主；经过思考之后，他认识到自己经常靠强迫命令而不是靠说服来使群众完成各项任务。他说，他曾强迫农民“自愿”抬担架和出公差。在割封建尾巴运动中，是他自己决定了哪些人作为应被批斗的“封建尾巴”，而不是由群众来决定。确实，在这两种情况下，他所做的不过是执行上级的指示。当时，王喜堂觉得这些指示不切实际，还与他的上级争论过。但是，鉴于他的反对意见得不到重视，而且感到农民不愿按上级的要求办事，他曾吓唬过农民。

冷冰同情地听取了这些意见，他解释说，一些党员的各种

错误很可能是由上级的不切实际的指示造成的。他说，这类情况情有可原，可待以后仔细研究；同时，重要之点在于把有关情况公之于众。王喜堂鼓起勇气对自己允许王绍贞滥用政治指导员的权力解除他兄弟的婚约一事作了自我批评。

别的党员见村长承认了错误，也就更具体地检讨自己的过错了。然而，冷冰总觉得在党支部里存在着某种有组织的反对势力，其中，政治指导员特别狡猾。

尽管如此，冷冰向工作队汇报，他认为这个头起得不错。他觉得对党员的教育工作不会太困难。队长罗林不同意，他说：“除非他们之间开始相互批评，否则，搞运动的条件还不具备。”

党员干部明白，工作队正鼓励老乡们来评议他们。意识到这点以后，干部们就设身处地，从群众的角度来考虑自己过去的表现。有些干部对于自己的错误难以启齿，但他们知道工作队迟早会了解到这些问题的，而且很可能会从自己的冤家对头那里听到歪曲了的故事。

冷冰对党员强调说，只有诚心诚意地揭露问题，才好改正；进行教育目的是通过提高党员的素质来加强党的力量。他说，每个共产党员都是党的宝贵财产，不会被轻易抛弃的。

“另外，你们的根子是正的，”冷冰对他们说。村里大多数党员是新中农，过去身为贫农，深受饥寒之苦。他们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得最坚决，在尔后的土地改革中表现得最积极，因而被吸收入党。冷冰说，“很显然，象你们这样的经历过革命斗争的人，只要勇于把缺点错误公开亮出来，就能得到改正。”

五天的关门会结束之后，村里的领导层的面貌基本上分明了。党员担负了村里最重要的职务，他们用命令和“决定”来管理全村。在村里的历次选举中，他们推荐候选人，并竭力操纵

选票。用党支部宣传委员的话来说：“选举，不过是办党支部事先安排好的事。”

在支部内，民主也不过是形式而已。凡事都由五个头头作主，即村长、政治指导员、农会主席、治保主任和村人民保卫委员会主席。他们很少开会，民兵队长告诉冷冰说：“我们对支部的领导有许多意见，但不敢提。”一位互助组组长说，他曾私下向王喜堂反映过政治指导员和治保主任的专横作风，王承认这意见是对的，但说要用间接的方式反映解决。这样，下级党员只得讨好有权势的干部。他们被迫变成“两面烧饼”——无论你怎么翻，看到的总是正面。

土地改革运动中，党支部决定了谁是斗争对象以及如何分配斗争果实。有些党员分得了额外的果实，有些干部甚至允许一些地主和富农家买果实。这样，通敌分子王半延买到了镜子和花瓶，而一位贫农竟买不起他所急需的一根扁担。

冷冰向工作队汇报，“党员认为群众落后无知，因此企图自立法规。他们认为对群众进行民主教育太费时间、太费功夫。因此，不管党下达什么指示，他们都组织少数积极分子来完成。人们说，党员和积极分子就象火和炸药，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可要当心！”

“党支书王绍贞最后承认，他们使民主走了过场。他说，如果真的实行了民主的话，村里就不会有任何‘窟窿户’了。当他想到有些人还没有翻身，比如孤单地住在河对岸的山坡上的那个贫困的退伍军人就是一个的时候，就感到后悔。他说，‘如果我象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那样把贫农的利益放在心上的话，我决不会同意卖掉斗争果实，而会将它们分掉。’他还以‘窟窿户’的情况和他翻身前所过的苦日子作了比较。”

冷冰说，“实际上，到第五天，有些党员把这些情况看得如此严重，以致精神开始垮了。他们看不到怎样才能补救自己的过错。在前天的会议上，王喜堂突然说，‘今晚散会之前，我们最好收走每个人的武器。’他担心可能有人自杀。然后，垂头丧气地坐在炕上的那伙人说：‘我们干脆停止这种党内批评，把自己交给人民法庭吧。’农会主席傅常寿甚至掉下了眼泪。”

冷冰接着往下说：“当他们头次提到卖掉斗争果实，让一个地主奸买走了花瓶和镜子，而一个贫农竟买不起一根扁担的时候，我真恼火，喊了起来：‘想想你们到底是为谁服务！’后来，他们有些人责怪我象地主一样威风。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如何是好。我想，如果我不给他们些压力的话，就无法把事情彻底弄清；可是如果压力太大的话，他们又可能受不了。”

冷冰向罗林反映了这个问题，他们决定，需要把压力和鼓励结合起来。冷冰走访了党员的家，表扬他们所做的自我批评；同时，又指出他们要从错误中汲取政治教训。

在十三天“关门整风”的其余的日子里，冷冰把讨论引导到高一级的政治水平，缓和了党员的紧张情绪。后来他说：“我们开始就整个支部的问题来讨论，而不拘泥于个别人的所作所为。尽管后来的讨论很激烈，然而，每个人的心情都不那么沉重了。他们总结说，过去进行的六次运动，三次都有问题，减租减息运动没有把全体贫雇农动员起来。在取得可分配的果实最多的查黑地运动中，他们却执行了中农路线，出卖了斗争果实。最后，他们认识到，整个支部对这些缺点是有一定责任的。”

冷冰说：“他们同意，对于一个党支部来说，最主要之点在

于它的坚强，而不是在于它的软弱。不管怎么说，是这个支部领导群众在这个村子里摧毁了封建制度。村里确实还有二三十家‘窟窿户’，但他们的土地的平均产量只比全村的平均产量稍低一点。因此，尽管有缺点，党支部确实领导了群众争取翻身。”

串连贫雇农

3月3—4日

1948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工作队在十里店发动群众的总结报告。工作队首先谈了工作中的缺点：

“在把一些贫雇农召集到一起并鼓动起他们的热情以后，我们没有把他们组织起来。也没有给他们起一个诸如“贫农组”之类的名称，而是完全放任自流了。这就等于向他们泼了冷水，因为，尽管党员干部正在进行自我批评和自我改造，但是，贫雇农仍然害怕那些非党干部。

访贫问苦的阶段不能拉得太长。因为不让贫雇农在某种形式的活动中得到考验的话，就无法了解他们。我们用了六、七天时间家访，其实，五天已经足够了。行动的迟缓带来了不好的影响，由于缺乏组织和一致的行动，结果造成了一些贫雇农的不和。

有些访问太简单、肤浅。我们有些同志不够耐心；他们觉得这工作很简单，经常是草草了事。有些同志则疑心太重；在他们看来没有一个是好人。他们认为，农民不是太消极就是太积极了。如果某个农民有勇气畅所欲言，他们认为他太胆大，因而就不够单纯、老实。如果某个农民家里的地扫得很干净，他们就怀疑他不是真正的雇农。他们是如此害怕从群众中孤立起来，以致不敢在群众中挑选有领导能力的农民来。

“事实上，贫雇农不是没有缺点的，重要的是如何对待他们。我

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他们，并耐心地纠正他们的缺点。”

尽管工作队有缺点，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方法总的来说还是可行的。他们写道：

“我们的工作完全是公开进行的。从一开始，我们就和大多数贫雇农进行接触，因此，少数不良分子从来不曾占上风，这多少消除了中农的不安和怀疑。群众大会开过后，人们到地里干活的积极性越来越高，这使得党内坏干部很难破坏我们的工作。

“群众很快打消了恐惧心理。当我们在召开群众大会前访问他们时，他们还不敢讲话，但是一天以后，他们就开始对干部进行批评。与此同时，我们的工作并不仅限于家访和宣传；我们所作的每一件事都是明确地为了引导民主运动和在农民中划分阶级。”

到了三月三日，工作队认识到：没有及时地把贫雇农组织起来是一个缺点。他们开始分片在村里召集他们认为可靠的少数贫雇农开小会。

其中一个这样的小会，是那天中午由四名负责村南头和村中东片的工作队员召集的。当工作队秘书正在整理笔记的时候，被邀的五位贫农中的三位来了。工作队员耿西迎上去招呼他们，并同他们聊天，直到另外两个工作队员同那两位贫农一同进来。谈话渐渐由泛泛议论，集中到工作队征求群众意见后提出的贫农团发起人的四项条件上来了，这些条件是：常年劳动；大公无私，心眼正直；平易近人；热心给大家办事。

耿西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说：“这是我们在你们各片了解到的贫雇农的名单。我一个一个地念，你们评一评他们够不够这些条件。头一个，王福臣怎么样？”

几个农民互相瞅着，看谁先说话，他们的眼光都落在王文盛身上，他是福臣所在互助组的组员。

王文盛想了想说，“他不太守信用。跟好人就学好，跟坏人就学坏。哪边有坡儿，他就往哪边溜。”

其它人点点头，他们认为王福臣是个难以肯定的候选人。

耿西接着念了第二个人名：王米泉。从村南头来的三位农民说：“他年轻，莽撞。”

“但他是个直心肠，说话直爽。”

“他对干部有啥就敢讲啥。”

众人一致同意让年轻人王米泉参加贫农团。

耿西在名单上打了个勾，接着说：“王魁方、王贵方和王禄方三兄弟怎么样？”

一位农民说：“王魁方是个木匠，他挺怪，你总也拿不准他对事是怎么想的。但是，他们是他们兄弟仨里头最好的。贵方参加过解放军。虽然他有很强的责任感，愿意办公事，但他对人很冷淡——难以接近。至于禄方，他哇哩哇啦说个不停，可是过不了两分钟就变了主意。而且，他也是不好对付的。”

“就是，”另一个人接着说，“如果有谁得罪了他，他决不放过。”

耿西没有在三兄弟的名下划勾。往下，他念了另一个曾在邻省山西扛活的老乡的名字。每个人都认为他是个好人，但对他母亲没有好评。

“她是个跳大神的，装神弄鬼。”

“她过去向找她看病的那些迷信女人要了不少礼物。但这几年不行了。”

“当然，现在再没人公开去找她了。因此，她对改革不感兴趣，而是到处散布各种谣言。”

“她现在和一个过去是地主的老头子一起住在寨上。”

耿西指出，儿子能不能参加贫农团，不应由于他母亲弄鬼或与过去的地主有关系而受影响。他把这个农民的名字也勾上了。

“王抗石怎么样？”

这五位农民都认为他是个好人，够格儿。尽管他母亲也有毛病，如有人说，“她老盯着男人。”

下一个名字是王广顺。

“他的嘴很脏，经常骂人，损人。”

“他顾吃不顾穿，甚至连给孩子买衣服的钱都舍不得掏。”

“但他最大的毛病是靠不住。”

耿西没在王广顺的名字上划勾，而转到下一个。他问，“王魁年怎么样？”

这些农民都认为他是个老实人。“但是他象驴子那样拗，他尖嘴利舌。”

“他过去很穷。八路军来了，他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可是，他老是抱怨他没分到他应得的果实，没受到平等待遇，这里政府机关里的人吃得比他好。”

“他在地里和几个朋友私下嘀咕还嫌不够，还在街上当着众人放大炮。”

下面接着讨论的是兄弟两个。农民们当下就认定其中一个符合四项条件，然后，讨论另一个。

“他不仅不能带领群众，自己还需要别人给鼓气。但是，尽管他在开始时慢吞吞的，只要他干开了，就一定干到底。”

“还有一点，他不要滑头，也从没给地主通风报信儿。”

他们认定这哥俩都可以吸收。

下一个讨论一个店员，他离家后到城里的一个铺子里干事。人们形容他“脑子快，胆子小”。

“他对每一个问题都从很多方面去想，以致对任何事都拿不定主意。”

老乡们又讨论了合作社的磨坊工人傅守喜。得出的结论是，他符合条件。

“他脾气好，跟谁都合得来。他过去追过女人；实际上，他现在跟楚子的老婆住在一起，但那是楚子的错。”

这些农民们在说笑中，讲起了这段故事。楚子是当地武安戏的一个戏迷，非常崇拜一个艺名叫“三杆旗”的演员。楚子结交上了这个演员，把他请到家里，只供养这个演员而不顾家。后来，他老婆带着两个孩子同傅守喜住在一起了。傅守喜一直穷得连老婆也讨不起。

下一个念到的是个以冷漠闻名的农民。

“他是一个好人，但他不很积极。他象个老头子一样，从不激动，也从不着急。”

“然而，他并不懒。他就是这么个人，如果谁在他坐着抽烟的时候请他帮忙，他会说，‘我正抽烟呢。’当他抽完了烟的时候，就过来帮忙了。”农民们认为他合适。

“王喜才怎样？”

“他喜欢替众人做事，而且每个人都喜欢请他帮忙。他成了一个好的说合人。”

“当冀南银行工作人员在这里演出《白毛女》的时候，是他借来了演地主家那一场用的花绸被子。你们都应当说是见过这些被面的，色彩美得象彩虹一样。”

“这是一些还没有分配掉的斗争果实。”

接着是一阵意味深长的沉默，因为斗争果实拖延不分，始终是农民们感到不痛快的一件心事。

另一个人接着打断了的话题说：“他爱串门，特别爱去这里政府机关的干部家。他老是同他们讲过去他们打游击时候经历的危险。”

他们通过思考、议论和分析，把耿西的名单议了一遍。村里的其他片，也召开了同样的会议。而后，将那些各个小组赞同的贫雇农提名为贫农团发起人。同时，有必要先搞清谁是贫农和雇农，否则，就无法建立贫农团。在贫雇农中找出一些积极分子，向他们讲解党的政策，这样一个预备阶段，完全是为了保证那些还没有站起来的贫雇农，能在村里划阶级的决定性的阶段有自己的发言人。

这一基本任务完成后，工作队员就开始了运动的第二阶段——划阶级。第一步，他们自己学习了划阶级的原则。他们每天聚在一起，根据自己的实践，参照1933年颁布，而最近根据土改运动的需要重新修订了的划分阶级成分的规定，进行了讨论。

农村划阶级的规定

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地主剥削农民的方式，主要地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

富农：占有较好的生产资料并有一些流动资本。他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

中农：全部或主要靠自己劳动为生，一般不剥削别人，而且，他

们中很多人还受别人小部分地租和利息等剥削。他们一般不出卖劳动力。

上中农^①：偶然有轻微的剥削，但剥削而来的收入不构成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

下中农：一般自给自足，但他们也受地租或利息等形式的剥削。

贫农：一般都须租入土地耕种，他们受到地租和利息形式的剥削，有时他们还必须受雇于人。在一段时间内出卖劳动力是他们区别于下中农的基本特征。

工人(雇农在内)：一般全无土地和工具。他们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

工作队在学习会上讨论了如何给个别农民划成分的问题。负责寨上片的肖航说，“给象李新海这样的人划成分没有什么问题。他完全符合划贫农的原则。他没什么地，又穷，他家的日子很苦。如果他不给互助组里其他组员干活的话，他家就没法过活。

“但怎样划傅锁钱呢？他家有八口人，他们耕种二十六亩地。然而，只有18亩是一般的地，其余的都是山坡地。他没有出外扛活而在山坡上开了荒，正象他说的：“即使种些自己的薄地、石头地，也比种别人的地强。”你可以说，‘李新海没出卖劳动力，而傅锁钱既不雇人，也不受雇于人’，可是他们两家的日子一样穷。

“再看看傅立库吧，他家平均每人有二、七亩地，但地很薄。

^① 当时在十里店实行的阶级划分的概念与这些规定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没有采用“上中农”和“下中农”的概念，统一为“中农”。按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土改的指示，中农分为两个部分，“旧中农”和“新中农”。“旧中农”是指土改以前的中农，“新中农”是指土改以后上升为中农的人。——原注。

因此，他只好牵着毛驴外出作工来维持生活。他每年只在家呆四个月；他还为别的八个人贩运东西。

“如果按照划成分的原则上说的贫农只有不足以生产他所必需的全部粮食的小块土地的话，那么，怎么样划傅利库的阶级成分呢？他不算中农，但他又不打短工；他靠他的毛驴。有毛驴，使他看起来比贫农富。然而有些人，尽管没有毛驴，但他们有别的家当，日子也比他过得好，但也叫贫农。”

工作队为此而伤尽脑筋，最后他们议定，如果哪家占有的土地太少、太薄，不足以养家，只有靠特别繁重的劳动，象雇农替人干活一样辛勤劳动来维持生活，就可以划为贫农。

对工作队来说，搞清楚如何划分阶级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工作队才能教农民如何去划分成分，而不是为他们包办代替。就象这时期的《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里说的，“工作队无权决定任何人的阶级出身；工作队员在划成分的工作中只起到‘把灯拨亮’的作用。”

工作队员认识到，从一开始到最终，他们都应该为那些尚未翻身的农民起到“把灯拨亮”的作用。如果农民能在当前的运动中站起来，决定自己的命运的话，他们就能在划阶级中起带头作用。但他们对划阶级毫无所知，因此，通过培训和实践，培养他们在各阶级参加的大会上起带头作用的能力和信心，是必要的。

工作队给南头片和中东片的五位贫农——即参加议论耿西的名单的五位贫农上了划阶级的第一课。这次会议由工作队员彭庆昭主持，彭解释了划分阶级的原则之后，建议到会的一位农民先谈谈自己的经济情况，让别人以他作为实例来试划。这样，王培青就讲开了自己的情况。

他说，“我家现有四口人，我娘，我弟弟，我姪女，和我自己。

“我大约十岁的时候，家里有十亩地。但这不够维持生活，我们穷得象要饭的一样。一家一连三代，连一头牲口也没有过。

“我十四岁那年去山西同我爹烧砖，他早就到那儿了。1935年，我爹死了，我就不干烧砖的活儿了，因为我种庄稼没经验，就当了羊倌。放羊也富不起来，我把所有的工钱都攒了起来，在1942年带着我爹和我叔叔（他也死在山西）的尸骨回家了。（为这，我买了两条新羊毛口袋，一个口袋里装着一副尸骨，并把它绑在扁担的一头，再把我所有的东西绑在另一头，使扁担两头正好一样沉。）

“回到家，看到我娘受不了灾荒的煎熬，正准备逃荒呢。我们立即用我赚的钱赎回了卖掉的两亩地。那时，我的孤独的小姪女已经和我们住在一起了，因此，我们决定无论如何得再买点地。我们卖掉了准备给她作嫁妆的家具（那时她才六岁），又买了两亩地。没完没了的干旱使我们高兴了没多久，夏天麦子颗粒无收，秋天只收了一大升小米。

“这样，我又回到山西烧砖，我娘跟我一起去了，找到了替一个地主家作饭的活。我们离家后，我那个结了婚的姐姐自己在家种地，她把地种得非常好，以至后来用种地的收获又买了两亩半地。这样，当我和我娘回家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六、七亩地了。

“以后，我又当了一段时间工人，攒够了钱又在南门外买下一亩半地。前年，我到北村烧砖又挣了一点钱。

“去年春天，在填平补齐运动中，我们用沙石峪里的一些薄地换了一些好地。现在我们一共有十一亩地，其中四亩是好

地。这同村里的平均数差不多，定的常年产量是十石粮食。去年收了八、九石麦子。秋天，我们交了一石小米的公粮，又用了另一石雇牲口耕地。

“我们现有的粮食够麦收前的五个月吃了。如果庄稼长得好，我们就过得去。去年打的粮食只够吃八个月的，余下的日子，只好靠烧砖过活。尽管如此，除开买工具的开支外，我还积了一些钱。

“现在，你们了解我的情况了吧。你们觉得我算是哪个阶级呢？”

在王培青的长篇介绍之后，是同样长篇的讨论。王培青的经历是如此曲折，农民们竟一时无法搞清哪些是与划阶级不相干的。工作队员帮助他们理出了那些与为王培青划成分有关的情节。这些农民认定，重要的事实是，王没有剥削别人，还要出卖自己的劳力，他有一些地，但不足以维持全家的生活。他没有大牲口，刚刚开始购置农具。他们的结论是（并得到工作队员们的同意）：王培青是个贫农。

这种联系实际的议论，为在以后几个星期中给 433 人划阶级做出了样板（包括王培青本人）。挑选出来的其它贫农小组，以同样的方式在小会上叙述了自己的情况，他们就这样被工作队培训成为划阶级的带头人。

在寨上，肖航和其他工作队员费了很多时间教贫农傅便则怎样划分阶级。无论从他的有利条件或不利条件来说，寨上的傅便则都算得上是未翻身的农民之中最典型的一名。他瘦得弱不禁风，尽管才三十多岁，但看上去象个老汉。他的牙大部分掉了，脸上的肉松弛下来，头发稀稀拉拉，但他并不象看上去那样无知，而且，他还被推选担任过几次较小的职务。当傅便

则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后妈把他从家里赶了出去，她希望自己生个继承人替代他。从那时起，傅就靠扛活和烧砖为生。

经过在寨上一个星期的家访、调查和组织工作，工作队员肖航了解到了为什么这样多的贫雇农对傅便则有好感。他具有老实农民的品德，单纯而敦厚，他的正义感常常克服了自身的胆怯。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别人的鼓励，这样的人有可能成为发动寨上的贫雇农的带头人。

当肖航头一次找他时，他显得局促不安；但到了3月3日晚上，经过工作队员长时间的辅导，他和另外几个农民已经准备就绪。4日早晨，划阶级的工作开始了。

寨上划阶级

3月4日

第一次划分阶级是在寨子里最宽敞、最显眼的建筑物里——过去的一个地主家进行的。除了以前的斗争对象外，寨上家家户户都有资格派代表参加。实际上，除了有五家的男人因去贺庄煤矿拉煤而没有到会以外，其余的都到了。

八十多位老乡(大约五十个男的，三十个女的)分别坐在屋里的小凳、砖石或草垫上。很多妇女带来鞋底在纳。尽管在最近几年已经获得自由，她们还是同男人们分开坐。两名工作队员坐在靠墙的桌子旁边准备作记录。一些工作队员和下村来的农民挤在门道里，所有人都想瞧瞧怎样划阶级。

工作队员耿西兴致勃勃、实实在在而又有力地说：“今天，咱们来划阶级。这件事太重要了，为它误一天工也是值得的。也只有区分阶级才能使我们团结起来。

我们要组织起来，就一定要划分阶级。我们要按各人的实际情况来划，不管他是傅家还是李家的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划了阶级以后，是贫农、中农，就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是地主、富农，就划出去。谁也不能包庇谁，谁也不能讲面子，谁也不能泄私愤。你该划什么，就划什么。我们管铁锹就叫铁锹，贫农就是贫农，中农就是中农。”

“按啥条件划阶级呢？”耿西提出这个问题，接着一遍又一遍地讲述了党的文件上写的农村各阶级的定义。“怎样划法？”他解释说，划阶级的过程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分三个步骤。这一回是“自报公议，三榜定案”。各人先在小会上自报家庭经济生活情况，由大家按规定的条件评议是什么阶级成分；然后张榜公布，让全村的人都知道；张榜以后大家再讨论，把大家同意的、不同意的都写出来，再出第二榜。大家对第二榜再提意见，绝大多数人都同意了，就定下来，出第三榜。三榜后有人还不同意，还可以提到人民法庭去裁决。

第一榜，先给基本劳动群众，即那些没有被斗争过的农民划阶级。在他们之中划出贫农（这一部分人将成为贫农团的骨干），新中农（这一部分人也将被吸收进贫农团，约占贫农团人数的三分之一），老中农（将同贫农、新中农一起重新组成农会）。

划阶级的第二榜，才确定斗争对象，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工作。划阶级的第三榜比较简单，是把头两榜讨论的结果经过必要的修改之后加以审定。预计整个划阶级的工作要花费一个月时间。当然，在这期间其它有关的工作也将穿插进行。

耿西在末了又谈了两点：

“工作队无权为任何人定阶级成分。工作队是来这里帮助你们定成分的。工作队的任务只是把灯拨亮，使大家更加心明眼亮。

“还有一件事说说：划阶级是一回事，补窟窿又是一回事。当然，将要把那些被划为贫农的人的窟窿填起来。但是，有些贫农如果过去分到了额外的果实的话，应当退出来。反过来说，有些中农则可能收回一些土地。因此，补窟窿和划成分完

全是两回事。

“现在大家酝酿一下吧，可以自己试着划一两个看看。”

“酝酿酝酿。”每个人都这么讲，这在以后几个星期的多次会议中，成了人们熟悉的词儿。

人们纷纷搬移小凳，挪动砖头，调转身子。一时间，听众的注意力从耿西身上转到身边自发形成的小组的热烈讨论上。朋友、邻居和同一互助组的人，农会的一个小组或民兵连的一个班的成员，照例是坐在一起的，这些人形成了天然的酝酿小组。开始时只是悄悄地交头接耳，不久，屋里就充满了人们纷纷议论的声音，讨论耿西说的事，有的说对哪几点还不明白，有的抒发自己的见解，有的提出问题或看法。在自己朝夕相处的人中间，甚至最胆怯的人也敢于畅所欲言。对那些一再提出的，看来特别重要的问题，在各个组内分散活动的工作人员就大声回答，使大家都能听到。

嗡嗡议论的声音逐渐静了下来，主持开会的人再一次宣布开会。各个非正式小组的发言人汇报了各组提出的看法和问题。最后，耿西宣布：假如没有别的问题和意见，谁就开个头对划成分作个自报吧！

头一个站起来的是傅立荣，一个善良的老人，头上的羊肚毛巾扎得非常低，只露出下面一半眼睛，外表有些阴沉。他的目光从毛巾底下凝视着大家，开始自报：

“前年，我有八亩一分地。去年春天，农会又给我补了一亩五分地。这样，我现在一共有九亩六分地。没有牲口，只有一把锄、一把锹和一把镢头，没有犁、耩之类的大农具。我的种子够用，但肥料只够上三、四亩地。

“我家三口人，只有我一个劳力。打下的粮食不够吃，就



划阶级。乡亲们听取一位农民汇报自己的经济情况。坐在桌后的是工作队长罗林。

给别人打短工。”

“我有四间房子。”这不是说有四个单间，实际上是两间房，每间房子只要有一根房梁就算两间房。

“我的地定的产量是七石多^①，实打三石多谷子，一石多玉米，总共四石七斗多粗粮。”

“我自己估计不算贫农。我的地不能说是太少。尽管打的粮食不够全家吃，我可以在外面帮工换吃的。我老婆会纺棉花织布，她和我闺女都会做衣裳。因此，吃穿都不算困难。”

傅立荣停了一下又说：“算个中农户吧。”

“大家看算个啥成分？”耿西问道。

各个酝酿小组又各自凑到一起小声议论起来。最后，一个

^① 这里说的产量是农会按照土地质量的好坏议定的每亩地平常年景的产量，是公平分配土地的计算单位，也是交公粮(农业税)的计算单位。——译注

小组的发言人站起来说：“我们认为他是贫农。尽管他的地不少，但产量很低。尽管他有四间房，但非常小，在里面扭不转身。”

另一个发言人站起来说：“我们也认为他是贫农。因为他还要靠打短工来养家。他也没有牲口。”

又有人说：“他只是在最近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才翻身的。”

妇女们交头接耳议论了好久，才站出来一个说：“他的确是贫农。他老婆是个半残废的，妮子还很小，不支多大事。就他一个是正经劳力。”

一个年轻人站起来说：“他说的不真诚，他自报的完全是贫农的情形，对吧？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要把自己划成中农呢？他应当直截了当地讲自己是个贫农。”

就此，耿西问傅立荣：“假如你不到外边找活干，够吃吗？”

“当然不够。”傅答道。

“既然如此，”耿西说，“这里每个人看来都认为你是贫农，你的意见呢？”

“我没什么说的，”傅答道。显然，他认为自己实际上是贫农；但又怕直截了当地讲出来，好象是为了要求给他补窟窿似的。

“还有人要说的吗？”主持会议的人问。

“没有，没什么了，”屋里各方响起回答，“他是贫农。”

第二个自报的是李保慈，他说：“我家有三口人，十一亩地，定的产量是八担多。五月间我买了头小毛驴，七月间把它卖了，换了头大毛驴。我从银行借了三块钱^①，靠贩卖碗盆挣

^① 当时是冀南银行的钞票，票面是三万元，后来折合人民币三元。——译注

的钱还了。

“我家的地都是去年春天添的，收了一季秋庄稼；夏收的麦子是人家前年秋天播的种，我和人家各分了一半。我什么农具都没有，向别人借着使。

“但我们并没挨饿。我和我儿子，经常有一个人在外头赶脚。这样虽然受累，但有吃的了。

“我们家一间象样的房子也没有，都快要塌了。

“我的地挺赖，平均每亩定产只有五斗。”这相当于好地产量的一半。

“去年秋天，我打了四石多粮食，其中三石谷子，一石玉米。

“按前年情况说，我是贫农。按去年说，我成了新中农。”

“新中农的日子你过了够一年不够？”耿西问。

李保慈犹豫了一阵子。

“你手头的粮食够不够一年吃的？”耿西又问道。

李保慈和人群里的人立即答道：“不够，不够。”

“他只有一季半收成。”

“那么，你再说你该是什么成分？”耿西问。

这次李保慈回答说：“贫农。”

耿西建议大家再好好酝酿酝酿。会议又一次分为许多酝酿小组，然后，再行集中。

“他还得打短工，我们认为他是个贫农。”一个小组的发言人说。

“他的地并不很差。”另一个人说，“他过去受过苦，但现在有了地，日子也好过了。而且，他的儿子已经长大，可以赶脚。”

同一组的另一个人插话说：“他花五块钱买了一头小毛驴，

又在七月间以七块钱卖掉了，后来他花十三块钱买的驴就大多了。他现在还为这头驴欠着债。如果他不出外赶脚，他和毛驴都会饿死。他给毛驴做鞍子，垫的是借的旧棉花套子。我认为他是个贫农。”

又有一个人说：“他去年确实收了一季半。他还要借农具种地，因此日子很艰难，他是贫农。”

“早先，他没一点家底，共产党来到之后才开始翻身。去年，他的日子才好过起来。”

“他的地离村子很远，还在山圪梁上。我说他是个贫农。”

“以前他非常穷。”一个妇女补充说。“他老婆替人缝活挣钱，几乎没有时间给自己家里的人做衣裳。”

通常总是男人先发言，其次才是妇女。尽管她们开口晚，可通常能说到点子上。有段时间，寨上的妇女会主任兼村妇女会副主任王香，似乎自命为所有妇女的发言人来讲话。结果，其他妇女变得越来越消极。当耿西发觉了这种情况时，他和葛地笑着说：妇女们自己会讲话，无需任何人代表她们。

众人的结论是，李保慈目前还是贫农。然而，夏粮丰收之后，他无疑就是中农了。

下一个自报的是傅寿泉。他说：“过去我活不下去，八路军来了之后，我才种上十来亩地，喂了一头老驴。后来我卖掉驴买了头骡子，因此欠了债。

“我的地一年打八石谷子。一家八口，还不够吃。我常常给人打短工或到窑上烧砖。我去烧窑的时候，小孩们都留在家里。

“我只有一间小茅屋，没有桌椅板凳，我有一张犁、一个耩和其他一些大大小小的农具。除了种自己的地以外，我还租

了一个寡妇的七亩多地，在山坡上开了五、六亩荒地。我很壮实，喜欢做小贩、赶脚。

“从外表看，我的日子过得可红火啦，可是内里空空荡荡。我自己看是个半不拉子，说我是贫农吧，情况要强一些，说我是中农吧，情况又差一些。”

人们酝酿了一阵之后又集中起来。有些人提到傅寿泉的土地少、产量低；有些人则强调他还得做小贩、赶脚或者打短工。

一个人说：“他那头骡可象是纸糊的，结果他落了一身债，更得挨饿。”

最后，傅寿泉被划为贫农。

这头三个实例说明：在十里店，尽管还有一些贫农，但是再也没有佃户或赤贫户了。总的来说，村里人都部分地翻了身，或者象傅寿泉说的，是些“半不拉子”。

第四个自报的是七十四岁的李力滋，他说：“我有十二亩半地和一头驴，还有各种小农具（锄、镢和锹），但是除了一把犁外，没有任何大农具。另外，还有我孙子的七亩地。我们俩一起过了十年了。全家要养老俩口——我老伴和我，还有小三口——我孙女，孙子和他媳妇。”孙子只有十三岁，媳妇比他大两岁。

“我没负什么债，但我老伴生病得花钱抓药，我的地的常年产量平均每亩一石。这些地全是八路军来以前买的。

“我们分过一次家，后来又合在一起了。分开过的时候，我儿子是中农，我是贫农。因此，现在我也搞不清到底应当算什么成分了。既然我们五口现在住在一起，可能我应当算是中农吧，我倒不在乎算什么阶级，请大家替我定吧。我发愁的是没

有劳力。”

“这个问题先放一放。”耿西建议，“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定他的成分，然后再研究缺少劳力的问题。”

撇开这个难题，就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了。五口人有十九亩半地，当然算是多的了。按当地标准，产量也是高的。另外，这些土地是在民主改革以前就有的了。这样，李力滋被定为老中农。有些人称赞他的自报就象他本人一样老实。

在他之后发言的人，也因态度坦率而受到表扬，人们称赞他们讲的话“一是一，二是二”，“不必为他们谈的情况费脑筋”，“如果都象他们那样的话，我们很快就可以搞完。”

由于妇女是家长的不多，几乎所有自报的都是男人。然而，过了一会儿，一个寡妇起来自报了。名单上列的不是她自己的名字，而是“李连喜娘”。

她儿子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寡妇说：“他被算作是全劳力，但他有病，只能算个半劳力。”

“什么！”有人喊了起来，“一个十九岁的大小伙子不算全劳力？”

另一个人说：“他确实不很壮实。尽管如此，也还算个全劳力。”

没人对于这个小伙子不是好劳力的事实提出异议，这并不影响定这个家庭的成分。人们在会上作出结论：李连喜和他妈是老中农。

这一结论是根据划分成分的基本原则作出的，即根据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是否剥削他人劳动来定成分，而不是根据家庭生活水平来衡量。李连喜娘和李力滋都从互助组雇工并按规定付工资。这样，中农雇主的结余就不多了。实际上，雇工的生

活水平往往比雇主要高。尽管如此，李连喜和李力滋毫无疑问是中农，因为他们比村里大多数人拥有较多的土地和农具。

到会的许多人的发言表明，他们掌握了划分阶级的原则。然而，仍有一些人把阶级与生活水平混淆起来。当李六成被评定为老中农时，他老婆无法接受。“怎么能把我们算作是老中农呢？”她痛苦地问道，“我这辈子连半晌福也没享过。”

人们说这可能是真的，但尽管他们既没剥削他人，也没有受到剥削。因此，仍然认为李六成应当划为老中农。鉴于李的老婆不同意大多数人的这一决定，双方的意见都被记录了下来。

在上午的会议上最后一个自报的是王香，即早先好为别的妇女代言的那位。王香年轻时给人家当童养媳，受了不少苦。当一个女孩子从小被许配给人，送到她未来丈夫家住时，她常常被当作奴隶看待。

后来，王香翻了身，并被选为十里店妇女会主任。尽管如此，她还是觉得自己的地位不稳。她明白许多妇女都对她另眼相看，这是因为她在公众场合随便同男人们来往，甚至举止带有一些男子气概。她意识到，只是因为这些妇女害怕当众讲话，才佩服她的大胆而选举她当了妇女会的干部。

如果失去了贫农的身份的话，她还能够保持在妇女会里的地位吗？她不知道。当她站起来自报时，信心就不如平时那么足了，但她照旧叉开两只裹着的小脚，语气坚决地说：“八路军来以前，我啥也没有。后来我翻了身。现在，我有五亩九分地，常年产量六石二斗。我没有牲口，没有自己的房，也不欠债。我想我是个下中农。”

王香采取了这样一种折衷的办法，既不好意思把自己叫作

贫农，又不愿承认自己是中农。工作队员耿西对她解释说，这次划阶级中没有下中农这一成分，她得定下到底是中农，还是贫农。王香稍稍迟疑之后，大胆地说，她是贫农。

人群小声议论开了，王香窘迫而又挑战似地仰起头来。

一个小组的发言人起身说：“王香的一个侄女是寡妇，她种不了所有的地，就给了王香三亩。她没要任何报酬，只是偶尔去王香家吃顿饭。”

另一个人说：“王香有的够多的了。实际上，她的粮食根本吃不完。她儿子当兵，地都由别人代耕，又有人替她挑水，村里还供给她烧柴。”

再一个小组的发言人是和事佬，他说：“她现在收的粮食确实不少。但如果她儿子结了婚，那就太少了。所以，如果我们把两口算成三口的话，她的粮食又不够了。此外，她也没有牲口。总的来说，我们组认为她是贫农。”

但是耿西说，“划成分要根据当前实际情况，我们不能把两口算成三口；一口就是一口，既不能多算也不能少算。因此我们只能把她当兵的儿子算一口。但我们也要把他算成一个劳力，因为他要回来的。至于代耕，不能算作给她划成分的依据。她没有牲口，这并不能决定她是不是中农。当然，如果中农有窟窿的话，也要给补上。”

随着讨论不断深入，情况就清楚了：八路军来到之后，王香上升为中农阶级。最后，她同意被划为新中农。

王香对划成分的原则的某些疑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工作队事先没有给富裕农民辅导，而是集中力量在半翻身的贫农中进行工作。这样做的理由是：工作队已经估计到，少数能说会道的中农考虑到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总想把自己划为贫

农。因为村里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在这次运动中将形成这样一个新的社会等级：贫农在顶上，新中农在中间，老中农在底下。

午饭后，寨上的老乡们又重新聚在一起，几个被划为中农的人显然是抱成一团了。牲口贩子李宝会又提出富裕户傅为山来了。他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会同意把他划成老中农，刚才他对我说，要不是八路军来了的话，他简直活不下去了。他真是在八路军来了以后才翻了身，对吗？”他问。

“你们给我定什么成分我都同意，”傅为山说，“但我的日子确实是在八路军来了之后才好起来的。他们让我们种棉花，我就种了，这以后，我有钱买了一头毛驴。”

过了一会儿，傅为山又替另一个农民讲话。他说：“李民的地是在八路军来了以后才买的，把他划成老中农真是莫名其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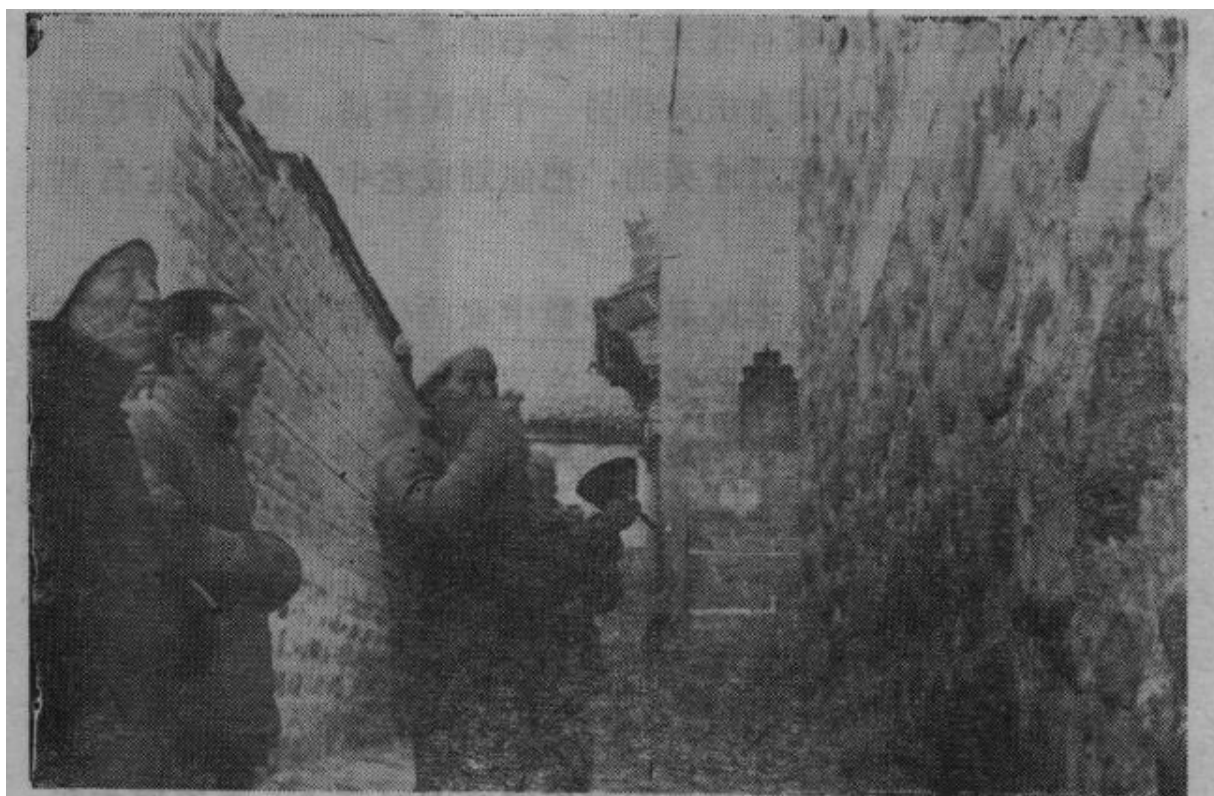
确实，傅为山、李民等大多数中农的生活是在八路军来了之后才得到改善的。共产党带来的革新，如种棉花、纺织、互助组、合作社贷款，以至对地主和富农的限制，使几乎所有的中农都从中得到好处。还有不少人从查黑地运动期间的不正当的作法中得到了好处。当时把因瞒地漏税而被没收的一些地主和富农的部分土地拍卖了，而不是无偿地分给贫农。这条“中农路线”使得李民和其它许多中农得以买到土地。

在那些经过工作队辅导的积极分子的鼓动下，贫农敢于起来同中农争辩，并坚持他们上午作的决定。因此，傅为山和其他中农为彼此定为贫农而作的努力失败了。但在下午的会议上，傅为山和他的伙伴们又作了一次新的尝试。这次他们的企图是，使尽可能多的人划为中农。显然，他们忖度着：在运动

后期，会请中农献出土地来填贫农的窟窿。他们认定，被划的中农越多，分摊在每个中农身上的负担就越小。

例如，李保卿从他父亲那儿继承了少量的薄地和几间破烂房子，一个中农就想以此把李保勤划成中农。他说：不管怎么说，李保卿既不是靠自己流汗，也不是靠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得到了这份土地，而只是继承来的。但是大多数小组的发言人都坚持认为李保卿是贫农。这样，反对的意见就被否决了。

随着会议的进展，寨上的老乡们越来越多地懂得了划阶级的原则和坚持这些原则的必要性。最后，工作队的肖航一字一顿地宣读了寨上第一次划阶级的结果：



村里张贴了划阶级的榜。

阶级成分	户数
一致通过的：	
贫农	18
新中农	13

老中农	24
工人	2
有两种意见的：	
新中农或贫农	6
新中农或老中农	2
有三种意见的：	
老中农，新中农，或贫农	2
暂时未划的：	4
<hr/>	
共计	71

肖航说：“这是三榜定案的第一榜。到第三榜定案的时候，必须做到每个人心里都没有疙瘩。我们必须保证所有的建议或反对意见都能自由发表，这样才能不犯错误。如果这次有些情况不清楚或做得不恰当的，我们必须加以考虑，并在以后划成分时加以纠正。我们要坦率地议论干部，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员；对党员则也不管他是不是干部。我们必须改掉爱面子的习惯。但我们所说的得是准确而实实在在的。我们要心平气和地说，不要吵架。”

“全村第一次划阶级成分完成以后，我们将张榜公布，让全村每个人都能看到。然后大家可以酝酿一下，准备在下一次提出修改意见。”

当肖航即将宣布散会的时候，半翻身的贫农傅立荣作了最后的发言。这次划阶级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即人们不会仅仅因为富裕了而被划到敌对阶级中去。只要不剥削他人，发家致富不受任何限制。“至今，我没有尽力来改善我们的生活，”他说话的时候，眼睛在那条好看的毛巾

下面四处张望，“再也不能这样了，我要象头骡子那样干活。”

寨上划阶级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村。各个片都跃跃欲试。有些人在白天聚会，有些人在晚上；有些人在广阔的场院里或空地上聚会，有些人挤在屋子里，靠在炕上，蹲在门槛上，或是倚在织布机以及贮存小米或谷物的容器上。

全村专心致志地搞了三天划阶级的活动。第四天早上，表明评议结果的三张榜分别贴在三个地方。各户家长的名下，写有他所在的那一片给他划的成分。在有争议的各户的家长的名下，写有两个甚至三个成分。这一榜对村里 421 户中的 330 户订了成分；早先的斗争对象以及几家缺席户待以后再订。划分的成分及户数如下：

贫农	120户
雇农	2户
工人	2户
手工业者	2户
新中农	99户
老中农	80户
因意见不一致而暂时未划成分的	25户
<hr/>	
共计	330户

选举贫农团发起人

3月7—8日

当前任务的核心是民主问题。

——摘自1948年3月6日张磐石给罗林的信

三月七日晚上，划为贫农的农民开会选举贫农团发起人^①。工作队推举耿西主持会议，这是因为事实证明，他那种简明的问答式的谈话技巧很受农民欢迎。会议一开始，他就强调了团结的必要性。

耿说：“今天开的是啥会？是寨上和下街全体贫雇农的会。各组各姓划出的贫雇农是一家人不是？”

“是！”一致的回答从人群中各处传来。

“旧社会谁掌权？”耿问。

“地主、老财。”人群中回答。

“既然所有贫雇农都是一家人，为什么那时候会那样呢？”

“因为我们没团结起来。”

“因为我们还没有翻身。”

^② 这里的发起人，相当于筹备委员。因为“筹备”一词农民不容易懂，所以叫做“发起人”。在一般情况下，发起人当然不是选举产生的。——译注

耿问：“今天该谁当家作主了？”

“群众。”

“对了。为这，今天我们开个穷人一条心的会，商量怎样当家。”

“有些人说，‘老是开会，不如快些补窟窿，然后好好生产。’但是，组织贫农团就象盖房子打墙脚一样。只有先把贫农团组织好，才能和中农在一起改组农会。然后，再重新选举村干部。只有在这些任务完成以后，才谈得上补窟窿。”

“怎样组织贫农团呢？开头先要选发起人，就象选种一样，我们必须选得精而又精。这就是说今天你们要敢于讲话，不然，就会选了坏人组织贫农团。就象我们播了坏种子，就得不到好收成一样。”

贫农团发起人的候选人：由于要当着许多听众讲话和听取对自己的批评而感到忐忑不安。



“选发起人和划阶级就不一样了，划阶级头一次划错了，第二次还可以纠正。选人就不同了，假如我们今天没把好人选出来，我们就不能明天再选一次。今天，每个人都要以当家作主的样子来办事。”

耿西讲了一遍村里各组事先讨论的条件：贫农团的发起人必须长年劳动；大公无私，心眼正直；热心给大家办事；而不是讨好地主、富农的人。众人都同意这几条可以作为好人里头挑好人的条件。

耿西说，发起人要把所有够条件参加贫农团的贫雇农吸收到贫农团来。对一些在某些方面不够条件以及有小毛病的人，可以考验一段时期，观察他们能否改正。对那些缺点严重的人，可以观察更长一段时间。除了贫雇农外，可以邀请一定数量的新中农入团。末了，新中农可以占团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耿说：“吸收了足够的团员以后，就成立贫农团。以后，经发起人介绍推荐为团员的人，都要由所有的贫雇农进行审查，看看他是否符合条件。”一个人可能申请入团多次，才得到批准。每个人在被吸收入团以前，必须把他脸上的脏东西打扫干净。

“现在是贫雇农起带头作用的时候了。这也包括贫雇农妇女；没有她们，就代表不了全体贫雇农。如果这一回选不好，我们怎能做好填窟窿的工作呢？”

选举时，第一个被提名的是南头的候选人。王文盛在推选他的人们激励下，跳上了庙堂上的最高一层的台阶上。

“我从来没有当着这么多人讲过话。”他讲话时带着一种羞怯而温和的微笑。“我们组选我当候选人，但我觉得自己不够条件。我往常很穷，干活卖力，腐化的事，我没干过。我不敢当众讲话。给大家办事不敢说话可不行。有些人说我刻薄我爹，



群众举手选举贫农团发起人。

不给他吃饱穿暖。是不是这样，大家说吧。我有什么毛病，请大家都提出来，不要讲情面”。

听众们分成酝酿小组低声议论开后，一会，又聚在一起。一个小组的发言人说：“他从小就受穷，在山西给人扛活。他可不自私，也不腐化，他没什么缺点。”

另一个人说：“他符合所有的条件，我们对他满意。”

“说他待他爹不好不是真的。说这话的人没安好心。”

大家把意见讲完后，下一个被提名的人登上了台阶。他是五十岁的王广顺。就是3月3日工作队员邀请五个农民开小时他们讨论过的那个人。

这些农民说他嘴不干净，常常骂人，“顾吃不顾穿”。尽管如此，他所在的那一片还是有不少人提名他为候选人。

“咱可从来没腐化过。”他说。刚讲了这一句，他就说不出



按照习惯，女人与男人分开坐，她们也参加了选举。

坐在中间手里拿着一个纱框的妇女正在绕棉纱。

话来了。最后，他低声说：“我说不上啥，有啥毛病大家给指出来吧。”说罢，他就匆匆退到了旁边的走廊里。

农民们在议论之后说：

“他多年做长工，受老财剥削，有一肚子苦。”

“他是个好人，平时待人不错，从来没有掌过权。”在运动的这一阶段，干部受到如此彻底的批评，以致老乡们认为没掌过权是一种美德。

“尽管他老婆死去多年了，他也没有胡来过。他劳动卖力。”

“可是遇到村里有人办红白喜事的时候，他可不怎么出力。他几乎没有给众人办过啥事。”这头一个反面意见鼓励了其他谨慎的批评。

“他是这号人：人家的不爱，自己的不舍。”

“他可不那么节约，爱吃零食，上次他去阳邑时买了一块糖糕。”

讨论渐渐冷了下来，又叫到下一个候选人，王存才。

这是个民兵，他在合作社管轧棉花的机器。“我哪个条件也不占。”他忸怩地说，“当然，我劳动。要过日子，怎能不劳动？我从来没办过公事，也没掌过权。我对女人耍过流氓，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

村里人如此关心追逐女人这件事，是由男多女少形成的。解放前，每逢灾荒，许多穷人家被迫弄死女婴，原因是粮食不够一家吃。男孩子长大后，至少可以在家里干活；而女孩子长大后要出嫁，离开母家到丈夫家干活。

小组讨论总的来讲赞成这个民兵。一个人说：“他过去有段时间是个二流子，但近五年来改好了。”

“他老实、忠厚、心眼正直，从来不和老财通气。”

“是的，他从来没有对老财是一副脸，对咱们又是另一副脸。”

“他是那号能给大家办事的人。”

轮到下一个农民时，他抱歉地说：“我不会说话，有点儿聋。自己不知道还有别的啥毛病，请大家指出来。”

他耳聋成了众人议论的主要题目。人们对他没有多大的反对意见，但是许多人认为，他的生理缺陷使他难以担任公职。

接下来登上台阶的候选人都说没什么。一个发言人说他劳动好，正直，不说两面理。然而，总的来讲，他的缺点似乎超过了他的美德。人们说他脾气很倔，不经常到会，不合群。

再往下的是一个退伍军人。他的自我鉴定简洁、干脆：“我的缺点是脾气暴躁，经常跟老婆吵架。”他说着，利索地迈到讲台

边上。

一个发言人说：“他忠诚又大方，但确实脾气不好，嫌人腻烦，如果他家来了很多客人，他扛起镢头就到地里去了。”

“分配过斗争果实以后，他有时候乱花钱。”

“他还有点儿懒，他甚至没耕完自己所有的地。当政府号召我们种麦子的时候，他只种了一亩。一个人连种自己的地都不关心，是不会为帮助别人而操心的。他需要打起精神来。”

“这些就是南头片的全部候选人。耿西站起来说：“已经花了很长时间来讨论六个候选人了。对他们没有多少批评。从这一点来看，你们还是有点碍情面。”

“每一个人都应当敞开发言。不要担心候选人是否会当选；不要害怕报复或记仇。”

“另外，不要分寨上、下街；也不论是哪一组、哪一片的。只要讲的实际，对任何一个候选人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

“投票前请大家先酝酿一下。然后，我们要从六个候选人里头选三个。每人只能举三次手。不要四处张望看别人选谁不选谁；自己拿定主意。每个人自己心里要有个底。也不能根据你同候选人的私人关系来选举，要按照四条要求来衡量。”

经过短时间的酝酿之后，就开始选举了。工作人员对举起来的手进行计数。

第一个发言的王文盛得到一百零二人同意。第二名当选者王广顺得到五十九人同意。

这时天已经晚了。耿西站起来宣布第二天下午再开会。留出上午的时间种地是很要紧的。

第二天下午，人们又聚集到一起，由北头片的候选人来作鉴定。费了很大劲，赵正方才鼓起勇气登上了台阶。他呆呆地站



王文盛以压倒的多数当选为贫农团发起人。

了一会儿。他那高大瘦削的身躯过早地变驼了。他对人群中善意的鼓励报以微笑，说，“我老了，”可他才四十六岁，“恐怕难以办好众人的事了。”

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同样简单：“他非常老实。别说这四条条件了，就是八条条件他也够了。”

与赵正方又高又瘦正好相反，李宝有是一个又矮又胖的人。他也几乎得到一致赞成。他说：“我用力干活，不劳动就没得吃。我和老财从来没有一点瓜葛。”

农民说“这个人全好，大公无私，容易亲近。”“四个条件全占。”选举时，赵和李都在北头片的候选人中领先。

北头片是村里提名妇女作候选人的头一片。但妇女候选人并不占男人的名额，她们是额外加的。这样的安排是因为人们觉得如果直接与男人竞选的话，她们不是对手。尽管她们的地位比解放前大大改善了，但仍赶不上其它改革的步伐。

北头片选了两名妇女。与其说因为她们符合条件，倒不如说她们是模范妻子。她们所达到的三条要求：勤劳、品德端正、会与人相处，即使在旧社会也是受到推崇的。只有第四条要求，——热心为人民服务，具有新时代的特点。然而，对十里店的妇女来说，服务仍然意味着为自己家庭服务，而不是为整个村子的大众服务。

这样，当轮到第一个女候选人自我汇报时，才发觉她已经离开会场了。她的娃娃闹个不停，她带他回家了。人们对她作了缺席评论：“自从王翠子来到十里店以后，从来没有见她发过一次脾气。”

“她老实忠厚，和邻居处得不错。”

“她从不抱怨丈夫穷。”

另一位妇女候选人宋婷子在自我汇报时，刚说了几句，就不作声了。为了掩饰窘态，她把头歪到一边。这样，她齐肩长的黑发就半掩了她的脸。象王翠子一样，她也因恪守妇道，纺纱织布的灵巧和勤奋，以及作为妻子和儿媳的贤慧而受到赞扬。她也以多数赞成而当选。

中东片提名的候选人中，李书东的经历最为复杂。他出身于地主家庭，但早就被赶出家门，靠当雇工生活。更为复杂的是，他后来娶了一个被遗弃了的地主老婆。在划阶级的会议上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他被定为贫农。因此有资格被提名为发起人的候选人。在现在进行的评议中，显而易见，李书东在

村里是很得人心的。

“他的地主家庭不喜欢他，这是他的光彩。”“他走的是群众路线。”“他没有毛病。”这些都是对他的评价。因此，尽管他自己和他老婆的家庭出身不好，他还是当选了。

下街四个片的发起人都选定了以后，寨上也选了发起人。第一个发言的候选人是傅立荣，一个用白毛巾几乎盖住眼睛的老汉。他的自我鉴定可不象先前那些发言者那么谦虚。

“大家都看到了，我可是劳动积极，也关心大家的事。早先脚步不正，搞过女人，现在已经改过了。我担心的是能力不够，领导不起大家。”出于礼貌，他加上了后一句话。

“他劳动红火，名声也不赖。”头一个发言的人说。“他干活确实卖劲，”第二个人说，“可是当他保管合作社的粮食的时候，在里面掺过土。”

“对，这不假，他还在黄豆里掺砂子，他有私心，不是没有私心。”

“听说，他这么大岁数了，还追女人。”

“他连四条要求中的两条都不够。”

一个妇女以下面的话结束了讨论：“这个人不行！”

傅立荣听着人们的议论，毫无反应。毛巾下面他那张折皱的、晒黑了的、新长起稀稀拉拉的胡茬子的脸，没露出任何表情。

下一个候选人是纯朴老实的傅便刚，就是工作队员肖航曾经培养他在寨上划阶级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那个人。

他简短地叙述了自己的贫困生活，人们稍作讨论就表示同意：“他讲的实际！他是个好人！”

然后是李保卿。他说：“前些年有人说我是头号懒汉，我现在仍然种不好地。娶媳妇以后，我还去打牌，我老婆三更半夜

在家等我。她劝我别再赌博，我就打她，把她打小产了两次。后来我认识到自己的毛病，改过了。

“我从没办过公事，也没贪污过。有人说我实际上不是贫农，应划为中农；因此，还是等到我的成分评定以后再选好。”

对他讲话的第一个评价是：“全是老实话，都是真的。”

“对，这个人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就会改正。”

“是的，可是他为什么不讲他给军属代耕时烂掉了豆子呢！他说他是个懒汉，但他自己的豆子可长得不错。”

下街的一个人说：“寨上的这些候选人，没有一个象样的。提名这些人毫无道理。”

人群中的咕哝声从一处传到另一处，很快变为愤怒的争吵声。

一个人喊道：“不是什么寨上或下街如何的问题，而是候选人够不够格的问题！”

但是，吵闹声越来越大，最后耿西不得不出面掌握会议。尽管他嗓门很大，威信很高，仍然拖延了一段时间才安静下来。

吵闹平息下来以后，对寨上的一名有待评议的女候选人进行评议。象大多数妇女一样，陈翠子很不好意思讲话，而是由别人替她说了。

“她很勤劳，纺花是全村头一名。”

“她侍奉婆婆很好。”

对她没有反对意见。但就寨上的候选人投票时，人群中显示出相当大的阻力。不满的、抱怨的声音在各个酝酿小组之间传布着。

原因很清楚。寨上原先提出的五名候选人中，除了陈翠子之外，还有四个男的，其中一位是陈的丈夫。他在最后的时刻

退出了，说：“两口子一同参加选举不合适。”这样，只剩下三个男的候选人了。由于每人可选举三次，这三个人就自然地都要当选。

由于人们对其中两名候选人意见很强烈，耿西建议每个候选人都要得到半数以上的人同意才能当选。大家对这一致同意。结果，傅便则和那个妇女当选了，其他两个落选了。

会开了近三个小时。人们开始往大门口挪动，妇女特别急于离开，因为她们还要回去做饭。

耿西把他们叫了回来，他说：“这些发起人都是你们选的，你们对他们有什么嘱咐吗？”

大部分农民停了下来，若有所思地望着他，有些要走的又返了回来。

一个农民指着新选出的发起人说：“你们是使贫雇农富裕起来的酵母。”

“是呀，要把贫农团这块面发好，好好给咱贫农办事。”

“要记住划阶级的时候，有些户自报了几遍也没有完全讲实在。”

建议从庙院的每个角落传来，并且要求当选的发起人表态。大多数发起人说，他们这一天里已经说得够多的了，不再说了。经过一再友好的请求之后，少数人答应了。

“我不会做这种工作，但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同群众一起翻身。大家要我往哪儿走，我就往哪儿走。我希望你们仔细监督我。你们对我有任何意见都请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不必讲究场合。”

“至今，我们还没有彻底翻身。从现在起，我们要尽力。我们都要团结起来为穷人办事。”

“是啊，我们要团结。是寨上的还是下街的，都一样。要是寨上的贫农兄弟们嫌选上的发起人太少，可以再选一次，多选几个。”

耿西在结束会议时又强调了团结。他问人们：“全村贫农能团结起来不能？”

“能！”

“贫农要不要联合中农？”他提出这个问题，预期着运动的下一个阶段。

“要！”人们欢乐地议论着，涌出了大门。

宗派主义

然而，实践证明团结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宗派主义，作为地主扶植的一种传统，在十里店已经有了许多世纪的历史，它深深地扎根在姓傅的，姓王的和姓李的几个家族里。从理论上说，家族是社会机构，甚至是负责每年的祭祖、扫墓、春节和其他节日庆祝活动的半宗教性机构。但实际上，它们还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职能，因为它们是地主集团之间彼此对抗的一种组织形式。

各个地主集团勾心斗角地争夺官方或半官方的职位，特别是那些负责税收的和其它有“油水”可捞的职位。各姓的地主靠着维护古老的家族组织，确保各有一伙现成的追随者。

共产党领导的改革，把宗派主义的最恶劣的方面及其根源的地主统治一同消灭了。但是，宗派主义的幽灵在农村生活中并没有消失。

工作队几乎是一到十里店就碰到了宗派主义。在挨家访问和最初的会议中，农民经常提到寨上（那里的人大部分姓李、姓傅）和下街（那里姓王的占多数）之间的对立，以及在寨上姓傅的和姓李的之间的对立，在下街北头和南头之间的对立。不久，工作队又察觉另一个问题，即村里的积极分子之间也存在不和。积极分子中的一部分集结在前任村长王克斌周围，另

一些则支持现任的干部。

宗派主义给工作队造成种种障碍。划阶级的时候，下街的人嚷嚷：“他们寨上那伙人是勾结好了的，竟把有半头驴的傅某某划成贫农。”南头的一个小组抱成一团，达成默契，把彼此划为贫农。后来，其他片的人议论南头的人“互相搓背挠痒”。批评干部的时候，寨上的一些人追问，为什么村里的大干部都出自“王家街”，——他们对村里这条街的南半街的挖苦的叫法。

对于如何最有效地对付宗派主义，工作队员们持有各种不同的见解。有人说：“我们不应当把它公诸于众；否则就等于正式承认它了。”也有人说：“我们必须把它公诸于众并彻底解决，否则我们什么事也干不成。”

工作队长罗林对这两种看法都不同意。在工作队员最初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说：“宗派主义不能在一天之内加以克服；它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一露头，我们就要公开对付它，并与我们当前的工作联系起来。”

当下，工作队又在一起商议如何对付在选举贫农团发起人的时候出现的宗派影响。讨论得很详细，会开的时间也很长，最后，罗林作了总结：

“首先，不要在原则问题上让步；不要忽视不正确的意见或害怕互相批评。换句话讲，不要为表面上的团结而掩饰分歧。”

“不假，当下街的人批评寨上的候选人的时候，部分是出于闹宗派的动机。然而，大量的批评是正确的。尽管如此，我们有些人没有认识到这点而是提出‘我们应当坚持自我批评，让别人批评他们自己’。我们应当引导他们讨论哪些批评是正确的，哪些是片面的。”

“其次，我们必须特别注意自己不要陷入群众的宗派活动。例如，在下街工作的个别同志曾经说过：‘咱们在寨上工作的同志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而在寨上工作的一位同志回敬说，‘宗派主义的主要责任在下街，他们支配着比下街小得多的寨上。’说这些话，你们就成了群众的尾巴。这种情况必须防止。

“应当在合适的时机，公开批评卷入宗派活动的少数农民。我们有些人担心这样做会变成包办代替，不是让群众自己翻身。这种情况，我们当然要防止。然而，放任自流并不能使我们团结群众；而只会使我们脱离群众。”

当新当选的发起人在一起制定挑选会员的计划的时候，工作队向他们指出，必须克服宗派主义。同时，肖航召集寨上的贫农积极分子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为什么他们的候选人只有两名当选。

傅立荣和李保卿这两名落选者也出席了会议，另外还有寨上的吹鼓手、浓眉毛的傅德以及英俊魁梧的油印员傅长亭。会议不拘形式地开始了。人们有的坐在炕上，有的坐在门坎上或坐在从隔壁边区政府民政部门食堂借来的凳子上。

肖航一开始没有参加议论，他想给农民一个机会去发泄对下午那次会议的气愤。

一个老人说：“哪儿都是一样，大村子老是欺压小村子。我们寨上人就象是家里的儿媳妇。”

另一个农民说：“我们只好分家，分成两个单独的村子。”

话题又转到了选举。一般认为，寨上的候选人可能不是十全十美，但是下街的候选人也不见得比他们强。傅立库，寨上当选的女发起人的丈夫，支持这种意见。尽管他自己已经退出候选，他参加会议还是很积极的。

傅立库说：“第五互助组不是提名王水成吗？他是个什么东西？不就是个二流子嘛！还有那个跟那个寡妇勾搭的叫什么名字的老家伙。他们互相包庇；他们就是这样被提名为候选人的。一种新式的互助。

“另外，傅和气是个二类斗争对象，为什么他们把他划成贫农？”

“他们只讲我们的候选人的缺点，可是他们就不看看他们自己的候选人的毛病。”

“说实在的，”傅立库又说道，“每个人，甚至县长都有缺点。我们应当选出精明能干的年轻人来，不然，啥事也不成。即使他们有缺点，也是难免的。光是强调单纯老实是不够的。”

“是的，”吹鼓手傅德说，“很多人都在议论，如果我们光选象傅便则那样单纯老实的人，那可不行。看看李惠吧，他顶老实了，可是啥事也干不成。”李惠住在寨上，是个无能而怕老婆的副村长。

“这些青年积极分子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看看傅长亭吧，就在这儿。他积极得很，在互助组干活很多。可是下街的人不了解这些。他们光知道他脾气有点暴躁。”

“确实，”傅长亭说，“我得罪了很多人。我的脾气的确很坏。”

这使傅立荣处于较为主动的地位，尽管下街的人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不管怎么说，我们寨上有两个候选人当选，一男一女，这就不错了。如果我们寨上的人觉得不够的话，可以提出来再多选几个。”他从头上扎的毛巾下射出威严的目光，和气地说：“要紧的是，我们寨上的穷人决不能看不起下街的穷人。现在贫雇农要当家作主了，互相埋怨不好。”

另一名落选者李保卿同意他的意见。他说：“现在的问题是，怎样继续进行工作？”

看到农民们把怨气出完了，肖航提出了宗派主义的话题。他谈到了团结对于当前发展贫农团员和批评党员干部等项工作的重要意义。他说，要团结就要做到两点：大家必须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必须进行自我批评，而不是光批评别人。他提醒他们，宗派主义是老财们为了分化和统治农民而制造的，它使所有农民都深受其害。

肖航说：“这说明不管你属于哪个互助组，来自寨上或下街，都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所有穷人都是一家人。”

街上的各片也召开了同样的会议。宗派主义此刻已成为众矢之的了，人们认识到它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严重弊病。从那天起，不参与任何小集团的活动，就成了参加贫农团以及以后参加农会的条件之一。

然而，还有一种更为危险的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反党宗派活动，可能在村里造成危害。由于党员都受到了群众的批判，那些被某些党员的专横态度得罪过的人，以及对权力和地位有野心的人，可能会趁机组成一个特殊的集团。任何一种有组织的反党宗派活动，都会是对过去八年中所取得的进步的倒退。因此，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不损害党的声誉和地位的情况下，改组党支部。鼓励那些尚未翻身的贫雇农评议党员是应该的，但是，开展评议的过程，决不能为反党派别夺权打开缺口。在选举了贫农团发起人以后的日子里，党员的思想改造成了运动的关键。

寨上评议党员

3月9日

农民在划阶级中获得了政治经验，而且，已经开始了的建立贫农团的活动，使他们有了一种安全感。为了揭露党支部工作中存在的必须纠正的缺点，工作队要求农民公开评议党员。

然而，与此同时，村里的党员也得参加建立贫农团的工作。尽管他们有缺点，但总的来说，在与地主阶级进行斗争的艰险年代里，共产党员是村中最有胆识、始终如一而且头脑清醒的人。因此，团结和批评并不矛盾；为了组织群众和改组本村党组织，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

公开评议要求做好仔细的准备工作。开头，贫农和中农先在各自所在的片里进行一次预习，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觉得自在些。

1948年3月9日晚上，寨上所有的贫农和中农（除党员外）聚集在他们经常开会的屋子里。在宣布会议开始时，工作队员肖航就鼓励农民畅所欲言。他说，工作队的支持是可以信赖的，不必担心工作队走后党员干部会打击报复。因为到了那个时候，群众自己的组织贫农团和改组了的农会将给他们撑腰。此外，那些他们所信任的，经他们批准而取得团员资格的党员也将参加这些组织，并将全力支持他们。因此，不必害怕

什么。

一开始，肖航指出，已经到了对那些前任的干部提出批评的时候了。如对住在寨上的前村长傅高林，他说：“已经决定对傅高林进行一些教育，使他对过去干的所有坏事有正确的认识。如果党员或任何干部在现在或过去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可以把他们送交人民法庭审讯。”

“说吧，现在就讲讲你们的想法吧。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意见讲完以后，我们就在各组选一些代表，到明天的会议上发言。”

第一个提意见的是吹鼓手傅德。他批评了政治指导员王绍贞私自卖了本应交给民兵的枪支。当晚的会上，人们还批评政治指导员，说他买了以前的地主王邦彦的院子，以及撕毁了他弟弟的婚约。

傅立库，他在昨晚讨论宗派主义的会上就曾对下街的群众作了刻薄的批评，这时又质问村长王喜堂：“为他母亲的丧事花了三十元，我不知道他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他用老于世故的口吻讲话，暗指村长贪污。

那晚上傅立库发了几次言，其他贫农也讲了话。贫农第一次真正掌握了会议。正如工作队所希望的，随着贫农团即将成为现实，他们得到了新的勇气。

另一方面，与被培养成贫农骨干的贫农相比，中农往往在政治上表现落后。牲口贩子、新中农李宝会批评村里的前会计说：“灾荒年头，人们看见他往边区政府给合作社分配的黑豆里掺土；因为他同下街的干部关系好，所以没有受到惩罚。寨上没有一个干部是代表我们这儿的利益的。”

事实上，副村长和民兵队长都来自寨上。贫农们对这一宗派主义的挑动没有理会。

然而，傅立荣抓住了往豆子里掺土这个题目。他说：“在选举会上，有人说我也往豆里掺渣土，我根本没干过这号事。”

从头上扎的毛巾下面，傅立荣真诚地注视着人们：“是这么回事，提审我的时候，村长一口咬定我有罪，他还说我得改过自新。最后，我被迫承认往豆子里加了几碗土。

“一旦我松了口，张钟更得寸进尺。他计算说，我往每斤豆子里掺了四两土！还迫我赔偿损失。从那时起，全村的人都认为我往豆子里掺土了。”

人们耐心地听了傅立荣的辩解，但没有一个人把它当回事。他讲完后，有人开始批评前村长傅高林。

“轮到他抬担架时，他就往脸上贴膏药，让人觉得他似乎病得厉害，不能去。可是当我真的病了的时候，他却说我逃避公差了。事实上，我从那天病到现在，这你们大家都知道。”

人们又揭发了原来的两个前村长的很多问题。一个是当前与台上干部唱对台戏的宗派头头王克斌；另一个是已经离开本村到县城工作的王子寅。

农民们已经不害怕提出批评了，但他们对目前掌权的干部仍然没有提出多少严厉批评。这个事实使工作队员们相信，他们关于干部暗中串通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不管目前的村干部有什么缺点，他们显然比过去的干部强多了。

批评转到了非党员李保武身上，他是前村人民保卫委员会主席。傅喜昂说：“李保武让人把我娘捆起来打，他说我娘是个替地主窝藏东西的‘防空洞’。她因此病倒了十天。”

“他还说，我在晚上点火是给要藏东西的地主打信号。其实，我点火是因为孩子病了。他没过几天就死了。”

邢恒泰说：“李保武趁着灾荒发财。我家揭不开锅了，就卖

给了他三亩地，他至今还占着。他用孬地换好地，还用远地换成近地。”

一个妇女说：“荒年时，我男人到外地去了，我钱粮都用完了，去找李保武卖地，他趁机强迫我改嫁。我不答应，他就说：‘你等着瞧吧！’以后我只要有一次没去开会，他就损我。”

李保武现在是寨上的油坊管理员。农民指责他干这行时还贪污。李保武的本家兄弟李保卿说：“我去油坊买油，他只卖给我油渣，说剩下的没别的了。其实，如果他跟你好，就卖给你好油，不然就不卖。”

另一个说：“他经常把应当上到油坊帐上的钱塞进自己的腰包。”

村里关于李保武腐化的传闻颇多，但从未得到证实。总的来讲，在运动的这一阶段上，尽管有些批评证据不足，工作队还是避免给群众头上泼冷水。

有人一时头脑发热，宣称：“村干部都是一路货。村长、治保主任，农会主席勾结在一起包庇地主，弄得斗争不彻底”。对这样的过头话，工作队也未加理会。

然而，当工作队员们听到毫无道理的批评时，他们不能不出面干涉了。牲口贩子李保会把一个党员说成是“封建尾巴，不配当共产党员。”他还进一步说：“据我看，他连农会会员也不够格。”

“他连农会会员也不够格吗？”肖航心平气和地问道。

“当然够”。人群回答。

谈到治保主任王林荣时，贫农傅守生说：“他负责卖的斗争果实中有三副手镯，他没有卖给任何女人。搞不清他到底是把手镯自己收起来了，还是送给哪些相好了。”

另一个说：“那些铺盖的下落也是一样。很多想要的人都得不到，他自己却卷走了一些。”

“他还得到一份救济小米。”油坊工头辛维泽说，“他从哪儿来的钱买骡子呢？”

一向同村里的党员不和的傅有河对党支部的两位副书记之一、前民兵队长李松亭提出指责：“他在生产上不带头。锄草的时候，要不带上很多烟，他是不会下地的。他地里的草实际

上都是互助组给锄的。互助组还替他起粪送粪。他的地不少，可还设法领政府发的救济粮。在斗争期间，他额外得到一份斗争果实。”

他皱着眉头说：“这都是由于干部和党员官官相护。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就得解决这些问题。”

工作队认为，傅有河之所以对村里党员喋喋不休地责难，是由于他的个人野心与积怨结合起来了。他反复地说：“说我们批评党员而他们不会报复尽是废话；要使他们不能报复，唯一



傅有河，他苛刻地批评本村的党员。他从前线回村后当了民兵。

的办法是要确保他们之中的任何人都不再当选。”

当划阶级工作刚刚开始时，他就说过：“哪能指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能公平地划分阶级呢？”

一个农民反问他：“那你觉得在国民党领导下能划好阶级吗？”

尽管这个问题使他发窘，傅有河仍然坚持自己的论断。他说：“这是人的本性，人只要活着，遇到机会就会设法报仇的。”

一旦工作队放手让傅有河这样的人同单纯老实的农民掺在一起，就常常有这种风险，他们那些挑衅性的指责最终可能引起暴力行动。当然，群众的政治觉悟越高，他们就越不会响应或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然而，工作队和十里店的共产党员，以及许多农民在运动的这一阶段，已经学会了怎样召开群众性的批评会。能不能做到合理、公平？群众会不会被傅有河这种人的言过其实的指责所左右？如果为这种煽动所左右，会不会象在过去的运动中对地主、富农那样，对一些干部和党员使用暴力呢？

群众评议党员

3月10日

聚集在庙院里的农民都是喜气洋洋的。即便是那些对村里的党员吹毛求疵的人，也觉得被邀请参加党的会议是一种荣誉。然而，那些打起精神来参加这种挨批的会议的党员，却显得不安和紧张。他们不得不提醒自己，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员，这个党领导人民战胜了日本侵略者和地主富农。他们在庙台和走廊的上方挂了一幅红布会标，衬托着两面红旗之间悬挂着的毛泽东的巨大画像。他们认为，尽管这次公开的支部会议的目的在于批评支部的成员，但它是显示党的风格和尊严的场合。

当农民们聚集到院子里的时候，村里党员仍在庙里同工作队成员谈心。庙外，由各片推选出来提意见的六十多名代表，坐在被当作讲台的台阶前面。代表们左边有一块空地，是留给党员的；右边是一群妇女。在这三片人的后面，其他的农民围坐成一个大半圆形，一些工作队员分散在他们中间。

最后，党员到会了，坐在指定给他们的地方。政治指导员王绍贞那张圆圆的、孩子般的、通常总是笑嘻嘻的脸，现在紧绷了起来。他的好友、农会主席傅长锁也是这样。当过近四年村长的王喜堂在平时总是保持着冷静和自信，这时也显得心神不定。找到地方后，他们都低着头坐在那儿。



党支部开门会上的一群妇女。

冷冰主持有群众参加的党支部会议，要求村里的群众评议党员。



工作队的冷冰登上台阶，说：“在十里店，有二十八名共产党员。所有这些党员都已经对你们作过介绍了，除了他们之外没有别的党员——没有地下党员。除一人生病外，今天下午他们都在这儿。

“所有这些党员都有他们自己的缺点错误。在过去的十天里，他们反省了自己做过的事，并在党内进行了批评。我们没有请你们参加党内的自我批评会，现在邀请你们参加这次公开的支部会。共产党要求你们热情地、开诚布公地帮助党员改正错误。

“过去，我们搞过洗脸擦黑运动，帮助党员和干部克服他们的缺点。但是，这次运动与上一次不同。那次运动没有要求党员改造自己；这一次就要求他们改造自己。

“决不允许党员进行报复，永远也不许。因此，代表们不必害怕报复。

“从现在起，群众要自己当家。过去，你们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以后，要组织起贫农团，改组农会。群众一旦掌了权，更不允许报复行为了。一方面，党的上级机关不会允许党员报复；另一方面，群众自己也不允许——群众掌权就能做到这点。

“在支部内部进行的十多天的教育中，我们发现有三种党员：

第一种是那些入党时间长并当了几年干部的党员，他们犯的错误比较严重。有些人霸道。有些人在运动中占了额外的果实，翻身翻得太高了。有些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有些人有骂人、绑人和打人的行为，甚至诬陷人是特务。这些老党员有的已经很好地作了自我批评，有的还没有，而且没打算改正

错误。

“第二种是那些犯错误不那么严重的党员。他们对群众盛气凌人，或者自私自利。同样，这些人中有的作了很好的自我批评，有些还没有。

“第三种是那些错误较小的党员。他们是新近才入党的。他们的缺点在于自私，缺乏领导能力，没有很好地为人民服务。

“现在，该你们谈谈如何对待这三种党员了。该受到批判的，就批判；该免职的，就免职；一致认为有罪的，就送交人民法庭去审讯。经过多方面考虑以后，党认为不够党员条件的，可以动员退党。

“你们对过去的干部提了很多意见。今天要考虑的是对党员的意见；以后再考虑过去的干部的问题。但是，你们放心，我们将根据你们提供的事实，把所有的问题解决好。工作队已经找前村长傅高林和王克斌谈过话，并且着手解决他们的问题了。

“为了保证开好今天的会，我想给代表们和党员们提出几条要求：

“第一、要讲真话；

“第二、不吵嘴，不打架；

“第三、党员要虚心听取和仔细考虑群众提出的意见。在此期间，即使不同意这些意见，也不要反驳。

“最后，希望群众不要自己直接提意见，请把你们想说的话告诉代表，他们会替你们讲。

“现在开始听取你们对党员的意见，我按次序念党员的名字。

“王绍贞。”

先是一阵沉默；接着是暴风骤雨般的批评。作为村里的政治指导员和党支部书记，绍贞是村里最活跃的两个干部之一。另一名是村长，他上了年纪，老成持重。在开展的各各种运动中，在应付各种危机的过去五年中，绍贞得罪了许多人，并且结下一些私仇。



党支部开门会上，一位农民发表对本村党员的意见。

代表们总共对王绍贞提了三十二条批评。第一条是关于步枪的事。几个代表都提到了这件事，每人都提出些新名堂。一位发言人愤慨地说：“那支枪是给人民的礼物，他不把它交给民兵，反而卖掉。这就等于私吞公款，可他指望因从前线扛回了枪而受表扬呢。”这件事引起了极大的愤怒，因为民兵与村里农民是生死攸关的，先前靠民兵对付日本兵，现在对付国民党。

人们还指责王绍贞多拿了斗争果实，翻身太高了。他不仅

买了一个新院子（部分是用的卖枪的钱），而且，据一名代表说：“他还从斗争果实中，拿了一块头巾和一件绣花旗袍在阳湖卖掉了。他一共卖得六元，自己留了两元，剩下的三、四元给了他的同伙农会主席。”

除多分斗争果实外，代表们还指责王绍贞随意用果实送人情。

一个代表说：“一个妇女挑了一件她中意的东西，王绍贞就骂了起来，问‘你要这个干什么？’从她手里夺走。”

另一个代表说：“我也遇到同样的事。我想要一个衣柜，他把我骂了一顿，还问：‘也不想想一想你配这个吗？’”

“跟他好的人可以先挑斗争果实。在填平补齐运动期间，他只让我拿了一条用烂了的布袋。”

“他脾气很坏，人们都怕跟他讲话。”

“一次在党的会议上，有一个人打瞌睡，他就打他耳光。”

一些妇女提到了那件撕毁婚约的事。因为想让妇女们在会议上积极些，因此，尽管她们不是代表，冷冰还是让她们发言了。

“他兄弟与南阳邑的一位姑娘订了婚。”一位中年妇女一手拿起一把锥子，另一只手拿着纳了一半的鞋底说：“可是政治指导员为他另找了一个姑娘，并撕毁了原来的婚约。”

另一个女人讲：“另找的就是咱十里店的。她结过一次婚，她男人逃荒出去，再没听到信儿。她要嫁另一个人，可是王绍贞强迫她嫁给他兄弟。”

一位代表作了更详细的补充：“她确实已经嫁给了河东村的一个人，跟他过了三天，可是干部们强迫她回来。干部们说她没有按老规矩在丈夫走后等三年，因而宣布婚姻无效；接着就要她

嫁给了政治指导员的兄弟。”

“绍贞嫌他兄弟在南阳邑的那个未婚妻个子太小、太瘦，就把婚约给毁了。”

从头到尾，王绍贞一动不动地坐着。他的头微微低着，看着地。最后，意见提得差不多了，变成了翻来复去的老话。

在冷冰的建议下，给政治指导员提意见告一段落。接下来念的是名单上第二个名字王南方，他是劳动英雄。

代表们一开始发言就暗示，王南方不配得到这一光荣称号。一个人说：“我们至今所有的劳动英雄都出在第三互助组。”大部分干部属于这个互助组。“在锄草时候，是第七互助组首先锄完，又帮助别的组。可是，第三组的王南方却成了劳动英雄。”

甚至南方的干劲和事业心也受到了批评。一个代表宣称：“他替自己着想。他们组让他开了一个染坊，他还不满足。他改变了主意，又开了一个磨坊。全为了他自己和一两个伙伴。”

王南方象他的当政治指导员的堂兄一样，也卷入了一场婚姻纠纷。“他弟弟想同一个姑娘结婚，那姑娘不愿意。南方就强迫她嫁给他。”

“他叫李喜元当媒人。”李是民事主任，共产党员。

“媒人！不过是把他们反锁在屋里，然后自己走掉了。后来，她不得不嫁给了他。”

一名代表说：“情况并非如此，其实办的是买卖婚姻。由于姑娘不愿意，她家为了阻挠这门亲事，就坚持要他拿出彩礼。但是李喜元说，不管他们要什么，他都能办到。”

这样一来，由于姑娘家里的人贪财，就允许媒人把他俩锁在一个屋里。就象在封建时代一样，姑娘被迫出嫁了；不过，

她至少作了一些斗争。”

与对王绍贞的批评相比，对王南方的指责就少得多了。在村里的公务生活方面，王南方的重要性毕竟要小多了。

名单上第三位是村长王喜堂。在党支部里，他的地位低于王绍贞；但作为村里的行政干部，他的地位又比王绍贞高。对他的第一条指责是，他在几个买主争着要的情况下，抢购了沟底的六亩好地。

接着指责他违背群众的意愿，急急忙忙地让某个候选人当了官。还有一条意见得到三位代表的赞同，即为他母亲的丧事大肆挥霍。

第一个人说：“他为办丧事花三十元，一般人花不起这么多钱。”

另一个人说：“我不清楚他花了多少钱，但我知道用了五、六天时间搭灵棚。”

当年，王喜堂用一个场院举行殡葬仪式。他从大门到场院搭起了天棚，天棚用许多松枝、纸花、白布装饰起来，在那里设了祭坛。祭坛上供着各种祭品，包括一盘用上好白面做的馒头。为向死者家属表示慰问，村里各户都在自己房前沿街挂起了缀着悼念字句的挽幛。当送葬的队伍走过村子时，他们在每幅挽幛前停留片刻，志哀者向贵重的棺材磕头时哀乐高奏。

一名代表说：“王喜堂给他娘办丧事时，沿路挂满了挽幛；可是村里一个战士死了爹的时候，一幅幛子也没有。”暗指王喜堂在别人办丧事时，应当领头挂挽幛。

这些意见提完后，很长一段时间没人说话，代表也没有再要发言的表示。很显然，人们对于这个曾经领导全村进行了近四年艰苦斗争的人，没有更多的指责了。王喜堂低下头，遮盖

了泛在脸上的笑容。

冷冰念了其他干部的名字。人们批评村合作社经理傅培玉在征兵运动中不让他兄弟应征，还批评了他经营合作社的方法。人们指责村治保委员王林荣说，当做生意和分配斗争果实的好机会到来的时候，他总想趁机捞一把。他同一个战士的寡妇的一段关系也被提了出来。

人们批评党支部组织委员王米山专横跋扈。代表们还指责他利用职权占用好房。

对一部分党员的评议很快就评完了。对他们的评价多半是这样的：“他是好人，就是受了别人的影响。”“他有点固执，”或“他太自私。”

个别党员受到了赞扬，“他没什么问题；每个人都喜欢他。”然而，如工作队后来指出的，有些人仅仅由于性情好而受到称赞，并不见得是个好共产党员。还有一些党员受到一连串的批评。年前当上农会主席的傅常寿由于他叔父过去放高利贷，因此，也不受贫雇农欢迎。

一位代表说：“他之所以当上农会主席，是因为四大干部^①强迫人们选他当的。

“后来，他得到了比他应得的要多的斗争果实。除他应有的那份外，他还想方设法去弄酒坊的一部分股份。现在他主要经营磨坊生意，而不是在互助组里劳动。

“另外，在斗争期间，他包庇了他叔父家。

“他叔父离开村子以后，傅常寿叫他婶婶在衣服里面垫些棉花，以假装怀孕来逃避斗争。当第二次斗争到来时，他让他婶

^① “四大干部”，指支部书记、村长、民兵队长、治保主任。——译注

婶说自己流产了，这样又蒙混过关一次。但是人们终于还是斗了她，她最后交出了十块银元、一罐铜元。常寿仍然为他保存着一些银元。

“他有一个兄弟在解放军里，还有一个在国民党军队里。”村里人都这么说，尽管从未得到证实。

“一次，一个寡妇向他要结婚准许证，他说可以——只要她答应嫁给他就行。”

“对了，他还说，他有的是钱，她要什么就给她什么。”

“村里所有的大干部都给他撑腰。他们向这个寡妇保证，如果她嫁给了他，到阳邑去爱啥买啥，爱啥吃啥。”尽管这样利诱，傅常寿至今仍然光棍一个。

一个代表说：“辛如灵死的时候，傅常寿说给他立一块墓碑。他以此为借口，占了辛如灵所有的东西。但是他的诺言从来没有兑现。”按照惯例，如果死者没有直系亲属的话，他的亲属关系最近的族人（同样没有的话，则是他的朋友或邻居）可以继承他的财产，但继承人得以死者亲属的身份安排丧葬，并给死者立碑挂匾。

人们指责二十六岁的干部王池勇说，除了政治指导员外，他干的错事最多。他是民兵队长，代表们指责他滥用职权。

“每逢参军活动，他就躲着不见了。日本人投降前，正当我们上前线去打仗时，他急着要回家，说是一条腿受了伤。”

“虽然他已住了一套房子，在斗争中他又要了一套房子。”

一名退伍军人从人群后面喊道：“我到现在还没房子住。他还经常挖苦我们复员兵，说我们离开部队是由于不老实。”

对王池勇指责最严厉的是发生在中秋节的一件事：过节时，有四个群众在一起多喝了几杯。另外几个民兵也凑进来一起喝，

大家都有了醉意。最初喝酒的一个人开始抱怨自己被划为封建尾巴。他说了共产党的坏话，因此，引起了民兵队长的愤怒。

“我们当时怎能知道民兵队长是党员呢？”其中一人现在问道。

据有些人说，那个醉汉抓过来一支枪，企图刺民兵队长，但被别人制止住了。第二天，一起喝酒的四个朋友都被抓了起来，罪名是偷窃子弹（那些子弹是在争吵中丢失的），并被定为“敌特集团。”他们被绑在庙院里挨打。

“后来，我们被关了一天。村长说我们是一伙二流子，反对干部。我们坚持说自己无罪。

“最后，他们咬定我们是敌特。这顶帽子我们一直戴到今天。”

下一个轮到干部王文堂。农民们对他的态度是有区别的，他们看来是把他当作一个误入歧途的朋友看待的。

一个代表说：“老文堂，你是个好人。可是，自入党后你反而变了。你买了一头牛，搬进了原先地主的房子，娶了老婆。如果你不是党员的话，能有这些吗？”

有些人觉得王文堂自从当上新成立的合作社委员会领导成员之一以后，变得自高自大起来。一个代表说：“我们去合作社轧棉花时，他爱搭理不搭理，全看他当时心情如何。一个党员对群众是什么态度？”

另一个人说：“人们去合作社轧棉花时，经常发现缺斤短两。我的七斤七两五的棉花短缺了半斤。”

“合作社不准我们拿粮食到集上卖，只能卖给他们。他们给的价一斤比集上少一厘钱。既然合作社是属于人民的，为什么还剥削人呢？”

会议用了整个下午和大半个晚上，对所有的党员都评议过了。批评几乎涉及村政府和党支部领导的各个方面。

在总结这一段运动时，冷冰向工作队作了如下的报告：

“为期十三天的关门教育党员工作已于3月10日结束。这时，群众开始直接投入这一工作。

“大多数群众对党员的批评是实事求是的，但是，那些叫得最欢的勇敢分子有些问题，说得轻一些，起码他们的动机是令人怀疑的。

“尽管如此，支部的公开会议达到了两个重要目的。首先，群众学到了很多東西。他们知道，听取对党员的批评，也是听取对自己的批评，因为他们明白，自己也干过同样的错事。其次，会议帮助党员加强了自我批评精神。

“总的来说，除了党员在关门会议中已经交代了的问题外，代表们没有提出其他有份量的指责。有些问题，如关于王绍贞的问题，是群众所没有提到而是党员们自己揭发的。另外，当代表们指出了某个党员没有交代的某些事时，这个党员就会责备自己：‘我自己为什么没有想到呢’？

“当党员听到批评合乎情理时，他们感到满意；但是，当他们听到批评不符实际时，他们的确得压住心中的怒火才行。我们预先在党支部内对这个问题作了充分的讨论。就拿王文堂来说吧，他觉得，说他在合作社委员会傲慢自大是没有根据的，但他仍然执行了党支部关于不要抱怨的决定。会议过后，我提醒党员们说，他们首要的任务是仔细考虑所有这些意见，并对那些合理的意见加以深入考虑，不必费心去反驳那些不合理的意见，那到以后再说。

“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我们仔细地分析了所有这些意见，

看哪些是合理的，哪些不是。我们发现，一般来说，那些说话时最激动、而又最吞吞吐吐的代表，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怀有宿怨、想要报复的人。一个多次发言的人不时宣称自己：‘我是代表十里店所有的人讲话的。’他当然无权这么说；他其实只是替自己讲话。因此，我们一定要从群众的角度来看问题。那些影响到群众的问题是重要的；个人恩怨是无足轻重的。”

组织贫农团

3月12—13日

贫农团的发起人是3月8日选出的。当晚，他们在一起讨论今后的工作。有的发起人说：“如果老中农里有几个好人的话，我们最好把他们也吸收进来。”在他们看来，由他们这些在过去处于底层的农民来成立自己的组织，并将成为村里政治生活的支柱，是狂妄的、不切实际的想法。

但是，大多数发起人说：“这不行，我们成立的是贫雇农的组织，不是老中农的。他们不知道我们受的苦，他们和我们不是一条心。他们可以参加农会。”

这样讨论之后，那些不够理直气壮的发起人被说服了，团员资格仍按原计划的规定。

有些发起人接着又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说：“我们只吸收那些最老实、最无私的人入团。不要那些二流子，那些围着女人转的，或替斗争对象当过防空洞的人。”

“这太苛刻了。”王文盛不同意，“那些同贫农一条心的人我们都应该吸收。有些人讲话不中听，可是心并不坏。”

赵正方说：“即使有些人有点自私，我们也是可以团结、教育他们。这样他们就有机会改造了。”

李宝有说：“有些人只是很小的防空洞，如果他们已经

承认了这点，并且认识到那是错误的，我们就应当吸收他们入团。”

另一个人说：“那些只给地主送过一两次礼，或者替地主家扫过院子的人，不能当作地主的狗腿子。”

“有些人因为太穷而娶不起老婆，偶尔与女人有些瓜葛，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就不应当算作流氓。”一个年轻人说。

最后，关门和大开门的主张都被否决了。发起人们同意，每个被划为贫农的人，都具有入团资格。根据中央局的指示，以后可以再吸收一部分新中农。

发起人们定下了吸收团员的步骤。每个发起人应提交一张他所在片或互助组可能入团的人的名单。然后，全体发起人一起讨论这些名单，删掉那些不合格的，添上那些被忽略的。接下来，每个发起人按修改过的名单，找他负责吸收的人作一次单独谈话，了解他对加入贫农团的看法以及对自己缺点的态度。那些有诚意改正自己缺点的人，将被记入发起人们供贫农团成立大会公布的名单上。

发起人们为自己“联系”贫雇农作了四条规定：第一、不抱任何个人成见；第二、不包庇亲友，不乘机报复，不论任何人，合乎条件就吸收，不合乎条件就不吸收；第三、不准站在群众之上，不准摆架子，发脾气。最后，自己有错就改，别人有错就当面批评。

在公开评议党员的会议开过几天之后，工作队讨论了在建立贫农团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队长罗林传达了中央局的一些指示：

“应先接纳一部分贫农入团，其余的贫农应加以考察。也就是说，先吸收那些发起人认为够条件的贫农，而告诉那些总的

来讲合格，但有某些小缺点的人：‘如果你改正缺点，你就将被吸收。’待贫农团对他们进行再次审查后，可以吸收他们入团。

“然后，与发起人开会，请他们决定哪些贫雇农适于入团。

“大体上有三类贫雇农：第一类是那些应当立即吸收入团的，即为贫农团所需要的；第二类是那些可以吸收入团，但需要先进行一些教育的；第三类是那些不应吸收入团的。

“发起人还可以考察共产党员，看他们谁适合加入贫农团，谁不适合。”

记下这些指示之后，工作队员们三三两两地来到旁边的一个套间里，贫农团的组织者们正在那里讨论哪些人应当或不当被吸收入团。由于看到讨论进行得杂乱无章、漫无结果，罗林向发起人们传达了中央局关于三类贫雇农的指示。这些人当时的议论重点主要放在哪些人不够格入团上，这些指示当下被他们接受了。

某人由于他“和一个地主的女人住在一起，用她的钱买房子，而一个贫农依赖地主是不对的”，因而被否决了入团资格。

有人则因为“到处胡说，播弄是非，心术不正”而遭到反对。

一对贫农因未婚同居而在排斥之列（尽管那个女人有个儿子在部队），“因为他们的关系不正当。”

情况就是这样：尽管发起人接受了上级规定的政策，但有些小组的门还是远远没有敞开。寨上的发起人只发现一个人合格：年轻的榨油工人傅长亭。显然，他们担心，他们推荐的入团候选人，会象他们片里推荐的发起者候选人一样会被否决。反之，北头片则从他们三十三户贫雇农中，推荐了三十名够条件加入贫农团的人。其他各片则分别发现了六、七个够条件的贫农。

那些有关门倾向的发起人争辩说：“某某现在看来似乎不坏，但他一旦稳稳地进入贫农团，天晓得他会不会狂起来呢？”

大多数的意见认为，如果他狂起来的话，“群众可以随时再把他赶出去。”

最后大家决定，只有那些与地主关系密切的、那些拉小集团或搞宗派的、那些被个人偏见所左右的、那些“报复专家”以及那些继续与女人保持不正当关系的人不能入团。发起人的会议结束前，他们讨论了村里的每个贫农，并列出了三个分属三类的贫雇农名单。

下一步是由发起人把决定通知给那些属于第一类和第二类名单上的贫雇农。然后，让那些可以立即入团的人，在他们所在片内组成贫农小组。这些小组将帮助发起人完成如下任务：督促那些必须改正缺点的贫农；吸收那些够条件的新中农入团；提名贫农团委员会的候选人。

3月12日至13日在这一地区举行的传统的春季庙会，略为推迟了这项工作。到几里外的冶陶镇上赶庙会，对那些偶而光顾的人来说是太远了，但对那些有要件要采购的人来说，却是不可错过的。为此，十里店在白天放了假。晚上，随着新成立的贫农小组举行了他们的首次会议，运动在继续进行。

寨上的小组在3月12日晚集会。十几个贫农三三两两地来到会场。他们疲惫而兴奋地谈着庙会。在等待迟到的人的时候，在冶陶酒店干过几年跑堂的傅志，凑近闪烁着微光的煤油灯，费劲地读起了《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十里店工作队第一阶段的工作——家访、宣传和发动》。不久，最后一批迟到的人也到齐了，只好暂停读报，开始开会。

傅便则宣布开会。他费了很大劲克服自己的胆怯去掌握主

主持会议的艺术。他要求大家汇报，在考察有小缺点的贫农方面以及在吸收够条件的新中农方面，有什么进展。

第一个汇报的是选举贫农团发起人时落选的李宝卿，选举中的失败，并没有影响他组织贫雇农的热情。他由于掌握了祖传的农民认为能治百病的“拔火罐”的医术，因而在村中小有名气。

李宝卿在谈到一位做过长工的老人时说：“我跟他好好地谈了一回，他保证不当‘透气筒了’。”在替地主或富农干活的时候，这个人偶然地向他们传递或“泄漏”过只限于群众知道的消息。

“他说他知道自己脾气不好，但以后会克制自己。至于腐化，他承认自己过去不对，但现在已经改过了。”

下一个汇报的是在会前读报的傅志。“我去找过傅德，”他谈到了那个吹唢呐的，“他保证以后不再胡说了。”

一个女人说：“傅德的老婆并没有什么错，她是一个好女人。灾荒年间，她因为没东西吃，跟几个男人混过，但早就断了这些关系。”

尽管有几个妇女来开会，但很少发言。有一个妇女一开头就宣称：“象我这样的妇道人家，做不了啥，也坏不了事。”

寨上唯一的女发起人陈翠子同意她的态度：“你们男人想着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们女人家不大懂这些事。”

主持会议的傅便则汇报了他联系的三个农民：“有一个人讲他以前腐化过，现在早已不干了。另一个人承认自己对别人的态度不好，脾气坏，他说以后会尽力学好。还有一个人说别人对他的批评有道理，他一定改正错误，以后凡是让他参加的会他都不缺席。”

绝大多数检查过小缺点的贫农，都令人满意地保证他们要

改正错误。发起人们认为，对他们的考察阶段应尽快结束，并提出吸收他们为贫农团员。

至于那些被提名入团的新中农，工作队建议暂时不让那些翻身过高的新中农入团，除非他们愿意退还一些多余的斗争果实。发起人同意这意见，并决定在第二天要求其他有可能入团的新中农来贫农小组作批评和自我批评。

“发起人在联系贫农方面做得很好。”工作队员肖航说，“现在我们应该为贫农团委员会提出候选人名单了。”

“这个委员会不同于发起人小组，后者是临时性组织。委员会将领导整个村子的工作，只要贫农团存在，它也就存在。选好委员是很重要的，不忠诚的委员是领导不好群众的。当选的人必须符合规定的四个条件。”

“你们可以在村里各个片的贫农中提名，愿意提多少个就提多少个，没有人数限制。也可以提名党员，只要他们适合做好贫农团的工作就行。”

“候选人全部提出以后，我们要讨论一下。各个片都提出候选人之后，我们就要召开大会成立贫农团。到那时，将要选举贫农团主席。”

首先被提名的是两名共产党员。然后提出了一些村里的出色人物：李宝有、赵正方、王文盛。被提名的人越来越多，多达二十一名。几个参加这次会议的人也被提名，他们是：年轻的榨油工人傅长亭，会议主持人傅便则和其他几个人。

在名单结尾最后几名是妇女，她们中间有两名贫农团发起人：一个是特别不好意思在选举她的会议上发言的申婷子、一个是半个小时前说过“女人家不大懂这些事”的陈翠子。

当提名结束时，陈翠子的丈夫傅立库（他又一次拒绝被提

名)说,他不满意这个名单。他解释说:“这些庄稼人都是好人,可是他们都不识字。其实,那些过于简单的老实人的本事,不如那些有毛病的人强。”

傅长亭说:“问题是,他们符合不符合四个条件?”

“可他们也得能说会道啊,”傅立库坚持他的意见。

工作队员肖航说:“是不是文盲,能不能发言不能作为条件。地主有文化,也能说会道,但是,他们不为贫农办事。贫农团委员的选举必须认真、慎重。”

傅立库被驳倒了,但他并不服气。当开始讨论傅便则为候选人的时候,他说:“便则整年劳动,和群众处得很好,也从不发脾气,甚至你打他一顿,他都不会吭一声。他符合所有四个条件。他是贫雇农,老实,单纯而且忠厚”。但是,他在结尾时补充了一句,“他不是当领导的料。”

李保卿不同意,他说:“这不成问题。我们应当提名他为贫农团委员的候选人。”男人和妇女都支持他的意见。

年轻的榨油工人说:“我认为便则很有能力。除了不发脾气外,他不自私,热心,工作卖力。”

不久,便则又一次证实了他的好品德。他再一次提议曾经批评他的傅立库当候选人。然而,立库坚决不干。

当讨论傅长亭的时候,傅长亭说自己脾气不好,“即使我当选了,那也没用;因为我得在油坊工作,我不能领导你们。”

原先冶陶的酒店伙计傅志说:“确实,他对人态度不怎么好,但那是容易改的。”

“你说得对,”李保卿说,“他脾气有点儿坏,但可以克服。他是一个正派的人,一个好工人。”这样,傅长亭的拒绝被否决了,对他的提名通过了。

傅志本人也被提了名。他对提名是否接受也拿不定主意。他开始时说：“提我没什么用处。”但是显然并不愿意放弃这种荣誉，说：“我的优点是不乱花钱，看不惯坏干部的行为，我成年起早贪黑地卖力干活。”

他停了一下，然后信心不足地说：“尽管如此，我仍然不够四个条件。”

李保卿同意这最后一句话。他拐弯抹角地说：“他干活满行，可是他从小就当跑堂的，不是个地地道道的贫农，下街的人肯定会说他不行。我们必须看到这个实际情况。”

事实上，傅志是个声名狼藉的二流子。在冶陶当了四年堂信，他就觉得干农活有失身份。回到村里以后，就把自己地里的活儿都交给了他十四岁的儿子干。结果，他那块地成了十里店种得最糟的地。

然而，没人愿意进一步补充李保卿的批评了。讲话的只是那些替他含糊敷衍的人。

傅便则说：“看起来他真是很忙。他不发火。”

“他关心别人，”傅立库又插上一句。

但是，李保卿坚持了他含糊的反对意见。作为反应，傅志开始说他的身体也不怎么好，最后拒绝了他为候选人的提名。

关于李保卿本人，傅长亭说：“几年来，他一直是个好工人，他热心为众人办事，而且没干过什么坏事。”考虑到李保卿在选举发起人时承认自己曾经是个“头等二流子，”赌棍、是把老婆打得两次流产的人，就可以知道傅长亭这最后一句话是很有份量的。但是，寨上的贫农显然认为他确实改造好了。他在没有异议的情况下当选了。

对两个女候选人很少争议，虽然年轻的榨油工人说，“申婷

子不太关心别人，而且对应当参加的会经常缺席。”不过，提名妇女似乎是为了满足工作队的愿望，因此，她们的当选仅仅是走过场。

在会议结束时，工作队员肖航提了些批评意见：

“这次会议有些缺点。举一件事来说吧，我们还没有克服照顾面子的习惯。实际上，我们大家都有各自的弱点，可是，今晚我们没有都讲出来，交情和事佬态度使我们隐瞒了缺点。

“你们似乎不愿意讲别人的毛病。你们不大重视四个条件。这是一个严重的缺点，对你们今后的工作会有害处的。

“你们知道，提出的是全村的候选人，因此你们在提名时应当非常慎重。为了全村的前途，你们应当开诚布公，不讲私情。

“如果某人是有名的懒汉，由于我们扯一些别的事而把这个缺点掩盖了，这对他有好处还是没好处？有缺点就应当揭露，不应隐瞒。如果某人不够条件，就不应该选他。

“今晚这个会的问题就在于缺乏开诚布公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今后，我们应当象提名发起人时那样坦率、讲求实际。”

散会时大家情绪低沉。农民们答应利用贫农团正式成立前剩下的三十六小时尽力把事情办好，此外，还要考察那些有可能接纳入团的新中农。

新中农入团手续，与那些有小错要改正的贫农差不多。有希望的候选人由各片提出，先由全体发起人基本通过；然后，提名人访问候选人，再向本片贫农汇报。经各组赞同后，候选人到各片去作批评和自我批评。

到3月13日晚，新中农中的候选人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阶段结束了。发起人统计了所有被贫农团串连到一起的人

数：共计二百零九人，其中一百四十二人是贫农，六十七人是新中农。

接纳新中农的好处立即显示了出来。贫农去掉了孤立的感觉，中农去掉了被排斥的心理。运动初期堆积在院里的肥料现在撒在地里了。

随着贫农团正式成立的日子越来越近，甚至那些没有被吸收入团的中农，也感受到“基本群众”中洋溢着喜悦气氛。

建立贫农团

3月14日

为了庆祝贫农团成立大会的召开，在庙院里喜气洋洋地张贴了五彩缤纷的标语，挂起了红绸和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一条大红标语上工整地写着毛笔黑字：“紧密团结中农！”它贴在一座石碑上，石碑是几世纪前建庙时为记载地主的“功德”而立的。召集人李宝有怯生生地宣布开会。面对这么多听众，他那平时转得很快的脑子似乎也不灵了。在别的召集人和工作队员的鼓励下，他总算结结巴巴地把议程念了下来。

首先，选出了五人主席团。由于有人分担主席的重担而使李宝有松了一口气。接着，村乐队起劲地奏起了“祝贺曲”，这曲子象十里店奏的大部分乐曲一样，有些象爵士乐。

主持过工作队与全村第一次大会的前线记者吴象，又走上了讲台。当人们向他鼓掌致意时，大雪在望的阴云密布的天空中飘下了几片雪花。瑞雪兆丰年，在农民们相视微笑中吴象开始发言：

“工作队到这儿来，只是为了帮助你们执行土地法大纲。

“现在，贫雇农就要自己管理自己的事了。已被吸收为贫农团员的人，是你们阶级中的优秀分子；至于那些还没有被吸收入团的贫农，改正错误以后就可以入团。你们已经从团员中



泥瓦匠李宝有，当选为贫农团主席。

选出了贫农团委员会的候选人。今天早晨，你们就要从好人里面选好人了。

“不久，你们就要自己召开会议，管理自己的事情。处理问题的时候，必须注意团结中农。过去，地主挑拨离间，现在，贫雇农要团结中农组织农会。”

雪早已下大了，农民们尽量地挤进了大殿；一部分群众涌上了刚才用作主席台的庙廊。

重新安定下来以后，会议接着对准备吸收加入贫农团的新中农党员，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发起人早已考虑让贫农共产党员入团了，在他们九人之中，四人已被吸收。对新中农党员的审议就严格得多了。他们不但已在贫农小组，而且还得在贫农团成立大会上再次作自我批评。

打头的是村长王喜堂；“我在给我娘办丧事时铺张浪费是不对的。大家都知道，尽管我父亲烧砖赚了不少钱，但他把钱都花在抽大烟、白面儿上了。他死的时候我还小，我母亲靠纺线织布，给别人作衣、缝补，才养活了我们弟兄几个。因此，尽管我明白不应该铺张浪费，但还是要向娘表示感恩。

“另外，我母亲出葬时，人们都挂了白幛子，待到一个复员战士为他父亲办丧事的时候，我却忘了也这样做，这是不对的。

“我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不讲民主。我出身贫雇农阶级；过去我只知道怎样捡石头。”这是指最穷的农民只能种那种有许多碎

村干部在开会。右边是王喜堂，左边是会计王福星。



石块的地。“但是，当我开始办公事的时候，我就忘了本，既主观，又不讲理。”

王喜堂接着提到了中秋节时因有人酒醉而引起的捕人和打人事件。他说：“我起先认为，不应当把那四个人抓起来。我找到民兵队长，把我的看法对他说了。但是，这四个人里头有一个是我的亲戚，队长指责我包庇自己人，我只好作罢。我没有坚持原则。”

他还就他在卖枪事件中的表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觉得政治指导员不应当把枪卖了，我们争了起来。后来，闹到了区长那儿，他也断不了。区长说：‘看来卖枪是错的，但是王绍贞缺钱用。最好是把人家买枪的钱作为给他的奖赏吧。’区长的意思是，王绍贞替人民效过力，买枪得钱是理所当然。尽管王喜堂明白这种道理说不通，但为了和村里干部保持一团和气，他还是勉强同意了。”

王喜堂接着说：“政治指导员撕毁他弟弟的婚约时，我也是不同意的。我们为这吵得很凶，我气得把村政府的印章扔在地上。后来，绍贞拾起了印，盖在他用村政府名义写给那姑娘家的信上。我又一次没坚持原则；这确实是官官相护。这是我的弱点，也是使我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的缺点。”

“去年夏天，我在河滩买了二亩六分地。这使我翻身过高。这样，我家每人占有的土地，比全村每人平均占有的土地多一亩，我就冒尖了；我要想成为一个新富农。现在，我愿意退回二亩六分地给群众。如果你们能原谅我，吸收我加入贫农团，我将非常高兴。如果你们不同意的话，我只好在外边等着。这全由你们决定了。”

人们对村长的大部分自我批评，看来是满意的。他说话时

态度诚恳而谦逊。但是，当出现情有可原的情况时，如他母亲的葬礼问题，他也是如实地说了。他的发言得到一致通过。

然而，一个在中秋节酒醉事件后被捕的人说：“你当然明白他们要狠狠地痛打我们。如果我们里头有人被打死的话，你打算怎么办？”

王喜堂说：“当我听说民兵队长被打翻在地的时候，我觉得事情很严重。我的错误主要在于同那几个干部一个鼻孔出气。”

刚才那个人回答说：“我们从来没有把他打翻在地。我们上炕时把鞋脱了，有一双鞋靠近枪。我的同伴正要穿鞋，他伸手去拿鞋时，民兵队长以为他是要去抓枪，就打了起来。”

另一个被打者说：“就因为这件事，他们象地主一样凶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即使我真的做错了，他们也不应该这样对待我，应当对我进行一些教育。”

关于中秋节事件的讨论，在怨声中结束了。主席问大家对王喜堂的自我批评还有没有别的意见。

“当政治指导员和治保委员发火对我们瞪眼时，村长从来不纠正他们。”一个人说道。

“对，他看不起群众，袒护干部。”另一个人说道。

“确实是这样，有时他明知是错的，还迁就。他耳朵根子软。”这是指他很容易为人所左右。

“他没有把分斗争果实的帐公布出来，否则每个人都能弄清楚东西是怎样分配的。”

一个贫农仔细地诉说了他在挖防空洞运动中受的苦：“我姐姐嫁到了青烟寺村，走后留下了许多东西在我们家。这是早先我母亲给她的，因此，我们并不认为这些东西也算打埋伏的东西。当开始挖防空洞时，民兵到我家要我姐姐的东西。她的

衣服被我们农会拿走后，青烟寺村又来了一伙人要我们交出一些东西。我的棉褥子被拿走了。我姐姐因是防空洞而被打了一顿。整个事情都不公道，不民主，而村长是应当主持公道的。”

王喜堂说：“确实是不应当让你把那些东西交给青烟寺的人。但问题在于你不直截了当。每次民兵去你那儿，都发现新的隐藏的东西。我没有尽到责任是对不起你的。但就你而言，表现得也不够老实。”王喜堂认识到自己过去没有坚持原则，现在对事情的立场就强硬了起来。

很长一段时间没人发言。最后，王喜堂自己结束了这场讨论：“作为村长，我没有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然而，作为党员，我受政治指导员^①领导，并通过他来影响别人。总的来讲，我们犯有同样的错误。我们互相包庇。这就是官官相护。”

现在，要由农民来决定，在揭发了村长这些错误之后，还能不能吸收他加入贫农团。表决时，绝大多数人都赞成他入团。这样，王喜堂成了贫农团里头一名是新中农共产党员的团员。

接着很快又有三个人被吸收入团。一个党员在作自我批评时说，一个斗争对象在挖防空洞运动中把一小包东西藏在他家，但他发现后，立即交给了村政府。

“是的，他是一个好人，我们没意见，”农民们说道。他未经讨论就被吸收入团了。

另一个党员是个年轻的民兵，他说：“我的态度不好，有时好发脾气。一次，在地里，我把借的一把耙子弄断了，还给人家时，我也没有道歉。这是不对的。我管民兵的时候，很少召

^① 村里的政治指导员是由支部书记兼任的。——译注

集他们开会。这是缺点。”

人们哄堂大笑。因为在解放区，共产党经常开会已经成了笑谈。有个农民诗人编了两句顺口溜：

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

“他年轻，没担当过什么负责的职务。”农民这样评价这位民兵，就一致同意吸收他了。第四个党员也被吸收了。当问到这些新团员有什么话要说时，王喜堂说：“过去我迷了路，就象通信员丢了信一样。我保证以后我要同群众站在一起。请大家对我多多提出批评。如果我呆在这儿大家不好提的话，我可以走开。”

“不，不用了，我们没别的意见了，你就呆在这儿吧！”人们向他喊道。广大贫农心里都明白，王喜堂和他们是能够同心协力的。那些怀有私愤、想往死里整的少数人，毕竟是无法同新成立的贫农团较量的。

接着，工作队秘书宣读了全体贫农团的名单。本来要求人们在最后表决前逐个讨论名单；但人们听完名单后都认为，“小组会上已经一个个讨论和审查过了，没必要再搞一遍。”正象有人讲的：“没一个名字听来刺耳。”于是，与会者一致同意将所有列入名单的人吸收入团。

王文盛手里拿着一张纸走到会场前头说：“发起人为贫农团起草了章程，请大家考虑考虑。”他把这张纸交给工作队的秘书代为宣读。

章程的内容是：（一）成立贫农团干啥？（二）哪些人能加入贫农团？（三）怎么入团？——申请人应由一名团员介绍，在贫农小组会上作自我批评，小组通过后，提到委员会表决。（四）有哪些纪律？——服从多数，服从领导，参加会议，不当“透

气筒”。(五) 犯了错误怎么办?

这样一个既提出问题又有具体规定的章程是由发起人自己制定的，这标志着运动的一个转折点。从此，贫农就担负起了管理自己的组织的职责，而工作队将逐步退居顾问地位。

李宝有现在开始介绍议程上最后一个重要议题：选举贫农团委员会。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话，仍然使他感到不自在，因此，他请工作队秘书向群众解释了选举的具体规定。

工作队秘书说：“发起人建议委员会应由十三名正式委员和二名候补委员组成。各组提出来的候选人总共四十名。有人提了这样一种意见：有两个以上小组提名的才算正式的候选人。这样，就只剩下二十一名候选人了，大家同意不同意？”人们同意了这种安排，要求每个候选人讲讲话。

第一个候选人说：“我没有干过对不起穷苦人的事。只是年轻时候，我的确跟女人有过一些不正当的瓜葛，以后就没有了。”

人们对他鼓了掌，喊着：“他合适！”“我们没意见！”

第二个候选人颇为自信地笑着说：“我并不是懒得出名。”

人群里有人说：“那不错，可是你最好改一改爱追女人的毛病。”

第三个候选人王广顺一开始就承认：“我的缺点是懒。自从我老婆死后，我用了很长时间照看孩子。”

他又说：“大家批评我冬小麦种得少，这是因为我的地在阳邑塬上，我自己琢磨着：那儿种麦子不好，不如种秋庄稼。其实，我应当听大家劝告，多种麦子，那样就可以卖小麦，买衣裳。”

“说我在阳邑买糖烧饼吃可不是事实。”显然，他对在选举

贫农团发起人时对他提出的这个批评仍然耿耿于怀。

但是，早先提出这一批评的人仍不示弱，说：“不管怎么说，他爱乱花钱，老在街上转。”

王广顺最后说：“我担心自己干不了这号工作。但不管你们叫我干什么，我都愿意试一试。”

“广顺哥合适。”这是众人的一致评价，这样，通过了他当候选人。

下一个是王文盛。他说：“我把自己的事看得太重了，在替群众办事之前，总是先替自己盘算。”

“另外，我对我爹的态度也不好。”在上一次会上，农民已经否定了这一指责，但是，鉴于村里正开展自我批评活动，王文盛显然在这问题上动了点脑筋。他说：“我经常对我爹发脾气。有一次他因为拿了别人的一点饲料，被关了两天，我很生气，觉得他败坏了我们的名誉。但我的确应当让他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事实上，他全家离自足的水平还差得很远。

“不管怎么说，我担心自己不会讲话，也没有能力。”但是，人们还是通过了他当候选人。

寨上的傅便则把自己贬得更低：“我记性不好，不会讲话，也不会办公事。”

“过去我没有水壶，就从地主那儿借了一个。这是不对的。我老婆还替地主藏过一些东西，但我发现以后就立即汇报了。”

每个人都清楚傅便则不是地主的走狗，因而很快也被通过了。

一位发言者承认自己最大的缺点是经不起女色。但人们并不在乎这一点，而是称赞他对每个人，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是温和相待的好脾气。

然而，王喜堂可不愿意轻易放过他。他坚持要让这位好脾气的登徒子当众交待同哪些女人有过来往。但是，群众反对这样做，这才替那些女人保了密。

议论过所有这些候选人后，耿西登上讲台，讲了工作队对下一步选举的意见。他还提到了经常引起议论的男女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常常使思想狭隘的农民失去了对更重要的问题的判断。尽管妇女对两性关系方面的错误更为吹毛求疵，耿西还是从男人的角度来谈这件事。

他说：“我们必须把大错误和小缺点区分开来。搞女人有不同的情况。如果一个穷人因为穷得无法娶老婆，而同某个女人有不正当关系，只能说是小错误。想一想过去地主养了多少小老婆，而贫农却一辈子打光棍。可见，搞女人是大错误还是小缺点，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还有人认为只要搞女人就是严重错误的吗？”

“有，我就这么认为，”王喜堂说，“因为它破坏夫妻关系。”

尽管他出身于贫雇农家庭，如他先前说的，他过去除了刨石头外什么也不懂；但随着经济地位的改善，他对事物的看法也改变了。作为一个新中农，他成了亲。现在，他所考虑的，同一个总怕自己的老婆被那些娶不起老婆的贫雇农拐走的男人的考虑是一样的。

但是，王喜堂代表不了大多数贫农。他们坚持认为：“如果搞女人的是娶不起老婆的穷人的话，就不能说是有多严重的问题。”

几天前，工作团的负责人解释了党对于男女关系问题的意见。他说，中央局不允许党员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是因为干部利用职权霸占他人妻子的危险是始终存在的。但是如果这

类事发生在贫雇农群众之中，只要没有因此引起多大纠纷，党是可以理解的。

耿西在会上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党和贫农团的关系。他问道：“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党是贫农和所有农民群众的长工，因此，应当由人民给党交任务。

“同时，党应当是贫农团的领导。尽管它可以提出批评意见，但它不能光靠发号施令来领导。它必须树立榜样，教育群众并说服他们。

“另外，有些党员有缺点的可以改进。假如党员犯了罪，可以送交人民法庭。

“现在，我想征求你们的意见，到底是让党员进贫农团好呢，还是不让他们进好呢？”

“让他们进好！”很多人回答。

“让他们进贫农团委员会好呢，还是不让他们进好？”

“应当让一些党员进贫农团委员会。”几个人答道。

耿西接着谈到了选举的其他方面。“为了保证委员会确有代表性，在选举委员时；眼光应当放宽一些，委员会里应当有从每个互助组来的人，也应当有一些妇女。

“委员会共有十三名委员，外加两名候补委员。候补委员将参加委员会的会议，他们可以参加讨论，但没有表决权。如委员有出缺或死亡，他们可以补充空额。

“现在大家举手表决。”

赵正方和王文盛在十五名当选者中遥遥领先。寨上的傅便则仅次于他们。四名妇女也被选上，其中有一名是候补委员。三名党员候选人中，一名当选为候补委员，两名落选了。

当选者照例作了谦虚的表态，请大家在看到自己不尽职时，

及时提出批评。作为回答，人们又要求委员们以一颗“公正的心”为人民服务，并告诫他们不要“耳朵软”，不要听任任何人搞打击报复。

耿西在总结时说：“不称职的委员可以由选举他们的人撤换。团员们应当服从领导，就象领导应当尊重群众一样。”

贫农团就这样正式成立了。

那天晚上委员们开会分工，李宝有被推举为贫农团主席。

党和群众

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

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在工作队员们看来，本村党员没有一个当选为贫农团委员，反映了他们工作中的严重问题。中央局在后来的分析中，也把一些责任归于上一级党的领导。中央局的某些领导人夸大了整个太行边区“党组织不纯”。他们认为，这一地区贫雇农没有彻底翻身，是因为党的干部受到地主富农思想意识的影响。

其实，土改运动基本上是开展得令人满意的。中央局的领导同志一经发现了自己的错误，立即发布了正确估计地方党员

的优缺点的指导方针。中央委员会的一位成员说^①：

我们的地方工作干部中很多是艰苦奋斗，为人民所忠诚拥护的……但其中也有不少人作了许多对不起群众的事。他们在作这些事时，有些是为急于完成上级给他的任务，但是方法不好而发生的。例如催粮草，派担架时，时间很紧，又没有学会民主作风，他们就用强迫命令的方法，打骂了群众，得罪了群众。这样的事不能完全由下面地方工作干部负责，上面领导机关交给任务太多，时间规定的太急，平时对民主作风的教育太少，也有责任。但有些事，例如多分果实，假公济私，贪污腐化，横行霸道等，那是完全违背领导机关历次指示的，那是要干部本人负责的。上级如果也有责任，就是没有立即发觉、制止、处分或根本撤销其工作。但这些区别群众并不容易常常分得清楚。

另外，在党的领导机关发布的一项指示中，也论述了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②：

在第一、第二类地区，一般的封建势力业已消灭，而农民中的不满常集中于一批利用政治地位为非作恶，侵占土改果实的党员及干部身上。因此，在这些地区进行调剂土地的工作，必须与整党工作相结合……

我们既要严肃地注视党内不纯的现象，也不要忘记我党的整个情况是业已经过长期考验，在群众中有了极大威信，并正在胜利前进之中。

^① 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所作题为《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由于战争时期交通隔绝，直到3月27日十里店才收到它的复印本。——原注

^② 见《中共中央关于在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原注

然而，在把这些政策规定应用到当地实际情况中时，就要有成熟的判断，而且还有可能出些差错。例如，十里店工作队秘书写的工作日日记，在3月1日有如下记载：

一些同志对于进行整党的方法有所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在整党中要明确指出一些党员有地主富农思想，要他们反省。另一种意见认为，这样就一下子提得太高了。

结果证明，另一种意见是对的。党支部在1944年的改组中，已经消灭了成分不纯和封建的因素。不管支部的成员有什么过失，也不能把他们说成是头脑中藏有“地主富农思想”。十里店的党员，无论是就个人或集体来说，都显示出是村中最少自私，最有勇气和最有才干的人。他们的缺点是次要的，不是主要的。

过去，党支部处于半地下状态，农民们不了解哪些人是党员。这一实际情况使得事情复杂起来。村里群众在赞扬整个共产党所起的作用的同时，并不总是也充分归功于自己村里的共产党员的。在工作队急于纠正党员的错误的情况下，难免不能及时纠正群众的态度。的确，工作队煞费苦心不给群众泼冷水，结果，却把冷水泼到了党员头上。

此外，评议党员和划阶级的时机，也选得不适当。武安九区工作团负责人张磐石在给罗林的信中写道：

当划阶级正在进行的时候，你们就应当让群众仔细考虑他们对干部和党员的批评意见。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乐意，就可以提出批评，并作出判断。这样做，既能提高他们的热情，又能推动整党工作。

工作队原计划白天划阶级，晚上评议党员。然而，划阶级

一开始，群众除了划阶级外，其他的事都不想干了。因此，评议党员和干部的工作被暂时推迟了。农民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教育党员是发扬民主的关键，民主是重新调剂土地的关键。在运动的最初阶段，甚至连一些工作队员也没有完全弄通这三者的关系，更不要说农民群众了。

农民看得最清楚的是划阶级和调剂土地的关系。在他们的心目中，划阶级仅仅成为一个与占有土地有关的问题。他们认为，如果某人被划为地主或富农，那么，他的土地就应被拿走；如果被划为中农，他可以自愿交出一点儿或得到一点儿土地，或保持原有土地；如果被划为贫农，就将得到土地。他们想早些结束划阶级的工作，因为他们急于定下土地问题。工作队为了使他们认识到民主是首要问题，是要花费很多时间的。

夸大了党支部思想作风不纯的情况，忽略了指出它的成绩，以及无法执行原来的日程表，这些因素，都对贫农团正式成立大会，特别是对共产党员在贫农团委员会中不能赢得席位，发生了影响。贫农团委员会候选人中有三名共产党员；对于其中之一，在四天前的支部公开会议上，农民们说“没意见”；可是在贫农团成立大会上，有人却批评他冷淡、懒惰。

群众对另一名党员的讨论，时间是够长的：“他本人不错，但他老婆不好。”一个人说。

“他耳朵软，”另一个人说。

“他经常给地主通风报信儿。”

“他太老实。”

“那我倒不清楚，”一个人反驳说，“我觉得他自私。他在划阶级的时候没有把他家所有的房产都自报出来。”

那个候选人回答说：“那只是因为我不太明白划阶级的事。说我给地主通风报信儿是没有根据的。”讨论就这样搁置了起来。因此，在对这两个候选人进行表决时，举手的人就不多。

第三名党员傅培常在村里人缘很好，大多数农民都说，他在担任后勤指挥这样一个难差使的时候，干得很出色。那时，他得管理抬担架、运军粮、做军鞋、军装等等许多工作。

当他被推为候选人时，他作了长篇的自我批评。他说：“我的错误是把自己的利益置于群众利益之上。例如，去年冬天，招待所要雇伙伕，我觉得这在农闲季节是个赚钱的好机会，自己就干了这个差使。当乡亲们来找我结算后勤出差券的时候，我经常借口太忙顾不上结算。结果，因为我的自私而浪费了大家的时间。

“当有人叫我参加新年演出时，我说没时间。另外，我还浪费了我们互助组的很多时间。这些都是我的缺点。欢迎你们批评，不要因为我是干部就不敢讲话了。”

这一劝告是不必要的；他的话刚一停，批评接着就来了。“去年堆在场院上的斗争果实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因此你看一眼也不肯，什么都不要。”

“去年7月，为庆祝党的生日搞节约周，培常给自己定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指标。他说，他家可以每天只吃十两小米。”^①

人群里有人对这一批评提出反驳。因为实际上，每天只吃十两小米是有可能的，而且傅培常和他家确实这样做了。

对于说他看不上斗争果实的批评，傅培常作了自我辩护。他说：“我之所以不要，是因为党支部决定党员都不要。这绝不是

^① 当时每斤是十六两。——译注

因为我看不上这些东西；想着能分到更好的。”

人们立刻议论了起来，满院子嗡嗡响。

“他说的是实话。”

“他作的自我批评很好。”

“他就是耳朵根子有点软，没有别的缺点。”

实际上，所有这些批评都来自那些带有个人怨气，想要借机报复的勇敢分子。大多数农民，并没有盲目地对党员横加指责。来势凶猛的批评浪潮对他们虽也有些影响，但他们并没有随波逐流。

事实证明，贫农团成立大会是党群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在那次会上，党员头一次对群众的指责作了合情合理的答复。以前，不管批评有多么刺耳或失实，他们只是静静地听。但是，当王喜堂被考虑加入贫农团的时候，他开创了客观地、有说服力地陈述已见的先例。贫雇农给他撑了腰，在欢呼声中通过他加入贫农团。

然而，在贫农团获得团员资格是一回事，取得领导权又是一回事。因此，在选傅培常当委员时，尽管他人缘好，工作勤勤恳恳，还是落选了。

挫折并不严重，但它警告工作队要弥合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以后，必须有较高水平的批评，充分的讨论，对过去的事件以及党员在其中起的作用作较深入的分析。必须实事求是地评价反对派的勇敢分子提出的指责。其中最重要的是，党支部必须在即将来临的新农会委员会的选举中，有较好的表现。

贫农团于3月14日正式成立。中央局在写给工作队的信中说：“贫农团的成立，将使中农感到不安。因此，在稍事安排和组织贫农团的工作后，应立即着手建立农会。”

工作队进村后，在最初十六天里的工作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然而，贫农团一经建立，工作队就希望将自己的作用迅速缩小为顾问和指导了。以后，办事情要尽量让群众通过他们自己的组织：首先是贫农团，其次是农会，然后是村人民代表大会。

如果党支部也相应地发挥其作用的话，它将对这些组织和村里的活动起领导作用。因此，在工作队能够确实摆脱村的公务之前，一定要把党和群众的关系调整好。

这意味着要使更多的支部成员迅速完成自身的再教育，从而使他们在日常活动中恢复固有的地位。被接纳加入贫农团的十名贫农，新中农党员已经投入了工作。现在，冷冰正安排另外八名被认为有较小缺点的党员作自我批评的准备。3月15日，他们在有群众代表参加的支部会上发了言。

自五天前开过开门支部会后，群众对党员的态度已经有所转变。那时，在工作队的敦促和怀有私怨的勇敢分子的影响下，群众的批评偏于苛刻。但是，在贫农团成立大会上，当党员表明了自己那一方面的情况后，一种相互了解的气氛就开始出现了。

同样，上了年纪的长辈们也开始发挥他们的影响，这与那些年轻的勇敢分子的尖锐攻击是截然相反的。那些对地主和国民党统治下的情景记忆犹新的人懂得，是党支部帮助本村农民改善了生活。他们觉得，现任民兵队长和治保主任很粗暴，但认为他们这种工作，也难免如此；与国民党军队的军官相比，他们对群众的态度可算是和蔼的了。参加党支部会议的一部分代表都有这种看法。

许多怀有强烈不满情绪的人也到会了。其中有几名退伍军人，他们觉得干部没有对他们的服役给予应有的报答，他们的

家庭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还有一些受过村政权公正或不公正的惩罚的人。最后，是那些想要取代党员干部并试图掀起一场清洗运动的勇敢分子。

随着夜色的逐渐深沉，党员们在自我批评时的诚恳态度产生了效果。尽管他们都预先作了准备，但他们大多数是文盲，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就记不住原来准备说些什么了。

在作自我批评时，合作社经理傅培玉一时不知要说什么了，他停顿了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还有什么来着？”

“追女人。”他的一个同伴提示说。

“还有那件买地的事。”另一个补充道。

“啊，对了。”他又接着说了下去。

除作自我批评外，党员们还谈了自己对大家提的意见的看法。他们态度冷静而谦逊，但拒绝接受那些道听途说或以个人成见为根据的指责。

结果，八名党员的自我批评都被代表们接受了。其中四名被毫无异议地通过了，另外四名则是在提出的批评得到解释的代表的勉强同意下通过的。工作队认为，这时，半数以上的支部成员，已经走上了恢复在村里的公务生活中的固有地位的道路。但工作队也认识到：群众对党员的评议，过分偏重于个人小节，而忽略了共产党员在反对封建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

在新的农会成立之前，工作队一定要引导农民对党支部有一个正确的评价，并使他们与共产党员建立起较好的关系。最大的阻力来自老中农，因为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对那些已变为新中农的党员起来掌权的情况感到不满。而且，在新老中农中都有一定数量的对立的勇敢分子。然而，贫农在政治上的进步

是如此之快，只有指望他们才能对党支部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相比之下，现在中农就显得落后了。

鉴于中农与贫农相比已经落后，工作队要求各片的贫农团成员召集少数中农一起开会，不管他们是老中农还是新中农，是男还是女，只要老实，不抱个人恩怨就行。

寨上的贫农团里的新的积极分子召集了大约二十名中农。会议主席，年轻的榨油工人傅长亭转身询问工作队员肖航，这个会该怎么开。肖航建议，人们不妨明确指出哪些党员是好的和哪些是坏的，甚至指出哪些是最好的和最坏的党员。

这个建议被采纳了。二十八名党员被逐个作了分析。大家认为，有十七名党员是好的或没有大过失的，有十一名是不好的。在不好的党员之中，农民们认为，有五名是受了其他六名最劣者的影响。

“现在，我们已经把党员分成了好的或不那么好的；坏的和不那么坏的。”主席说，“问题是，他们能不能加入农会。”

会议再分成各组进行酝酿。最后认定，除了六名最坏的以外，都够格加入农会。这六名最坏的将暂时被排除在外。

“好了，能不能让其他的党员当干部掌权呢？”

接着是更长时间的酝酿。

肖航说：“我想解释一下党的正常工作方式。”

“十里店党支部的成员，是毛主席领导下的党的党员。他们有责任去带领群众。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为贫农团和农会出主意，提建议。他们应当要求这些组织的成员对他们的建议进行讨论，看这些建议究竟是否正确。如果这些建议被否决了，党员也一定不能把它们强加给贫农团或农会。”

“有时，贫农团或农会认为，这些建议部分可以接受，另

一部分不能接受。这时支部可以在党的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对自己的建议加以修正。

“这样，你们可以看到，党员的唯一权力是提出建议请你们考虑，不论党员或支部都不能发号施令。过去有些党员干部强迫你们按他们的主张办事，这是不对的。”

肖航讲完后，各组又酝酿开了。接着，主席又问他们：“你们觉得，今后我们应该怎样让党员发挥作用呢？”

“村长王喜堂是党员，他知道怎样领导。”一位战士的父亲说，“去年锄草的时候，村里缺少帮军属种地的劳力。喜堂召集我们军属开了个会，把能组织起来的劳力都组织起来了。我们发现，靠自己互助的力量，能干许多活儿。这样也可以减轻村里的负担。”

“工作队刚来时，”一个老太婆插话说，“我们担心他们不会把好村长和那些坏干部分清楚。我觉得，不管是干部、党员还是群众，我们应当看本事用人。”

“对，只把那些坏家伙清除出党。”

“要是他们认错并改过自新的话，就用不着开除他们了。”

“对，再给他们一点时间作自我批评。作得好的话，就不必开除他们。我们可以吸收他们加入农会，因为我们需要能干的人。”

会议就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中进行的。肖航通过划分好、坏干部的做法，防止了反对派的勇敢分子搞“大扫除”的企图。不仅党和群众之间的隔阂打消了，而且，人们还开始确认党支部担任领导的必要。各片开会的结果与此大同小异。

在接着召开的一连串的片会上，听到过党员在支部会上作自我批评的代表们，将向群众汇报，群众并将提名新农会的委

员候选人。除了斗争对象外，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当然，这样广泛的群众参加会议，意味着会上的总的政治思想水平将有所降低。因此，在准备过程中，肖航事先向寨上代表建议，在汇报中可以对党员的自我批评分等，从好的里面选出最好的；从坏的里面挑出最坏的。

代表们同意了。在各片的会上作完汇报后，也要求群众运用同样的标准来划分好的和坏的；最好的和最坏的党员。肖航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提高各片群众的政治水平。但是，这种意图只是部分地成功了，因为许多农民仍然纠缠于小事和个人恩怨。在各个片里，有些群众还没有掌握通过政治斗争的表现来衡量共产党员的原则。这些活动有多大进展，只有在新农会成立大会上选出委员会成员时，才能看得出来。

建立农会

3月18日

在工作队集中力量调整党群关系的时候，群众正在扩大贫农团并由它来组织新的农会。有些贫雇农低估了农会的重要性。正如一位老雇农在反对提名王喜堂进入委员会时说的：“我们还不如让村长担任更为重要的职务。”

其实，农会主席将是村里最重要的职务之一。由于群众在政治上变得更加成熟和积极，对干部和积极分子的依赖，就不会象以前那样强了。一般农会会员，将对村里的事务有更多的发言权。

农会是包括贫农和中农在内的所有劳动农民的组织。但是，它要比旧农会更有效地为贫农的利益服务，贫雇农将成为它的支柱。

不光是贫农团委员会，现在整个贫农团的成员都被动员起来筹备组织农会。各片的贫农团员讨论了所有那些老中农和尚未入团的新中农的情况。有些人由于老实和符合四个条件而被立即认可加入农会。其余的只有在他们已被证明改正缺点后才能加入。那些介乎两者之间的，则被邀请到他们所在片的贫农小组做批评和自我批评。有些人被接纳了，有些人则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才行。建立新农会的工作由贫农团员包下了，

他们自动转为农会会员。

只有很少的中农被认为不够入会条件。寨上只有五个人不够，其中包括油坊管理员武李保武（他有贪污嫌疑），“滑头滑脑”的牲口贩子李宝会，和原妇女会主任、快嘴的王香。

由于绝大多数的新老中农被吸收进了新农会，中农不再觉得孤立了。当建立贫农团和强调贫农为运动的骨干时，他们有一种被遗弃了的感觉。然而，现在的主张是要贫农和中农联合起来。运动牢固地站在两条腿上，广大群众也就感到安心了。

有一部分仍然感到惴惴不安的中农，是那些还没有被吸收进贫农团，或没有被提名为农会会员的十一名共产党员。一种沮丧的心情压抑着他们。当过干部的后悔当初不该当官，他们觉得，现在的倒运都是由此引起的。

几年前，政治指导员王绍贞不怕触犯祖先的在天之灵，带领村里人平了祖坟种地。现在，他的脸色看上去就象鬼魂似地阴暗苍白。他既无心修整他在河那边南山台上的梯田埂，他也不再端着饭碗和人们一道聚在合作社门前吃饭。他用了几天时间反省。

至于民事主任李喜元，他完全陷于反省之中，以致不容丝毫的干扰。一天，他赶驴下地，由于铃铛的响声扰乱了他的思路，他就摘下了驴脖子上的铃铛。支部的宣传委员王文堂，竟为痛恨自己过去的错误，打起自己来了。

相反，支部组织委员兼武委会主任玉米泉却冷冷地对老婆说：“我好象一下子变成老财主了。”

尽管他们的反应各不相同，这十一名党员都感到不安和焦虑。但是大多数贫农和中农的情绪，随着贫农团的正式成立而逐步高涨。3月18日早上，当群众集会正式成立新农会时，

他们的情绪达到了高潮。

同第一次在庙院召开的全村大会一样，单是到会群众的数量，就显示出贫农和中农更加团结起来了。尽管中农也参加了进来，但还是由身材矮壮的泥瓦匠、贫协主席李宝有宣布会议开始。贫雇农成了带头人。

李宝有说：“打自八路军十年前头一次进村后，尽管我们之中还有人没有彻底翻身，村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现在我们又前进了一步，组织起了贫农团。今天，我们要和中农一起，把农会建立起来。

“我们知道，我们村子里有二十八名党员。我们对党员和干部进行了评议。我们把好党员吸收入贫农团，现在，我们要吸收好党员加入农会。不论一个人是不是党员，是不是贫农，是

群众在雪地上参加农会委员会成立大会。



新中农还是老中农，只要他是个好人，就应当吸收他入会。

“至于那些还没有被吸收的，我们可以在以后决定是否吸收他们。不管怎么说，那些拿了份外的斗争果实的农民，应当把多拿的退回；对那些做了错事的人，应当给予适当的处理。”

李宝有停顿了一会，不知如何是好，他转身看了看工作队员耿西，耿给他提示了最后一点。“对了。”李宝有说，“待会儿，我们要选举农会委员会。因此，选举以前，请工作队的同志讲几句话。”

被指定在这次会议上代表工作队发言的耿西走上了讲台。他站在那儿比李宝有高得多，微笑着直等到群众掌声停止。

农会委员候选人：中间为李宝有，左边为王汝唐，王文盛站在门道上。





在新农会成立大会上的一群妇女。

“贫农团成立的时候，这里没有今天这么多人。因此，贫农团员互相打量着，心想：‘我们的人不够多，能干什么呢？’那时，他们感到需要尽力团结中农。”

“同时，新老中农也在想：‘为什么他们不让我们参加他们的会呢？’”

“可见，贫农和中农有着共同的要求：走到一起，共同工作。贫农团象媒人一样，把贫农和中农介绍到新农会中来。新农会的主要任务同贫农团的主要任务一样：带领过去还没有彻底翻身的人翻身。”

“你们可能会想：‘我们过去不是也有个农会吗？这个农会与以前那个有什么不同呢？’让我们来比较一下吧：过去的旧农会是怎样接纳会员的呢？好的坏的都让加入，是不是？现在呢？”

我们定下了新条件。

“在我们的新农会里，我们不要任何‘透气筒’，我们不要二流子、追女人的人、不劳而获的人。

“新农会还要做好分配果实的工作。”耿西指的是以前运动中留交下来尚未分配的果实。“新农会做的每件事都会是公平合理的。

“现在我想再谈谈贫农和中农的关系问题。

“在贫农中还有大窟窿需要填补的人。只有贫农当家作主，这些窟窿才能填上。现在他们在办这件事了。他们吃过苦，因此，他们能公正办事。

“不光是贫农受过苦，一些中农也受过苦，他们在旧社会也没有发言权。贫农辛辛苦苦地种地，中农也是一样。因为贫农、中农一起劳动、一起受苦，所以说是一家人，永远不能分开。

“在贫农团里，没有任何力量能把贫农团员分开，因为他们都是受苦人。但是，单靠贫农是不能当家作主的，他们人数太少了，他们必须同中农联合起来。贫农和中农在一起，就可以当家做主了。

“他们一起当家会是一种什么情形呢？那就象经营一家店铺那样，贫雇农是当掌柜的，中农是当二掌柜的。

“在旧社会，村里不是有很多无赖和流氓吗？不是有妇女被糟蹋的事吗？不是有抽鸦片，打吗啡的吗？”

“是呀！”一个人喊道。

“过去就是这样，一点也不错。”

“我们这儿以前有过各种各样乌七八糟的东西。”

耿西接着说：“自从共产党来到十里店以后，发生了什么变

化呢？群众向共产党员学习，改造自己。现在共产党员向群众学习，改造自己。我们工作队也是一样，为了给你们帮助和出主意，我们必须向你们学习。真本事是从群众中来的。

“只要贫农和中农联合起来了，党员得到了提高，农民就坐了天下。团结在一起，大家就会翻身，过上好日子，富裕起来。”

耿西退到庙廊后面去了，会议的主席之一的王汝堂走上讲台主持选举农会委员会。王汝堂是贫农团委员会里最年轻的委员，他站在众人面前一时说不上话来，过了一会儿才说：“现在，我们选举农会委员。我们先搞清楚谁是候选人。”

被提名的有七十二人，其中二十五人是不止一个片提名的，大家一致同意就在这二十五人里头选。汝堂请工作队秘书宣读了名单。每个候选人在被唱名后，就走上门廊的台阶。这样，人们可以见到他；愿意的话，还可以给他提意见。

列在名单上最前面的候选人之中有王汝堂，唱名时得到了农民的一些赞扬。王汝堂听到自己当众受到赞扬，有些发窘，一只脚勾着另一只脚，两只手捂在脖子后面。当人群中有人提了个建议，因而扭转了话题时，他才明显地舒了一口气，建议：“选举以前，让我们先分成小组，酝酿一下。”

经过几分钟的酝酿之后，大家觉得，在过去各片的会议上，已经把所有的候选人讨论过了，现在，可以直接选举了。这样，当每个候选人被唱名时，就从主席台的椅子上起身，由同意的人举手，并由会议主持人计数。

举手表决表明，老中农、新中农和贫农都有代表进入农会委员会。贫农合乎情理地占了大多数。贫农团的六位委员当选为新农会的委员，他们当中有贫农团的主席李宝有、赵正方和王文

盛。还有三名妇女当选为委员，另一名妇女被选为候补委员。

五名党员也当选了。他们之中的村长王喜堂，遥遥领先，比下一名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多得三十七票。在接着召开的农会委员会会议上，他被推举为新农会的主席。

制服老虎

3月18日

就在选举产生新农会委员会的当天，农会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旨在排除达到充分民主的最后一个障碍，这就是原干部和支持他们的那伙勇敢分子的宗派主义。这伙勇敢分子总共有四、五十人。有的过去支持共产党员，对推动村里的工作出过力；有的则主要是出于对当权者不满或者怀有取而代之的个人野心。各派中势力最大的要数王克斌领头的那一派。此人在1942年的村政府里当过村长。

1940年，十里店来了头一个共产党的工作队。这是一个武装工作队。由于日本人离这里不远，武工队的目的是组织农民抗日和建立党支部。武工队交给村里领导用来发动群众的最有力的武器是群众路线。然而这个武器可不容易掌握，不论是王克斌还是后来继任的傅高林，还是依靠传统的发号施令的方法来治理村子。

尽管这两个人都是贫农家庭出身，由于他们刚愎自用，因而惯于独断专行。如果党支部坚强有力，就能对他们实行纪律约束，教育他们，他们也有可能成为模范村长。可是，在他们掌权的那些年里，支部从内部遭到了地主和国民党支持者的破坏。

王克斌和傅高林在组织十里店人民保卫村子，抗击日寇方面，确曾出过力。但是，他们未能做到象一个典型的由共产党领导的村庄那样，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投入抗战。这两个村长虽然都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的累进税制，但在执行时却玩弄了某种“灵活性”。尽管他们从不免除任何地主和富农的税，但有时却因受贿而降低税额，或出于私怨而任意提高某些人的税额。

1944年，这个村子的党支部由于混进了地主、富农和国民党特务而被解散。支部所有的党员，包括王克斌和傅高林，党籍都被取消了。当新支部成立的时候，他们俩都没被吸收入党，而是吸收了王喜堂和王绍贞这样的新干部。

对原先的干部大都听任各行其是后，他们也就分道扬镳了。王克斌不择手段地企图恢复他在村里公务生活中的影响；傅高林则决心利用共产党实行改革以后的新机会来谋求好运。

新干部也具有王克斌和傅高林身上表现出来的某些个性。但从根本上说，新支部和老支部是截然不同的。新支部里没有隐藏的阶级敌人，它和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也更为密切。这样，村里的新干部的才能，就和中国共产党积累起来的经验结合起来了。

正是在这些条件下，新支部得以领导全村进行减租减息和随后的土地改革。通过这些运动，新的村干部在运用群众路线方面有了一些进步，但是，他们同样也没有能掌握这种复杂的工作方法。直到罗林率领的工作队进村并开始对他们进行教育时，他们才认识到，在运用群众路线方面，他们有多大的不足之处。

到农会成立时，共产党员已不再认为自己是村里最合格的

领导人了。由于工作队坚持认为，人民群众从此必须自己当家作主，因而他们自己更是信心不足了。

这些就要当家作主的群众仍然缺乏经验。在工作队的鼓励下，他们小心翼翼地对干部提出了批评，但是，正是这些干部当年首先站出来反对王克斌和傅高林滥用权力。因此，1948年3月18日，这个村子里的干、群力量是旗鼓相当的。王克斌还有影响，村里许多老乡对他仍心存畏惧。他在搞政治运动方面是颇有手腕的，他讲话既流利又得体，他指望能东山再起。如果他再次成为村政府里有影响的人物，在他发号施令之下，民主会不会败坏呢？

看来最好的办法是召开控诉会。会上群众可以面对面地揭发王克斌。群众已经有了进行公开批评的经验，而且又有自己的新组织作为揭批原干部的后盾。控诉会不仅将为纠正过去的错案、假案铺平道路，也将破除某些人对原干部的幻想；这样，农民们就可以集中全部精力完成今后的任务。其次，对过去作一次彻底而认真的回顾，就使群众有机会对过去的村干部和如今的村政府作个比较，从而肯定后者所取得的进步。

就在那个有明亮月光的晚上，农会和工作队的全体成员聚集在庙院里。空气紧张。工作队的成员意识到他们自己担着多少风险，因此也和老乡们一样紧张。

贫农李宝有和王文盛代表新近当家作主的人们讲了话。由于对自己的作用还缺乏自信，他俩紧挨着站在台阶上。泥瓦匠李宝有首先镇静下来，讲开了：

“今天早上，我们成立了新的农会。新农会今天晚上开了这个翻身控诉大会。我们已经对党员提了意见。现在我们要揭批以前的干部。他们是多年来压在我们头上的石头。”

李宝有转向王文盛后，王文盛嗫嚅地说：“今天上午我们成立了农会。农会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是领导我们大家翻身，是团结贫农和中农。”他停了一下，看了一下工作队员吴象赞许的眼光，又接着往下说：

“现在，好党员已经挑选出来了，我们还要继续评议别的党员，他们的问题以后解决。我们不准备在今天晚上处理他们的问题。

“今天晚上我们干什么呢？我们要揭发，要控诉。我们要控诉谁？原先的干部王克斌和傅高林！”

“今天晚上大家揭发的罪行，”王文盛越说越有信心，“一定会得到处理。农会要按大家的想法处理这些问题。我们要根据这伙人的贪污罪行，算他们的帐。他们捞走的东西必须退回。”

会议的另一位主席李宝有接着强调：“农会和贫农团一定会按大家的要求办事。”然后，他宣布了会议议程。

“我们先要王克斌和傅高林讲一讲。我们要看他们是否说实话，要是不说实话，我们就讲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一定要把每件事都搞清楚。但是，一定要有秩序地来，不许吵嘴打架。

两位主席耳语了一会，然后一起走到走廊尽头月亮和灯光都照不到的黑影里，几乎谁也看不见他们了。他们的上半身探出走廊的边缘，叫唤在黑影里席地而坐的王克斌。

王克斌拖着脚步走到台阶下，踢拉着布鞋，两手缩在棉衣袖子里，低下了头。即便是他走到亮光底下，他看起来仍是一个阴沉沉的人。他又厚又密的、乱蓬蓬的头发和多天没刮的胡子连在一起，几乎遮住了他尽是皱纹的脸。人们早说，此人是一只凶残的猛虎。王克斌小声地、吞吞吐吐地说起来，一反过去那种趾高气扬、口若悬河的常态。

“打民国 31 年（1942 年）我当村长到现在，我干了许多错事。”

“大声点儿！”坐在人群后面的人们喊道，“我们听不见！”

王克斌提高了嗓门，“那时，我们还没开始搞斗争。地主想逃税，就请我们一起吃饺子。我们在许多地主家吃了。

“灾荒年，我命令民兵队长检查护秋的情况，有些人被捆绑起来挨了打。

“我受了许多贿。我对老百姓的态度很坏，脾气也不好。好几年前，我乱搞过男女关系。我强迫人们抬担架。”

王克斌沉默了。人群中也没出声。过了一会，他又接着说：

“在饥荒年，王成方老汉吃粮不够时，他偷了点粮食。虽然他已是近七十的人了，我还让他敲锣游街，好让大家都知道他干的好事。还有田训真没有偿还欠下的小米，我叫人把他锁在屋里半天。”

王克斌又不言语了。接着，他又打破沉默喃喃地说：“如果我想到别的，我还会再说的。”然后，他又拖着步子回到暗处去了。

傅高林走到王克斌刚才呆过的台阶下，从黑暗里走出来的他是个高个儿，仪表堂堂，丝毫没有王克斌那种狼狈相。他穿着厚厚的棉袄，头上整齐地扎着一条白毛巾。他给人一种自尊的印象，虽然也有些手足无措的样子。

他终于用平静的语调讲话了：“我当村长和农会主席时，干过许多坏事。”他两手插进袖筒，开始一件件地数起来。

“干部们去地主家吃饺子，我也去了。我批准了一些离婚案子。”老乡们知道他说得不全，因为傅高林还鼓动、甚至强迫一些夫妻离婚，好让那些女人嫁给他的朋友们。他淡淡地说，

“我自己也帮着安排了一些人再次结婚。我常被请去吃酒席。

“后来，我在灾荒年里买了一些便宜地。常长河也想买，但我先买下了，因为这块地正好连着我的地。”换句话说，他利用自己当干部的地位排挤了他的对手。

“我当农会主席时，负责分过七八回救济粮。我的秤软，没有给足数；部分救济粮被贪污中饱了。我和别的一些干部一起挪用这些粮做饭吃了。还剩下一些荞麦，我吃了一点，还磨了点面，做成面条卖了。

“饥荒年，我开了三个月的客店，使了许多损人的手段捞钱。

“还有，我还买过整整一座院子，尽管房主原来只想出卖靠边的房。以后，这些房我没有用了，不管原卖主还要不要，我就卖给了别人。

“前年，我和头一个老婆离婚，去年我就结婚了。村里好多人不赞成，我自己也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

“当我家地堰需要修整时，我就从公共路堤里拿了些石头；后来路堤因此倒塌，把路都堵了。我本应马上就把它修好，可我没有这样做，造成了公害。

“荒年时，我分到了十几捆谷子，这些谷子是巡逻防盗的干部和民兵没收的。”这些粮食的一部分确是从偷粮的人那里没收的；但有一部分则是巡逻的人出于怀疑而从那些带着粮食的人那里弄来的。好多这类情况，往往是从个人恩怨出发处理的。

傅高林在列举自己的错误时，最后说：“有年春节，有人送我几斤羊肉，我收下了。这是不对的。”

他说完了，先看了看一位主席，然后又看了看另一位主

席。过了一会，他被允许回到原处了。

“现在是你们揭发的时候了。”李宝有对大家说。

王文盛说：“我们担保，你们的控诉会有结果的。揭发的情况清理后，我们就要作出如何处理这些情况的决定。”

“记住，一个一个地说，”李宝有说，“要守秩序。我们先批判王克斌。”王老虎从黑影中被叫了出来，面对控诉他的人。

他还没来得及站定，从暗处就传来了愤怒的声音。人们吐着唾沫叫着王克斌的名字：“王克斌！你当村长时，你逼着我妈杀我爹。”说话的是个只有十来岁的年轻人。

他用发抖的声音接着说：“我妈说她决不会干这号事。可是当她去小王庄给我姥姥送葬的时候，王克斌在路上拦住了她，用大棒威胁她。他强迫我妈保证害死我爹。第二天，我妈和我姐一起上了吊。把她们的尸首松吊的人，现在还住在本村。我家三口人都是被王克斌活活逼死的。”发言人压抑着抽泣结束了讲话。

王克斌抬了抬头，他又长又密的、乱蓬蓬的头发遮住了眼睛。庙院里一时寂静无声，可以清楚地听到一辆木轮大车在公路上隆隆而过。

第二个人站了起来。他的声调是心平气和的，和那个控诉的年轻人适成对照：“王克斌当村长时，大家合计过要和他清理帐目。可他说，帐是没法算清的了。所以这事也就搁下了。他到底捞了多少钱？这就是我现在要问他的。他贪污了多少？”

一个妇女接着说道：“他买卖妇女。他用五十块钱把他收养的妹妹卖出去了。因为他在替她说亲时，硬从新郎家要走了五十块钱。”

“当我儿媳想改嫁的时候，”一个中年男子说，“她找到王克

斌要求他开个证明。而他却说，证明他可以开，但她得先和他睡觉。”

一位老年妇女颤巍巍地站了起来，身子靠两旁人的肩膀支着。两年了，她很少离开她家的院子。但今晚她坚持要来，儿子只好把她背来了。

“我兄弟到我地里收豌豆，”她用发抖的声音说道，“王克斌说他顺手偷了几穗玉米。他就把我兄弟捆起来打了一顿，罚了他五十块钱。

“饥荒年，我去采野菜，王克斌说我偷了他的萝卜。他说我是贼，抢走了我的口袋和篮子。他自己使着这些东西，一直没还给我。他还罚了我十块钱。”她坐回小凳上时，浑身还在发抖。

接着，又一个人说：“灾荒年间，有次我男人的小侄女去田里收豆儿，在她回家路上，你、王克斌看见了，你说她偷了东西。你把她双手绑起，打她的光脊梁。她那时候正饿得又弱又病。她父亲躺在家里，饿得身体虚弱，不能行动。挨了那次打后，我侄女也因衰弱变得不能行动。她在屋里躺了四、五天，没有一点东西吃，直到她死。”

她最后说：“你还给我们的的是一个破篮子，而不是当时她拿的那只新篮子。”

“灾荒年，我老挨饿，”另一个农民说，“可他逼我交二十斤小米的公粮，一点儿不给我剩下。一天，他告诉我，区公所来的人要我交还拖欠村政府的粮。我不知道自己欠村政府什么东西，但我害怕得要命。因此我带了家私什物到阳邑卖了，好歹交了十斤。秋后，我又交了十斤。”

“王克斌当村长时，”另一个人说，“他还管理救济粮发放的

事，我没见谁拿到什么粮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村分到七百斤救济粮。”另一人说，“这些粮食一次就卖掉了，我想知道，这笔钱他是怎么处理的。”

“灾荒年，石洞村附近出了一起抢劫案。”另一人说，“一个骑驴的人被打了一顿，然后把驴子抢走了。王克斌说，是李开明给土匪通的风。结果，李和村里另外两个受冤枉的好人被关了起来。要不是区里派人来调查这事，这三人早叫杀了。”

“王克斌家的地堰塌了，土落到下面别人家的地里，他就把地界往下移。他用这种办法侵占了人家一整块地。他贪心不足，还在那块地里种上了蓖麻和高粱。”农民们认为，这些作物损耗了这块地的地力。

已经提出的这些控诉，尽管是大喊大叫的，可不是群众自发地提出来的。这是经过一再鼓动后，老乡们才揭发的。一度胆怯、犹豫的王文盛在庙台上从走廊一头走到另一头，鼓动人们不要害怕，拿出勇气来，依靠新成立的农会、贫农团的力量。尽管如此，控诉的激流渐渐缓慢下来，以至于干涸了。

王文盛直率地问道：“怎么啦，你们害怕说吗？”人群中有些人老老实实地承认，的确是怕。

工作队的吴象登上了台阶的最高层说：“在这次会前的小组讨论中，揭出了王克斌的好多问题，可这些问题今晚上都没提到。工作队才知道，王克斌对人说，他和工作队说通了，只要他作个检讨，他就没事儿了。

“这可不是事实。我们要讲清楚，农会有全权处理他的问题。怎么处理王克斌，完全由老乡们自己来决定。

“你们一点儿也不必害怕。这类控诉不单是十里店才有。整个边区的人民都在开展一场民主运动。在这里，你们也可以尽

量倒出你们的苦水。王克斌要是打算报复，那只会罪上加罪。

“我建议你们再酝酿一会儿，然后继续控诉。”

尽管他提醒群众，十里店人民和边区的其他三千多万人民的紧密相联是使人宽慰的；但对一些极为小心谨慎的老乡来说，还是不够的。他们建议把王克斌带走，这样，人们就可以比较随便地讲话了。会议主席对任何能使群众发言的建议都感激不尽，当然就同意这个建议。

王克斌不等通知就很快地离开了。他沿着人群边沿走进院子里，再朝庙门走去。

然而，他还没有走到庙门，一个声音从院里传来，“王克斌，站住！”这是工作队队长罗林的声音。罗林很少在公共场合讲话，因为他带有很浓的湖南口音。但是一点也不错，这次正是他喊的。王克斌停住了脚步。

罗林转向群众，慢慢地、清楚地、一字一板地说道：“既然大伙已经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就是有二十个王克斌，也没有什么可怕。让我们把他带回来，让群众当他的面，把多年憋在心里的苦诉一诉。”

“对！把他带回来！咱们可不再怕他啦！”整个院子一片喊声。

于是，这只老虎又回到了控诉他的人们面前。这回控诉的人又多，说得又急切。

有人提到农民不得不通过日军封锁线弄盐和其它日用品时的情况。“我们四十八个人安全通过了敌人的据点（其中三个人是别村的），我们把带回来的东西拿到阳邑去卖，但是我们没打算全卖掉。王克斌就诬陷我们，这样，他可以从我们这儿敲诈一些东西。和我搭伙的人是从外村来的，王克斌就说他和我

们村的一个女人勾搭。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单独和她在一起过；王克斌说的他俩有关系的那天晚上，那女人和母亲、兄弟都在一起。末了，王克斌不得不承认那个人无罪。但那以后，我只好花钱请那个人吃饭，给他消气。

“王克斌一计不成，又赖我是窝主。他说，我接受了赃物，然后拿走了我的好多盐作为惩罚。”

“我也常常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去买盐。”另一个人说，“有一次我回来后，王克斌从我这里拿走了十二斤盐没有付钱。我那会儿不敢问他要钱。现在我敢了。开会前，王克斌怕我揭发他，满街宣扬我可是个大好人，曾经送过他十二斤盐。”

另一个人等得不耐烦了，抢着说，“我父亲死后，我母亲日子很难过，被迫卖了一些地。王克斌想要这些地，只付给她一百块钱。要是换别人买，她至少可以得一百一十块。”

“李奎五的牛也是这样。”另一个人说，“他在荒年生活困难，不得不卖牲口。那头牛值一百三十元，王克斌只给了他八十元。他答应给老李一些额外的救济粮，可他从来没给过。”

“是啊，王克斌买了那头牛。他在灾荒年，还买房、买地；可我兄弟却活活饿死了。”一个年轻人悲伤地说。

“前年秋天，王克斌看管互助组的一群牲口。他只是到处乱赶它们，好象那是国民党的牲口似的。”

“我放牛的时候，”一个小男孩尖声说，“王克斌说我弄丢了他家的牛，说我是特务崽子。”

“他还说我也是一个特务。”一个年轻人插进来说，“他对我说，‘小云，你以为你是个漂亮小伙子，是不是？可是，你知道你是什么人？你只是特务的一条走狗！’打那以后，我怕得再不敢开口了。”

“王克斌当村长时，哪家有好看的女人就能得到救济粮。”一个人说，“可我兄弟是单身汉，所以他饿死了。”

“当然，对他来说，象你们俩这样的单身汉只能讨他厌罗。”一个老成的年轻人说。

“那孩子说得对，王克斌和陈春媳妇乱搞。陈春当场抓住了他们，那女的就投井死了。”

“他常跟别人的老婆乱搞。”一个妇女说，“可是，他就象一只看家狗一样看管自己的老婆。他从来不许她出去开会，谁一接近她，他就咒骂谁。他家的女人没做过一双军鞋。她们甚至连纺线也不干。”

党员、新中农李宝恩说起了王克斌在灾荒年间的蛮横统治。他说话时不禁泣不成声。

“灾荒年我们老挨饿。一天，我十二岁的儿子对我说，‘让我骑着老驴上地里看看玉米熟了没有，能吃不能？’那块地离村有二里多路，我儿子身子虚弱，走不了那么远。因此，他骑着驴去了。过后，我也出门了。我回来时，已是晌午，可我儿子还没回来，我着急了。后来，他顺着路慢慢回来了，老驴精疲力尽，驮着一只口袋，袋里装着二十个玉米棒子。我们多高兴啊！我媳妇把棒子捣成糊，棒子芯、玉米粒、叶子全都捣在一起了。我们实在饿极了，一丁点儿也不能浪费。

“她正在捣着，张其正走了进来。他家的地和我家的地挨着。他说，我儿子掰了他地里的一些棒子。因此，我就跟着他和另一个人到地里去看。我对他们尽说好话，因为我想，没准我孩子真是掰了他地里的棒子。我们都还没吃，就先给他们一人两块玉米饼子。我自己也吃了一块。从清早到晌午，一直走着实在太饿了。到了地里，我们在他地里看到了驴蹄印，而且

可以看得出来，他地里和我地里的一些棒子都给掰掉了。

“末了，我们发现，我儿子到地里时，把驴拴在张其正的地边。牲口脱了缰，吃了张家地里一些庄稼。他的地里丢了七、八个棒子，不是被驴吃了，就是叫人偷了。这样，我只好承认是我儿子干的。”说到这里，他哭了起来。

“我立即去了村公所，把事情经过报告了。王克斌说：‘偷东西是重罪。’我说，我对不起人，等着挨罚。他们让我回家了。

“回家路上走到街上，我看见四、五条绳子挂在高高的树杈上。”说到这里，他又哭起来。

“回家后，我又累又饿，就坐在床上歇气。”

“突然，三、四个民兵闯了进来，叫我去下街一趟。我到了那里，他们把我拉到树底下，对我说，‘脱掉布衫！’他们把我双手捆在一起，吊了起来。

“他们走后，我的邻居来了，抱住我两腿，使我手臂能松一点；随后，又叫来一些人，把绳子松开，把我放了下来。我永远也忘不了他干的这号事。

“我被罚了一百块钱，五十斤谷子。我只得求他们放宽交款时间。他们拿走了我老婆用那些棒子捣成的糊糊，拿到客店里，王克斌自己吃了，也要民兵和他一块吃。整整两天，我们家可什么吃的也没有了。

“我只是他吊打过的人里头的一个。他前前后后几乎吊打过村里所有的人，从村北头到南头，从街上到寨上的都有。”

“我们现在也把他给吊起来！”一个小伙子喊道。

人群中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人们的心被李宝恩的控诉激动了，他的控诉使大会进入了高潮。他们会对王克斌的暴行以

牙还牙吗？

罗林和两位主席轻声耳语了一阵。李宝有说道，“现在快到半夜了。我们已听到了许多群众的控诉。现在，让我们仔细考虑一下怎么处理王克斌。”

“让他自己把多吃的东西吐出来！”有人喊道，“他要是还不出，我们就没收他的财产。”

“酝酿酝酿！”从院子里好几处传来了喊声。人们分成了几个小组讨论怎么办。

过了一会儿，主席开始让大家提建议。

“他贪污的钱和用斗争果实买的房必须交还给农会。”

“还有地。”

“还有牛。”

“明天早上，他应该开始交待自己的帐目。在这期间，让他每天扫街。”

“叫他扫地是对的，可他是个坏家伙，不应该让他在街上乱窜，否则，不知道他会干出什么事来。”

“把他送交人民法院。”

“我要他先把他戴到我头上的特务帽子摘掉。”

“我们先把他关起来，群众就能揭出更多的罪证来；”

当人们的建议逐渐减少时，王文盛站在台上说：“群众提了许多建议，我们最好集中一下。”

两个主席与记了笔记的工作队秘书商量了几分钟。然后，秘书宣读：

“首先、他必须交清帐目，把他贪污中饱的交出来；

“第二、上午让他扫街。其余时间，他要是不在地里干活，就得呆在家里，不准在街上乱窜；

“第三、对那些被他指控是特务的人，他必须拿出证据，否则就得承认，他是污蔑；

“第四、他必须保证不寻机报复；

“第五、将来送交人民法庭审判。”

王文盛接着说：“坏干部吊打群众是错误的，”，“地主才那样干。我们决不能学他们的样子。假如你们还有其它要求，可以向贫农团或农会提出来。”

然后，他转向王克斌问道：“你还有啥要说的吗？”

“今天晚上对我的批评是一剂良药。”王克斌回答说，想了一想又说，“我和米泉媳妇不是在街上而是在屋里吵的。”

“什么？”那女人尖声叫道，“你没有在合作社门前骂我？你没有到村长那儿去说我？”

王克斌闭口不提这件事了。他接着又转向了那个男孩，“我记不清说过你是特务的狗腿子了。”

这男孩喊道：“你就是站在街当中骂我的，说我是特务崽子！”

王克斌再也说不出什么了。

“他就只想滑过去。”一位老人说。许多人和这位老人一样，怀疑王克斌仍在耍花招。尽管他说是良药，但远远治不了他的病。很明显，人们的怒火又上升了。

工作队又一次出来讲话了。耿西告诉群众，开这会不只是为了出气，“我们保证今晚的会有结果。”他说，“从现在起，要由大家来作决定了。不过人民法庭要成立还需要一段时间。因为我们要派政府代表参加，你们也要选派代表参加。你们一定能看到，人民法庭会按你们的愿望办事。”

会结束了，人们从小凳子上、砖块上站起身。蹲了好几个

小时了，起来伸伸有点僵了的腿，跺跺有点麻了的脚。那位生病的老太太又趴到她儿子壮实的背上。人群走出庙门，穿过田野，沿着通到寨上和下街的路走去。“记住，”两位主席在后面叫道，“明天下午，我们要处理傅高林。”

傅高林的问题

3月19日

3月19日下午，在控诉、揭发傅高林的大会上，再没有比他离婚再娶的事引起更多的注意了。在八路军到来之前，傅高林是个贫农，尽管他辛辛苦苦地干活，也只能勉强糊口。自然，他娶不起老婆，虽然他长得又高大、又英俊。八路军来了，他翻了身，很快就娶了媳妇。他媳妇给他生了好几个孩子，但都没活下来。最后，在灾荒年间，他从一个挨饿的贫农那里买了一个儿子。

傅高林在政治、经济上都发了迹，先后当过农会主席和村长。这时，他对在自己不得志时娶的妻子越来越不满。于是，他又找了个使他中意和配得上他的女人，尽管这女人已结婚了。她丈夫是个矮小、瘦弱、没主见的人，在傅高林插进来之前，他就怕老婆。

傅高林盘算好要离婚再娶的主意以后，就拼命挑拨那家夫妻不和。在傅高林的怂恿下，那女人每天都要臭骂她那可怜的男人一顿，不给他做饭，还公开夸耀，她已经和村长睡过觉了。最后，怕老婆的丈夫在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生活的情况下，离家出走，不久就死了。傅高林马上就离了婚，娶了这个女人。但是，当这件丑事为人所共知时，村里人的不满增加了，

以至在人们的心里结了个大“疙瘩”。

控诉会上揭出了这件丑事的种种事实。最后一个发言的是那个死者的母亲。“傅高林把我的儿子赶走了，弄得他死在异乡。”她说，“然后，他把我儿子的东西都拿到他自己屋里。我儿子离村前，不敢回家吃饭。他被傅高林关过好几次，多次想自杀。现在死的死了，活着的女人被傅高林霸占了。我的眼泪都哭干了，只有心还在哭。”

傅高林也曾为村里一些离了婚的人牵线，这当然不是出于关怀，而是在做买卖。随着生活普遍改善，越来越多的贫农成了有奔头的新中农，过去因贫穷而打光棍的人们，现在都想成亲。这里男多女少，傅高林就让大家知道，只要有酬劳，他是会想方设法为这些男人物色妻室的。

为了从牵线做媒的勾当中谋取私利，傅高林专打那些对婚姻不满的夫妻的主意，一有机会就挑拨离间。然后，他就向女方提出，他可以利用他的职权安排离婚，只要她和他介绍的单身汉结婚就行。

“当我病在床上的时候，”一个年轻人说，“傅高林劝我老婆和我离婚。她被带到马村领了离婚证，然后又被送到三王村跟一个人结了婚。傅高林从中捞到了五十斤小米、三百块钱。”

会上揭发的并不全是傅作为婚姻掮客的事。

“当我离家外出贩卖旧衣的时候，”一个男人说道，“傅高林拿走了我家房子的钥匙，用我一间房开了个烧饼馒头铺子。他烧掉了我的麦糠和麦秸，连我的一些砖也卖了。我回来后向他提出抗议，他还叫我不得声张。最后傅说，他在一个月里搬走。”灾荒年，傅高林把铺子里做的馒头赊给吃客。人们还不起帐，他就要人家替他干活，甚至夺他们的地，就象过去地主干

的一样。

“烧饼铺子开张后两个月，他就赚了不少钱，买了地，还买了一个儿子。”一个人说，“我儿子向他赊了一些烧饼，还不起帐，傅高林就要占我家的院子。最后，他让那孩子替他锄草。他给了我五斤黑豆作为救济粮，然后要我替他锄草。我还能说什么？受人恩惠，嘴就给封住了，说不得什么了。”

“有地的人是傅的烧饼铺的常客。”另一个人说，“有一天，原先的民兵队长王金星在我家里吃玉米饼。他说，他在傅高林的铺子里吃过几次馒头和烧饼；现在傅高林让他用地来还帐。他甚至指定要一块谷子都快熟了的地。可是，没有地的人别想在他的铺子里赊账，即便是他们饿得慌也不行。”

驱使傅高林行动的是个人利益。在斗地主那会儿，这使他站到了人民一边。后来，村里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开始翻身，他致富的欲望，使他和他本当为之服务的人对立了起来。

1944年，傅高林丢了党籍后，只好退出公务活动，一心务农。他的错误是过去犯的，而且在很多事情上，他已经补偿了他过去伤害过的人的损失。当然，他还没有改造成为一个模范人物。然而，如果不是由于王克斌造成的危害而需要召开控诉会的话，傅高林的问题本来是可以由工作队和新干部个别处理的。

对傅高林开的控诉会，几乎和前一天夜里对王克斌开的控诉会一样长，一样激烈。工作队后来在分析为什么会出现在这种情况时认为，这个会给了那些政治上落后的昔日的勇敢分子一个出风头的机会。一些人是从个人恩怨出发指责傅高林；另一些人则指望借此在即将到来的村选举中抬高自己的身价。

当控诉终于结束时，就要对如何处理作出决定。大家同

意，关于将傅高林提交人民法庭的问题，还要再加考虑。同时命令他交出所有强占的财物。从原则上说，他贪污和勒索的东西必须“吃啥，吐啥。”

除此以外，有些勇敢分子提出，傅高林应立即和他的第二个老婆分居。有人甚至要他立即和前妻复婚，尽管她在三王村和她现在的丈夫已有了两个孩子。这些勇敢分子声称，他们是代表群众说话的。但是，当冷冰让大家就这些动议举手表决的时候，只有五个人举手赞成。

接着，一个农民提出傅高林应为军属做些好事的建议得到了同意。

“我看王克斌也得这么干吧。”有人说，“不要扫街。现在每天都下雨，扫街只是白费时间。”

“王克斌会喜欢这个建议的。”李宝有说，“他宁愿在军属地里帮十天工，也不愿意扫三天大街。”

人们听到这么说就推翻了这个建议。他们对这只老虎恨之入骨，不惜对他采取那种封建式的惩罚，尽管浪费在扫街上的劳动完全可以用在其它方面。正如罗林对工作队所说的，农民对这类问题的强烈的偏见表明，建立民主是个困难的过程，是和思想改造紧密联系在一起。

革命知识分子的一些思想问题

看了你昨天的来信，我觉得十里店的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请注意下列几点：

1. 就当前局势而言，你们的工作不应陷在原干部的问题上，而应该转向新的工作中心。群众对原干部还有什么意见，可交给新干部来处理。必须懂得，如果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原干部的问题也就不可能得到解决。

2. 群众提出处理原干部的大部分建议是不适当的。例如，提出要王克斌扫街和让傅高林与他妻子分居，很象是旧的统治者的做法。你们在这方面进行过说服教育没有？

3. 当前的工作重点 is 调剂土地，而不是建立人民法庭。不论原干部的罪行多么严重，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只能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后才能进行。否则，土地复查会受到影响。你们一定要向群众解释这一点，使他们理解这是正确的。如果工作队的一些同志也需要做一些说服工作，你应该召开个讨论会，统一他们的思想。总而言之，从现在起，把干部送交人民法庭的建议不应再强调了。

我仍在病中。当我好些时，我将通知你来这里汇报工作。

——武安九区工作团负责人张磐石

给罗林的信

在河西村的工作团团部，张磐石注视着所属的三个工作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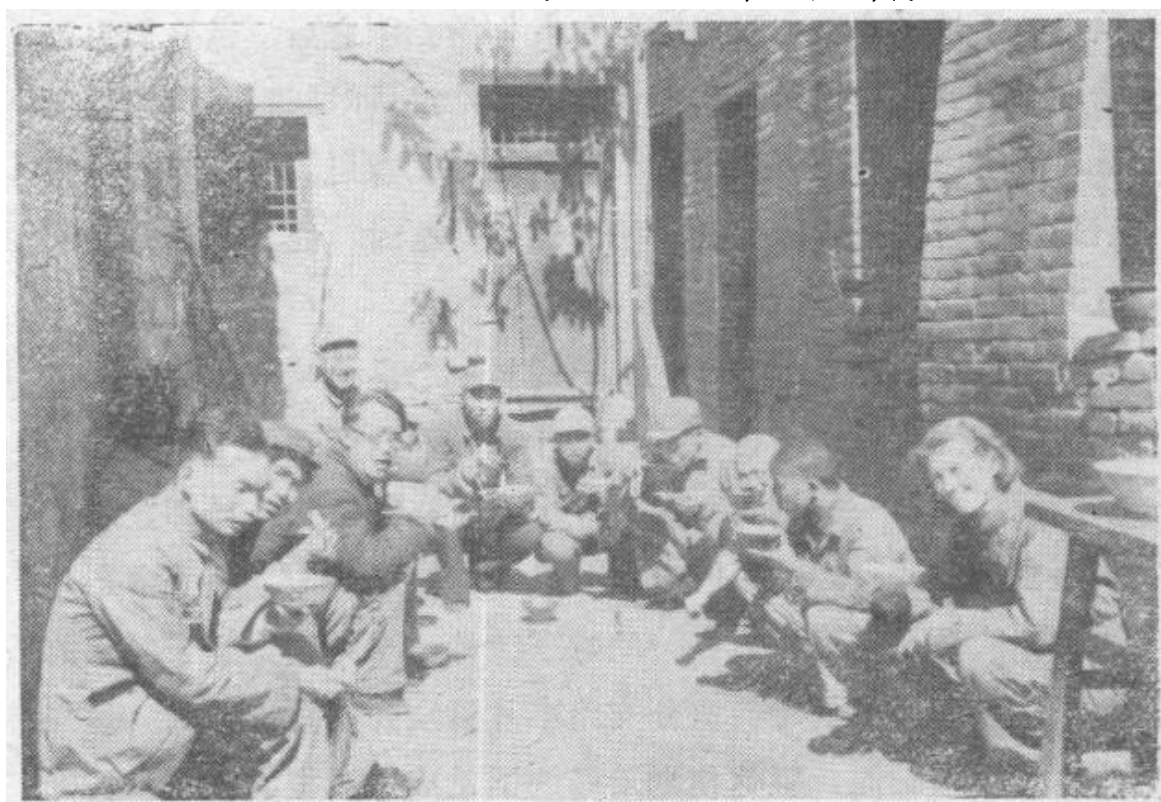


张磐石，他负责武安九区所有工作队的工作。

的日常工作，并通过电话和通信员给他们以指示。除了掌握工作队的日常书面汇报外，他与他的助手安岗，也经常到那些正在开展工作的村里检查工作；在六个星期里，张磐石主持了两次由各工作队负责人参加的全天会议。他本人则向驻在冶陶镇的中央局汇报工作。

张磐石认为，实际工作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反映了部分工作队成员的思想问题。工作队大部分成员是知识分子。在中国，知识分子是指那些受过教育，能读会写的人。当时，在这

样一个四亿人口的国家里，只有五百万这样的人。共产党认为这些人是十分宝贵的财富，同时也认为非常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改造。虽然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对自己拥有知识还是比较谦虚的，但总的来说，他们的那种对文盲农民所表现出来的优越感，还是使他们在自己和农民之间划了一条鸿沟。因此，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就成了整个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边区政府外事办公室和群众工作部的工作人员在一起午餐。
左边第一人李焕山，戴眼镜的是李棣华，桌边的是本书作者之一伊莎贝尔·柯鲁克。

在三月中旬的一个总结报告中，张磐石写道，十里店工作队的主要缺点是“知识分子的工作作风”。他指出，在一些情况下，工作队成员象“老学究”那样开展了理论讨论，这些讨论对于解决村里农民的问题来说，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有时，他们又象“幼儿园的老师”，把一件事情解说了一遍又一遍，唯恐群众不明所以。

张磐石说，这两种工作方法都是脱离实际的。“对群众做工作的方式应当是正确、简单、明了。没有必要象兜圈子那样把事事的细节都对群众饶舌。那不是农民思考问题的方式。

例如，当组织贫农团的时机来到时，工作队没有直接指出是应当成立贫农团的时候了。他们认为，这种建团要求由农民“自发地”提出为好。如同罗林后来所说的那样：“我们对贫农积极分子谈了多次，设想暗示了我们的意图之后，老乡们自己就会提出要求。但是，我们谈得越多，浪费时间越多，他们变得越不明白。他们不明白我们究竟是什么意思。王喜堂就从来不采取这种方式解决问题。每当他谈问题时，他总是说得又明白又直率。”

知识分子出身的工作队成员的另一个毛病是，他们往往以一种包办代替的方法行事，从而背离了群众运动的工作方式。举例说，在第一次划阶级时，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队员都按照了耿西在寨上试点时采用的自报公议的方法进行的。负责中东片的工作队员研究了村里有关的数字统计，事先就定好了每家的成分。然后，把划定的成分交给本片群众开会讨论通过。这固然省了很多时间，但这使划阶级的活动成了死板的、技术性的事务。划阶级本应是政治运动中高潮的一部分，目的在于促使农民丢掉封建的、打不破情面的思想，树立起政治责任感。

虽然这种问题只发生在中东片，但张磐石不满意的是，没有一个片把划阶级和群众运动充分地结合在一起。在那段时间里，他曾写信给罗林：

你的工作特点是小心谨慎。这是好的，也是必要的，这是在群众中工作，你必须小心谨慎。总的说来，十里店的群众运动看来少了些。你的报告读起来显得枯燥些。

没有群众运动，光是小心谨慎是没有用的。群众只会有不甚了了的感觉。划阶级必须同解决村里的具体问题紧密结合起来——当前，就是同建立贫农团结合起来。

只有通过群众自己的行动，我们才能使他们受到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

工作队之所以陷于琐碎的事务里，往往与它的形式主义的工作方法有关。有时工作队员对一些措词也争论不休，例如，是提“阶级出身”合适，还是提“阶级背景”合适，而不是对原则性的问题进行争论。

有一次，张磐石对一些工作队员谈话时说：“你们有些同志喜欢吹毛求疵。你们仔细讨论自己的工作，这是好的；但你们应懂得分清琐碎事务和原则问题。如果你们进行无休止的争论，这对工作是不利的。有些同志甚至在工作紧要关头还争论不休。”

某些工作队员在工作出差错时往往诿过于人。在一次会议上，罗林说：“真怪！工作顺利时，谁也没有什么意见；但只要一出现困难局面，工作中出了毛病，有些同志便开始互相埋怨起来”

“你们不应互相指责，”张磐石告诉他们，“不要只看到别人的缺点，当然也不要光看他人的优点。要着重考虑的是怎样克服我们的缺点。”

他还说：“在决策时，人人都要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少数人的意见只能有助于我们深入地思考一些问题。如果有人不执行大多数人的决定，工作队就不能保持团结，工作就要受损失。”

工作队里没有人故意违反纪律，因为所有队员都是忠诚和

自觉的。但是，也有人错误地认为某些违反纪律的行为是“首创精神”的表现。这种为美德的外衣所掩盖的缺点，往往是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一种错误倾向。

工作队的全体成员都面临种种考验，对有些人说甚至是很痛苦的考验。其中大多数人是离开舒适的家庭来参加革命工作的。多年来，他们住在农民家里，除非是过节，他们只是以小米、咸菜或白菜充饥。他们的生活水平相当于当地的中农。有些工作队员在解放区度过了荒年，主要靠吃草根、树皮和树叶得以幸存。为了革命，他们不顾自己的身体健康和生命。但是，光靠这种心甘情愿的献身精神，并不能解决他们从旧社会带来的某些思想意识问题。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需要坚持长期的斗争。

村人民代表大会和新的村政府

3月20—22日

3月20日早晨，罗林和贫农团委员们会面，商谈建立村人民代表大会。接着，贫农团委员分别召开了片会，工作人员在会上解释了代表大会的性质。它将是一个代表性极为广泛的机构，通过它处理和审议各种事情，比召开全村大会容易解决，而且能比村政府委员会更密切地保持与全村农户的联系。它的日常公务由贫农团和农会的干部或委员会办理。出现特殊情况时，也能迅速地召开大会。

村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批评干部，甚至有权撤干部的职和举行新的选举。它将管理向边区政府交公粮和其它应尽义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也得调停选民中的纠纷，并帮助他们解决个人问题。他们在即将进行的选举、调剂土地、分配房屋和剩余的斗争果实的工作中，将起重要作用。

作为建立代表大会的第一步，农民开始组织“人民小组”。按照规定，每组由十二至十五户组成。在某些情况下，住处相近的十来户就组成一组，因为这些户是一个自然单位。也有以若干邻居为核心，吸收一、两户住处较远的农户组成一组的。不论怎么安排，所有的小组都是在自愿的基础上组成的。

在组成各个小组的当天，一小群一小群的人们聚集在院子

里。孩子们神气地来回奔跑，传递消息。热烈的讨论是在左邻右舍习惯地聚在一起吃饭的地方进行的。到晚上，全村已组成三十一个小组。每一个小组成立后，立即讨论小组在当家作主方面应怎样发挥作用。每个小组还选出一名代表，参加当晚党支部召开的党员自我批评会。

第二天早餐前，各人民小组向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候选人的名单。有两个小组各自提出了一名比较突出的人物，因此，他们就容易选择。但多数小组各自提出了三个候选人，就把他们的名字都报给贫农团委员会确定。

这些任务都要赶紧完成，因为这一天赵庄有集市，赵庄离这里不远，每个人都急于赶集。老老少少都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去赶集，他们口袋里的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当地用的各

在集市上买木杈。土改后，农民的钱多些了，他们需要更多的农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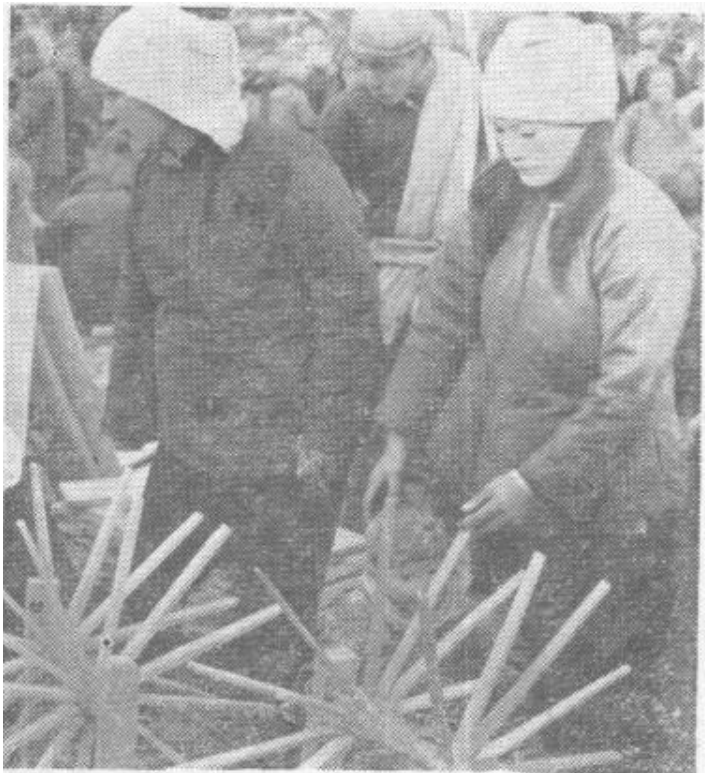
选举村人民代表大会休会期间，群众去赵庄赶集。

类农具和家庭用品那里都有卖的。新中农特别想买东西。他们为装备新分得的牲口选购鞍子，为耕种新开垦的土地购买犁、耩，还添置日常生活需要的风箱、铁锅和其它东西。那里还卖儿童玩具和各种小吃。集市上还有各种文娱活动，说书、唱大鼓和演出新旧剧目。人人都能在这里尽情欢乐。

傍晚，人们满载着新买的耙子、杈子、风箱和铁锅，热烈地交谈着一天中的所见所闻，匆忙赶回家去。这时，农会委员会已对候选人名单进行审查，刷掉了八名不理想的，为选举各

组的人民代表作好了准备。经过晚饭前后或在吃晚饭时进行的讨论,各小组立即进行了投票选举。最后,比较公平地选出了村里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九个贫农,十六个中农,六个老中农。

那天晚上,村人民代表大会和全村人聚集在庙里开会。三十一位当选的代表分散在群众中间。粉红和大红的标语纸上写着口号:



妇女们在集市上挑选纺车。

“全体农民团结起来!”“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大会!”

“十里店全体农民参加的会议,对村里的事情最有发言权,是吗?”工作队的耿西提出这个问题,群众表示同意。

“但我们不能老是召开这样的全村大会。老开,我们就没法

干农活了。我们一定要选出代表来为我们办事,这样就可以少耽误我们干活。除了开全村大会的时候以外,村人民代表大会拥有最高的权力。如果人民提出要求,它有权撤换村干部。

“人民政权象一座宝塔,解放了的中国的所有村庄里的人民代表大会是这座宝塔的底座。在这个底座上,建立起区、县和边区人民代表大会。全国解放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是这座宝塔的最高一层,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人民政府。

“我们组织十里店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为将来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铺了一块基石。”



一个农妇在为一只木鞍讨价还价。

一位盲艺人在拉琴演唱。边区政府已把盲艺人组织起来，除了拉唱为人民喜爱的传统曲目外，还歌唱战争中、土改中和生产中的动人事迹。



耿西用一句口号结束了他的讲话：“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大会！”

作为新农会的主席，王喜堂开始讲话。自从工作队来到十里店以后，这还是头一回由原来的村长主持群众大会。他的讲话充满了幽默感：“今天，十里店的人民翻身了。”他说，“现在，集合在这里的代表，共同考虑怎样建立新的村政府，这就是开始为人民做工作了。请你们大家发表意见。”

两个小时刚刚选出来的三十一名代表，依次代表他们的小组讲话。并不是所有的代表都清楚地了解情况的。一个代表说：“我们还没有很好地讨论，因为今天我们组里大多数人都去赶集了。”但是，多数代表早有准备，他们就各种问题发表了他们的主张。

他们主要的意见是要求撤消某些办公室，精简村政府机构。

人们分成小组投票。



这个主张很得人心，这不仅是因为行政机关太大难以管理，也是因为有些人希望撤消过去给他们带来麻烦的干部的职务。有些人认为，村里干部越少，负担后勤工作的人就会越多。村干部们往往在一年中最忙的时候免除后勤义务，这样就给老乡们增加了负担。

后勤任务对十里店来说，确实是一个特殊的问题。

自十里店被选定为

一个中转站以来，前方下来的伤员要从这里送到后方，公粮和其它物资也要从这里送到前方。“要末免除我们的长途运输任务，”一位代表说道，“要不然别的村应当帮助我们。他们比我们干得少多了，只因为他们离大路远些。”

“对，石洞村、河西村和柳春沟上头别的村子应当帮我们出勤。”另一个人说。

“如果我们一直负担这么多后勤任务，即使我们有更多的



农会委员候选人李宝有(中)，译员李棣华在门道上，何燕凌站在李宝有右边。

地，生产也上不去。”

王喜堂作为一个有经验的主席，运用掌握会议的策略和技巧，使讨论又回到成立新的村政府的议题上来。最后，一致同意设立八个干部职务，并且议决所有干部的地位无高低之分。自从工作队来到以后，群众对民主的关心是如此强烈，所以，他们不想让村长比村政府的其他干部拥有更大的权力。

3月22日早饭前，人民小组开会提村政府委员候选人。被四个以上小组提名的候选人有十八名。早饭后，贫农团委员会开了一小时会对此进行审议。根据主持会议的罗林的建议，又对这些候选人作了裁减。

他说：“我想，担任贫农团主席、农会主席这样重要职务的人，会忙得没有时间担任其它职务了。”委员会成员经过连续八天的紧张工作以后，已经疲乏了。他们欣然同意把李宝有和

工作队秘书何燕凌在为每位候选人计票。





王文盛(左起第三人)当选为副村长。

王喜堂从名单上刷掉。

已被选为贫农团副主席的王文盛也想刷掉他的名字。他是家中唯一的劳动力。他父亲年老体残，妻子也丧失了劳动力。“我老婆说，如果我把时间都花在村里的工作上，我们就连勉强凑合的日子都再也过不了啦。我怎么能不听她的呢？”他认真地、带点开玩笑地说。但是，委员会还是不同意把他刷下来。

为了减轻公务负担，罗林建议，村政府是否以设立九个委员而不是八个为好。第九名委员可以起候备力量的作用，帮助负担最重的干部进行工作。大家一致同意了这个建议。

有人问，村长的秘书究竟是由村长自己来挑，还是由群众来选。会议肯定，后一种方法有助于防止贪污舞弊。

最后一个问题是怎样进行选举。委员会决定，请十六位候选人登台就座，选民则在自己的人民小组里就座。由一些在

各个小组里来回活动的点票员把候选人的名单念给每个选民听，每个选民再悄悄地把自已的选择告诉点票员。这样做，不识字的选民，也可以用无记名的方式投票。

有关那天下午选举情况的记载，描述了选举时的欢乐情景：

会议开始时，如同往常那样，妇女们都挤在接近走廊的地方，捻着线，做着军鞋，男人们占了院子的其余部分。大会宣布：所有属于一个人民小组的人，不论男女，都要坐在一起。带着几分犹豫之情，嘻笑之声，大多数妇女都起身和她们本组的男人坐到一起去了。也有几个保守一点的妇女则坐在本组的旁边，形成了她们自己的小小组。人们重新就座以后，一群一群的人们，象是收获时节地里一簇簇捆好的庄稼。

工作队的成员和边区政府的一些干部，分别到各个小组，把十六名候选人的名字念给大家听。农民们就象要听清楚远方传来的声音那样，聚精会神地听着，再凭各自的选择，从里面挑出九个名字来。

一个老年妇女选了李宝有以后，想再选一两个，可接着又选了李宝有。对她念了一些别的候选人的名字以后，她又提了她最满意的李宝有，尽管李宝有并不是候选人。

最后，宣读了选举结果。对干部搞“大扫除”的主张被否定了，五个当选的人是原来的干部。宗派主义也被打破了：新干部中有三名是来自寨上的。贫农、中农都有当选的人，新当选的九个委员之中，甚至有三个老中农。工作队认为，党组织的表现也是令人满意的，因为有三名党员当选了。

赵正方得票最多。在宣读了九个当选人的名字以后，人们要求他讲几句话。他推辞了很长时间，但人们坚持要他讲。最后，他咕哝着说了几句。王文盛也得讲话，在他那白胡子的父亲的注视下，他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以前我们从未见过全村群众这样兴高采烈。他们推搡着挤到台前，跟新当选的干部大声开着玩笑。新当

选的干部不自在地微笑着。

虽然选举大会已经结束了，人群中的大部分人仍然站在院子里闲谈着。光荣的当选人和工作队的同志们一起走进学校的一间屋子。耿西和他们讨论起他们的新职务来。想到压在自己肩上的沉重的担子，这伙人看起来个个面带愁容。

耿西尽力鼓励他们说，所有新干部在开头都有这样的感觉。新干部围着他坐在砖上，看来好象无动于衷。王文盛说，他家缺少劳力；有些人说，他们还担任其他职务；别的人强调他们没有文化，不会讲话。

耿西说，他们就象新娘子上轿，起初心情沉重，以后就会感到高兴的。可赵正方说，也有新娘子一直哭个没完的。耿西又换了一个比喻：“好吧，就象头一次骑马，你很快就会熟练起来，感到有信心了，就象一个老手那样。”

第二天晚上，新选出来的村政府开会时，干部们依然不是信心十足的样子。不管怎么说，他们必须决定谁担任哪项职务了。意见一致的是，村长由得票最多的赵正方担任。

赵正方一个劲儿地推脱：“不行，不行，根本不行。我干不了。谁都知道，我只是一根椽子，成不了大梁。”

“不用担心，我们九个人可以一起商量。”

“该干什么不是由你自己决定的，是由群众决定的。”

“你没有很多事要干。后勤委员会可以管送公文，有一个秘书可以替你写公文。财务委员会可以帮你管钱。你就管订计划就行。”

“计划！”赵正方激动地说，“我不会管计划。咋回事儿？这当儿，我连明天要犁我的哪块地也没了主意。”

“群众是有眼力的。他们看到你老实，也有能力。”

“我完全不同意！”赵大声嚷道。“我肚里空空的。”农民们通常把肚子看作是储藏智慧的地方。

“你没多少心眼，这是真的，”他的一个坦率的朋友承认了，“但你也没有什么坏心思。”这是一种古老的信条：平凡的人心上只有一个心眼，聪明的人心眼多一些，足智多谋的人有多达七个，甚至九个心眼的。

“正因为你心地踏实，所以你就不会出错。主要是不要和群众对抗，大胆地为他们服务吧。”

“你能当村长，王文盛可以当副村长。你们可以配合得很好的。你老实，他主意多。”

罗林见到赵正方越来越不安，就说：“最好让他再想一想。”但他还是推辞不了；委员会决定，赵正方担任村长，王文盛担任副村长。由于儿子让驴吃了玉米，在王克斌命令下挨了打的李宝恩和会打算盘的李宝希一起负责管理财务。李宝恩是党员。另一名党员、退伍军人张兆林，任村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由九人组成的政府委员会中的第三个党员王寿和负责教育。

次日，村政府委员会的任命决定提交全村大会通过。这天，天气寒冷而晴朗，小山顶上覆盖着白雪，地里的冬小麦正在返青。分工情况和其它决定宣布以后，群众表现得比在选举时平静。在正式移交职权的过程中，所有到会的人都保持肃静。王喜堂，为了哀悼他的亡母，依然全身孝服；他捧着一个木盒走到台中央，盒子里放着村政府的大印——这是他交卸职务的象征。

王喜堂准备将印盒交给他的继任者，可赵正方却在房廊尽头处躲躲闪闪。新的副村长将他推上前去，他笨拙地伸出瘦骨嶙嶙的双手接过印盒。人群中突然爆发出一阵掌声、口号声、笑声、喧哗声和欢呼声。新的村政府委员们开始就职了。

第二次划阶级

3月23—28日

3月23日，天色阴暗，大雪纷飞，但下街和寨上的大街小巷却挤满了一群群的男人和女人。他们踏着泥泞去参加分片召开的会议，复查第一次划阶级有无差错，并划定过去的被斗户的阶级成分。

中东片在李宝石家里开会。妇女们都挤在凹室的炕上，背靠墙上。四十多个男人挤在昏暗的房子的其它地方。来早的坐在主人拿出来两张长凳上，其余的坐在地上、砖上或自己带来的小凳上。三月的新鲜空气，不久就被炕炉里冒出来的烟，和传来传去抽吸的长柄烟锅里的烟味弄得混浊了。

第一次阶级划分情况刚一宣布，在讨论开头四个的情况时发生了争议。傅合德的情况就引起了不同意见，由于他急切地想把自己划为贫农，因而他没有如实地汇报自己的情况。他说，他的三亩地是他母亲的，其实他母亲早已把地给了他了。另外，他也不提他的一个开客店的亲戚，允许他从客店的马棚里起粪。

在第一次划阶级时，傅合德那片里的人是知道这些情况的。但那时他们碍于情面，没有点穿他。在工作队领导下开展了二十多天的运动之后，他们改变了原来的想法。这次，他们

决心不让任何一个人隐瞒情况。他们把傅合德隐瞒的情况公诸于众，开始重定他的阶级成分。其实，最终看来，他的那些花招都是不必要的。即便是加上他母亲给的三亩地和从他亲戚马棚里取的粪，傅合德还应划为贫农成分。

相反，傅培常在第一次划阶级时坚持说他不是贫农，而是一个新中农。虽然当时大多数人认为他是个贫农，但他们都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因而这个问题拖着没有解决。这次，有些人指责他不顾事实，存心委屈自己。

“正因为你是党员，你想当模范。”一个人说，“但我们大家操心的是把你的阶级成分定对。”最后，傅培常同意把他划成贫农。

傅寿奎在第一次划阶级时同意将他划成老中农，但后来他又声称，他实际上是一个新中农。虽然他又提出来了问题，但并没有提出新的事实。除了他自己，在大家看来，第一次给他划定的成分是正确的。人们指出，他最近卖了一些在过去的斗争中分得的地，这是因为他种不了这么多地。在所有的事实面前，傅寿奎再次同意，他应划为老中农。但他是勉强承认的，显然仍是不满意的。鉴于讨论的目的不单是用大多数人作出的决定来划定每家的成分，也是为了使当事人真正信服，所以，这个问题还要提交农会进一步讨论。

第四个是傅伦的问题。第一次划分阶级时，他自谦地把自己说成是新中农。但大家普遍认为他是个贫农，他也完全同意。当下，主席就说，“我听说，许多人对把傅伦定为贫农是不满意的。他们说道，他的大儿子在阳邑做了好生意，带回家很多钱。”

傅伦一旦被定为贫农后，他要求留在那个阶级里。“这是王

克斌造的谣。”他气愤地说，“我知道，他对我有气。不错，我儿子过去是做生意的，可是现在他在一个政府机关里为人民服务。他每月的收入除了吃饭、穿衣只有值六斤小米的零用钱。”

无论王克斌是不是应对此负责，许多人仍认为傅伦不是贫农。党员傅培常提出一个解决办法后，讨论变得热烈起来。“他比贫农要肥一点，比新中农又瘦一点。”他说，“所以，我建议把他划成新中农。如果他有窟窿，就在调剂土地的时候给他填平。”

这个建议被采纳了。会议开始转到给被斗户划成分。第一个要讨论的是傅培民。在旧社会，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高利贷商人的弟弟。傅培民躲在屋里最暗的、最不起眼的角落里。他开始用犹豫不决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自报起来了。人们要他站到前面去，这样可以听到他讲什么。他蹲在主席台前面，心情紧张地拨弄着手里的一根野草，象是在回想八路军到来以前他自己的经济情况的细节。

尽管傅培民的汇报是不连贯的，自相矛盾的，大家都很有耐心地听着。有个人说，“他和我们不一样。他有两三年没有参加会议了，不习惯讲话。”

大家都帮着他算账。“他说，他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有二十六亩七分地。他承认，他常在农忙季节雇短工。最强的劳力最多也只能种十五或十六亩地，他至少有十亩地要靠雇工来种。因此，他的总收入里靠剥削得来的超过了四分之一。很清楚，他过去是个富农。”

工作队的吴象很想知道傅培民是否觉得对他的成分的划分是正确的。根据他的建议，他的问题暂时搁下，到下午开会时再讨论，以便傅培民有时间仔细回忆与他划阶级有关的一切事

情。

会议又转而讨论石匠王二河。他是因群众出于对他的父亲的仇恨而被斗的。他小时候被人绑架时，被索赎金四百块钱。他父亲自己凑了点钱，但其余的都是利用当村长秘书这个职务从其他的农民那里敲榨来的。这就是王二河被定为斗争对象的原因。现在，农民们懂得了阶级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道理，他们就不难理解，王二河是个新中农。

在3月23日和24日，各片也召开了类似的会议。到第二天午后，所有被斗户的阶级成分已初步划定了。除两家外，绝大多数定为老中农。其中一户划为富农，另一户仍定为地主。虽然他们已不再剥削别人了，但还没有改变阶级成分。他们要按规定时间自食其力以后才能改变成分（地主劳动五年，富农三年）。

对于下一阶段的运动情况，《人民日报》作了这样的报道：

开完这些会后的当天晚上，贫农团和农会委员会一起逐个审查了被斗户的阶级划分情况。虽然大多数过去错划的在公议时已经改正了，但还是发现了一些因自报不实而划得不准确的问题。

3月25日和26日晚，贫农团召开全体会议，审批全村划阶级的结果，纠正了二十多起错划。

3月28日，公布了第二次划定阶级情况。在以后两天里，工作队注意观察在大量改正斗争对象的阶级成分后对群众产生的影响。工作队成员还访问了斗争对象的家庭。有时，也和他们一起开小组会，以使他们了解党的政策的新精神。

开始时，一些贫农对于改正这些人的成分感到沮丧。他们说：“我们村里难道一个地主也没有吗？”“如果不让我们斗中农，我们到哪里去找房子分给贫农呢？”一些人声称：“真怪！甚至一个地主也能变

成贫农了！”另一些人因想到过去的斗争搞错了而感到懊丧。但仍有些农民坚持说：“父债子还。他的地不是靠劳动得来的，查三代没错。”

然而，到最后，正确的意见还是占了上风。一个人站起来说：“象过去那样搞斗争，我可不敢发家致富。我挣多少就吃掉多少。我要把斗争果实和从地里劳动挣来的钱全花光。从现在起，不会再有这种斗争了。咱们敢发家致富，不用害怕被斗争了。”

另一个人说：“你们都知道，我手头口粮不足，没有牲口耕地。过去，向有旺（老中农，曾被划为“封建尾巴”）借粮食和牲口没什么为难。可是他被划成斗争对象后，我就不敢再从他那里借了，生活过得多苦啊！”

至于中农，现在他们一般也比较放心了，因为他们知道今后不会再斗争他们了。一个中农说：“让地主和富农改变他们的阶级成分是有道理的。他们应当受到公正的对待。老实说，他们劳动也不赖。”另一个说：“如果斗争还按老办法搞，咱们中农的生产就会越来越差劲。”所有中农都同意这一点：“如果那样的斗争还搞下去，咱们大家或迟或早都会被斗争。谁能免得了呢？出力劳动是为别人干的。这样下去，还不如把自己的都吃光喝光呢……”

至于斗争对象的家庭，大多数都是很高兴的。在和工作队员交谈后，他们的苦恼也摆脱了。他们要求恢复他们的政治权利和搞生产的自由。一些人要求归还他们的土地、房屋和牲口。

早期的极左倾向的受害者的合理要求，向新干部提出了一个问题；而这些新干部正面临着为新翻身的贫农寻找他们必须补充的土地和其它财物的困难。

斗争对象

在第二次划阶级开始前一个多星期，工作队开始同在近年来的斗争中被斗争的对象谈话。有些工作队员对被斗户进行了家访，并定期召开和参加了每次由若干户参加的小会。当被斗户诉说自己的遭遇时，他们开始明白，自己不幸的根源在于封建社会本身。

在解放前的十里店，发家致富的唯一道路是骑在别的农民头上。一个人要么剥削别人，要么受人剥削，这是一条铁的规则，没有永久的中间道路可走；中农阶级不断分化。大多数中农逐渐衰落成为贫农。少数人通过放高利贷和不择手段的行动，给地主或富农当狗腿子，从而爬上较高的社会阶层。

共产党搞的改革为建立一种不同的社会秩序创造了条件。可是，虽然贫雇农和村领导看到新社会是为群众的利益服务的，他们却看不到富裕的老中农也是群众的一部分，而且可能结成同盟。他们只看到这些老中农的一些行为，和剥削者干的没有什么两样。事实上，由于替有势力的人当狗腿子，这些老中农比地主、富农还要显眼，有时人们对他们更为憎恨。

“我的确为我爹的问题挨过斗。”李宝用在寨上被斗户的一个小会上说，“我爹小时候在私塾上学，是最好的学生，算盘打得很好。所以长大后，他在石洞村一家大地主家当了帐房。后

来，他们叫他出去收租。当人们付不起租时，赶人家出门，抢人家的土地是他。当然，他不喜欢这个差使，但他自己的地不够维持生活，所以他干了三、四年。最后，他积了一点钱，自己买了一些地。”

石洞村的一些大地主不愿意雇用识字的中农替他们收租，而宁愿将相当多的土地租给富裕的中农，收租之低足以使他们转租。李宝用自已就当了这种中间人。他说：“我在外村的一个熟人在十里店买了一些地，要我帮他租出去。当然租金是高了一点。在减租、减息运动里我挨了斗。但我只是个中间人，并不是真正的地主。看来佃户不懂得这一点，他们斗了我。”他基本上是个好人；这类事是地主叫他干的。虽然李宝用现在支持改革，但很明显，他对于替住在城镇的地主办事，自己从中牟利这件事，并不认为有什么错处。

会上，另一位农民李宝财说，他家也被斗过，因为他父亲是放债的中间人。“我爹曾按每月百分之一的利息向地主借钱。然后，他再分小批（通常一批不超过一百块钱）放出去，每月收百分之三的利息。有时可能还要稍高一点：一块钱每天收一个铜板的利息。一块钱合四百个铜板，这样算来，月息就是百分之七点五。”

一部分斗争对象是破落或破产的地主、富农。李丰一度是寨上的富农，他将好地卖出去还了债。然后，他买进和租出石块很多的山地（这些地是没有一个债主愿意收作抵押品的）；他又从地主亲戚那里租进好地。寨上的另一个一度是富农的傅兴，就是靠替地主收债而免于破产的。

破落或破产的地主、富农不断加入了中农乃至贫农的行列。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转而以包揽诉讼为生。通过周旋于封建社会

不可避免的摩擦和冲突之间，而为自己招徕诉讼之争，是这一行当所公认的手段。一旦包揽在手，讼师们就尽可能地把这场笔墨官司拖长。他们告诉当事人，如果通过讼师给法官大量行贿，官司就能打赢。这些讼师就其谋生之道来说，手脚当然是干净不了的。由于这些勾当，为平民百姓所痛恨的封建讼师和诉状捉刀人，又赢得了一个“刀笔吏”的恶称。

李焕然是个破产地主的儿子，除了受到一些古典的文化教育以外，他从那衰败的家里别无继承。这样，他就想靠撰写诉状谋生。然而，很快他就发现，对文化的爱好，并不是一个成功的诉状捉刀人的生财之道。由于无能而不能在这方面飞黄腾达，他就当了地主王邦彦的账房。他还被派担任由王邦彦当头的庙会的帐房，并且由他监督将庙会的钱财秘密地转送给国民党。1937年，国民党十一旅的黄司令在十里店设立了指挥部。王邦彦成了他在地方上的联络官，李焕然当了那个旅的会计。这本来是一个财源亨通的好机会，但他也没能因此而发财致富。

富裕农民或破落了的大族子弟也乐于混个一官半职。他们当了保长（管百来户人家的官员）、村长或文书。凭着这些地方官的职位，他们收租、征兵、为国民党维护法律和秩序，甚至和日本人勾结。因而，这些人长期来一直挨斗，而且往往因此而被自己的子女所断绝关系。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他们的下一代在后来的运动里还是成了斗争对象。

现在，其中一些人为父辈的罪恶而自己受到株连叫苦；有些人表示理解他们为何受到如此对待。总的来说，他们是愿意向前看的。

在这些人之中，有一个三十四岁的地主儿子。他在1940

年加入了八路军。但十里店的斗争开始时，他被召回家乡，交待他在他家的罪恶行径中干了多少坏事。他的上级让他回家老老实实地在群众面前低头。他被列为斗争对象，因此，不准他返回部队。他在家干农活，并为军属劳动。他干得如此出色，包括打扫军属家的茅厕和在大田里撒粪等等，以致负责的干部说，“在本村里，还没有一个人比他为军属服务得还要好的”。

虽然，有些人认为，他参加八路军只是想提高他家的地位；但这个地主的儿子很明显在思想上有了变化。他说：“我父亲是人民的敌人，因此也是我的敌人。我回来是要老实地向群众低头。”他还在被斗户会议上宣称：“我相信政府的政策，所以，我认为把我划成头等斗争对象是不对的。不管我爹干了些什么，我自己还是愿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破坏改革运动。”

“我以前从没有说过这些，但我总认为，政府的政策是宽大的，我们村也应如此。我总在想，对我来说，最好要求审判我，然后，我会接受对我的任何处分。这样，我又可以开始新的生活。”

另一个因家庭问题而受牵连的，是那个先是不得志的讼师，后来成了帐房的李焕然的儿子。当共产党第一次来到十里店时，此人是个串家走户卖衣服的小贩。直到1942年，他没有积极表态是支持还是反对改革运动。那年在旅途中，日本人没收了他的货物。回家后，他对侵略者充满了仇恨。新的村干部就动员他参加了民兵。一年后，他当上了民兵干部。1945年，他进了一所抗日军政学校。日本人投降后，他回到十里店，参加了斗争地主、富农，分到了一些斗争果实。

与此同时，他爹李焕然也支持共产党，在武安县政府办的民众教育馆里担任图书管理员。在那里，这个和善的老学究，

由于工作仔细而受到尊敬。

在割封建尾巴的运动里，李焕然因不在家乡和在教育馆里表现良好，因而没有受到触动；尽管作为一个可能的斗争对象，曾有一、两次提到过他的名字。可是他的儿子却被定成斗争对象，只是由于他父亲的，特别是他地主爷爷的历史记录。

这个年轻人的日子并没有象其他斗争对象那样难熬。事实上，在工作队来到以前，他已得到群众的谅解。部分原因是，他在十里店每个旧历新年演出的戏剧、曲艺和其它娱乐活动中，是个既会编剧，又擅于表演的主角。在1948年2月初的一次欢庆活动中，村干部要他编写一段题为《贫雇农必须当家作主》的快板。开始，他因可能出政治性差错而不愿执笔，但是，最后他不仅写了，而且在亲自演唱时，博得了全村人的掌声。

现在他在工作队召开的原斗争对象会上说：“在土地法大纲颁布以前，我想，什么事都没什么希望了。看来，我将终身是个‘封建分子’了。土地法大纲公布后，我知道了人们可以通过劳动改变阶级成分，我才有了希望。”

就象其他农民一样，过去的斗争对象从划阶级中得知，早先对老中农的斗争是错误的。但这两批人都知道，过去确定这些斗争对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现在，双方都愿意不再纠缠旧账而重新和好。绝大多数错斗户没有提出把过去错误地没收他们的财产全部归还给他们本人。他们懂得，这样做会使全村的经济陷入混乱。象村里其他农民一样，大部分错斗户相信，填窟窿的时候将给他们补够足以谋生的土地和别的财物。他们更为珍视的是在政治上恢复名誉。

丈量瘦地和肥地

3月26—28日

在农会委员会、贫农团委员会和村政府的一次联席会议上，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寻找填“窟窿”的“土”。

“我们首先要丈量土地。”农会主席王喜堂说。

“是的，”副主席说，“我们一块地一块地量。”

“我们最好从区公所拿个标准尺来，”王喜堂接着说，“我们自己的不一定准确。我们要把能写会算的都组织起来。”

“每家可以在自己所有的每块地上插上一块牌子，注明土地面积和常年产量”。贫农团主席李宝有说，“然后，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计算进行核对。”

“这就是说，全部农活都得停下来，动员全村。”副村长王文盛说。他早已感到办公事的需要，对他可利用的时间的压力了。

“这要不了多长时间的。”王喜堂说。

但一部分新干部和委员觉得，在即将种棉花时，要丈量全村分成百来块的四千多亩地，工作量太大了。工作队队长罗林同意这种看法。最后，决定由村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到各自的选民中征求意见，以便弄清丈量土地是否真是群众的要求。

第二天，在全村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代表们到台上汇报。

王喜堂问他们：“群众是要还是不要丈量土地？”

“当然要的，”他们之中有一个人肯定地说，“那没问题。”

“他们想丈量土地，没错。”另一个人说。

罗林将王喜堂拉到一旁，对他小声说了几句。工作队长怀疑，一些当选为代表的勇敢分子可能没有代表他们各自组里的群众说话，而只是说了自己的想法。

王喜堂又一次转向代表们说：“这件事得在每个组仔细讨论讨论。这样，你们才能深入了解群众的愿望。不要主观，要根据事实。”

这样，三十一名代表回到各自组里进行酝酿。讨论进行了整整半个小时，最后，代表们又回到台上。事实上，决定是一致的，所有的土地都要丈量。

“对！”王喜堂精神焕发，热情地说。他知道，在他当村长时，丈量土地是搞得很实在的，他热切地希望别人能发现这一点。

“那我们还得深入到群众中去，”他说，“了解怎样组织力量，怎样量得又快又公正，怎样在丈量土地的同时不误农活。要不，咱们放下农活到丈量完土地再干？群众要求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现在就是要讲民主。”

“白天丈量，晚上计算。”这就是群众的决定。

建议很快就提了出来，并且得到一致同意。“会写的写，会算的算。不会写不会算的可以动手丈量或拉绳子。什么也插不上手的，可以站在一边监督。每个人都必须参加，每个人民小组可以作为一个工作单位。”

大家都认为，即使这样干，这项工作也得干上五天。人们还统计了全村在丈量方面比较熟练的人数。

王喜堂宣布：“全村有二十九人能写会算，十五人能算，九十九人能丈量和拉绳子，九十七个可以做检查员。”

第二天早上，在一些院子里，在充满阳光的街上的一些角落里，各个小组的农民分别围着几个识字的人。户主自报以后，这些记录员就在一块木牌上写下每块地的面积和产量。几乎每一个会写的人都用上了。许多过去的斗争对象发现，他们多年来第一次被包围在友好的人群之中。寨上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退职教员，用他父亲的老家门口的一扇磨盘作为写字台。下街一个一度富有的年轻地主，正忙着记下农民们自报的数字。后来，这两个人和许多原斗争对象一样，都成了丈量土地时的统计员。

村政府的院子可说是最拥挤的地方了。院里，村办事员王复新正在拚命地写着。那些等着轮到自己报数的人虽然聊得很起劲，但并不怎么快活。丈量土地对他们来说是欢迎的，但是惋惜丧失了播种的时间。

早饭后，大多数牌子都写好了，大伙儿匆忙地拿去分别插到地里。小溪边、大路旁青葱的麦地里、寨后、柳溪沟和远离干涸的河床的梯田里、阳邑塬石山顶上的台地里，只见到处都是来去匆忙的人。

回到村里后，联合委员会又开了一个会。王文盛说：“我听一些人说，如果丈量结果，我们村的土地面积比区里登记的要少，我们就可以少交公粮了。”他满意地笑了笑，然后，又严肃地说：“如果有谁因出于这类想法而打算在丈量时搞小动作，我们可要追查。”

“我同意。”王喜堂说，“我们要反对那种打小算盘的态度。我们搞丈量，是为了让区里掌握准确的土地面积；这可不是为了

少交公粮。”

罗林也打破了自己的沉默，反对把丈量土地作为少交公粮的手段。“负担多少的问题，”他说，“总是可以在区或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上讨论的。我们在这次运动的后期就要选举代表参加这些会议。现在，我提议今天下午开全村大会，让王喜堂明确地对大家讲一讲丈量土地的目的。”

委员会对集中在村政府办公室的丈量土地的工具进行了检查。工具中最重要的是木“弓”，看起来象一个大型的音叉，杈端之间约距五尺。村里现有九个“弓”，王喜堂把每个“弓”都以从区公所拿来的标准“弓”为准进行测量。结果发现，十里店的“弓”比标准“弓”要稍大一些。经大家同意后，叫来一个木匠，比着标准“弓”，把村里的“弓”的每个杈锯掉了二分。

一小时内，“弓”被锯短的消息传遍了十里店。这就打消了人们普遍存在的通过丈量土地减少负担的希望。随之而来的是担心把“弓”锯短后，丈量土地会使负担增加。

下午村里开会时，群众集合的速度比工作队见到的任何一次都快。这也是运动以来群众到会最多的一次，气氛紧张。不仅是因为丈量土地和负担有紧密关系，也是因为这是过去地主、富农欺骗农民所采取的方法之一。因此，丈量土地就成为不涉及到具体问题就引起了强烈感情的一件事。

王喜堂宣布开会的目的是组织大家参加丈量小组。很快爆发出一阵喧闹声。

“没有必要丈量所有的地！”一个人喊道。

“我的地的产量估得太高了！我要求量一量。”另一个人喊道。

“要是你的地瘦，你可以提出要求。”第一个发言者反驳。瘦

地的实际面积或估计产量比登记数字小；而肥地则恰恰相反。”

“那些地瘦的人自然会提要求的，可是地肥的就不吭声了。”

“那旁人可以把他们的肥地报出来的。肯定会有人知道这种情况的。”

“不，我们还是丈量所有的地吧，我们村的产量估计得太高了。如我们好好丈量，可以把产量降低些。”

这些议论启发了王喜堂。他站在庙廊最高的台阶上，对丈量土地是为了减轻负担这种想法提出了批评。

“丈量土地是为了做到公平合理、不是为了减轻负担。”他最后说，“我们必须做到公正和实事求是，我们必须从一行地边豆量到另一行地边豆。”农民们在每一块地边的犁不到的地方种了一些豆子。

“如果我们发现哪块地的面积或产量登记错了，”王喜堂说，“我们可以报给区里。现在，让我们就丈量这件事表决一下。”

“最好让群众先酝酿一会儿。”罗林平静地提出建议。

“酝酿酝酿！”院子里充满了嗡嗡的兴奋的议论声。最后，议论声消失了。王喜堂又一次登上了台阶。

“同意全都丈量的站到东边。同意只量肥地和瘦地的站到西边。”他喊着。

人们纷纷移动凳子和砖头，通过站地投票。没有必要点数，五分之四以上的农民站到了西边。只是瘦地和肥地要量一下。前一天的决定完全被推翻了。

下一件要决定的事是怎样报瘦地、肥地。大家同意当场开小组会，各组成员报自己的地是瘦地还是肥地。如果谁有肥地不报，组里其他人可以代报。但也不得对有肥地不报的人进行

指责。

这时，王喜堂看来是完全不知所措了。显然，推翻丈量全部土地的决定，使他大吃一惊，也使他很不满意。当一个代表走上讲台，要提一个小组里的问题时，王喜堂要他去其它三十个小组了解情况。他想对作出的决定再次进行讨论，看是不是存在什么误解。但罗林干预了，他说王喜堂在他自己的讲话中已把这件事说得很清楚了，不可能有误解，群众显然不愿花时间去量每一块地。说到底，各种现象表明，村里大部分土地既不是肥地，也不是瘦地。

王喜堂仍然坚持说：“可是，也得在新的村政府领导下丈量一次，对不对？”

“对，”罗林说：“但这可以在更合适的时候丈量。群众最近开会花的时间很多，而且还要开不少会讨论填“窟窿”的事。我们应该留给群众一些时间种完棉花。”

王喜堂保持沉默。看来，为了他自己的威信，他要执行丈量全部土地的决定，以便向对此有所怀疑的贫农证明，村里的工作是在他的意见一致，值得自豪的领导下进行的。新当选的干部如赵正方和王文盛缺乏经验，但王喜堂是一个已任职多年的干部了。可是他没有能正确领会群众的想法。看来，他脱离群众了。

过了一会儿，他心中的好奇心战胜了屈辱，他跳下庙廊的台阶，去和群众谈话。他从一个组走到另一个组，他到处受到友好的欢迎，也总能说出一些贴切的话，他不断听取意见。现在，他开始弄清情况了。

酝酿结束后，各组代表作了汇报。王喜堂又一次讲话：“我刚知道一点为什么你们对量地改变了主意。看来，这是因为你

们担心我们准备用的‘弓’比过去的短了，这样量的结果，土地面积看来要大于实际的面积。那些本来想通过量地减少负担的会盘算的人，一下子又开始担心，由于用的‘弓’短而可能要使负担增加了。

“现在，我们都知道，量地不是为了增加或者减少负担，而是为了公平合理。要做到这点不是靠‘弓’，而是凭良心。

“我们把‘弓’锯掉二分，想的是我们的‘弓’应当和区里的标准‘弓’一致。现在，我们不准备量全村的地，只量肥地、瘦地。这不是为区公所量的，而是为我们村备案用的。所以，这二分是小事，你们不用担心。”这番声明使开始时气氛颇为紧张的大会平静地结束了。农民们的希望和担心，王喜堂的急于辩白，种棉花的时间不能耽误，各种矛盾都交叉在一起了。

由于大多数党员是新中农，许多又是干部，他们最容易买到肥地。现在，全村都在报地，他们就热诚地汇报自己的肥地，也报别人打算隐瞒的肥地。

支部书记王绍贞在村里是第一批中自报有肥地的一个。在废除封建制度以后，象王绍贞那样辛勤劳动的、进步的翻身农民，往往通过苦干使自己的地“肥”起来。开垦荒地的，把梯田往山顶越开越高的，在世代荒芜的坟地上种上庄稼的正是这些人。边区政府通过在一段时间内对新开垦的土地不征公粮，奖励了这种进取精神，但是，由于对新开垦的土地面积没有登记，因而使有些地成了肥地。

1948年3月27日，各丈量组开始工作，把土地面积记录正确。六个丈量组分别由两个算账的（每人有一把算盘）、两个或三个丈量的（带有丈量用的弓和绳）、一个记录员，还有贫农团监督丈量的代表组成。在大多数情况下，自己的土地将被丈



由会计、土地的主人和丈量人员组成的土地丈量队。



去丈量土地。

量的人陪着丈量组活动。

早饭后，各丈量组愉快地到村公所外集合，听取负责丈量工作的村长赵正方作最后的说明。写有“十里店村政府土地丈量委员会”标记的量地“弓”都一一作了比较，验明全部符合标准。

丈量王绍贞的地的那个组里包括李宝武，他是寨上油坊的主管，尽管人们对他的经营有所指责，但当有所需要计算时，此人还是不可或缺的；还有一个是早先的布贩，他是以善于摆弄尺子见长的；还有两个是早先的斗争对象。在这两个人的衣服背上还别有斗争对象必须别的布条标志，但他们能参加丈量组表明，他们现在已被接纳为社会的成员了。

对丈量组进行监督的贫农团的代表也别着一块布条，但这是一块表示他曾荣获“支前英雄”称号的布条。它的标志是红色锤子和镰刀，是缝在胸前的衣服上，而不是别在背上的。

用“弓”丈量土地。





一个土地丈量组在地头上。

丈量组穿过遍布着鹅卵石的干涸的河床。他们先丈量由王文盛父亲——胡子雪白的王义报的一块瘦地。当他们走到对岸的那块地时，王义解释说，他是和傅高林一起买这块地的，这块地本来是应当他们俩均分的。老人说，“可傅高林当时是村长，而我靠卖馍为生。所以，我能怎么办？”

“哪块地大些，他的还是你的？”油坊主管问，故意逗那老人。

王义笑道：“你量一下就知道了。”

当他们走到地边时，组里很多人犹豫不决地站着。但贫农团的代表快步沿着地边走，然后回到地中间，站着察看地势。

“最好把这块地分成三块，量三块地的宽和长度。”他喊道。这是考虑到这块地的不规则形状而提出的量法。

大家同意先用“弓”，然后再用绳丈量。那个原布贩的尺子



王文盛的父亲王义注视着丈量他的土地。

本来插在背后，一头露出在衣领之外，现在他刷地抽了出来，熟练地量了一下绳子。这条绳子不仅因常用而便于拉直，而且两头还涂以红色，这样就不至于再被篡改。丈量员宣布绳子长二十五尺整。丈量组很快用“弓”量了分成三块地的长度和宽度，组长还不时提醒他们“走直，不要拐来拐去”，“一直量到豆子那里”。报出数字后，两个原斗争对象记了下来，布贩子和油坊主管打着算盘，在他们计算时，算盘珠拨上拨下响个不停。

王义的那份地是二亩三分，傅高林的是二亩三分半，多半分。

“好了，老汉，你总算没吃多大亏，”丈量组人员笑着说。

“嗯，可我那份地登记成两亩四分了。”王义说，“我听说他只登记了两亩。”

“现在他自报了他这块地肥。”组长说。显然，傅高林正在努力挽回乡亲们对他的尊敬。

“王绍贞自报他在山脚下的一块地也肥。”组长说，“现在我们去量一下那块地。”

当丈量组离开的时候，王义穿过河床回家了，边走边说：“不管怎么说，半分就是半分。”

王绍贞的地，正式登记的是八分，丈量结果是一亩三分；如他自己所说的——肥了。一个原斗争对象记下丈量数时，冷冷地笑了笑，好象在说，那些带头斗争他和他那个阶级的人，也不是什么模范人物。

组长为王绍贞辩护说：“从地势上看，这块地本来是八分。西边的那半块地是从山边开出来弄平的。我记得在开荒运动中，他在这块地里干时，流了不少汗。地当中的那一小片好地也是这样。原先那儿是两个坟堆。他可是一锹接一锹地开出了这片地。而有些人，”组长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却在议论鬼会跑出来毁掉庄稼的。”

土地丈量工作除第一阶段的讨论和组织动员外，用了几乎两天时间。这项工作于3月28日结束。对此，工作秘书队在日记中写道：

丈量结果，有的地比原先登记的少些，有的多些。总的来说，没有多大的差别。产量评议委员会的工作结果也是这样：与原来估算的相差无几。这些结果对填补窟窿都没有多大影响。

但是，整个丈量活动还是起了开动村里不断完善的民主机器的作用。群众对丈量的真实想法，是深入到人民小组及其代表之中才了解的。成立土地丈量组和产量评议委员会，使新

干部在组织工作方面取得了经验。吸收原斗争对象参加丈量工作，也有助于全村团结。丈量的结果也是如此，它根除了贫农对中农一向存有的这样那样的猜疑。此外，党员带头自报肥地，从而为重新取得村里的领导权又前进了一大步。

摘 帽 子

在抗日战争中，村里有些农民曾向敌人提供过当地共产党员的名单和游击队活动的情报。到1944年，大汉奸之一——地主王邦彦已被捕获，另一个名叫傅守良的也受到了怀疑。通过一系列事件，老文堂——十里店的一个老实但容易上当受骗的治安员，开始怀疑村里一大批农民是特务。狡猾的傅守良想方设法劝告这些无辜农民去主动坦白并公开认罪，说不然就有获罪的危险。但一当他们主动坦白以后，公安干部就要这些假特务供出他们的同伙来。最后，他们的乱供大约涉及到七十个本村农民，从而造成了至今谁也理不清的一团乱麻的局面。

工作队没有提出重新审查特务——确定谁是首恶分子，谁是偶入歧途的、受骗的，谁是假的。要对有关个人是否有罪——进行详细调查，势必会把运动的发展引向过去的事，而不是面向未来。但摘掉那些受牵连的农民的“特务帽子”——耻辱的标志——的时机已成熟了。同时，也是应该摘掉那些通过劳动改造改变了自己阶级成分的斗争对象身上挂的布条的时候了。

冷冰已基本结束了教育党员工作，转而来搞戴帽分子的处理工作。必须做一些工作使事实得到澄清，使那些认为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不再背包袱。真正的错案应予纠正，但公

正并不意味着是以牙还牙。目的在于恢复名誉，鼓励现在支持民主改革的人们，在村里的政治生活中起有益的作用。

冷冰是从审查案件的主要事实依据开始的。他把这项任务分为三步。首先，他和一些有关的人谈话，包括两个从外村召回的人。一个是老文堂，那时，他是村里的



背上缝有一块白布作标记的“斗争对象”。

治安员，现在是区干部。另一个是王在寅，他在1944年任该村党支部书记，现在，在县城一个国营企业当干部。

从他俩和其他十多个农民介绍的情况里，冷冰逐渐串成了一个真真假假的叛徒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只有少数最坚定的分子才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抱有必胜的信念的时候。他开始看清了前国民党村长和暗藏特务傅守良，为保护自己，打击对手而织成的阴谋网的轮廓。

在第二步工作中，冷冰召开了由六个下台干部和在职干部参加的会议；原干部介绍了事情发展经过，使现任干部有所了解，从而有助于更有效地管理全村。

会开始时，要老文堂大致讲一下当时的情况。经他说明以后，情况就清楚了。那些象他那样老实、好心的干部，当时主要注意的是保卫受到沉重压力的村子。那时，一连两年灾荒，日军正进行扫荡。老文堂在斗智方面显然不是狡诈的傅守良的对手。

冷冰然后对当时有关的主要人物的动机、利害关系进行了分析。会上，其他人又提供了更详细的情况。冷冰接着指出了四年后的今天解决问题最有效的途径。“我们不能再继续错下去了，”他说，“我们重视的只能是那些已经证实的事实。我们已证实了王邦彦和他的同伙是汉奸，我们知道傅守良也有罪责，而别的一些人则犯了造谣和诬告的错误。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能证明他们有叛变行为。显然，过去工作中犯了错误，这是应该承认的。但是，现在是摘掉他们特务帽子的时候了。如果今后再发生任何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必须提交上级处理。”

在处理特务案件的第三步工作中，冷冰召开了七十名戴帽分子的全体会议。他又一次强调，处理问题的方式应是医治旧伤，而不是重揭疮疤。虽然，他承认过去的工作中有错误，造成冤屈，但他没有走向另一个极端，没有说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是毫无干系的。无疑，其中一些人在某些指控中是有罪的。当务之急是他们要客观地检查自己。那些无辜的应立即恢复名誉。那些犯有错误的，对大家，包括他们自己，都可以作为一次教训来记取。

“我们要求你们自己说，你们觉得给你们戴的帽子是真的不是。”冷冰最后说。

会上二十多个戴帽分子发了言，有些人发言冗长，有些人

则寥寥数语。一些人显得激动不已，一些人则冷静自如，甚至不无幽默之感。这些人中的一些人，在“割封建尾巴”运动中被定为斗争对象，因而长期被排斥在群众性集会之外。对他们来说，这次会议是一次愉快的社会活动。相当一部分人乐于放弃一次捻线的好机会，而更多的人则因成了会议主角而沾沾自喜。随着他们发言的逐步进行，气氛明朗了，已被掩盖多年的详细情况开始揭开；由于害怕或羞耻而不敢说话的现在也开口了。随着这些村里能说会道的人畅所欲言时，他们戴了很久的无形帽子的份量变得越来越轻了。

虽然会议是在成功的气氛中进行的，但偶尔也有一些深深陷进去的人，令人不快地企图暗示自己是无辜的人。因此，冷冰在会议结束时说了一段既是警告又是许诺的话：

“不要忘记这个案子里真是有特务，也有人诬告好人。我希望那些与敌人勾结的人和那些告人刁状的人，能正视自己的所作所为。

“你们这些人几乎都有怨气，你们出气是对的。因此，明天我们要召开全村大会，当众摘帽子。”

第二天，3月30日召开的会议，不仅是要摘特务帽子的大会，也是第三次即最后一次划阶级的大会。庙院挤满了人，天气阴冷，人们显得特别严肃。会议开得很有效率。按照前两次划阶级的结果，把全村各户分别登记在六张名单上。这些名单中一部份是情况最简单、最平常的农户；另一部份是情况最复杂、争论最多的农户。一张张宣读和讨论这些名单，那些情况最简单的有可能很快通过，然后把大部分时间用于讨论情况最复杂的那些人。

要进行讨论的两部份人中包括原斗争对象。一张名单上列

有原先的地主和富农，另一张上列有曾被错斗过的基本群众。群众发表意见时，既不讲什么面子，个人成见也不再妨碍他们的判断了。

例如，在讨论原先的富农和白面(海洛因)贩子王英祥的情况时，有人提出，他曾被怀疑参加过还乡团。但一个老农说：“他并没参加还乡团，他过去是什么样的人和他的阶级成分是两个事。他的阶级成分是由他参加不参加劳动来定的。”

这个看法得到了普遍的支持。虽然农民们依然痛恨王英祥，他们还是同意他不能再算富农，因为他已有三年多不再主要依靠雇工来种地了。最后，把他定成了商贩。他做生意的资金已远远超过一般小贩的资金，他贩卖旧衣只是为了给贩白面儿打掩护而已。但他没有雇用助手，他甚至自己用扁担挑运东西。

与此相反，一个原地主的情况却被看得复杂了。正如有人在会上指出的那样，“他从不用肩挑东西，他用自行车驮。”在这个发言人看来，有这么一件惬意的交通工具，也就类似寄生虫了。但最后决定划他为剥削者，不是因为他有辆自行车，而是因为他雇了工。经过长时间反复讨论，他本人的成分被定为商贩。

这两个斗争对象都已按规定的劳动了一段时间，所以改变了阶级成分，前者是富农，需劳动三年；后者是地主，需劳动五年。最后，群众认为，十里店的剥削阶级分子中，只有两人还不能改变成分，不过他们也正处在改变成分的过程之中。

到吃午饭时，只有一小部分特别困难的情况还未解决。于是，大会决定把它们提交给贫农团、农会和村政府联席委员会(委员会两天后开会时处理了这些事)。

划阶级的工作最后终于按要求和目标完成了。如同工作队刚来十里店时所预见的那样，划阶级的结果不是使村子分裂，而是使全村更团结了。绝大多数人感到很满意，他们都是一家人了——都是基本群众。在整个村里，只有两家仍属于封建阶级。

被斗户(不论斗对或斗错的)总共八十四户，除两户未改变成分外，八十二户中有五十七户现在被定为老中农，七户定为新中农，十六户定为贫农。王英祥贩卖白面和旧衣定为商贩，另一户“由于历史复杂”，成分未定。

全村划阶级的最后结果(各阶级的户数)如下：

贫农	140
新中农	125
老中农(包括4户富裕中农)	148
工人	1
手工业者	2
商贩	1
旧式富农	1
工商地主	1
尚未确定者	1
共计	420

下午会上讨论了占十里店总户数五分之一的那些农户的问题：那些被斗户是斗对了还是斗错了，那些被戴上特务帽子的人是该戴还是不该戴。过去有些事做错了，在割封建尾巴运动时，当村长的王喜堂应对错误负相应大的一部分责任。在回顾历

次运动时，他说明了哪些错误是他的责任，哪些应由别人（有的是他的上级）负责，哪些是由于当时的客观条件造成的。

“当有人建议查祖宗三代，看他们是不是封建尾巴时，我并不担心，”王喜堂说，“因为我本人不会是斗争对象，除非查四代！”他接着说，“当然查三代肯定是错的，因为很少有人几代都那么穷。假如爷爷穷了，他就娶不起老婆，就不会有儿子、孙子。

“过去我犯了很多错误。”王喜堂最后说，“你们现在有权讲话了。不管你们认为我犯了什么样的严重错误，都要毫不犹豫地指明。大家都在这儿——工作队的同志、斗争对象、群众——你们都应给我帮助。要不，以后我还会重犯错误。

“但有一件事我是有把握的，这就是斗争地主和富农没错。这是咱们共产党的目的。问题是把清白老实的农民，把贫农、中农当作斗争对象斗错了。

“可是，有些人被斗是因为伤害了别人。他们也应该检查一下自己的行为。他们可能认为这场斗争完全是坏事，但也起了些好作用，即使是斗错的也罢。这对大家都是很好的教育。挨斗的人总做过一些坏事或者有些缺点。要是他很清白，就不会挨斗了。从现在起，谁不跟人民走，谁还想伤害和剥削人民，谁就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王喜堂想让一些原斗争对象知道，虽然他们从高利贷和剥削得来的收入不到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他们的行为并不是完全无可指责的。如果他们认为自己无可非议，他们就可能对村里人有怨气。他这样提到过去，是为了否定过去的道德标准，批判过去发家致富的手段，从而赞美改革之后能够实行的互助合作的方法。

王喜堂一說完，討論就開始了。醞釀了一會兒以後，人群中一個坐在大石頭上的老漢又象對自己，又象对大家說道：“只要有鬥爭，就會出差錯，這是免不了的。老是怕犯錯誤，就連鋤地也鋤不深，只能擦地皮兒。”

“事情就是這樣的，”他旁邊一人說道，“有時錯誤出在上頭，有時要怨我們的幹部，有時是我們自己的不是。要緊的是往後要儘可能把事情办好。”

“起初，我和大家一起參加鬥爭，”一個原鬥爭對象說，“我也分到了一份鬥爭果實。後來開始查三代，就把我和大家分開了。我不再是群眾之一了。我的心情很沉重。現在群眾又要我了，我就要儘力為人民服務。”

一些人對此表示同意，但王喜堂決心不要因為怕有人不高興而把問題滑過去。他對那個鬥爭對象說：“你是貧農出身，這不錯。可你離開了群眾，站到地主、富農一邊去了。是你自己把自己和群眾分割開來的，這你自己很清楚。你經常牽了毛驢上東邊敵占區，你說是去馱煤。我也經常在晚上爬上你的屋頂監視你，看你到底在幹什麼。我為什麼這樣做？你知道！就是因為你和敵人有聯繫。

“你再想一想吧。你好好吸取教訓了沒有？我現在告訴你：從今以後，再不要跟地主、富農坐一條板凳了，要堅決跟群眾坐在一起。把你趕過去的不是我們而是你自己脫離和傷害了群眾。要不，你會被鬥嗎？”

這個鬥爭對象啞口無言了。

停了一會，王喜堂接着說：“過去，我們犯了另一個錯誤。那就是讓那些定成階級敵人的人背上掛布條。他們走到哪裏，群眾見到他們就議論：‘看，鬥爭對象！’掛布條使他們和群眾

隔绝开来。这些布条不仅是一小块白布而已，也是压在他们身上的沉重的负担。

“虽然挂布条不是我的主意，我也要负一部分责任。现在，不能再拖下去了，是取下布条的时候了。你们愿意取下来吗？”他问那些身上挂着布条的人。

从院子各处传来了喊声：“愿意！愿意！我们愿意！”一只只手举了起来表示同意。

“取下布条对不对？”王喜堂问大家，“同意的请举手。”大家举起了手，喊着同意，点着头。院子里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

“那么，取下布条，把它们都传上来。”王喜堂说。

布条都扯了下来。有些是从人们手中传到主席台上；有些被揉成一团，用戏剧表演般的动作扔到台上。

一阵喧哗过去之后，王喜堂说：“谁想讲讲心里话，现在就讲吧。”

在第一批讲话的人当中，有一个人，他父亲替欺压老百姓的国民党军队的黄司令当过代理人。他们父子俩一度是同伙。这个人在村里的名声也很臭。他是村里“八大金刚”之一。他秉承那个司令官的旨意，掠夺和毁坏人民的财产，殴打和折磨人民。后来他参加过八路军。在上次运动中被叫回来向群众作检查。是1947年8月回到村里的。

“我的布条还很新，”他说，“我很少挂着这个。与其带着布条亮相，我宁愿不走出家门。在我的名字下写着‘头号大破坏分子’。它几乎要了我的命。”

■他总结了过去的的生活，承认了他对人民造成的危害。他承认自己参加八路军，是想以此保护自己和家庭躲避愤怒的群众运动的风暴。但他在部队受到的政治教育，使他对过去的行径

感到后悔，真心愿意为人民服务。在上次改革运动中，他的上级命令他回村“向群众低头”。

“我回来时，”他说，“我想悔改，但群众不理我。我孤立了。这就迫使我回想我干了些什么。我开始认识到我是有罪的人。”

“我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想，‘一切都完了’。但现在，我发现十里店的人仍然需要我。我感到自己就象一个突然被释放的囚犯。我希望你们批评我，指出我的错误。”

“你们有些人可能担心，我最终会报复那些杀我父亲的人。没有必要担心。我担保这种事永远不会发生。”

这番话给群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群众仍保持一定的警惕性。许多人亲身吃过他或他父亲的苦，他们对他的话还是半信半疑。

另一些知道他如何卖力地为军属耕地的人，感到他态度诚恳。但一些农民还持观望态度，互相耳语：“好，让我们看看他是不是能改造自己。”

王喜堂对未来充满信心，这是无疑的。但他也不打算把过去的事草草了结。“他把自己的问题说清楚了，”王喜堂说。然后，他转而补充道，“不管怎样，你还得反复检查自己。我保留了你的问题的记载，我要交还给你反省。”然后把有关他的罪行的书面材料都交还给他本人，象征着既往不咎。

勾销往事是会议接下来的主要内容。“不管过去你们应不应该挂布条，现在是你们所有的人都应回到你们自己的阶级中去的时候了。”王喜堂说，“从现在起，我们大家都属于劳动阶级。我们都是一家人了。我们可以公开、自由地在一起说话了，就象我们是兄弟姐妹、父老叔伯、婶子、大娘一样。”

还有一项任务是摘掉特务帽子。曾在案件发生时当治安员

的老文堂站起来说话了。他承认，他不太了解当时村里各派干部之间复杂的关系。他上了傅守良的圈套。他还承认，他对有嫌疑的人施加了压力。因此，无罪和有罪的人最后都写了坦白书。

“我召集他们开会说，‘如果你们曾经受骗误入歧途，你们必须坦白。’起初，大家都不吭声，时间过去了，没人说一句话。天渐渐黑了，他们觉得就这样也不是事儿，不说，我是不会放他们回去的。因此，他们开始瞎编故事，写了坦白书。打那以后，他们戴上了特务帽子。实际上，只有个别人，象傅守良和王邦彦才真有罪。

“我的意见，现在应该把过去给他们戴的帽子都摘下来。”

现在十里店的生活和特务案件发生时已大不相同了。1944年，灾荒使村里农民又穷又饿。战局也不妙，看起来，好象日本人会打赢。现在，日本人已赶走了，国民党尽管有美国人支持，却接二连三地打败仗。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繁荣。而且，几天之内，十里店剩下的窟窿将被填补起来。

“现在，一件件事情都弄清了，所有的帽子都摘掉了，”冷冰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但要记住，有些曾经被列入名单的人，甚至那些无罪的人，也并不是什么缺点都没有的。特别是，有些人养成了随意说别人坏话的习惯，这就是工作中犯错误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是傅守良钻了空子，他利用当时干部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原干部和新干部之间的不和。他和他那伙人尽量夸大分歧，挑拨离间。结果，群众受苦了。

“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象这样的一起特务案是怎样冒出来的？”

“我们知道，国民党正在不断地派特务到我们解放区来，这就有了发生这种案件的可能。如果不是国民党捣鬼，大家就不会受这个屈。

“记住，今天情况还是如此，国民党还要偷派特务来。所以，共产党员和群众都要提高警惕。发现什么情况，必须向政府报告，这些事将由有关部门处理。”会议在提高警惕的号召下结束了。

模范家庭妇女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村里的妇女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在解放区其它地方，上至中央委员会，下至村政府，妇女在政治和行政机构里担任着各种职务。但在十里店，没有一个妇女被选进村人民代表大会或新的村政府。

在纺织运动中，十里店的妇女曾在武安县得过头一名。诸如此类的成就，通常应为社会和政治的进步创造条件，但“割封建尾巴”的运动阻碍了妇女的进步。地方妇女组织里最积极、能干的成员是一些老中农，但她们被迫辞职了。这是这场运动中为反对老中农这个阶层所采取的措施中的一部分。妇女失去领导后，听任自己的组织走下坡路。她们退回到自己家庭的小天地里，目前看来，似乎要永远屈服于封建传统的沉重压力了。

工作队进村时，对当地这种情况没有思想准备。他们在第一个星期里访问了贫农之后，不打算直接发动妇女，而是希望通过男人们做工作，吸引她们参加到运动中来。在那段时期，这种方式是行之有效的，妇女们参加了各片的贫农组，参加了划分阶级的工作。八十名妇女成为贫农团员，四名被选进了贫农团委员会。这些妇女又成功地发动了许多妇女加入了农会，使农会成员中有三百多名女会员，而且有三名妇女被选进了农会委

员会。

但是，这些妇女之所以当选，并不是由于她们的政治活动，而是因为她们具有温良、顺从和勤俭的传统美德。其次，男人投票选出这些妇女以后，看来也就把她们忘了。在委员会任职的妇女，常常无人通知她们开会。人们甚至不会注意到她们的缺席。这些妇女对这种疏忽非但不加抱怨，反而乐于有空闲的时间料理家务。

当组织农会时，原妇女会主任王香由于行为放肆而受到严厉批评，因而靠边站到她有改过表现时为止。她的倒霉的经历，连同那些对原来最积极的干部的胡乱批评，在十里店担任农会委员的妇女心目中留下了强烈的消极的印象。这些温顺的家庭妇女们深信，在公众活动中无所事事是一种美德。

妇女一边开会，一边把棉纱绕在纱框上。





工作队女队员吴舫。

三月中旬，武安九区工作团负责人张磐石说：“只是简单地把妇女吸收到各种组织里来是不够的，我们应当动员她们积极行动起来。起初，我们不太注意这个问题，现在要迎头赶上。”

工作队派了一名女工作队员吴舫去完成发动妇女的任务。她开始组织农会中的妇女在各片召开预备会议，计划在农会中成立一个妇女部。三月二十七日，召开了农会妇女部正式成立大会，虽然大会原计划在午后举行，但实际上等到四点才开始。甚至到那时，三百多名妇女会员也只剩一百五十名到会。

吴舫无法说服农会委员会的三名妇女委员中的任何一位出来主持会议。当初选她们的时候，没人说明她们以后还得张罗开会。最后，候补委员段福芝同意主持会议，她是个三十五岁的身材矮小的纤弱的妇女，带着有所考虑的泰然自若的姿态。她尽量提高声调宣布大会开始，尽管如此，站在人群最后的人

还是听不见她的声音。

段福芝用从工作队那里学来的方式，一开头就问道：“为什么我们要开这个会？”

“选举我们妇女的委员会。”坐在前头的妇女答道。

段福芝简短地说明了农会妇女部的作用和如何选举。

接着，工作队的吴舫讲话：“到目前，十里店的妇女在当家作主方面，还没有起到应起的作用。从现在起，你们要和男子汉们一起在村里当家作主。

“过去，你们组织了一些小组，是不是？这些小组是干什么的呢？”

“纺纱织布，做后勤工作，”原组长们回答。

“除了这些，你们还干了什么？”

“除了这些，什么也没干。”

“问题就在这里。”吴舫说，“妇女是干活了，但是在村里没有参加当家作主。从现在起，情况就会不同了。妇女也有财产权。每人有一份土地。妇女有发言权。你们有胆量发言吗？”

“有！”大家回答，但并不是很有信心的回答。吴舫指出，妇女应当有一个坚强的组织，这样，她们才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

大家同意农会妇女部应有九名委员，其中三名由农会委员会的女委员兼任。还有六名要选举产生，应从下街选四名，每片一名，另外两名从寨上选出。

吴舫说：“我们应当根据选农会委员的那四个条件来选。应选那些干活努力的，乐意为大家办事的，没有偏见，不传闲话，不搞宗派活动的妇女。我们不要选那些不正派的人。每个人都应该不留情面地、坦率地讲出候选人的缺点和优点。这

样，我们就可以从好人里选出最好的来。”

会议分小组酝酿候选人名单。寨上的那个组围着陈翠子坐着，她正坐着给孩子喂奶。她作为贫农团委员会的女委员，将同农会委员会的三个女委员一起，担任新的妇女部的工作。但她解释说，她不准备参加这样的活动了，因为她又怀孕了。她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参加一个妇女组织的领导工作。

寨上的其他一些妇女同意，有孩子要照管的委员们很难在公共活动中起领导作用了。“最好让一些刚结婚、没孩子的年轻人当委员。”一个妇女说道。

另一个补充说：“是的，选那些和婆婆住在一起的，能从家里抽空出来的。”时代变了，过去，过门的新媳妇听凭婆婆使唤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现在，也可以指望婆婆当儿媳的帮手了。

随着讨论继续深入，家务事成了中心话题。渐渐地人们开始研究实际问题。大家关心的问题是谁能抽得出时间，而不是吴舫列出的四个条件了。

开始选举时，寨上两个当选的候选人都是年轻的新媳妇。一个是二十二岁的王西玲，她那张认真的脸，文静的举止，与她那鲜绿色的裤子、深红的上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另一个是穿着粉红衣服的十九岁的苏惠泉，她是富裕中农傅继山的妻子。当苏惠泉得知她被选上了的时候，她兴奋地挥着手，显露出六个闪亮的银戒指和许多叮咣响的手镯。

从下街选出来的妇女没那么年轻。杨桂子二十五岁，带了两岁的儿子到会。军属李衡芝也二十好几了。和苏惠泉一样，她没有静静地坐着纺线或缝补，而是和身边的人们谈笑风生。另一个当选的是三十多岁、有四个小孩的妇女。第四个当选的

叫靳棠子，年已五十的慈母，有个十几岁的儿子。

接下来会议讨论吸收新成员的问题。一批提名都是在很少或没有什么争议的情况下通过的，突然间，一场争吵闹开了。

南头片的一个妇女提议吸收她街坊的三个妇女入会，寨上的妇女中传来了嗡嗡的议论声。她们中的一个喊道：“那号人！她们早先都是老财主的小老婆！”

她们三人原先的丈夫都是斗争对象，但现在她们都已离婚，改嫁给基本群众了。人群中开始争论起来，而没有分别讨论她们在原先的丈夫家里的地位和她本人是剥削者还是被剥削者。一些人指责南头片的妇女想把一些不够条件的人塞进来。不一会儿，就对南头片的缺点议论开了。

寨上的一个妇女对她的几个邻居说：“她们都是又懒又爱花钱的人。只要有一个卖烧饼的小贩从南门叫卖，她们就一个个从家里出来把烧饼买个精光。”

别的组谈的也差不多都是这些事。由于已到了妇女们要准备晚饭的时候了，吴舫宣布会议结束。在做小结时，她指出了宗派主义的危害。但很清楚，问题的根子太深了，不可能在当场就挖掘出来。消除宗派是新当选的委员会的迫切任务。

第二天，在十里店有名的模范儿媳资荻子家召开了妇女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遗憾的是，只要婆婆在场，一个模范儿媳总是不发表自己的意见的。因为资荻子的婆婆正在开会的屋子里的炕上一个劲地纺线，荻子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尽管她是农会委员，又是农会妇女部的委员。她从一个屋到另一个屋来回走动，忙着做家务。所以，她不但没有为会议作出贡献，甚至还不大了解这次开会讨论什么问题。

这间房和一般穷人的住房大不相同。对着屋门放着结结实

实、油光闪亮的方桌，两边摆着高靠背的油光闪亮的椅子。桌子上方挂着一面大镜子，院子映在镜子里。按迷信说法，妖魔进门看见镜子里的自己，就会慌忙逃走。桌上有两个画着蓝、白色花鸟的大瓷花瓶。现在它们已成了存放钥匙、变工牌和账目的所在。南边格子大窗下的炕占了屋子的一头。炕上有两架纺车，一大捆原棉和一只装满线轴的柳条篮子。荻子和她婆婆都是纺线能手。这个炕就是她们的作坊。

但眼下这炕成了开会的场所。妇女委员会成员上了炕，互通姓名和身份，因为彼此还有互不相识的。例如，从下街来的妇女都不认识寨上十九岁的苏惠泉。当她提到自己年轻的丈夫家和她娘家的男子成员时，妇女们有礼地说：“哦，那当然知道。”

这些妇女看来都对自己被选进委员会感到不安。他们都谦虚地宣称自己是不称职的，并列举了她们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寨上那个在前线打仗的战士的年轻媳妇衡芝说：“你们有男人在家的还可以。假如晚上开会，你们家总有人看家。可我当家的不在，我又住在村边上。来来回回开会太麻烦了。”其他妇女也深表同情。

另一个妇女说：“我不知道我那四个孩子该怎么办，两个大的老打架，两个小的也不安静。我离家一会儿就得出事，不知他们现在怎么样。”

五十岁的妇女靳棠子说：“我儿子真不知道怎样喂那头驴好，我得自己照料。”

沈新爱、区干部王承启的媳妇，要照顾她两岁的正在院里玩耍的女儿。她说：“我总是按时参加妇女会，想争取进步。但我担心，我当个委员还是太差劲了。再说，我那当家的大部分

时间在区里指挥部工作，他母亲又需要照顾，我一点时间也抽不出来。”

十九岁的苏惠泉笑着说：“没想到会选我当干部——我真不相信！我没有你们这样的困难，只是后背有点病。”不管她有什么病，她看起来很健康。

寨上另一个委员、二十二岁的王西玲说：“我太年轻。我们年轻人对村里的事不大了解。我担心自己会做错事。”

申婷子说：“我的困难是在众人面前不会说话，一见十来个人，我的脸就红了。”

一直静静地坐在炕后往线轴上绕线的一个年轻妇女说：“如果我丈夫从地里回来看到饭还没做好，他就会发火。这可是我的难处。”

由于议论的尽是担任工作的困难，吴舫开始问：“这些困难能克服吗？”

大家回答说：“能。”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各种建议也都提出来了。沈新爱对那个害怕做饭晚了丈夫发脾气的文静的年轻媳妇说：“他们大多数现在换了脑筋了。我们这个委员会可以和那些还没改的人说理。”

五十岁的那位妇女说：“我不懂你们年轻人为什么要害怕不会办事，你们学习读书写字还不晚。”

有人指了指愉快的惠泉说：“她已经识了好多字了。”惠泉听了，又高兴又不好意思。她谦虚地说：“说实话我识的字很少。”但这仍给妇女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她们之中有一个人是有点文化的。

申婷子对所有的妇女说：“我认为你们没有必要过份担心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有许多组长可以做些工作。”

吴舫同意了，又补充说：“你们之中有些人在家里就一个人，真是没有一个人不忙的。但你们不用耽心因此就没有时间做工作了。当然，我们刚开始组织起来是相当忙的；一旦事情办起来了，也不需要花许多时间开会。”

热情很高的惠泉对吴舫的话几乎每个字都作了同意的表示。其他大多数妇女也点头表示同意。一个妇女说：“即使开头我们干不好，我们也可以一起商量，互相帮助，解决问题。”

吴舫问：“你们觉得昨天的会怎么样？”

“那些引起一场风波的妇女究竟是什么人？”有人问道。

住在下街南头的那个战士的妻子衡芝回答说：“她们是从山区来的。”又补充解释说：“她们可是些难对付的人。”

“她们自称是女贫农。”杨桂子说，“如果不是寨上有人揭出了她们不光彩的老底，可要给她们蒙混过去了。”

衡芝象感到挨了批评似的，回答道：“不管怎么说，今年她们干活还是很卖力气的。”

“才一年呢！”有人喊道，“地主要劳动五年，富农要劳动三年才能改变成分。”

但是，这些女委员自己消除了这种宗派主义的表现。“我们要搞好工作，就要团结。”申婷子说：“我们这一伙人可不能互相埋怨。”

衡芝补充说：“如果我们要互相批评，我们就应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我们可不要在你我之间有什么误解。”

每个人都同意这点，这样那三个原先当过小老婆的妇女的问题就搁下不提了。

新委员们不太清楚她们应该做些什么工作，吴舫建议她们选一个主席和两个副主席来领导工作。

选举结果，申婷子得票最多，当选为妇女委员会主席。资荻子和苏惠泉得票占第二、三位，担任副主席。荻子负责下街的工作，惠泉负责寨上的工作。

委员会接着讨论了妇女部的内部组织工作。她们决定所有的成员都应在自愿的基础上，分成大约十人一组的小互助组。委员的第一个任务是建立这些小组。每个委员负责组织她所在那片的妇女。

当这些计划讨论完毕后，吴舫说：“到现在为止，妇女还没有积极参加运动，所以，我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

她的话被对此抱有反感的战士的妻子衡芝打断了：“男人们甚至连什么时候开会，在什么地方开，准备讨论什么，都不告诉我们，叫我们怎么能积极参加呢？”

吴舫对这种突然冒出来的发问没有思想准备。工作队在运动中的基本要求是，要求群众团结起来。

吴舫担心在男人和妇女之间造成不和，就说道：“我们不要因为造成这种情况而埋怨男人们了。我们有了自己的组织，我们可以安排和农会、贫农团及村政府的委员们开一次联席会，讨论我们今后要做的工作。”

沈新爱立即响应了这个要团结的号召，她说：“从现在起，我们妇女们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同男人们相处好。”

不管怎样，衡芝提出的是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但这个问题由于强调团结而被忽略了。农村妇女们不再遭受地主和富农的压迫了；尽管象资荻子那样的年轻的媳妇们可能对她们的婆婆百依百顺，但她们已不再受婆婆的压制了。

但是，即便政治上最进步的男人们，也还没有克服他们对妇女的优越感。正因为是如此，他们从一开始就漠视妇女应另

外组成贫农组的建议；正因为是如此，他们在各种会议上，打断妇女们的发言；也正因为是如此，使选举妇女参加各种委员会成为一种形式。况且，打老婆的事还不时发生，虽然是极个别的。总的来说，公开压迫妇女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但男人和妇女的封建思想还有待克服。“如果妇女积极参加这些使男女相互平等对待的会议，”吴舫说，“并且坦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她们很快就能使男人们信服，她们也有能力一起当家作主。”

会开完了。那天下午，新的妇女委员们开始访问她们各自片里的妇女，说服她们组织起来，在运动中发挥作用。

查窟窿找补丁

3月24日——4月3日

在象十里店那样的穷山村里，要找到一些补窟窿的补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还有一些贫农需要翻身外，一些过去被“打翻在地的”地主和富农，现在也应公平地分到一份土地。其次，对大约六十多户本来不应挨斗的被斗户（绝大部分是中农）来说，现在也要进行一些补偿。但不管怎样，必须在十里店找到更多的或土质较好的土地分给这三类人。否则，他们的生产能力就不能充分地利用，他们的土地的平均年产量就达不到土地法大纲规定的公正的标准。

从地主或富农所有的土地中再也挖不出地来了。事实上，这些原剥削阶级的人，现有土地的平均产量已低于贫农。多余的一些土地是在勤劳的中农手里。而党已经明确表明，不能用强迫的方式来侵犯中农的利益。

全村共有四千五百多亩地，总产量为四千三百多石。人口为一千四百二十七人，平均每人三亩二分地，每人平均产量为三石。按照阶级划分，实际上按人分类的数字还是不同的：

	老中农	新中农	贫农	原地主和富农
每人占有土地	3.52亩	3.07亩	2.72亩	1.80亩
每人平均产量	3.44石	2.87石	2.51石	1.66石

上面这张表说明，只有老中农占有的土地和平均产量高于村里的平均数，占地面积约高于16%，产量约高于13%。但全村只有三分之一农户是老中农，总的来说，他们的土地分配是比较均匀的。这就是说，只有少数几户老中农高于全村的平均水平，是可以提供填窟窿的补丁的真正的“土墩”。因此，和需要填补的窟窿数相比，高出平地的土墩又少又小。

随着问题的性质越来越清楚，工作队的成员在采用什么办法解决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一些队员认为，十里店可以照搬山西北部黄家村的做法，那里的贫农所得的一份土地比平均水平要高。《人民日报》刚刚详细报道了黄家村的运动情况，还有毛泽东写的关于要仔细研究这一情况的推荐文章。

但工作队的其他成员对此不予同意。他们认为，十里店不应照搬那个典型，因为黄家村的地主、富农占有可供分配的土地。分了他们的土地，贫农可以得到高于平均数的土地，而且中农连一亩地的利益也不致触动。但在十里店光是要做到平均占有土地，就要触动许多中农的土地。工作队最后一致认为，如果把全村贫农占有的土地面积提到高于平均数的水平，就会出现左的偏向。

然而一些工作队员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说，保证不损害中农利益的最好的办法是，根本不必要求他们交出多少土地。村里有些属于村里、县里的公共土地，有些地的主人离开家乡多年或成了绝户，仅仅这些地就能用来填补窟窿。

在工作队长罗林的引导下，这个解决办法也被否定了。在不能从中农那里有所索取的情况下，完全依靠明显不足的来源解决问题是不现实和无原则的。从长远来看，这达不到团结的目的，因为这会使贫苦农民得不到翻身，因而这样做反而影响

了将来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最后罗林自己提了个建议。他提出，补窟窿的目的不是把窟窿户的土地面积和产量提高到全村的平均水平，而是提高到老中农以外的平均水平。按这样计算，每人占有土地的常年产量约为二石七斗二升，比全村平均水平低三斗。

这个建议被采纳了。“我们应加强贫农与中农之间的团结，这是对的。但是，绝对团结这样一种情况是不存在的。我们一定要把团结和斗争结合起来。在团结中农这个问题上也是如此。但是，这与斗争地主不同，这是一家人内部的事。”他指出，斗争的目标是那种小生产者的自发的狭隘、自私的倾向。

罗林要工作队懂得，要搞好补窟窿的工作，农民在思想、感情方面的问题必须正确地解决。

工作队在明确了自己在补窟窿这个问题上的思想以后，不是自己抓这项工作，而只是进行指导。找窟窿和补窟窿的实际工作，是由贫农团、农会和村政府的一个联席委员会领导群众进行的。

就象某些工作队员一样，村里的新干部中也有些思想问题有待解决。其中最顽固的思想问题是绝对平均主义的倾向，这在农民的思想意识中是根深蒂固的。

在讨论如何调剂土地的阶段，贫农团主席李宝有建议：“贫农和中农都是一家人，不是吗？因此，我们应当象兄弟平分遗产那样进行调剂。”

这个建议对一部分农民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它看来不仅要了点小聪明，而且也强调了团结这一重要不过的原则。但罗林很快就指出了它的问题。

“当一家兄弟分遗产的时候，”他指出，“他们一样样算——

土地、房子、牲口和农具，每样都得平分。但我们不想把十里店所有的土地、房子、牲口和农具集中起来平分。如果我们这样做，事情就乱了套了。生产就会长期停顿，我们不是加强了团结，而是导致混乱。这样做帮不了解放军的忙，而是帮了敌人。”

在一个看来没有什么恶意的建议中，李宝有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在整个运动中带有根本性的重要问题。调剂土地是为了抽象的公平或绝对的平均吗？罗林指出，这个问题产生于小农的狭隘眼界。他和工作队的其他成员有必要明确表明，调剂的目的不是只求平均，而是通过动员全体有能力、有决心的农民，在现有经济条件下做最大的努力，以提高全村的生水平。同时，调剂工作不单单涉及到经济问题，它还要打好一个坚固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村里各阶层的农民将在增加生产、赢得胜利的目标下团结起来。工作队不仅要把农民的注意力集中在十里店眼前的经济目标上，也要集中在国家的长远的目标上。

工作队反对那种要求把被错斗过的中农失去的一切土地、房屋、农具或衣服原物归还的倾向；但工作队说明，必须帮助他们解决当前的生产问题，这样，他们有可能得到比他们原先失去的要稍多或略少一点。

同样，那些多得了额外斗争果实的人，也不会象一些农民要求的那样被迫“吃啥吐啥”。但他们也可能被劝说交回一部分或所有的多余的东西。这里要再次强调的是，这样做对他们随后的生产能力有什么影响，也必须加以认真研究。

一旦工作队表明了反对绝对平均主义的所有论点以后，联席委员会同意，补窟窿的标准应是，老中农不计在内的全村的平均水平。

下一个任务是找到确定谁低于这个标准的方法。原则上大家同意采用曾在划分阶级时成功地采用过的自报公议的方法。于是，委员会就分几步开展工作：

1. 每个人民小组召开本组的十来户人家的小会。到会的人都可以提出自己是窟窿户。自报是窟窿户的人的名单送交每片的负责人；

2. 各片开会讨论名单。根据公议，同意、反对或修改自报名单；

3. 公议后的名单将交给贫农团，由贫农团从全村的角加以审核；

4. 贫农团的审核结果将由全村进行检查；

5. 村人民代表大会的三十一名代表，将和他们各自所代表的农户进行非正式的谈话，收集他们对审核结果的意见；

6. 最后，村人民代表大会将和联席委员会一起开会，以汇集全村人民的意见，并批准窟窿户的正式名单。

这六个步骤已在3月25日的全村大会上得到通过。王喜堂接着就自报公议应当合情合理的问题作了亲切的劝告：

“如果有人说他缺一头驴，我们会考虑他是不是真的需要；当然，如果有人说他缺一匹马，那就不好了。俗话说：

‘瓜无溜圆，人无十全。’

“重要的是要现实，根据具体情况自报公议。我们应当公正。我们应当象为自己打算那样为别人着想，我们既要教育人家，也要教育自己。

“举例来说吧，我们之中有些人从天亮苦干到天黑，挑的是满桶的粪。可有些人则是背着粪筐和粪叉在街上转，希望能

到处捡点粪肥。为了装得象是忙忙碌碌似的，他们甚至带着粪筐、粪叉去赶集，但他们实际上只不过是去玩乐一番而已。他们甚至还在集上买烧饼吃呢。

“假如这样的人认为自己是窟窿户，只是因为别人苦干以后产量比他的高，因此，他真正需要的不是补什么窟窿。这种人真正需要的是补自己思想上的窟窿。”

次日上午，三十一个人民小组开会自报。和往常一样，寨上的六个组在富农傅光原先的住家开会。一组在宽敞的厅里，另一组在高台阶上的廊房里，其它四个组分别坐在阳光普照的院子里。每组都有记录员，他记下每个自报是窟窿户的人自述的详细情况。

有人抱怨他的住房太小；另一个人则说他的土地特别差，想换些好的。有人说他缺犁；另一个则说缺耩。有些人自报时直截了当；有些人则羞羞答答，扭扭捏捏，要靠别人鼓励催促：“你当然是窟窿户，你象样的农具不就是一把锄吗？”“你没有自己的房就应该说嘛。你住的是你二叔的房，不是吗？”

除了这些议论外，没有什么讨论，虽然农民们都仔细地倾听每个人自报些什么。

当过职员、喜欢戴着眼镜大声读报给邻居听的傅志，今天早上犯了牙疼。由于下巴上捂着一块大毛巾，因此，他自报的声音很难听清。

“你不是有半条驴吗？”一个人问道。傅志恢复了原来的声音，他用宏亮、清晰的声调答复，他可是没有。

傅便则，早已克服了羞怯怕生而成为寨上贫农新积极分子之一，现在又张口结舌了。他曾经站在一边对记录员轻声咕哝了几句，说他缺些农具，少个水罐，但没有提缺地，因为害怕

别人认为他自私。他组里的一些人逗他：“便则，大声点！我们一点也听不见。你在小声说什么？你没牙疼吧，是不是？”顿时引起一阵大笑，因为便则的嘴里早已没什么牙了。

六个组同时开会，不到半小时，整个寨上的自报就结束了。每个组结束后，组员就走进客厅，坐在凳子上和砖上，等着开全片的会议。开会的时间到了。大约有六十个男人和三十个女人，女人们和往常一样坐在一起。

自报为窟窿户的名字一个个地念出来，连同他们自报的需要什么东西，由大家讨论。首先是土地和房屋，然后是牲口、农具、衣服和粮食。一些窟窿户还详细地自报了自己欠债的情况。

许多情况说得简单明了。经过短时间的酝酿以后，没费多少口舌就通过了。例如，一个小组酝酿以后，代表提到一个人时说：“应给他些农具，这是对的，但要毛驴的问题要等一等。可以交贫农团处理。”另一个组的代表说：“他整年干活，应该有钱自己买点农具。但应该给他补一间房子。”妇女们也同意应分一间房给他。这样，他的事就讨论完了。

七十四岁的李力慈的情况就不那么简单。他家缺劳力，家中只有他本人和一个十来岁的孙子。如村里人说的：“小的小，老的老。”现在，老人宣称：“我要说的只是我欠了一千元债，而且——我那布袋里要能再添点粮食就好了。”

“什么？”他的一位邻居叫道，“你去年秋天收了多少？”

“他不是窟窿户！”一个年轻人叫道。

这老人并没有心烦意乱。他大声吸了一下长烟管，笑道：“我正要说，我不是窟窿户。但在我们组里，他们一直说，‘有啥说啥’。组长说，‘老大爷，你需要啥就提出来’。好吧，谁

不想往自己袋子里添些粮食，嗯？”老人笑笑，四下看了看，脸上布满了皱纹和胡子茬。

下一个是李孟先，会上许多人都不认识他，因他十七年前作为一个身无分文的难民离开了十里店。从那以后，他在山西山区里当陶工，开垦山脚的乱石地。当他听说土地法大纲规定，他能在自己住地或回老家领到一份地的时候，他就决定回十里店。

讨论李孟先的时间比别人要长些。许多人都从旁边打量着这位白发老人。第一个发言的人总的来说，似乎同意了李孟先本人的意见。

“我们不能说他不是窟窿户。可是我们想，他在山区那里可能还有些东西，最好能把实际情况告诉我们。”

“对，”另一人说道，“我们不能凭主观。”

李孟先站了起来。他在山西度过的十七年生活，不仅使他的头发变白了，而且说话时带着晋东南口音，带着含糊不清的尾音和鼻音。当他说“我在那儿有两亩地，一点房。但我没法把它们搁在肩膀上扛回来。除这以外，我还有一张犁、一把锄”时，有些孩子因他的口音而取笑他。

“你还是得弄一封信来。应当让你山西的村长写封信给我们。这是规定。”

“我们可以让老赵给他们写信问问详细情况。”有人建议。

“为什么我们要写信？我们可不想去山里到处找窟窿填。”有人说。

可是，一般人认为，作为十里店的老住户，李孟先应在本村领到一份地，只要他没有在别处领到一份就行。最后决定，让赵正方发一封公函给山西李孟先所在的村子问明情况。

一位老年妇女对讨论什么问题不太清楚，但她确实知道人

们在申述一些要求和困难，并提出解决办法。她是十里店第一个自愿报名参加八路军的战士的母亲。她说：“我不需要什么东西。我的地已有人代耕，别的事也都帮我做好了。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让我儿子再回家一次。”泪水从她满是皱纹的脸上流下。

一个新近自愿参军的战士的媳妇想试着安慰她。“不要这样，大娘，他总有一天会回来的。你要记住，不让他在家过安生日子而离家出走是谁的错，是老蒋；恨那个蒋介石吧。不要哭了。”

接着，又讨论了别人的情况。有些人被认为是真窟窿户，有些人被认为是假窟窿户。最后，名单上的每一个人都讨论了。联席委员会综合了各片会议的结果，发现需要两百多亩地才能补上这些真窟窿户。这数字略低于村里可耕地的4.5%，但联席委员会的成员对此还是感到吃惊。他们担心，如果这个数字张扬开后，会引起中农恐慌。为避免这种情况，他们决定这些数字暂时保密，以后贫农团在审查各片交来的名单时，掌握的标准应比片里严格一些。作为准备工作，先派一些贫农团委员对那些看来最为可疑的自报的窟窿户进行侧面了解。

3月28日晚，贫农团开始正式审查，一直持续到次日早晨，晚上的会是开得够紧张的。尽管工作队员想退居幕后，当主席的李宝有还是请他们来帮助维护秩序。在晚上和清晨举行的会议上，一些原经片里通过的窟窿户被否定了。其中有些情况是与购买使役的牲口有关，这些农户把做的交易说成是欠了债，实际上这是一种投资。贫农团还发现，有些真的窟窿户是由于复杂的家庭关系造成的。例如，一个十九岁的青年抱怨他和专横的父亲合不来，想另立门户。这就是说他需要土地、房屋和农具。他的要求被提交到贫农团委员会。

一个更小的青年人也说，他也要独立生活，人们笑着告诉他

等着吧。“我只要一把镐和一把锄。”他坚持说。当一些人又好笑时，他哭了起来。另一些人想安慰他。有人解释说，“这是他姐夫的过错，他总是占这孩子的便宜，因为他是个孤儿。”当这个小青年得到问题总能解决的许愿时，他才渐渐地停止了抽泣。

贫农团委员会的委员自己也有要解决的问题；但当他们自己的情况作为自报窟窿户提出来进行审查时，他们感到很窘。贫农团主席李宝有说：“我家的境况也不是老不好。但有时是不好。这要看我修多少房子。假如你们认为我不是窟窿户，我也过得去；但你们如果认为我是，那对我来说可是帮助不小了。”

“他们又有了一个孩子。最好再给他们一点地吧。给两亩吧。”有人建议。

后来，当贫农团讨论村长赵正方的情况时，这个谦逊的人由于窘迫，什么话也说不出。李宝有是他的邻居，就出来帮了他忙：“在我们片会上，”他汇报说，“有些人认为村长应得四亩；有些人说三亩就够了。”

“给他三亩半。”有人建议。大家都表示同意。

副村长王文盛可能是新干部中最困难的一个，但他可没有这样一个邻居出来帮忙。他在本片会上甚至没有自报自己是窟窿户；他过于担心别人会怀疑他是利用职权谋私利。

会议结束前，出现了平均主义的问题。例如，有些人认为，由于某一个农民或他全家都是好劳力，通过帮助互助组里的他人干活而富裕起来，他们就不需要别的农户那样多的地了。他们的强劳力，可以使他们今后和以前一样过好日子。这种想损害那些劳力比一般人多或强的农民的倾向，是党批判过的平均主义的一种表现。由于工作队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到家，因此，贫农团拒绝把这个农民和他的儿子由于他们劳动积极而置于不

利的地位。

“为什么他们应该一辈子打短工呢？就因为他们是劳碌命吗？”一个人问道，“他们还有没有翻身的机会？”

最后，同意多给他们两亩地。

所有的自报情况都讨论过后，初步指定要补的土地总数是一百三十亩，比先前各片要求的两百亩减少了七十亩。批准的窟窿户半数是尚未翻身的贫农；另一半是原斗争对象。

在削减各片提出要补的土地数时，贫农团又成功地否定了一些假窟窿户。但它没有发现那些没有自报的真窟窿户——如王文盛。有真窟窿户而没有能自报上来，是工作中的严重缺点，因为调剂土地的目的就是解决贫农的生产问题。工作队和联席委员会成员访问了那些看来是窟窿户而没有自报的家庭。他们解释说，这将是最后一个使耕者有其田的机会。根据罗林的建议，在补足土地的估计数中另加了五十亩地，以备在发现这些情况时补上。

部分家访是成功的；一些农户被说服了，并向所在小组的人民代表作了自报，再由即将召开的村人民代表大会讨论。这种工作程序对发展村里的民主机器方面是有重要意义的一个步骤，因为新的村人民代表大会在群众和干部眼中确立本身应有的地位是很重要的。正如罗林所说：“新干部要学会如何依靠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来运用群众的力量。正是这些代表们最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干部学习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在收集了各个人民小组的每个家庭的意见以后，村人民代表大会的三十一名代表在4月2日下午、4月3日上午和联席委员会一起开会。这两个组织最后批准了窟窿户的名单。尽管会议是官方的权力机构，但会议只是开得比较郑重，并不铺张。

这次会议是在新的村政府办公的狭长的院子里召开的。

副村长王文盛在一个文书的提示下，从窟窿户名单上念一个名字。另一个文书报出这户已有的每块土地的名称、面积和产量：“一亩三分绿崖地，产量一石五；一亩九分燕沟地，产量一石；二亩砂崖地，产量一石一，”等等。接着劈里啪啦的一阵算盘子响，又一个文书做了计算，报出这户的每人平均土地面积和产量。接着，会议讨论要有多少地来填补这家窟窿户。

有时，代表们之间也有争执。有人对寨上的一名代表、青年榨油工傅长亭说的一番话提出了质问。长亭原来因他脾气暴躁挨过批评，他知道，他应当实事求是地回答这个问题，可这不合他的脾性。

“我很高兴接受你的批评，”他用生气的语调说，“我是组里的代表，如果我没有准确地传达他们的意见，欢迎你指出来。”

争执很快就过去了，不一会儿，傅长亭又象他往常那样笑嘻嘻了。但这是工作队早已注意到的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的一个方面，这就是有些代表不是表达他们小组的意见，而是利用职权发表自己的看法，为自己捞取好处。没有迹象表明傅长亭有这方面的问题，但他被人们质问这件事本身，却反映了人们对这类行径的警觉性在不断提高。这次质问也反映了仍在来自村里各方——寨上，下街，下街北头和南头，以及其它地区的代表们中间存在的宗派主义。在这方面，代表大会与贫农团相比显得落后一些。与贫农团不同的是，在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新中农、老中农；特别是后者，比贫农表现出更多的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

在偶尔爆发的宗派争吵或在讨论中出现紧张气氛的时候，女工作队员吴舫发现很难袖手旁观。她不止一次地出面揭露那

些她认为是为谋私利，而不是为自己代表的人民小组服务的代表。与此相反，罗林则是让争吵自己平息下去；然后平静地以寥寥数语提醒小组代表和村人民代表大会应负的职责。

当大会的两场会议结束时，宗派问题和新当选的某些干部追求个人利益的问题并未解决。例如，中农从个人利益出发，要求帮助他们偿还由于买牲口而欠下的债。有一些宣称自己是窟窿户的中农，就在最近还出卖了部分土地，因为他们顾虑当前这场运动的矛头是指向他们的，因而会失去部分土地。虽然他们的平均土地占有量是降低了，但他们还算不上是窟窿户。

另一方面，在由于揭露这些假窟窿户而发生的激烈的争论中，农民们逐渐丢掉了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爱面子的习性。在这方面，村里的党员表现得很突出。例如，在西中片，支部书记王绍贞揭露了一个自称为窟窿户，而实际上是由于新近买驴而欠债的中农。当别人都保持沉默时，支部书记说：“没有毛驴的人多的是。我们要不要让他们都登记上值一头毛驴价钱的窟窿呢？”对这个一针见血的问题，群众报之以一阵热烈的赞同。这一片别的人就再也不敢轻易假报了。另一次，党员王喜堂揭露他亲兄弟想把自己的住房换一间好的，而实际上跟别人的住房相比，他的住房还是比较宽裕的。

寻找窟窿的阶段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贫农户中的窟窿没有能都自报出来，部分原因是由于担心与中农发生矛盾；其次则是由于他们之中一些人对调剂能有什么结果表示怀疑。在过去的运动中，他们没有翻身；他们想，这次可能会分到一些费工、费肥料的赖地，几乎不值得耕种。

第二个明显的特点是中农往往夸大他们的窟窿。这部分原因是由于自私，其次则是由于误解。在对十里店全村的情况并

没有清楚地了解的情况下，象李力慈老汉那样说：“谁不想往自己的口袋里多装点粮食？”这是很自然的。

不管怎样，有些人确实需要增补一点。排除了假窟窿，发现了没有自报的真窟窿以后，明摆着还需要更多的地。到哪儿去找呢？

找更多的填窟窿的土

4月2日

罗林亲自指挥寻找填窟窿的土，联席委员会指定能干而且有经验的王喜堂，在这个需要妥善照料的任务中，掌管工作的进行。一开始，十五名党员给了村里大约三十亩地，这些地都是在早先的斗争中得来的。除此之外，他们还想归还所有作为斗争果实得来的房子和浮财。随着对党员的教育工作的开展，村里的这些党员越来越意识到，由于他们买去了相当一部分斗争果实，因而使许多贫农无法翻身。现在，他们都急于改正错误。

不久，又找到了六十亩地。有些是县或区的公产，有些是过去的坟地，有些是外出多年杳无音信的人留下的，有些是没有继承人的人死后留下的。（按当地传统，“无继承人的”地由为死者办丧事的人继承，因为安葬本应是继承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即使是接受了党员提供的那三十亩地，（实际上这并不可能，因为他们中许多人交出这些地后，就会成为窟窿户），再加上从其它方面得来的六十亩，还得再找八、九十亩地。

除此之外，唯一的来源就得靠中农了，他们的常年平均产量，比村里按人头计算的平均常年产量高得多。但是不能强迫

他们交出任何东西，只能出于他们自愿。他们不是斗争对象，甚至连“土墩儿”这个词儿也不是指他们说的。有“富余”的中农，只是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援助的兄弟。不管怎样，正在预备发动一场精心安排的运动，以便保证绝大多数有富余的人自愿作出捐献。

第一种对象是翻身过了头的人。可是，那些常年产量平均每人还不到三石一或稍多一点的户，还列不到这一类人之中。（村里所有阶级，除了老中农外，占有土地的常年产量平均每人二石七斗二升。）

第二种对象是占用了无主土地的人。但是，如果交出土地会使他们降到窟窿户的水平，就不要他们献地。他们的常年产量会低于平均每人二石八斗。事实上，应让他们有一定的余地，这样就不要求他们交出地了。

最后一种对象是那些明摆着有富余土地的中农，他们不是靠翻身过头或占用了无主土地而起家的。除非他们的平均常年产量超过全村老中农除外的平均产量（二石七斗二升）三分之一以上，否则也不是献地对象。换句话说，他们平均每人占有土地的常年产量在三石六斗以上，才会要求他们捐献土地。

各片的农会会员开了一系列会，动员这三类有可能捐献土地的人。在寨上4月2日召开的会上，大约八十个男人、四十个妇女挤在开会的会场。和蔼的工作队员耿西和区干部张青秀到会，但并未积极参加。会议主席是两个贫农——年轻的榨油工傅长亭、年轻但已掉牙的傅便则和在1942年灾荒中受苦最深的新中农党员李宝恩担任。

因为妻子正忙着做鞋，李宝恩只得一边抱着小儿子，一边主持会议。他说得很清楚，交出土地应是自愿的。寻找填窟窿

的土决不是一种斗争。他解释了哪些人属于那三种献地对象，指出了他们最低产量应是多少。最后，他号召自愿献地。

李宝恩在整党期间所经历的全面的自我检查和严厉的批评，大大削弱了他的自信心。因此，他的讲话只是照章办事的机械重复，而不是起鼓舞作用的号召。即使如此，也有人作了反应，新中农李启明当即站起来要求献地。

文书翻阅了放在面前的一堆土地账本，找到了李启明的名字，报出了他的土地名称以及具体的经济状况。打了一阵算盘后，他报出了这户每人平均产量是三石七斗四升。

最初，对他捐地大家意见是有分歧的。有些人说，他捐合适，因为他每人平均的产量超了三石六斗的标准。有些人指出，李启明的地不是通过多占斗争果实得来的，而是八路军来了以后，靠自己苦干和勤俭，攒钱买来的。另外，正如一个人所说的，他的地只是比标准多了一点点。“我们接受了他全部多余的地，也不过只有半亩。”最后，会议决定，由那些因多分得斗争果实和继承遗产而有多余土地的户首先献土填窟窿。就这样，这位勤恳的新中农献地的要求暂时被搁下了。

接着献地的是原富农傅兴，他一度是这个作为会场的这所房子的主人。显然，他不愿引人注目，因此，他悄悄地对李宝恩提出要求。但那位主席却坚持要他大声说。

“好吧，”他说，“我愿意捐出我的北池地，二亩二分。”他没有必要告诉大家那是肥地，人人都知道。傅兴尽管经历了所有的斗争，但不管怎样，他还是保住了自己的好地。

“你总共有多少地？总产量多少？”大家问道。

文书查了账。傅兴家有九口人，土地总面积是二十七亩三分，单位面积产量特别高。总产量为二十九石一斗五，平均每

人三石二斗四。因为他的地是一色好地，生产成本和力气就花得比较少。按当地标准，这家肯定是富裕户。

不管怎样，原则是除了那些翻身过头的或占了无主土地的人以外，只有那些平均产量高于三石六斗的人才应捐地。所以，起初大多数发言的人劝他收回他的要求。但傅兴坚持要这些在新社会掌权的人们同意他的要求。人们被他的决心说服了，接受了他捐的地。

热烈的谈话声充满了会场。傅长亭站起来在人群中走来走去。他喊道：“再来一个，下一个谁献？谁献？”

七十四岁的李力慈不久前错把自己报成窟窿户，现在提出要捐五亩三分地，大家只接受了其中的一亩八分。这样，他剩下的地刚好在标准线上。

尽管献地受到社会舆论的赞许，到后来献地的人越来越少，最后没人再献了。人们开始你看我，我看你，好象要看出谁有多余的地。

一些有多余土地的贫农引人注目地没有到会。例如，段寿有，他的土地比一般人多，人们到处找不到他。原先，他被寨上提名为新农会委员会的候选人，但在选举会上，人们批评他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全村的利益之上。他得到的选票是最少的。现在，他可不愿意交出多余的地，又想尽量避免人们批评他自私。因此，他就借口背煤离家出走了。

但寨上会议室的现主人，富裕的李为成参加了这次会。他家平均每人占有土地的产量是四石五斗。此外，他还有一匹强壮的好骡子。人们期待的眼光都转向他。最后，他站起来讲话了。

“咱们大家都同意，一个人有没有资格占有土地，就看他

是不是劳动。我想，在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我的地的由来。我那三兄弟原来每天花一块银元抽白面。最后把地全典当了，拿到二百七十元钱。钱花完后就去了山西。从那以后就不知下落了。

“我用汗水赎回了他的地。我闯关东多年，替人家当苦力，才攒够了付押金的钱。”

很清楚，李为成不想拿出地来。但人们知道，如稍加敦促，他还是会献出一些多余的地来的。但考虑到献地应出于自愿，李宝恩就建议他的情况暂不讨论。如有更多的热心人献地，那就不必难为不那么情愿的人了。如到最后仍然缺地，李为成的情况可以重新讨论。

在占无主地的人中，有些人自愿献地；有些人即使不需要这些地也不愿意献出来。

例如李欣，他为一个远亲老太太办了丧事，得了她的一亩六分地。会议开了不多会儿，他就主动地把这块地献了出来。相反，傅为山属于同样情况，却一直迟疑不决。当他看到再也拖不下去时，就很勉强地站了起来，用几分钟时间汇报了自有地的产量、面积和总的经济状况。然后，又坐下了，嘟哝着说，大伙认为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吧。李宝恩担心，如真把事情这么办了，这人以后会抱怨他献地不是出于自愿的。因此，他就让傅为山自己提个明确的意见。

傅为山眼看着躲不过去了，就说：“我那地没有一块适合种麦子。我愿意交出我自己的两亩地，留下那块无主地。”如他献出那五亩无主地，他家平均产量将低于二石八斗的最低标准，成为窟窿户。如他留下那无主地，他家每人平均产量将是三石五斗强，大大高于平均水平。他把自己的情况和暂时不作讨论

的李为成的情况作了比较：

“李为成在他兄弟死后赎回的地没有算作无主地，是不是？”他问道，“那为什么我叔叔的那五亩地要算作无主地？”傅为山的叔叔多年前就死了，把这地留给了儿子。后来，儿子又死了。傅为山把他安葬了。打那以后，地就归了他。

接下来的讨论集中到傅为山没有说清楚的一点上：虽然李为成确实得了他没有子女的兄弟的地，但他是通过辛辛苦苦的劳动才得到的。

傅为山带着怨气承认，这两种情况是不完全一样，他同意献出无主地。为了不使他成为窟窿户，大家提议让他只交三亩，正式承认另外两亩归他所有。

但是，当休会吃晌午饭时，傅为山发现他的事并未就此了结。最近，他刚和当选为妇女委员会负责人的苏惠泉结婚。她年方十九岁，漂亮、活泼。当她看到丈夫不太愿意捐出无主地时，感到羞辱难忍。她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批评傅为山，但回到家庭的小天地后，她就诉说了他的不是。

结果，下午刚开会，傅为山就站起来要求捐献剩下的两亩无主地。但大伙儿坚持上午的决定，指出不能因此而使他家成为窟窿户。

寨上和下街的会开了一整天。有时，献地的人或家属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斗争才献了地；有些人却毫不犹豫地、体面地献了地。

有些献地人提出了附带条件。寡妇邢爱芝缺劳力，献出了三块地。其中两块没有附带任何条件。第三块是坟地，她要求把它分给族里的穷人。

六十来岁的王成义献地时也附带了条件：“我愿意献出一些

地，”他说，“但我想献的那块地，是在阳邑塬上的那块。我现在上了年纪，不便爬上爬下了。”

另一个老中农经过仔细盘算后，决定献出一块地。这样可以少费劳力、少交公粮，他的损失不会太大。“我想我可以让出那块地，”他不露声色地说，“不过，我得把地里那棵树砍了，那棵树的木头可值钱。”

一个年轻的贫农生气地说：“这些老中农，算盘真精！多吝啬，连一棵还不及拇指粗的树也要砍了才舒心。”

“算了，”在他一旁的一位年纪大些的人说，“你要干什么，找事吗？”

另一个老中农帮着把事情平息下来。是他那片里头一个献地的人。这会儿他说：“我忘了说清楚，我献那块地连树也献上。”大伙儿都鼓起掌来。显然，大多数贫农都想表示他们和中农的团结。

接着这个老中农又提了个建议：“我想，对这些树我们得有个安排。结果的那些树不要砍，也不要砍比这细的。”他把大拇指和食指圈起来比了比说道。大伙儿都同意了。

土地面积高于平均水平的一些富裕中农仍不愿献地。其中有王喜才，他家的平均产量是全村最高的几户之一。“我的地产量还凑合，”他小心翼翼地说，“你们就想让我交出点来。可我有地，没媳妇。你就是有块挺不赖的地也难找到媳妇。”他伤心地接着说，“如果让我献出我的地，这辈子我就娶不成媳妇了。”王喜才苦笑着看了看会场四周。

“可不是，”一个三十来岁的新中农说，“这年月，找个媳妇比找地还难。”

大伙儿都笑了。王喜才的地还是照样没动。大家觉得他说

得在理。

即使他不献，献地的人也足够了。到4月2日晚上，各片都交来了献地人的名单，总共三十八户农民，自愿献出一百一十六亩二分地。连同从其他方面找到的几十亩，十里店填窟窿的土已经完全找到了。

填窟窿

4月3—7日

当村人民代表大会一致确认了真正的窟窿户，并相应地找到了填窟窿的土地后，离四月上旬的清明节已经不远了。清明节是当地播种主要作物——谷子的传统节日。这次运动刚开始，边区政府就同意在清明节第一天拥有土地者可以收那地里的庄稼。现在离播种只有几天时间了，不把地分好，就会耽误播种。联席委员会决定，除了填补窟窿、确定土地所有权外，诸如农具、布匹、衣服和粮食可以迟些分配。

4月3日下午，联席委员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同窟窿户一起开会进行分配，看哪块土填哪个窟窿。五个片先在庙里分别进行初步的分配。太阳火辣辣的，每个片都在庙院和屋里找了块荫凉地。南头片的窟窿户户主和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坐在亭子式的穿堂门檐下，迎着穿过敞开的庙门由山谷刮来的微风。寨上的六名代表和十来个窟窿户的户主，挤在一间小庙堂里。

村里的学校平时虽把这小庙堂当作教室，但这庙堂里还是塞满了香炉座、旧石碑，甚至还放着一具空棺材。孩子们在这里读书练字，并没有怎么注意到这些特殊的摆设。

有人把单子上窟窿户的名字一个个地念了。念的人就是过去富农的儿子李为书，他曾当过学校教员。现在，他又同村里

人成了一家人。人们都很乐意找他帮忙抄抄写写。他报出单子上的名字和个人的特殊要求时，举止谦恭又自得，报一个就稍停片刻，等着大伙儿讨论。

第一个名字就是他本人李为书。村里的土地账上，没有属他名下的一点土地。他没有什么耕地，只开垦了一些山地。这些山地是不算数的。所以，按规定，这个原富农的儿子是无地者。大伙儿建议给他家三口人九亩地。

他年纪轻，媳妇也年轻。有人就说：“他们劳动没问题。分给他一些好地，一些孬地。”

“我对能得到多少地倒不太在乎，”李为书插话说，“问题倒是这地分成多少块。几乎每个山头上我都有点零星地。去年，我上山下山，从一块地到另一块地，可把我累坏了。后来，我再也没劲照料庄稼了。”

一个饱经风霜的老农并没有因此心软，他以长者的姿态看着那个瘦高个的年轻教员说：“这就是说，你还得多吃得起点苦。”

另一个贫农则讲起了昔日的苦楚：“现在，你该知道我们过去过的是什么日子了吧！”

李为书点点头，再没说什么。

乡亲们都同意李为书应分三亩亩产一石的好地，四亩亩产七斗的中等地，为了使他更能吃得起苦，分给他两亩亩产五斗的孬地。这些新地收获后，这家的经济实力便会大大增强。李为书看来对这个决定感到满意。

南头片在庙门过道开会讨论曾贩过白面儿的富农王英祥的情况。王英祥也没有土地，但没有象李为书那样开垦荒地，而是靠亲戚过日子。大伙儿建议给他三亩地，总产量三石。

王英祥捉摸着是坚持原来的不满和蔑视态度好呢，还是看风使舵好。显然，他想，这种分法一定是搞了些名堂。

“这些一定是弄地，”他嘟哝着。

一连串的责问随之而来：“你这是什么意思？三亩产三石还不好？”

“当然是好地！”从当地标准来看，这些地确是好地。

“那……这一定是离村子远的地，一定是些零散地。”

大伙儿对他的怀疑笑了笑。但有人肯定地说：“不，不，你会得到一些好地，离村也不会远，别那么着急。”

王英祥胡子拉茬的脸上现出一丝冷笑，他不吭气了。最后，给了他两亩半全村最好的地、绿崖地，总产量两石八斗七升五，比最高标准还高一点。

新选的副村长王文盛在各片走动，察看情况。他正巧听到了那番话。他把王英祥拉到一边，告诉他，每件事都是光明正大的。但从王英祥的脸上却看不出他的话有无效果。

酝酿会结束了。一小时后，召集大会的准备工作全做好了。窟窿户的户主和村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及联合委员会委员一起挤在庙院里的荫凉处。一些人坐在台阶上和周围房子的廊下，其他人坐在院子里的砖上。邻近的一个屋子里仍然在上课。农会主席王喜堂在孩子们的琅琅书声中首先讲话。

“我们大家都要有阶级观点，”王喜堂说道，“我们都是阶级弟兄。天下穷人是一家。

“如果你对作出的决定不满意，你可以马上提出来，不要在会后再嘀咕。

“当然，窟窿户全都想要好地。可好地少，弄地多。所以，已经有好地或近地的人，如果分到了弄地、远地，也应该满意

了。已经有好地的再提要好地，也是通不过的。

“每人都应把自己的情况和村里别人的情况比较一下。”

王喜堂讲完话以后，在院子中间两张桌子旁边坐着的记录员成了注意的中心。其中头一个人宣读代表大会和联席委员会批准的窟窿户名单；第二个人按照登记簿宣读该户原有土地的亩数、产量和有关家里人口及家产的调查情况。接着，头一个人说明准备给该户补窟窿的土地面积和产量；第二个记录员顺着交给他的土地单子依次看下去，直到找到看来合适的为止，然后读出土地的名称，面积和产量。再由代表们和委员们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工作就按照这个程序顺利进行下去。

会议是由王喜堂主持的，村长赵正方和贫农团主席李宝有在两旁协助。在大部分时间里，缺少经验的赵正方忧虑地站在王喜堂的旁边，好象要从王喜堂的神态中吸取信心。这个新村长看来仍然很象贫农的样子。他穿着棉袄，有些缝开了线，因为他没有妻子帮助缝补。

工作队员不时出现在会场。一个工作队员经常到会场观察会议的进展情况，但不参加会上的讨论。

早先的讨论中提到了贫农榨油工傅长亭，他片里决定给他一块产量一石一的地。

拿着补地单子的记录员说：“这里有一亩九分王母地，总产量一石三。”傅长亭说：“他应得一石一的地，那块地比我们决定的地产量要多出二斗。”

但没有一块地正好产粮一石一。

“二斗产量不算什么！就这样吧。”大伙儿都同意把产粮一石三的那块地给傅长亭。

一个人在那块地名下写上了傅长亭的名字；另一个拿着

窟窿户名单，在傅长亭的名下写上了“王母地一亩九分”。

下一个是负伤的退伍战士赵唐子。这是王喜堂提出来的。“赵唐子是个荣退军人”。荣退军人是给过去在战争中负伤的指战员特有的称呼。“我们应特别注意他需要什么，他流血后身体弱。得给他就近的好地，一间好房和足够的农具。”

没人对此提出异议。“当然，这是对的，”“这是我们应负的责任。”在众人的轻声议论声中，提出了一个具体建议：“给他四亩七绿崖地，每亩产量一石一斗七。加上后山地三亩四，每亩产量九斗八。”

大伙儿都同意了，包括赵本人。连同他原有的土地，给他新地后，按十里店的水平，他肯定算是富裕户。

有些情况特别复杂。例如，王元德一直十分讨厌自己的父亲。他母亲去世后，他父亲又结了婚。他忍受不了家里的生活。他们决定分家，但儿子没分到好地。他现在是个窟窿户，而他父亲的土地常年产量却比一般人稍高。代表大会和联席会议提议，父亲应该给儿子两亩总产量两石一斗的土地。但有个亲属对此表示强烈反对。这件事只好提交给贫农团委员会，由它作调查处理。

在4月4日的会上，贫农团主席李宝有汇报了他的调查结果：

“我去了那家，和男女老少人人谈了话，才发现了事情的真相。我就把调查的情况告诉了委员会的委员们。现在，我们一致认为，让父亲把地分给儿子的决定是错误的。我们建议分给王元德两亩总产量为二石一的地，但应是零散地。”

贫农团的调查表明，这家由于宿怨和争吵已分了家，家庭内部进行了细致的调整。王元德的父亲和两个叔叔分担他们年

老的母亲的生活费，由三个儿媳妇轮流给她做饭。他父亲地里的部分收入，实际上是供养他祖母的养老金。所以，如从他父亲那里分走土地，他们几家就摆不平了，抚养老太太的问题就不好解决。

贫农团委员会认为，坚持原决定是错误的，提议从村里，而不是从王元德父亲那里给他一些土地。大伙儿一致同意了。这样，王家勉强作出的内部安排得以继续保持下去。

新回来的移民李孟先所在的片建议，李年纪大了，应给他好地；他又是个单身汉，应给他离家近的地，这样，他可回家做饭。片里的代表也指出，根据阶级成分的划分，他是手工业者，而不是农民。因在山西的十七年中，他主要是靠在陶窑做工谋生的，所以，片里决定，允许他仍然靠手艺挣钱。因此，不需要给他整份地。

但在大会上，有人指出，根据土地法大纲，在有地的情况下，单身汉可以领取双份地。土地法大纲中有这条规定，是因为农民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是家庭，单身的境遇特别困难。最后，会议达成了妥协的解决办法。给李孟先两块地：一块王母地，一块老坟地。这些地都挨着他在寨上的家，总产量刚过四石。

老人原先对回乡有些担心。他在山西的山里有两亩地，他担心回来后失去了那里的山地，将来没有后路。现在可好了，他能在幼年时的伙伴中度过自己的晚年了。开会时，他满意地坐着抽烟，邻居的一个三岁的男孩坐在他膝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可分的好地和近地越剩越少，有些窟窿户拒绝接受分给他们的地。当文书提议给王申川一块山地，补他缺的三亩地。王说：“我不要，我现在的地已够高的了。”他气呼呼地想朝大门口走。

文书又照土地单子读下去，建议分给他西坡地。但王申川摇摇头说：“我劳力不够。”很清楚，他不想要那些难以耕作的地。

有人问：“你不想要地，为什么把自己说成是窟窿户？”

这件事暂时被搁置一边，但王申川的态度看来开了先例，别人也跟着拒绝接受分给他们的土地。

经过几番拒绝后，在旁注意观察的工作人员吴象警告大家：“明年不会再象这样调剂土地了。你们还要不要地，现在要下定决心。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这种局面最后终于被党员王文堂打开了。分给他村边桃树沟的一块地，他一点没有异议，而是欣然接受了。

另一个以身作则的党员是支书王绍贞。他坚持要让出在上次运动中得到的两亩四分好地。现在他一家六口，拿出这两亩多地以后，还差年产量四石的地才能达到标准。

“既然他是个窟窿户，”有人说，“最好让他仍然保留让出的地。”

王绍贞表示他不同意收回，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政治威信比占有土地重要。但他缺的四石产量总要补足。最后他同意收回那块地，但要让出一部分作为邻地的走道。这样，他仍是个窟窿户。最后，又给了他两亩地。村里共产党员的行为和少数拒绝接受分地的人的表现形成了对比，这有助于重新建立党员的威信。

调剂土地的工作正好在春播前夕结束。第二天一大早，人们纷纷赶到地里干活去了。

眼前的紧急事办完以后，村政府开始着手解决填房子窟窿的问题。联席委员会委员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几天来搜集情

况，对村里过去的登记簿作了补充。从登记簿上可以看出，每家有几间房，但看不出有几间屋。有的一间房有一间屋，有的却有五、六间。虽然一家可能有好几间房，这些房子可能是通间，男女不能分开住。母亲得和成年的儿子一起住，公公得和儿媳同住在一个屋。

经过调查，自报的窟窿户加上查看登记簿所发现的情况，估计有六、七十家缺房，共需补充二百间屋。其中大约三十家为急需户。

在割封建尾巴的运动里，不少属于原斗争对象的房子准备将来用来分给贫农。但在分配之前，边区政府机关搬到了本地。有这样一些单位需要办公的地方：冀南银行，接待刚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学生和其他人员的招待所，接待解放军退伍的老兵、伤兵的中转站和解放区救济署。所以，十里店农会决定暂缓调剂房屋。因此，当时被称为封建尾巴的人，并没有将他们的房屋交给贫农，而是交给了边区政府。

这是1947年的春天的事。冬天通常是修旧房、盖新房的季节。但是1947年的冬天，正是推行极左的贫农路线达到高潮的期间，有条件改善住房条件的农民不愿意修建房子。他们担心很快又要来一次斗争，他们盖起或修好的房屋又会被收走。因此，十里店的住房状况越来越坏。现在是1948年4月，人们正想解决缺房户问题时，没人想到，到五月间，解放军会解放那么大片的土地，边区政府的驻地要向北移。村干部和委员们没有料到，成百间房屋很快就会腾出，因此，他们正为房子问题绞尽脑汁。在开了一次长时间、激烈的委员会会议以后，村长赵正方失望地说：“这半天，我宁愿挑几担粪到地里，也不愿坐着不动为这些事儿发愁。”

4月6日下午，终于把有多余房子，有可能愿意捐出来填窟窿的农民召集来开会了。那天晚上，五个片召开了会议。会上，每个人都可提出分房要求，有些人要求马上分房，另一些人要求调换布局对他们来说更为合适的房子。

妇女参加各片会议的人数比例特别高。显然，她们对住房问题尤其关心。许多先前不吭声的妇女，这次也壮大了胆子，自报了自家的要求。

遇到困难和有些不满是难免的，缺房户太多而房子太少。结果证明，不可能使每人都称心如意。个别窟窿户对提出的解决方案有意见。

赵正方显得担心，因为大伙儿对目前的做法不满，而他是村长。现在他又不能依靠有经验的王喜堂，他病了。

“我们可解决不了这么多问题，”赵正方叹息道，“只要喜堂不病，什么事都好办！”

“这不是王喜堂比咱们聪明多少，”李宝有不同意见，他没有那么强的依赖性，“这是因为缺房！他在这儿也会犯愁的。”

副村长王文盛同意房子问题实际上是不可能解决的。“我们所能分的只是一小碗清汤，”他说，“没有一点干货。”

但不管怎样，他们的工作还是使住房的紧张状况有所缓和。春天，边区政府搬走后，住房情况进一步得到了改善。以后，又一个农闲季节到来，农民们也开始修旧房、盖新屋了。

当天晚上，为了在清明节前完成调剂土地的任务，村公所的工作人员最后一次集中在村政府的房子里。这些房产第二天就要分给缺房户作为住宅了。屋里的油灯闪烁着，六个算盘劈啪作响。工作人员算出了调剂土地的结果，一直工作到深夜，准备好了打算张贴在全村各处的表格，以便使每个人都能见到

分地方案。一百多户人家分得了土地，共分了大约二百五十亩。

至于新中农，他们的情况稍有变化。一方面，一些翻身过头的自愿退出了一些在过去的运动中得到的土地；另一方面，有些窟窿户分到了一些土地。

在八十二个现已重返群众行列中的被斗户中，只有二十四户降为窟窿户。在调剂土地中，尽管他们只占得地户的不到四分之一的比例，但他们分到的地，占这次分配土地总数的近三分之一——八十一亩七分，年平均产量七十八石四斗。

尽管剩下的两户地主和富农眼下在村里是土地最少的，但也还能维持生活。本来可以再分给他们一些地，可这两家没有劳力耕种。

最后，老中农的每人平均年产量仍然比村里平均水平要高。过去，超出平均水平近五斗，现在，超出不足三斗。

1948年4月9日公布了这些结果。这天开全村大会很合适。雨虽然停了，地里仍然又烂又粘，没法干活。农民们很喜欢这种天气，他们说：“春雨贵如油。”大家都盼着好收成，这使气氛活跃起来了。

农会和贫农团共同宣布了土地和房屋的新所有权。于是，新的地权得到了公认，所有的旧地契作废了。

“分配结果肯定会有令人不太满意的地方，”王喜堂说，“这是难免的。连我们赶集买只布老虎给孩子玩，一边挑挑拣拣，一边还想，以后可能会碰上更便宜的。但我们大家一起办完了这件事。如果有什么办错的，只能怪自己。

“现在，我们要把全部结果向大家报告一下——需要多少房和地，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怎么分的。”

文书宣读了名单，群众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工作的成绩，情绪也越来越高涨。当王喜堂作以下宣布时，群众情绪达到了高潮：

“这张单子上的土地来自各个方面：有县里、村里的地，也有外流户的地和无主地。但有些地是从一个特别的来源得到的。这些地是我们的中农弟兄们自愿捐献出来的。他们的慷慨大度表明我们劳动人民都是一家人。他们对待贫农就象哥哥对待弟弟一样。现在我们要一个一个地宣读他们的名字。”

念出一个捐地者的名字，人群中就爆发出一阵掌声。

“中农献出来的这些地，”王喜堂最后说，“是他们辛勤劳动得来的。现在，他们自愿让出来帮助他们的穷弟兄翻身，这是高尚的行动！将来，如果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发生困难，我们一定要帮助他，照顾他。”

既往不咎

4月9日

原干部王克斌和傅高林的问题有三个星期没人过问了。由于他们的民愤极大，工作队认为，处理他们，会把人们的注意力从调剂土地所有权这个主要任务上，转移到他们身上去。

现在，窟窿总算已经填补了。于是，又在庙院里开会讨论他们的问题。工作队的冷冰首先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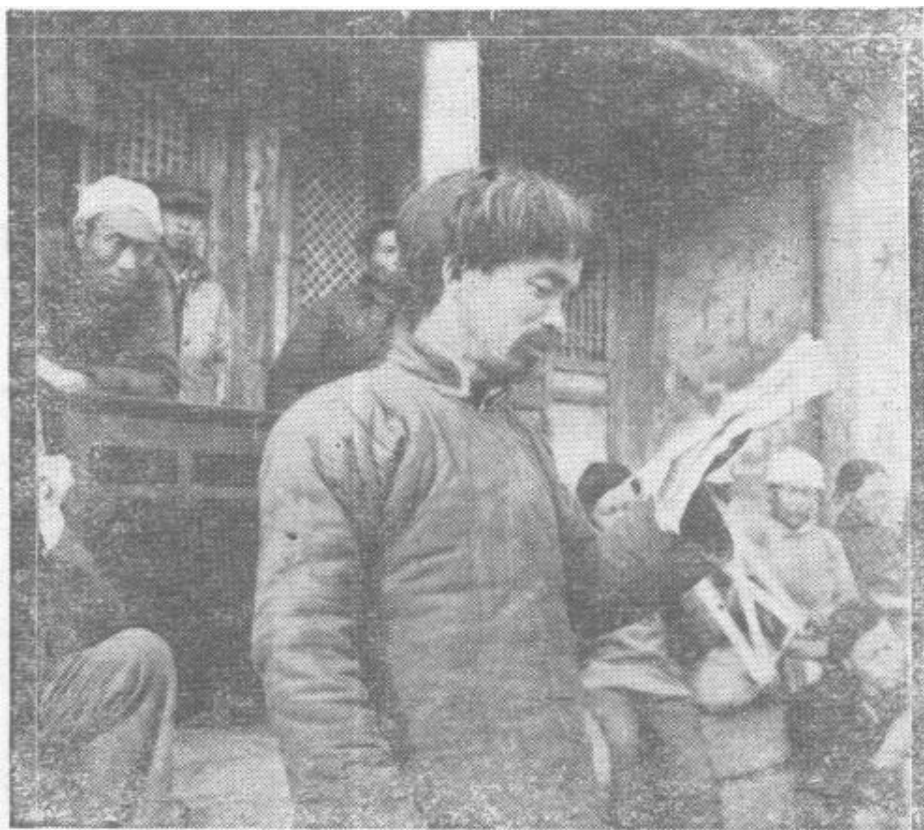
“说起王克斌的问题，”他说，“有人说，‘最好把他送交人民法庭’——好象送法庭是一种惩罚。但人民法庭只是申诉、摆事实、讲道理的地方。

“还有人说，‘把他送人民法庭和让他呆在村里没什么两样。只有一个目的——改造他。’

“有些人又有不同的想法。他们说，‘我们不要把他送交人民法庭，就让他呆在这里。用这两种方法都能使他受到教育。即便把他送交法庭，很可能很快就会被送回来，也许送回来以前让他在县里干些活。因此，我们还是就在本村把问题解决的好，让他为这里的军属干些活。’

“我完全同意后面这种主张。我认为开这个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王克斌接受改造。

“现在，让他自己说说。”冷冰转向王克斌，他等在庙廊台阶



前任村长王克斌在念悔过书，王文盛主持会议。

底下。冷冰作了总结：

“王克斌，现在是你向群众承认自己错误的时候了。老实坦白吧，群众在看着你，听着你。全看你自己的态度了。”

过去的三个星期使王克斌这只老虎变了。他和工作队员进行的谈话（工作队员曾就老乡们私下向工作队反映的对他的指控提问过他）；群众大会上农民们对他的批评和他的自我批评；扫街时所感到的羞辱——所有这些，对于他的忍耐力和一贯的态度都是巨大的压力。他灰白的头发乱蓬蓬的，胡子也没刮，脸比先前瘦多了，脸上的皱纹更多了。他向前移动了几步，精神紧张地想要把手里拿着的被风吹卷起来的几张纸展平。当他试图这样做时，眉心出现了两条深沟。他用一种低沉的、犹豫不决的语调说道：

“我不识多少字。”他说，“让我试试读一下这个稿子，这是

别人代我写的。”他说他识字很少是出于礼貌，是谦虚的表示。事实上，他在公共场合表现的阅读才能，还使他那丧失殆尽的威信多少增了点光。

王克斌的检讨可是不拘常规的。他列举了二十五条来概括他“过去所做的坏事”。

“……第五条……他不服从我，所以，我让他‘游街’。随后，他逃走了。

“第六条……他不听我的命令，我就把他绑起来吊在梁上。”

他很平静地读着，有时停下来，不时作解释，因为这不是他自己写的，所以难读。到会的群众、冷冰和主席王文盛不断地要求他说大声点。但他不是不愿意，就是提高不了他的声音，也可能是他不能或不愿不照着念。他结结巴巴地读完了，讲了他怎样严厉对待灾荒年间在庄稼地里小偷小摸的人；怎样在地主和富农家里吃饺子的。他列出了他受贿和从老百姓那里勒索来的“礼物”：

“我从办傅廷英的离婚、结婚手续中得了五十元；从李少牛老婆那里得了一尺二白布。

“财物是怎样到我手的呢？谁要使结婚或离婚合法，就得来我这儿，在证书上盖公章。”

王克斌在他的讲稿的最后一条中总结了自己的行径：“我欺压和斗争了那些不听从我的人。”

当他看到自己有可能重新回到村里的新生活中去的前景的时候，王克斌的声音又恢复了一些原先的神气。他第一次撇开写好的讲稿，说道：

“我自愿交出三条牛——一条成牛，一条小母牛，一条小公牛；还有三间房子，一盘磨。”

他早已清楚地向工作队表明，他虽愿意交出他的四头牲口中的三头，但他想留下馱鞍。显然他不是想躺倒不干，而是打算投入生产劳动。

他最后说：“我愿意为村里干四五天活，为军属种地或修堰。

“从现在起，我要改正错误。我不会报复任何人。我要照群众的意愿来办事。要是我做不到这点，那就罪上加罪。从今往后，我要老老实实，跟着群众走到底。”

“你说完了吗？”村长赵正方问。

“我就这些了，想不出来别的了。”

“现在，大家可以发表意见了。”

“从你说的来看，”王克斌的老对手李宝胥说，“人家会以为你从来没有干过任何错事。在我看来，你的自我批评还差得远呢。”

“妈呀！有些人总是不满意。”有人喊叫。人群中各处都传来了不同意的小声议论。

“你认为他漏了哪一点？”冷冰问。

李宝胥犹豫着。坐在他身旁的朋友王二喜（也是王克斌的仇人）插进来说：“我媳妇的事怎么样？她要没从你这儿得到证明信，她怎么也不可能从区里领到离婚证。”

“对，我让村公所给她写了封证明信。”王克斌带着些先前的劲头说，“她来我这儿要求我给她开个离婚证。我说我自己处理不了这类事，但我可以为她写封信给区里，让区里去处理这件事。我就干了这些。”

“撒谎，”李宝胥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你怎么知道不是那么回事？”人群中有人喊道，表明了大

多数人对向王克斌报私仇的那些老勇敢分子的不满。

“有人告诉我的。”李宝胥吞吞吐吐地说。

“谁告诉你的？他怎么说的？”院子各处都传来责问声。

“我知道一些。”在一旁等着作检讨的傅高林说，“二喜媳妇到区里闹离婚，说二喜是伪军。那时，二喜对我说，‘你看她那样，我和她处不到一起了。还是让她走吧。我不在乎，只要我得到点赔偿就行了。’”

“我从来没得过什么赔偿。”二喜气愤地喊。

这当儿，又高又大的傅高林站了起来说道，“我把钱给了你娘，你在我面前点的钱数。”

“谁能证明这点？”二喜问。

党员王奎明为傅高林作证：“他不但接了钱，而且在收据上盖了手印。”

人们群情激愤地对李宝胥喊道：“算了吧！”“住嘴吧！”“尽是废话！”……

当吵闹声越来越高时，一直在后面保持沉默的工作队长罗林，穿过走廊来到台阶前面，“这里没有那些搞报复的人的地方。”他用刚健宏亮的声音大声说，“如有人要搞，出去！我们要改造王克斌，要教育他。而不要象对敌人那样打击他。”

全村人都惊住了，但大多数人同意罗林的话。

喧哗声渐渐消失了。有私仇的人也沉默下来了。老乡们继续讨论王克斌自己提出的对他进行处理的建议。

“即使他把所有贪污的钱都赔出来，今天也值不了一斤盐钱。最好让他用小米来赔。”伶俐的牲口贩子李宝会说道。

人们议论了王克斌任职时的小米价。

“如果他把吞下的都吐出来，连那三条牛、三间房和那盘

磨都还了，”一个农民说，“他要变成窟窿户了。”

“赔不赔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改造他。”

“问题是他自己能改造自己吗？”

“我认为他会有的，他检查得不错。”

“他自己提出的处分也很合适。”

“对，那处分可以。”

王克斌自己结束了这场讨论：“我保证决不报复。”他说，“在以往的斗争中，我斗了各种人。我没有停下来好好想一想，他们是地主还是贫农。那样，我就做了错事。从现在起，我一定要站稳阶级立场，尊重老实农民。”

王克斌的问题讨论完后，太阳已经下山了。

接着讨论的是傅高林。他的问题很快就处理完了。部分是因为天晚了；部分是因为傅高林与王克斌不同，他自从被撤职以后就没有再参加政治活动；再说他基本上已经作了退赔。

当叫到他的名字时，他走到庙廊台阶下，转向群众问道：“你们要让我从头到尾交代自己的错误，还是只交代还没提到的那几点？”

“光说没提到的。”大家回答。

傅高林站着，双手交叉在胸前，简短地说开了。灾荒年间，他在地主家吃饺子；劝穷汉的老婆离婚的种种。只要他有遗漏的，人群中有的人或台上的冷冰就提醒他。

不一会儿，他就说完了，他也提到了对他自己的处分建议。因为对他的处理基本上已定下来，而且他在村里的处境比王克斌要好一些，他提出的退赔主要是一种认罪的表示和争取信任的姿态。

“我想，我应交八斤粮，干十天活作为处分。”他说，“不论

怎么批评我，我保证不报复。从现在起，我不再干错事；我要照贫农的意愿办事。如我不能说到做到，我愿受到群众的处罚。”

大家接受了对他的处分意见，这样傅高林问题就算处理完了，这次会也结束了。

民主领导的一些问题

十里店的新干部通常是根本不敢发号施令的，因为他们不愿重犯原干部犯过的强迫命令的错误，后者曾为此而被严厉批评过。不管事情多么细小，只要他们的主张没有提交群众大会通过，他们就什么事情也不敢决定；这样，以后工作中一旦发现差错，责任就在群众了。甚至当村里大多数人同意采取某一工作步骤时，只要一两个人强烈反对，新干部通常也就把它搁置起来。新干部完全了解，这少数几个顽强地坚持自己意见的人，以后会怎样和干部找些麻烦。

和新干部不敢负责密切相关的是他们分配不了任务。他们老是忙于日常事务。村长赵正方自己抬担架，因为一时找不到做后勤工作的人；他为挖出陷在村里街上泥泞里的政府卡车领路；他匆忙地为过路的战士找被子过夜，尽管有个接待站在管这些事；他甚至还亲自动手打浆糊张贴村政府的通告。赵正方是十里店最忙的人。他什么都干就是没有进行领导。

副村长王文盛是个仅次于赵正方的忙人，但在能力上比赵强。文盛在思想感情上和老乡们很亲近，特别是在他自己所在的南头片。街坊们常来找他，因为他们信赖他。当他听取他们的意见时，不是摆出一副批评的架势，而是和蔼可亲。尽管村里的群众相信他，可他对村里的情况的了解有限，因为他多年

来一直远离十里店在外当劳工。

正如王文盛不愿批评别人一样，当别人批评他时，他也很容易恼火。如果一百个人里头有九十九个赞成他的行动，只有一个人不赞成，他就会没信心。过去，他这种品性使他很得人心，甚至地主也是如此。因为他宁愿拼命干活也不愿受到他所鄙视的雇主的指责。在参加翻身运动时，他也表现出同样的品质。在调剂土地，每户都要自报是否有窟窿要填时，他却保持沉默。他虽穷，却仍然担心人们会指责他利用干部职权。

象王文盛和赵正方那样对别人缺点持迁就态度的人，会被选进村政府是毫不足怪的。当初有人提出候选人应具备的能力和经历问题时，工作队强调的是干部要单纯和老实。工作队认为，这些是首要的品质，做领导工作的其他条件可以逐渐具备。

工作队通过强调老实，希望能把群众中仍然埋没着的人才发掘出来。但事实上，群众并不是完全一成不变地接受这种特别强调的老实的。赵正方和王文盛被选为干部，是由于他们的群众关系好。但他们并不是由群众推选担任村长和副村长的。他们是由全体新干部和贫农团、农会委员会联合召开的会议推选出来的。群众确实赞同他们当选，但这主要是出于他们相信老赵和老王是老好人，而不是出于信任他们的工作能力。

在选举时，农民们显然考虑了候选人的能力和特长：财务委员，他们选了个理财有方的人；领导后勤工作的是一个在这方面有经验的人；组织保卫工作的是个八路军的老战士；如此等等。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不那么老实，但也不等于说他们就那么单纯。例如，大家都认为当选农会主席的王喜堂是老实的，但没人说他单纯。所以，村里老百姓用一个不同的词儿形

容他：正派。

严格地说，贫农团主席李宝有可不属于这些类型之中的任何一种人。几年来，他作为第五互助组的负责人在村里一直很积极。他胜任自己的工作，并得到本组的有力支持。但是，他无疑接受了一种旧观念，认为当领导要有政治手腕，要利用一派对付另一派。他成功地运用了这些手腕，因而很难说得上是单纯和老实的了。

除此之外，李宝有有时不顾村里其它片的利益，狭隘地为自己所在的南头片办事。他认为，他之所以当选，主要是由于街坊们的支持，因而，他对他们应尽特殊的义务。如在评议缺房户时，他让他那个片的一些有争议的户都通过了。

但李宝有还是肯学习的。在工作队看来，他是三个主要干部中最有能力的一个。他对待批评并不象村长和副村长那样敏感，他愿意承担责任。他毫不迟疑地接受了领导评议填缺房户的窟窿这个棘手的任务——这个任务甚至连王喜堂都要退避三舍。再说，李宝有还热心学习新的领导方法。正如他在调剂土地阶段快结束时说的，“原先我想，搞调剂比较简单，你只要打开账本看谁的地好，谁的地赖，谁的地多，谁的地少，然后再平均一下，就行了。我不知道自报公议这个好方法。我从工作队那里学到了许多处理问题的方法。”

至于妇女干部，她们发现，当模范干部比当模范妻子和儿媳要困难得多。寨上的陈翠子、贫农团和农会妇女部的委员，在做妇女组织工作时，就不善于解决困难问题。“她们就是不愿意来开会，就这么回事，”她说，“你得叫她们五、六次。”

原先村里有经验的妇女领导人之一、在割封建尾巴运动中被迫离职的王翠娣说：“难就难在这些新当选的妇女不知道怎样

才能找出主要问题。她们被各种各样的小事缠住了。当然，这不完全是她们的过错。她们没有机会象我们当初在妇女会成立时那样，去参加专门的训练班。所以，她们只好依靠男人，附和们。而男人们并不了解妇女们的特殊问题。”

虽然王翠娣在当了一年封建尾巴以后，刚回到全村的大家庭里来，她对如何改进工作却有不少主意。她说：“我们妇女里头那些知道主要问题的人，仍然不愿意站出来工作。”

男女干部都不愿出来负责，必然会使村里的政治领导发生某些困难。最主要的困难是，如何对待政治上落后的勇敢分子。这个问题不仅在十里店、而且在整个区里都存在。工作团的负责人张磐石在给他领导下的各工作队的信中写道：“应教育那些坚持个人偏见的农民接受大多数人的意见，否则就会产生极端民主化问题。如果他们坚持不改，要警告他们，他们可能被开除出贫农团或农会。”

十里店的勇敢分子的破坏性，不象有些村子的那样大。罗林在河西村中央局太行工作团指挥部开会回来后，对工作队的同志们说：

“在一些村里，勇敢分子对运动的阻力很大。他们甚至把人绑起来打，群众怕他们。在本村，这些人没有那么严重的问题，虽然他们也给新干部找了不少麻烦。他们总想推倒已经做出的决定，重新挑起那些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他们的问题是他们对某些人有偏见。需要教育他们。真正的积极分子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而不是孤立自己，盛气凌人。”

在运动中，工作队了解到勇敢分子是如何组成的。一共有五个头头。王克斌不算在内，他已不是头头，他已被群众处理

了。除了爱闹事的李西京和傅高林的对头张章河以外，还有寨上的傅玉河和下街的王其山、王米泉。这五个头头约有十来个得力帮手。最后还有二、三十个跟着起哄的追随者，这些人只跟着闹，从不带头闹事。

总的说来，工作队认为，只有这五个头头才是为盲目偏见或个人野心所驱使的。大多数帮手都是齐化占那样的人。齐化占喜欢发表自己的意见，不管这会对他或给村里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有时，他说的一针见血，有时说的文不对题；有时则是对那些头头的胡言乱语的鹦鹉学舌。因此，有时，他对发扬村里的民主有促进作用，但有时，他却是民主的阻力。有些农民称赞他说：“他说的正是我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实际上，大多数人认为他的话“言重如山”，另一些人则反对说，“他的话确有份量，但并不总是真的。”但仍有一些人不光是埋怨齐化占，还埋怨一般的积极分子，“他们老是没完没了地说，我们这些人一句话也插不上。”

最后，工作队决定三种类型的勇敢分子——头头、帮手、追随者——需要区别对待。工作队成员访问了所有这些人，批评他们，促使他们改正自己的错误。此外，在群众大会上，人们始终要求这些头头和帮手为他们发表的言论提出证据。这样很快就能检验他们是否口出澜言。

同时，工作队员还对追随者做了工作，向他们解释宗派主义的根源和危害性，以及小集团是如何助长宗派主义的。工作队员要求这些追随者所在的片进行酝酿，议论这些人以及他们的破坏活动。在小组讨论时，这些人就能比在全村大会上更有效地听取群众意见；在全村大会上，往往是这些人的头头们左右会议。

但是对头头本身，只要有适当机会，就要在公开场合进行揭露。对于孤立这些头头来说，这比用其它方式效果更好。例如，在一次评议窟窿户的会议上，有一个派头头对会议进程表示不满，他就决定他那帮人一起退场以搞垮会议。但当他开始这么干时，工作队员严厉地批评了他的企图，并号召他那帮人不要脱离群众。他那帮人不一会儿就安静下来，重新坐下了。这使他们的头头又孤立又不知所措。主持会议的李宝有从中增强了信心，采取了坚定的态度。因为会议已不再为这帮勇敢分子所控制了，比较落后的农民也开始发表意见了。

工作队和勇敢分子进行的个别谈话也很快奏效。如王米泉承认，他发言不负责任，又说得太多。对他来说，留些机会让别人也能发言是个好主意。南头片那派的一些人承认，他们之所以对本村的共产党员不满，实际上是他们对某一个党员怀有恶意。一个工作队员在同原先老是和本村党支部闹对立的寨上的傅玉河谈心以后说：“那个年轻人有不少好主意，我们一定要想法把他争取过来。”

但王其山对一个工作队员私下对他的批评感到恼火。他要王喜堂支持他对付他认为是不适当的压力，但喜堂不是支持而是要他改正自己的错误。王其山在一怒之下离村出走。但不久，他就以一个新人的面貌返村了。不管促使他思想转变的是什么因素，到五月中旬，他已是一个被吸收加入农会和贫农团的思想得到改造的农民了。

但令人遗憾的是，教育勇敢分子的重担全压在工作队身上。新的村干部认为，他们处理不了这类问题。原来当过干部的寨上的李宝恩由于在整党中历经风浪，而不敢坚持领导。只有王喜堂例外，他在当村长期间，已完善了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如

他所说的那样：“当我知道会上要遇到什么困难问题时，我就事先和那些可能要找麻烦的人私下谈话。我向他们征求意见，争取他们。我的体会是，如我这样做了，会议就会有秩序地进行，效果好。”

但王喜堂的工作方法之所以成功，主要是靠他自己的威信，这是通过多年艰苦的工作才建立起来的。象赵正方和王文盛这样一些新干部很自然地就十分依赖他；危险就在于，每一件事很快就控制在他手里了。为了在村里充分发扬民主，最重要的是，不但在形式上而且在实际上，把职责移交给新干部。

正式的移交推迟了，因为要说服新干部在开展调剂土地和房屋的工作中起领导作用是很困难的。由于他们缺乏信心和经验，要在同时把村政府的日常工作一下子压在他们身上，也是行不通的。但当调剂工作接近尾声时，该是新干部就任的时候了。

工作队和王喜堂一致认为，为了使全村农民信服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举行一次隆重的移交仪式是应当的。4月9日，在全村大会上，调剂土地和房屋的结果公布了；王克斌和傅高林也得到了处理；新干部正式上任了。

原村长王喜堂首先汇报了现有账目和公共财产的详细情况。汇报详情证明，离任的一届村政府是廉洁奉公的。最后，王喜堂宣布：“现在，请农会移交权力。”

每人都聚精会神地坐在那里。由于农会领导了过去的斗争，从历次斗争中得来的尚未分配的斗争果实，由农会负责保管。农会文书宣布，这些果实保管良好，并说：“现在，我向大家宣读我们做的摘要。你们是不会想听详细的流水账的吧。”

但有一两个新翻身的农民决心行使他们的权力，喊着：“我

们不想听摘要，全都念出来！”

文书好意地笑了，捡起放在桌上的一堆账本。他举起厚厚的五本账册给大家看。他打开了一本，逐一指点着写得密密麻麻的一页的各个栏目。这下把大家说服了；人们笑着同意，听念摘要就够了。

念完摘要后，王喜堂问前一天检查了大批账册的贫农团委员会，要不要讲些什么。贫农团委员会的代表走向讲台。“我要说的是，我们走了一圈，看了看，所有的东西都有条理地存放在屋里。东西都在屋里，好好的，就象账册里登记的一样。谁想看，可以自己去看。”

大量的账本、算盘和文具由原干部交给了新干部。这是正式的移交。原干部随着交出了账目、文件，也就卸下了公务的担子，并为他们努力工作、廉洁奉公得到公认而感到高兴。他们快活地向大家喊道：“有工夫去查一下我们的账本吧！你们知道东西都放在哪里，自己去看看吧！”

老乡们亲热地回答着。不一会儿，整个人群中一片欢声笑语，人们踮着脚评论着那些正式就任的人的表情。看来，只有新干部把这一时刻看得那么严肃。特别是赵正方，当所有的眼睛都盯着他时，他拉长着脸，不大情愿地走到了庙廊中间。当王喜堂庄严地将装有村长大印的印盒交给他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掌声。村里的权力，现在开始掌握在新当选的干部手中了。

党支部面向未来

4月10—14日

4月10日晚，调剂土地和房屋结束后的第二天，党支部召开了一次会议。各片都被邀请派代表参加。会议的目的是，继续分析党员的缺点，并且区分哪些是对群众有影响的大问题，和哪些是仅仅涉及到个人的小问题。

到会的人认为，过去有些错误是由于执行了上级党组织的命令而犯的。上级党组织在发布这些命令时，对当地情况没有作充分的调查研究。这些命令使党的干部处于一种无可奈何的境地，因而，他们只能用专横的办法来执行这些命令。如王喜堂动员群众抬担架时，只好采用强迫的手段，因为要十里店出的公差，已大大地超过了它所分担的后勤任务。此外，在割封建尾巴运动中进行的不正确的斗争，主要是由上面来的错误指示造成的。

在另一些情况下，人们认为，如果党员干部能得到上级更充分的教育，各项指示是得以执行的。例如，有个干部在做救济工作时不耐心，耍脾气，就是由于缺乏群众路线的教育造成的。

有些由于诸如灾荒或战争而引起的客观情况，也是导致一些错误的原因。特别是通信联络方面的困难，使党的某些新政



村里党员在开会。

策不能及时传达到村里，因而就不能很快采取行动。

最后，有些错误是要有关党员个人负全部责任的。不合理地过多购买斗争果实就是这种个人错误的一例。

采用这种方法来分析党员的错误，有两个好处。它有助于使共产党员客观地看待事物，克服对自己的缺点错误所抱的绝望的心理。此外，它使人民代表对党员们所面临和解决的问题有更多的了解。

次日上午，支部再次开会，这次是党内会议。一些共产党员在几个星期前一度产生的绝望心理已经消失了。当时，王喜堂曾想让他们交出武器来，担心有人会自杀。现在，他们都精神振奋。那一段经历是严酷的，但一个党员说出了许多人的心里话：“党对我们来说比爹娘还亲。”他说，“过去，我是个讨饭的，我的爹娘给我一只碗，他们盼的是我能靠讨饭活下来。现

在，党不光使我们从封建剥削下解放出来，而且给我今后的生活指明了正确的道路。”

支部随后提出了关于处分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有七种纪律处分：劝告，警告，当众劝告，当众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最严重的是开除党籍。象村里的一个老农民说的，“开除党籍就象子弹穿心。”

原党支部书记王绍贞简单地回顾了自己的错误，要求给他处分。他没有原谅自己。他毫无怨恨地说：“你们批评我许多严重的错误。我当了大约四年政治指导员。我绑过人，打过人，拘留过人。我卖过一支步枪和一些子弹。我帮了我兄弟不正当的婚事的忙。我应受到党的严厉处分。我建议给我留党察看处分。”

支部分成小组进行讨论。当他们开支部会时，王绍贞所在的小组同意他自己的建议，但其它小组不同意。

“我们组认为，他作了一个很好的自我批评，最多给他当众警告处分。”一个发言人说。

“他对人民代表作的自我批评和交代是最好的。”另一人说，“我们组认为，最多给他劝告处分。”

“他很年轻，没多少经验。不能象他自己提的那样留党察看。他应受当众劝告处分。”

“群众相信他能改正。他的问题是他没有受到足够的党内教育。他应受劝告处分。”

支部讨论了这些处分建议，一直到取得相当一致的意见时为止。表决结果是，绝大多数人同意当众警告处分。

接着讨论治安员王林永的处分问题。人们批评他与人通奸和利用职权欺压农民。

“我们组认为，对他的处分应比对王绍贞的重。”一个党员

说，“他应受留党察看处分。”

“那就是说，他的一条腿已在党外了。”

“我们同意。在党对他教育后，他没有多大悔改。”

“我们组也是这样的意见。支部多次讨论了他不道德的问题，并对他进行了充分的教育，他就是明知故犯。”其实，王林永就是不愿和他的姘头断绝关系。“但因为这是个人品德问题，我们认为给一个当众警告处分就行了。”支部最后决定给予当众警告处分。

对民兵队长王启永的处理，也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他借口腿伤从前线回家，被认为是严重的错误。他说话放肆也被认为是如此。大家先提议给他留党察看处分，因为在党对他进行教育后他也没有多大进步。但最后支部建议给他当众警告的处分。

对支部的另外一些党员，则认为是进一步教育而不是处分的问题。例如，大家认为原农会主席傅常寿不应对他的错误负全部责任，因为他是最近入党的新党员。还有一些党员还说不上是犯了严重错误。“他们的问题可以在支部内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李宝恩提议，为大家所同意。

工作队员冷冰宣布这一阶段的会议宣告结束。“我给王绍贞同志提条建议。”他说，“我希望从现在起，他说话应好好掂量掂量。在教育党员的运动中，他和别的同志谈问题时，总是太悲观了。这是不应该的。”

“至于王启永同志，他总想在干部里头结个帮。他一直到现在为止，他的表现还是不够坦率的，也没有把问题完全说清楚。我希望他将来会努力克服自己的缺点。你们对他的处分是轻的。”

然而，党支部对王启永以及其他人的处理决定，并不是最后决定。这是有待县委批准的处分建议，县委将根据支部的材料和处分建议，以及有关材料作出最后决定。

在十里店，党支部和村里其它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到三月底，村里群众对这问题大致有四种态度。

一种主要是一些老年人的观点，他们对十里店过去的许多历史阶段还记忆犹新。其中一些人还记得1911年以前，清皇朝没落时的情景，更多的人对推翻清朝以后军阀统治时期的混乱情况还历历在目，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民不聊生记得的人就更多了。这些老乡们认识到，是共产党使他们今天的生活得到了巨大的改善。他们要求共产党继续进行领导。

另一部分农民同样认识到，他们生活的改善，是由于共产党的领导；但他们认为，正是村里的这种党的领导，使他们不能很快翻身。他们认为，过去党员包办太多，而不是发动群众参加斗争。现在他们想的是，还是不让这些党员进行领导为好。他们觉得，这些党员太能干了，只要这些党员仍处于领导地位，群众就永远也不能坚持或表明自己的权利。因而他们宁愿由贫农团来起到这种作用。

第三种就是王喜堂的观点。象他的其它观点一样，他的这个观点也是得到很多人支持的。他认为，领导权应掌握在农会手中，他本人是农会的主席。这并不是说，他对党不忠诚或他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别人的利益之上。他的想法来自意识到自己才干出众。而且，王喜堂也确实是十里店最能干的干部。当工作队逐步退出对村里工作的领导地位时，有经验的王喜堂所担负的责任自然越来越重了。由于农会主席是如此出众的人物，

农会本身也就显得越发重要。自从党支部整顿自己的队伍而停止了大部分活动以来，王喜堂开始低估了支部的作用，从而过高估计了他所领导的农会组织的作用。

第四种是农民中较为普遍的观点：党、贫农团和农会应是平起平坐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对共产党员加入贫农团和农会，在他们的委员会里工作，真是求之不得。换句话说，他们对接受党员个人的领导，却是心无疑虑的。

从表面上看，在工作队来到以前，共产党对十里店的领导是被完全接受了。实际上，问题的种子早就存在，而且只要支部还没有把领导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这些种子就会生根发芽。发动群众批评党员，党支部不积极参加村里的活动，使工作队的领导暂时代替了党支部的领导，但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使党支部进行水平更高、更有效的领导。

工作队始终着眼于这个目的。但现在看来，也仅仅是工作队如此而已。对某些勇敢分子的尖锐批评，对一些群众是有影响的，工作队对党员的压力，也使党员失去了自信。

尽管在运动的中期和后期，党员的干劲在稳定地提高，但并不是所有的党员都象王喜堂那样容易恢复自信的。当关于处分的会议结束后，支部又召开了一系列讨论会，讨论冷冰提出来的问题：“怎样做个好党员，怎样联系群众，怎样向群众学习，又怎样领导群众。”

“唉，如果你想和群众搞好关系，”一个党员开了腔，“那最好是什么事也别干。看看傅高生是怎样想方设法当那么长时间的干部的吧。区政府有人来时，他积极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他们走后，他可什么也不干了。”

“傅培常同志也是这样。”王绍贞说道，“在批评、自我批评

会上，他对我们提的批评，比任何人提的都多。他自己从来就没有犯过错误，因为他从来什么也不干。不干，就不会有错误。”

冷冰说：“在这方面，我说几句。做一个好党员要抱着对党，对党的工作和对人民负责的态度。

“一个党员的表现和普通群众一样是好事吗？不。做一个党员应该积极，他应是一个雄辩的宣传家，要影响群众。我希望那些从没有表明自己观点的同志，将来能采取这种态度。这是他们的责任。

“这也更是他们在党支部会议上的责任。只有个人意见都发表出来以后，才能对问题进行讨论。不讨论又怎能作出正确的决定呢？每个党员都有责任表明自己的观点。如果发生了错误，每个党员都有自己的一份责任。”

原农会主席傅长寿说，“这些日子，我一直担心犯错误，所以变得很胆小。我觉得自己的手脚好象被捆绑着似的。我怕干。”

“我也是这样。”李宝恩说，“有时我甚至觉得又当选为干部是因为坏运气又来了。大部分原干部都被赶到一边去了，我怕今后我们这批人也会是这样的下场。因此，我觉得当一个共产党员没什么好处，因为当党员就得当领导。”

被选为村政府财务委员的李宝恩还说，他担负的责任使他非常苦恼，已经影响了他的家庭生活。当他外出时，一个农民到他家看村里的帐本。他媳妇不认识这人，就说她不知帐本放在哪里；但她不懂事的小女儿却指给他看了。这个农民翻看了一下，把帐本扔在桌上就走了。当李宝恩回来时，他十分恼火，打了孩子。“她大哭了一场，但我也没办法，我也一样着急。

的确这只是几本帐的事，但也可能有严重的事发生。”

李宝恩继续描述了在整党初期发生的一件事：

“一天晚上，寨上有个会，但同时我必须参加一个党员会。我很注意自己的表现，向贫农团小组会的主持人傅长亭请了假。他告诉我可以走，但会一结束，就得马上赶回来，因为寨上的会很重要。

“支部会很快结束了。我赶回寨上进了会场。但里面却没人，我摸黑走了一圈找会场。最后我发现有人在开会，悄悄走进去，四下看了看，才知道在那里的都是斗争对象。我感到很不自在，躲在人后头。没一个人和我说话。我很纳闷：‘怎么回事？是不是把我也当成了斗争对象？’

“最后，我决定走。但那天晚上对我来说太可怕了，做了一晚上的恶梦。天一亮，我急忙去傅长亭那儿。最后，我才发现自己走错了会场。

“你们可以看出，我在整党那个阶段的情绪怎么样。我很胆小，啥也不敢干。”

“是啊，那段时间真怪，”王文堂说，“没人敢和我们讲话。当一个共产党员好象犯了罪似的。工作队员用怀疑的眼光看我们，我们也接近不了群众。那时候，我们很痛苦。我从来没有一会儿高兴过，直到有一天允许我们回答哪些指控是对的，哪些是错的。打那以后，我才高兴起来。现在，我们已明确了哪是对的，哪是错的，是自己的错，还是别人的。我觉得路已打通，我们可以自由地向前走了。”

“当我刚听到党员的错误要根据群众的想法来定时，”另一个人说，“我可害怕极了。我告诉我媳妇，‘过去我犯了许多错误，群众是永远不会原谅我的，也有可能要把我送到人民法

庭。今后，你和我最好各走各的路。你走你自己的吧，让我自个儿走绝路吧。’我媳妇哭了，我也很不好受。

“后来，一下子情况都变了。要我再深入检查自己的问题。我交代了自己的错误，随后我就被吸收进农会。那以后，我更深入地认识自己的问题，把问题都从心窝里掏了出来。”

冷冰参加了这次讨论。“的确，在那一开始的大约二十天里，对你们思想上的压力是很大的。这只是为了能使你们做深刻的自我批评。现在看看结果——每一件事都弄清楚了。

“我们一开始就说，没有人会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那时，支部委员没有深入检查自己。很自然，当时工作队应和贫农站在一起，而不是和干部、党员站在一起。

“这样的确对你们造成了沉重的社会压力，但没有这种压力，你们不会很好地自我批评。这就是说，你们将会失去改造自己的机会，党组织也决不可能很好地进行整顿。”

“真是那样，”王绍贞说，“没有压力，我们的自我批评就不会深刻，而且群众也永远不敢说话。”

“而现在，”冷冰继续说道，“是不是做的工作都合乎党的路线了呢？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冷冰自己回答了提出的问题：“最大的问题仍然是怎样密切联系群众。我们必须十分仔细地研究这个问题。过去，我们没有认识到群众的力量，没有充分注意到贫农的要求。”冷冰把自己看作是支部成员之一，认为支部所犯的错误他也有责任。

“我们没有深深地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在他们和我们之间隔着一堵墙。这堵墙是什么？就是所谓的积极分子。我们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有事同这些所谓的积极分子商量，而不是到群众中去了解他们的要求。

“当然积极分子是重要的。但是，什么是真正的积极分子？就是群众中表现最积极的，和群众一起前进而不脱离群众的人。

“为什么过去我们犯了那么多错误呢？这是因为我们脱离了人民群众。从现在起，开展工作要容易多了，因为人民群众掌了权。群众越积极，党支部的工作越有效。

“同时，我们不应做群众的尾巴。我们应合情合理地和他们商量办事，但我们也必须对他们实行领导。我们要向群众学习，但同时也要教育他们。”

下一个要讨论的题目是支部需不需要定期召开会议。在开支部大会好，还是小组会好这个问题上有些不同意见。党员们最后决定每月的一号和十五号定期召开这两种形式的会，不管有没有特殊的事情要处理。

“开小组会的主要目的，”冷冰说，“应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过去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如能定期开小组会，当错误还不严重时，就能及时处理，这样就能防止犯大错误。

“另一种及时发现错误的方法是，党小组会要仔细考虑群众的任何意见。我建议，每隔三四个月，支部应专门召开一次会议，邀请群众派代表参加，并提出批评。这对党员来说，就象吸进一些来自群众的新鲜空气。你们认为怎么样？”

支部对此表示同意。在会议结束时，冷冰作了使人宽慰的估计，如果采取了这些措施，“就没有必要每隔几年就进行一次象现在这样的大规模的整党、整风运动了。”

有待党员完成的组织工作是，选举支部委员。当工作队进村开始整党时，支部委员都被免职了。

三月末，支部的二十八名党员中，已有十五名被吸收参加

农会，支部就决定选举支委。这时，党员还由于因受到批评而感到心绪不宁，他们觉得应当选出一批新支委来。他们也倾向于选那些群众关系良好和没犯过错误的党员。结果，张兆林——八路军的一名老战士被选为支部书记。

然而，事实表明，张兆林不能胜任这个职务。一个原因是，他不了解村里政治生活的历史，因为他很年轻时就离村参军，直到最近才退伍。另一个原因是，他已被选进了村政府委员会，这项工作就费了他不少时间和精力。再则，在冷冰看来，张兆林和他的前任王绍贞相比，工作能力和干劲都略逊一筹。

被选为党小组长的傅培常的工作，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据其他党员反映，“他总是朝上看。”这就是说，他竭力讨好上级。傅培常在群众中特别受到欢迎，是村里最先恢复威信的党员之一。但是，他是通过当“老好人”，而不是坚持党的原则来做到这一点的。

由于重新选举势在必行，支部为此在4月14日召开支部大会。会上，党员将投票选举四名组长和五名支部委员，包括支部书记——这个支部最重要的职务在内。

冷冰说，在选举时要考虑被提名人的党龄（入党年限）、经验、阶级观点和工作能力。每一个提名都要说明理由。

第一个提出的候选人是王绍贞。提名人强调他具有工作经验和勇于自我批评。接着，张兆林和李喜元也被提名，因为“他们在前线作战，不怕牺牲。”有人也提了王喜堂，但别人提出，他当农会主席已经够忙的了。李为成因入党时间不够长而未被考虑。反之，李松庭则是因为他是个“当了十年民兵的老干部，了解内情”而被提名。老长工王文堂因曾领导斗争地主的

经历而获提名。

最后当选的是，一度率领十里店的四十个民兵参加八路军的李喜元；曾任村政府财粮委员的张兆林；原支部宣传委员王文堂；以及青年民兵傅金生。

支部书记则由前任王绍贞连任。他的重新当选，是符合整党运动“治病救人”的精神的。那些领导人民，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表现了干劲和才能、冒过生命危险的共产党员，是不会被抛弃的。经过教育以后，他们将比以前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and 领导人民。

分配果实

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储藏室的封条还没有被揭掉，里面存有 1947 年夏天从被一些称为“防空洞”的家里挖出来的斗争果实。现在是打开储藏室分配布和衣服，打开粮仓分配小米、玉米和小麦的时候了。其中一些布和衣服，本来是别的比较富裕的村里的地主的财物，他们把这些财物藏到十里店的朋友或亲戚家里。但是也有一些属于十里店本村的一些中农，是在“割封建尾巴”的过火斗争中没收的。

工作队和新的村领导一起确定了分配这些财物的两条原则：第一、不把财物归还本人，而是分给那些需要的人，即窟窿户；第二、不搞绝对平均主义，哪些户缺得最多，就补得最多。至于那些缺少土地和房屋的窟窿户，不管是基本群众，是被错斗过的中农，或是原先的地主或富农，都将用现有的一切来填补。

布和粮食的分配手续，同土地和房屋的分配手续大致相

同。4月11日上午，贫农团、农会和村政府召开了联席会议，讨论如何分配。当天下午，三十一个人民小组分别开会，每户汇报了现有的衣服和粮食的数量。

与此同时，布和衣服已在正式移交给新当选的村干部。为节省时间，在移交过程中，还对这些东西仔细作价。这些果实原由村生产主任和农会主席保管，现在也是由他们打开储藏室，揭去封条。室内的东西都象百货商店仓库里的货物一样，摆得井然有序。一层层存放的东西都很干净整洁，每一捆东西都系有布条，标明原主或“防空洞”户主的姓名。

这些东西一共有四十二捆，已被搬到院子当中，放在苇席上。在一个个打开时，都按照村政府的记录作了核对。每一捆东西都核对无误以后，由原干部向新干部移交的工作就告正式

在庙院内陈列的斗争果实，正待分配。





斗争果实的贮藏室贴上封条，等待分配。

完成。

在进行核对工作的院子的那一头，气氛严肃而认真。院子的另一头，则充满了欢语笑声。一伙有经验的估价者，把每件东西都拿过来摆弄和掂量一番，然后作价，标价。只一会功夫，院里的苇席上就堆满了花哨的床单、鲜艳的女上衣和长裤、深红色的婴孩用布、一双双鞋子、以及杂七杂八的小玩意儿。拨动算盘的滴答声，向作记录的会计报价的喊叫声，以及围观人群的说话声，使院子象一个小型庙会似的。

六名估价员是由于他们过去做买卖有经验而被选的。拿村会计王福星来说，他在邻近的涉县曾为一个布商干过，被公认是估价手工织品的权威。傅周揆在冀南的冀县当过布贩，土改后又回家重新务农。尽管如此，看来他对这天下午能重操旧业

是相当乐意的。他在颈后的领口中一直插着一把木尺，不时利索地抽出来，以一个行家的熟练动作量每一块布。

他拿起一块丝绸，权威性地说：“这是东京货，两毛钱一尺差不多。”有时说：“这一块绸料是用上海的头等染料染的，就是把它穿成碎片，也不会褪色。起码值一毛八一尺。”

“你看清这块料子了吗？”他说着，捡起一些看上去很相似的料子。“这是用麻混纺的，是汉口出的。”

副村长笑着捡起了一套地主常穿的绸料衣服，把裤子套在他家里手工织的粗布裤子外面，又把短绸褂披在肩上，神气活现地在院子里晃来晃去。

一个人说：“这玩意儿是给老财主穿的，对咱们可没用。”

人们想要的是手工织的结实耐用的土布，而不是容易磨损的绸缎。机织的细布也不受欢迎，人们认为细布不耐男人磨损，只有妇女合适。

出于同样的原因，皮鞋也不受欢迎。一个人说：“这种东西给读书人穿行，穿了它下地可不行。”一双几乎全新的皮鞋只标价两毛钱，而另一双农民穿的布鞋却标价三毛。

一件引起众人好奇心的东西，是地主在城里的住宅中铺的绣花台布。在见多识广的傅周揆说明它的用途之前，绝大多数老乡对它还感到是个谜似的。另一件大家终于认出的，是一件类似银饰物的东西，这是老派的地主婆在外孙满月时送的礼物。在这些估价总值约为四百五十元的斗争果实中，除了还有一些银器如手镯、项链盒以及银元外，绝大多数是些布料、衣服和被褥。

当晚，村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审查那些自报为窟窿户的农户的名单，并从全村情况出发审议他们的要求。第二天上午，联

席会议和各群众小组的代表，一起研究了自称缺粮的七十六家农户的名单。为避免搞平均主义，罗林建议把粮食窟窿户分成大中小三类，并通过把各农户的需要相互比较后决定。

女工作队员吴舫说：“我们应当考虑到各种不同因素，如每一个农户的土地产量，每一户所有的劳力等等。”

有个人说：“最好公布帐本，这就能把各户的底细搞清了。”

“没有必要这样做。”另一个人反对说，“每个人都清楚谁富裕，谁不富裕。”确实，大家彼此都了解得一清二楚。问题在于他们能否不抱偏见，坦率地讲出来。

例如，当念到王友升家的名字时，会场里的三个酝酿小组中的一个组的发言人，犹豫了一会儿说道：“他家是小窟窿户。”第二个组的发言人附和，第三个组则长时间不表态。显然，他们想说，王友升家算不上是窟窿户，但现在对要不要和其它两个组针锋相对感到犹豫不决。最后，他们的发言人勉强地说：“我们同意。他是个小窟窿户。”

然而，他的话音未落，组里的另一个人就喊道：“他根本不是什么窟窿户！去年，他家的谷子是好收成。”

这三个小组一下子都改变了原来的意见，对王友升算不上是窟窿户表示同意。人们又开始低声议论道：真是单纯老实的人可没有都自报为窟窿户。

当讨论到段二娣时，有人说：“她是个寡妇。她男人在受灾时离家走了，从此再没听到过他的消息。”

“大窟窿户，大窟窿户！”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喊起来，没有异议。

轮到评议王子才时，有人评头评足地说：“他老婆过去可是‘狮子杨’的小老婆啊！”“狮子杨”是本地的土匪，最初投靠国民

党，以后又当汉奸，后来又投奔国民党来反对共产党。

贫农团主席李宝有正在三个酝酿小组中听取意见，听到了这句话后就说：“可没有必要提这类事，窟窿户就是窟窿户。”

但是，这一简单原则并不总是行得通的；左右评议意见的往往是一些成为习惯的因素，而不是经济方面的需要。比如，要把过去的大烟贩子王英祥列为缺粮的大窟窿户，看来这些农民是怎么也通不过的。人们觉得，在调剂土地时对他已经照顾得够好的了，因此，这次把他列为中等窟窿户。

至于王福成，他的情况也很复杂，然而性质不同。有人说：“他太大手大脚了。看看以前分给他的十二石小米吧，一会时间就没了。”

“对！”一个精瘦的留胡子的老人赞成这意见，“你就是把冀南银行搬到他家，也不够他花的。”

“可你也别忘了他儿媳妇正怀孕呢。”一个妇女说。

“那我们就把他算做中等窟窿户吧。把他算做大窟窿户可没好处。”

“但他确实是个大窟窿户，是不是？”罗林问，“因此，我建议把他列为大窟窿户；同时，再对他进行教育，使他改正大手大脚的毛病。”

尽管罗林提出劝告，农民在进一步讨论之后，认为在短时期内很难治好王福成浪费的毛病，还是把他算做中等窟窿户。

苏为川的情形正好相反。“他不管去哪儿都穿得破破烂烂的，故意装穷。”人们说。结果，三个组都认为他只是个小窟窿户。

讨论到王兰芳时，三个组各有不同意见：一个组认为，他是小窟窿户；而另外两个则根本不承认他是什么窟窿户。

一个人说：“去年他收成很好，打了十石多小米。他还买了一头驴。”

“我们并没有因为老段花了多少钱办丧事而不算他是窟窿户。那为什么要计较老王买毛驴花了多少钱呢？”

“照你这么说，即便他买了一头骆驼也算是窟窿户吗？”

最后，各组都同意把王兰芳算作小窟窿户。

当议到李宝有时，这位贫农团主席执意说：“我算不上窟窿户，我的粮食足够吃到五月份了。”

但他受到了一通善意的指责：“这可不是你自己能定的，还是让我们来办吧。别忘了你现在是五个孩子的爹呢。”这引起了一阵笑声，因为李宝有的第五个孩子正是在几个星期前才出生的。根据他家的人口和当干部的需要，他被列为窟窿户，尽管是小窟窿户。要不是因为自从调剂土地以来，他给人修建房屋的营生颇有发达之势的话，他是会被列为更高一等的窟窿户的。

当整个名单上的七十六户都被讨论完毕以后，确定列为大窟窿户的两个（都是寡妇人家），中等窟窿户的四个，小窟窿户的二十二个。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后才能确定的有五户。二十九个自称为窟窿户的被否定了。

会议结束时，看来各组对上午的评议都感到满意。他们只是对窟窿户的分类表示不满，在他们看来分成三种太少了，分成五、六种才好。

当天下午，再次开会讨论人们对储藏室里的布、衣服、被褥和其它物件的申请时，他们议论的头一个问题是，应该把窟窿户分成几类合适。罗林建议象分粮食一样，仍然分为三类。他的建议是：那些对棉花、布、衣服和被褥都需要的人列为大

窟窿户；那些只需要这些东西中的二、三样的列为中窟窿户；只需一件的列为小窟窿户。但是，大多数人不同意这种意见，结果，决定列为五等。

列为三等或五等，绝不仅仅是个数字之争。那天上午对五分之二的申请人的否定表明：粮食是分给最需要的人了，而不是分到的人家越多越好。正是这种不搞平均主义的作法，在会上引起了大多数人的不快。建议列为五等，目的是使分配给需要量最大的和最小的之间的差额逐步缩小，保证最大程度地平均分配，从而使被否定的申请户所剩无几。

罗林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有些分配的果实将被转化为生产资金，但多数（如果不是绝大多数的话），将被接受者用作衣服和被褥。在这方面，平均主义的倾向，并不象在土地分配方面那样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最后，各组同意把窟窿户列为五等。

除了这方面的变动外，其余同评议粮食窟窿户的程序没有多大区别。在估量各家的需要时，附带考虑的因素是，看各家有几名妇女，因为，纺线、织布和做衣服是妇女份内之事。如，在起先评议王英叔家时，农民们说：“他们家老少三辈都是男人，没有妇女。”这家就没有被列为一等窟窿户，而是被列为三等窟窿户。这是因为，他家劳力足够，有钱付给互助组的寡妇去做衣服。一等户保留给那些缺少衣服等四样东西的人家，一家有几个小孩也要考虑在内。

劳力少的人，如上了年纪的人，受到特殊的照顾。对残废人也是如此。王景玉老汉为招待所记帐，但他的眼睛不好，就从斗争果实中分给他一副眼镜。李楚美是个双目失明的老寡妇，人们毫不犹豫地把她列为大窟窿户。

象上午的会议一样，人缘不好并不妨碍某人被划为窟窿户，但它确实影响到定窟窿户的等级。例如，有人指出王成湘曾经当过防空洞，尽管有人说：“那件事就不必提了，应按他的需要进行分配，”可是未经进一步讨论，他就被列为小窟窿户。

总的说来，衣服和布料的分配标准，不象分粮食那样严格，因为那些本来在只分成三等时会被否定的申请户，现在可被列为五等，甚至四等窟窿户。结果，在被评议的一百二十七户贫农之中，只有四户被否定了。在提出申请的二十八户中农中，也只有四户被否定。同上午会议上七十六户中被否定二十九户(大约占百分之四十)的情况相比，下午的一百五十五户中，只有八户(约占百分之五)被否定。可见，农民的平均主义倾向仍然是很强烈的。

为了按不同的等级划分窟窿户，并对各户人口数统筹考虑，有必要进行周密的计算。这是在评议了窟窿户之后立即进行的工作。有待分配的东西的总价已经算出，还使不同类型的窟窿户保持平衡。

以粮食而言，大窟窿户按每人八分、中等窟窿户每人五分、小窟窿户每人三分计算。然后，把总分加在一起。第二步是计算粮食(包括少量豆类和其它农产品)的总价。小麦定价为1.1分，小米1.2分，玉米粒1.2分，带棒子的玉米0.8分，黄豆1.9分。把粮食总价用各窟窿户得的总分来除，得出大窟窿户每人应分价值8角的粮食，中窟窿户5角，小窟窿户3角。然后发给每个窟窿户一张记有应得多少价值的粮食的票证。

第二天上午，4月13日，农会主席王喜堂，村长赵正方和

村政府的其他干部以及一些工作队员到仓库分配粮食。

当干部登上存粮阁楼的阶梯时，众多的窟窿户都在下面的院子里等候。这是一个各色人等都有的人群，其中的许多人都在本村近期的历史中扮演过各不相同的角色。寨上原富农商人李封的老婆来了，和她一起来的有当教员儿子李伟树和她另一个儿子的媳妇，那个儿子在查黑地运动后，已随同他爹外逃天津。原保长、国民党特务的儿子李胜昌；制造过整个“秘密特务”冤案的经纪人的寡妻段翠的；以及被控贪污的原村长王绍有也来了。同他们挤在一起的还有一些原干部和几名新干部。

每个人都是兴高采烈的。窟窿户们的手里抓着票证、各式各样的口袋、篮子和麻袋。一个妇女拿的大口袋引起了许多人

分配斗争果实。站在中间的是过去的大烟贩子王英祥。





王文盛的父亲背着一袋粮食。

说笑，那条口袋可以装下她应得的数量十倍的粮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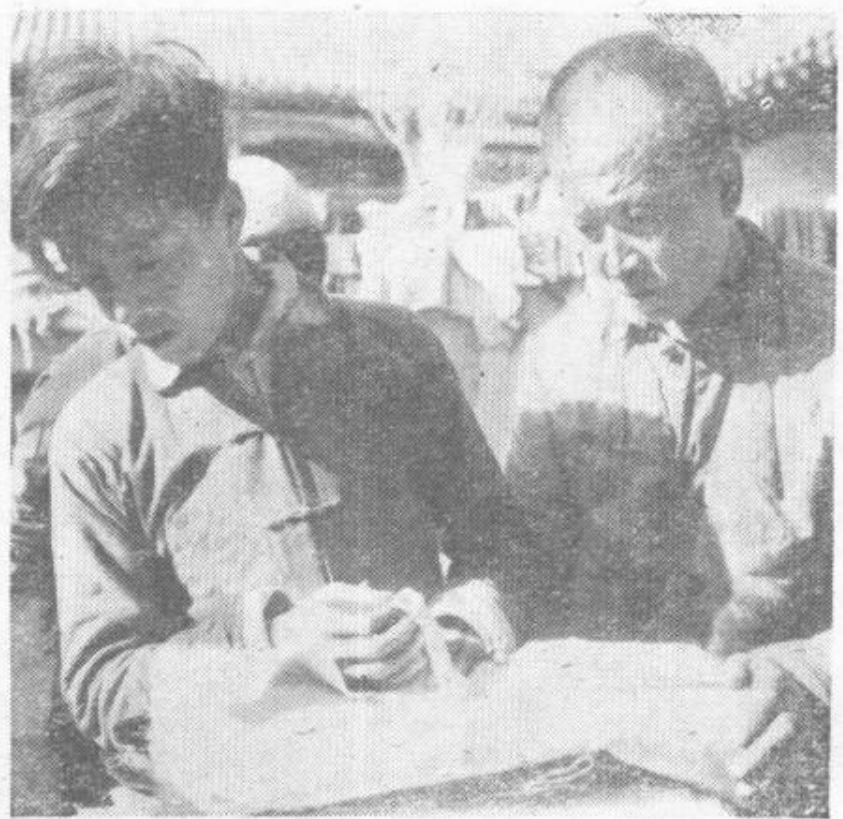
在现有的各种粮食中挑选哪一种，成了大家议论的主题。“我可不要小麦！”王宏双说，“我又没有病。”他打过几年长工，没享受过几次吃白面的口福。

“就是，”一位妇女说，“不吃白面可以，不吃小米可不行。”

寡妇段二德是村里的大窟窿户之一，她希望分到小米而不是谷子，因为她没有驴碾米。

最后，各种粮食终于都摆在阁楼门外的平台上了。由于平台不够牢靠，站不下这么多人，因此，只好一个个地把人叫上去。要把一口袋粮食沿着阶梯背下来，只有身强力壮的男子汉才行，可妇女和老人要找人帮忙也并不困难。

阁楼里的粮食渐渐分光了，院里的人群也渐渐散去，人们



王英祥(右)在出口的算帐桌前。

背着分得的粮食往家里赶去。他们匆匆吃了午饭，以便为下午分配衣服和布料作好准备。

这些衣服的价值和色彩可比粮食多多了。庙院中心的酸苹果树正在茁壮成长，然而，它那粉红色的花朵，在陈列在四周的色泽艳丽的成衣的映照下，也显得黯然失色了。有些东西整齐地摆在条案上，有些堆在地上铺着的苇蓆上，还有些是挂在或系在杈柄和锄柄上的一条条绳子上。干部和贫农团委员们正在陈列货物，以备“顾客”光临。坐在下院桌旁的会计已经准备就绪，当窟窿户拿走挑好的衣物时，就把他们的名字和东西的价钱登记入册。院外，人们正等着让他们入场的通知。

为了避免对便宜货进行抢购，窟窿户被分成每次七、八个人一批，依第一等到第五等为序陆续进院。计算不同等级的人应得多少衣物的原则，与计算应得粮食的原则大体相同。一等

每户可分价值为五元七角七分的衣物，第二等为四元六角七分，第三等为三元四角六分，第四等为二元三角一分，第五等为一元一角五分。

孤儿王康有是头一批进院的。庙门刚一打开，他就冲了进去，紧张地四处张望，然后冲到了堆放着一匹匹原色土布的柜台前。按照他已经出嫁的姐姐的嘱咐，他抓起最大的一匹布就走；这时，寡妇段二德才小心翼翼地迈过从下院到上院的一小段石阶。

别的人对要点什么也都心中有数。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太太蹒跚地走到一堆丝绸前，想找一块深灰色的适合作寿衣的料子。她要的是又轻又薄的料子，以便一旦归天以后，穿着走动起来也轻快些。各色衣服中，哪怕只镶有一小块毛皮的，她也不要，因为那意味着要冒来世投胎为牲畜的风险。在一旁等她挑拣的委员们，对她的迷信不时微笑。

在现场当文书的傅便则拣起一块鲜艳的彩缎，开玩笑地递给了身旁的一位稳重的中年妇女。

分到一堆衣服的孤儿。



“给我？”她惊奇地问道，“这玩意我可穿不出去。”

傅就想随手把彩缎放回原处。但是细丝勾在他因干活而变得粗糙的手上，一时甩不掉。“他妈的！”他讪讪地骂道，“老财主的这玩意儿粘手。”

除了少数人要找做寿衣的衣料外，大多数农民都宁愿挑选手工织的粗布而不要丝绸，其次则是机织的、结实的布料。一个壮汉准备撕一块这种机织布，来试验它的牢固性，就象试手工织的布一样，工作人员吴舫就警告他，这种布经不住他这样大的力气来撕。只是到了所有的手工织布都分光以后，人们才开始挑选机织的布，而且仅仅是为了日后进行交换或卖掉。

一位外号叫做“老葫芦脸”的瘪嘴老太婆，在一堆堆衣服和布料中乱翻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件中意的东西。当她那一批的其

“老葫芦脸”和她分得的一袋粮食。



他七个人都挑完离去后，她还留在那儿，挑选个没完。

“您找什么，大娘？”
吴舫关切地问。

“我在找我自己的东西。”老太太答道。

“你家不是地主吧？”吴舫感到有些诧异。

“不是。是防空洞。”
我把老财主的东西和我的东西放在一起了，真可恶，我的东西也同别

的东西一起被没收了。现在，我到处找也找不着。”她折腾了大半个下午，最后才找到了她要找的东西——一件深灰色的棉衣。

老太太看不上眼的都是些没什么实用价值的东西。一件是印有“回避”两个大字的一面旗帜。它原来属于一个在清朝为官的地主。当他外出时，当差的就扛着这面旗帜走在他的座轿前面开路。还有一把由深红色绸料做的“千名伞”，是赠送给本地一位名医的，它上面用墨笔工整地书写着他病人的名字。那面旗帜由于料子结实，尺寸又够得上做包袱皮，因此早就有了“买主”。但那把伞无人问津。也没人想要那些过去在举行婚礼时，送亲仪仗队打的印有“佛心”字样的旗帜。

有一捆书也没有引起人们的兴趣。李宝恩抱着希望向年轻的教师李为书指点这些书，李为书就一本本地翻阅了一通，接着摇摇头，把它们又捆了起来。这些都是他过去很欣赏的线装书，但现在他主要兴趣在于阅读土改和边区政府有关新教育政策方面的书。

李为书经常被问到贴在各件东西上的标签上的价钱，因为这些临时充当售货员的农民尽管他们服务都很热情，但大多目不识丁。能读会写的人正在记帐，那才象是正经做买卖的样子。每个农民在离场时都在庙门前停留片刻，由文书检验每件东西上的标价，计算总数，然后以此与他们持有的应得份额的票证进行核对。许多农民对他们所选中的东西价值多少心中无数，他们认为，与其挑少了，还不如挑多了保险。因此文书的助手只好忙碌地把一捆捆多挑的东西送回原处，会计在一边埋怨道：“这些妇女！挑选的东西总是比她们应得的多。”

当某人挑的一份东西的价值超过或少于他应得的份额时（超过或少于应得份额的部分为数极小时，用现金付款或补足），

由另一个文书将他的姓名、连同每件东西及其价格一起登记入册。

例如，寡妇段二德是一等窟窿户，应得价值五元七角七分的东西。她名下的细帐如下：

物号	品名	价值(元)
1033	黑毡炕垫	0.40
900	羊毛口袋	0.60
908	被子(新)	0.90
24	丝棉混纺布(有大红花图案) 7尺, (0.14元一尺)	0.98
924	黑布四斤(0.50元 一斤)	2.00
975	黑布二斤二两 (0.45元一斤)	0.96
共计		5.84元
超额		0.07元

贫农团主席李宝有是三等窟窿户，应得三元四角六分的果实。从他的登记细帐上不难看出，他家中有众多的孩子需要抚养。

物号	品名	价值(元)
860	黑布头	0.10
825	一包布头	0.20
961	黑布二斤(0.35元一斤)	0.70

168	三件童衣(细红布)	0.20
722	童裤(细红布)	0.05
97	两件童上衣	0.08
816	小孩围嘴布	0.08
635	印花布	0.10
439	白包袱布	0.07
757	小孩用浅蓝色背心	0.05
785	菜绿色裤子	0.05
693	红色裤子	0.15
252	粉红格条纹裤子	0.45
251	裤子(细蓝布)	0.30
535	小条纹黑褂	0.10
744	毛巾	0.04
859	黑布头	0.10

共计 3.27 元

余额 0.19 元

为避免院内拥挤，每个窟窿户只许一人进院挑选东西。因此，当每个人扛着一捆东西出现在庙门口时，立即被等得不耐烦的家里人围住了。

战士王尚林的母亲在路上就被儿媳拦住了，她执意要当场打开包袱，看看里面的每件东西。“怎么，连一块绸子也没有？”她问道。

“我们要绸子干什么？”老太太反问。

“当然是给您做寿衣。”她的儿媳答道，“您死的时候连件穿的都没有。”

“我一时还死不了。”老太太又把包袱系好了。但是，儿媳对自己应办合适的丧仪的关切，显然使她感到满意。

第二天早晨，工作队、村干部和各片的代表一起讨论了对分配工作的意见。据汇报，有一两户农民觉得自己本应是窟窿户，但被否定了；或者觉得自己本应分得粮食、又应分得衣服，但只分得了其中之一。也有这种意见：有些并不真正需要的人，分得了果实；有些本应分得很少的人，却分到了很多。

有位代表听到有人说：“王义分得的东西，肯定超过了他的需要。有一半东西是为他儿媳挑的。”显然，为避免急性子的儿媳发脾气，老人尽量满足她的要求，尽管这意味着要把他份内的很多东西给她。

“不少中农分到了果实，而很多贫农却什么也没分。”有一位代表说。

“是啊。”副村长王文盛笑着，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中农分到的果实真不少。但当村政府要布置任务的时候，我们贫农可是必须完成的。中农可溜之大吉了。”

“不让中农分得些果实是毫无道理的，”党支书王绍贞说。“有些贫农的生活比中农还好，只是在翻身后没来得及改变他们的成分。”

大家觉得这个解释很有道理，也就不再口出怨言了。

“总的来看，”罗林说，“村里四百二十户人家中，是真正感到不满意的只有三、四户。因此，我认为，分配工作可以说是成功的。”有人低声表示赞同。

“但我听到了一种意见，想在这里提一下。”罗林接着说，“我听到有人说，先让大窟窿户进院挑东西是不对的，因为后进进去的小窟窿户，只能挑别人挑剩的东西了。他们说，在每一

批进庙院的八个人中间，应该包括各个等级的窟窿户。”

“我也这样想，”一位代表小声对他身边的人说，“那确实不公平。”

“据我看，”罗林继续说，“让最需要的人最先挑是正确的。这有助于他们翻身，增加生产。别的方法不过是搞平均主义。”

那天下午，一共分掉价值四百多元的东西。但还有价值四十元的东西未动。它们是准备为填补窟窿而捐赠了土地和房屋的三十六户中农作礼物而留存的。其中有多段色彩鲜艳的布料，生活富裕的中农，是喜欢用这类衣料来打扮他们的孩子的。

最后决定，最简便的分配方法是，把这些布段分成价值相等的六堆，然后，三十六户中农按每六户一组分成六组，由各组自行分配。有一组深受村里经常出现的平均主义的影响，他们决定把每块布料分成六段，结果，每家分得的都是一堆窄布条，而没有一条大得能做衣服的。

就整个分配来说，共有价值四百五十多元以上的布和粮食被分配了。这一分配满足了最贫穷的农户的需要，为他们提供了可以用来出卖或换作生产资金的物资；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提高了他们的干劲。这一切都是在没有侵犯中农利益的基础上完成的。

全村的总结

4月14日

到了1948年4月14日，也就是运动开始七个星期后，这次运动基本上宣告结束。全村的最后一次大会，是为了总结这七个星期的运动的经验，吸取教训。

在做预备工作时，工作队和新的村干部一起就所要研究的问题以及怎样提法进行了讨论。罗林、贫农团主席李宝有和农会主席王喜堂在交换意见时，明确了一些主要问题。

“我们应当让群众谈谈他们对分配果实的方法，有什么意见，”李宝有说，“这是群众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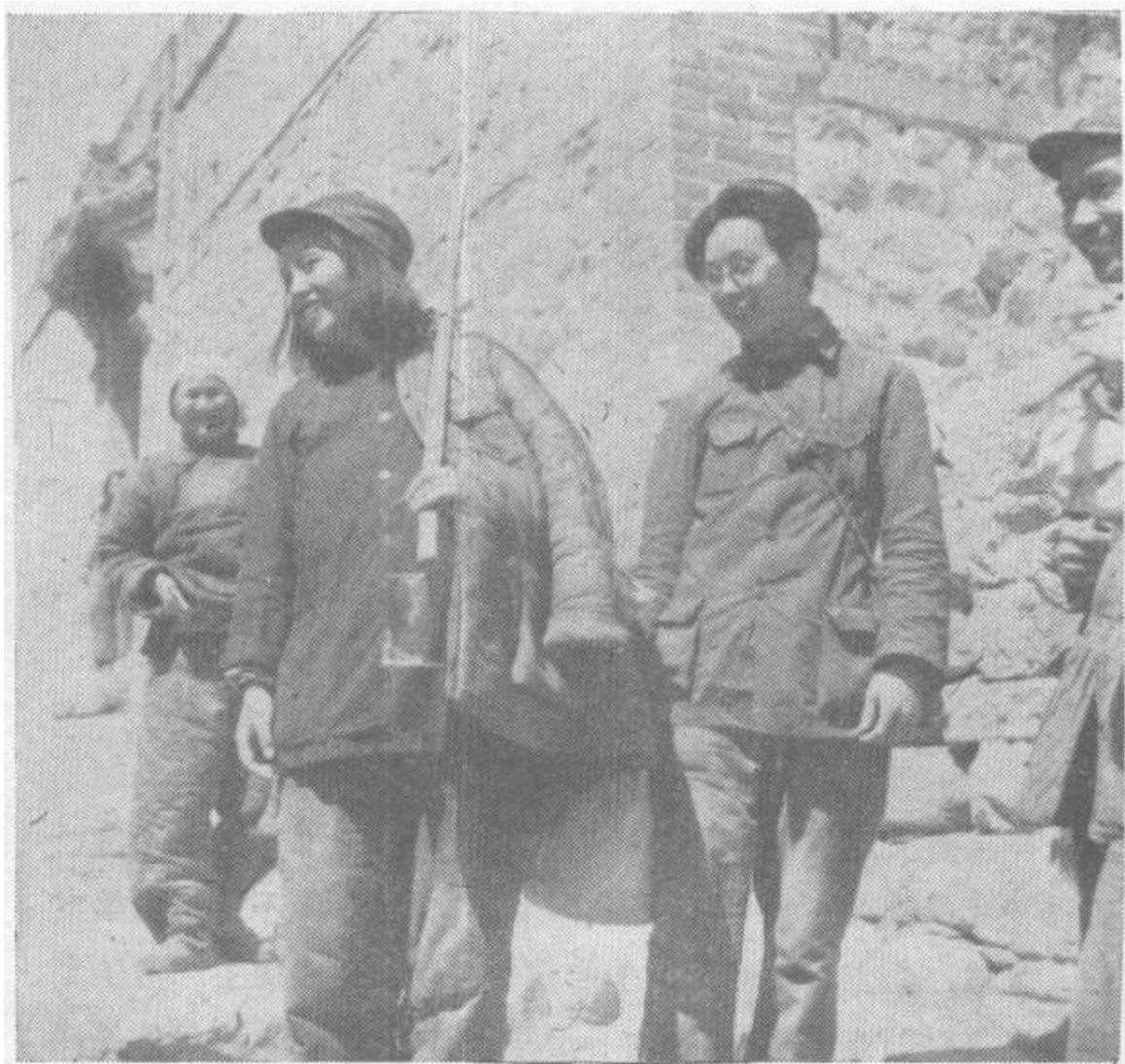
“这只是他们的一个要求，”罗林说，“我们应当向群众解释，没有很多东西可分，即使有的话，也还会有人不满意的。

“但是群众还有别的要求，这就是发展生产。这是正路，我们应当带领他们走这条路。其它的不过是死胡同。”

“对！”王喜堂赞同地说，“主要的是激发每个人的生产热情，不管他们对分配果实的工作是否满意。”

李宝有承认，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同时决定，作为“骨干组织”贫农团的主席，应由他在这次全村大会上首先发言。

为了召开最后这一次大会，借来了一盏汽灯照明。但当天晚上，当李宝有站在那幅被灯光照耀着的毛泽东画像下时，他



工作队员吴舫、何燕凌离村。

似乎有些慌张。

“在过去的四五十天里，”他开始说，“我们成立了贫农团，组织了农会。我们还召开了大团结会议，建立了村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这些组织，我们调剂了土地，最近又分配给窟窿户一些房屋和财物。但是，”他停顿了一下，犹豫地说道，“我们担心填补窟窿的工作还是不够令人满意的，因为窟窿很多，而可分的东西很少。窟窿户和财物不是由全村大会评定，而是由少数人来评定的。”



工作队的冷冰、罗林告别十里店。

李宝有支支唔唔地说出最后几句话，他似乎也意识到自己走进了死胡同，过多地强调了分配工作的缺点，而不是强调其成绩。显然，李宝有虽然在上午的预备会议上，表面上同意了罗林和王喜堂的意见，但他在内心里并没有想通。他自己仍然受到那些比较落后的农民的影响，认为只有绝对平均地分配果实才公平合理。尽管他还摆脱不了这种想法，但也明白那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

由于思想上的混乱和矛盾，他一时说不上话来。他此时只是不自然地讪笑着，并向身旁的王喜堂投去求援的目光。

农会主席站起身接着发言。他掌握自己和会场都是应付裕如的。

“确实，可供分配的财物不是很多。但总的来说，分配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房屋的分配情况也同样如此，我们的房屋

情况也不太好，有些被分配的房屋盖得也不怎么好。但目前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最需要的是有遮风避雨的住处。只要把屋顶修好，不漏就行。

“尽管没多少东西可分，但在中农捐献土地、房屋的帮助下，我们克服了困难。大家有吃有住，就安心了。在过去的一两年里，有少数人是挣扎着过来的。但从今往后，他们将和其他人一起，享受自己辛勤劳动得来的果实。

“这一切，都得到了工作队的很大帮助。在工作队到来之前，我们还不大会懂得土地法大纲。现在，我们把东西都分配了，并根据土地法大纲作了调整。现在是一家有一份，一个萝卜一个坑。

“如果有些人还对分配工作感到不满的话，我们将尽力说服他们。人心安定是搞好生产的必要条件。如果有些人的不满是有道理的话，我们还有些贮备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重要的是，我们足以生活下去了。可以肯定，我们再也不会挨饿了。大家都记得灾荒年月是什么样的光景，那时，吃的是野菜，五口之家每天只靠一两小米过活。那时，把一穗玉米看得象生命一样宝贵。尽管那么苦，我们还是活过来了。

“今天，我们要努力劳动，生产，把我们自己的地种好，在我们自己的房子里把日子过好。我们应当勤俭，一年到头穿着漂亮没有好处，免得来要帐时东躲西藏。过去，有些老中农担心会挨斗，但调剂只搞这么一次，因此，不必担心了。

“这么好的春天已经有多年没见过了。真是风调雨顺。只要我们为自己，为军属努力劳动，就会消灭贫困。我们自己的劳动是富裕起来的保证。”

王喜堂的一席话，把群众的思想从李宝有在开始讲话时把他们引进的死胡同里带了出来，并把他们引导上生产的大道。

接着，冷冰站了起来，对运动作了系统的总结。

“我要讲的有四点。”冷冰说，“第一点、土改复查；第二点、党群关系；第三点、生产；第四点、民主。

“我们对房屋和土地进行了调剂，这是最后一次的调剂。有些人对这一点还不清楚，我想明确地告诉你们，以后不会再搞土改运动了。十里店的土改运动已经完成了。

“有些人以为，土改是使每个人都绝对平均，就象我们用斗量粮食时要刮平一样，对件件事都要搞得一样平均。这些人抱怨补得还不算齐，因为老中农的平均产量仍然比一般的高。好搞平均主义的人以为，我们现在宣布不再调剂土地只是权宜之计，是为了把生产搞上去；到了秋天，又会搞一次运动。他们听说，搞完一场土改运动需要二、三年的时间；既然我们十里店只搞了五十天，他们不相信这场运动就结束了。

“作为一个工作队员，并代表共产党组织，我要说的是，所有这些疑虑都应当打消。《人民日报》已经明确地指出，这是最后一次土改运动了。而且，也不能以这场运动与以前的相比。

“在过去的运动中，有些无辜的人受到斗争。现在，不再有人被认为是斗争对象了。目前，村里只有一个地主，而且，也被斗争过了。只是由于他参加劳动的时间还不够长，因而还不能算是劳动人民里的一员。鉴于他生活有困难，我们也象对其他窟窿户一样，给他补助。

“这表明，我们的目的在于消灭封建剥削，而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至于那些被错斗了的中农，除已经补偿了他们的损失外，我们还要向他们赔礼道歉。错斗的责任不在于村干部，而在于上级领导。那时候还没有下达划阶级的指示，因此，甚至一些领导干部都不清楚怎样划阶级。

“那种人人补齐，样样拉平的想法是错误的。过去的平均，是剥削造成的，但现在存在的平均，可不是剥削造成的，这只是与中农相比平均而已。如果中农的地比别人多的话，这是他们自己劳动的结果。他们打的粮食自然也比别人多。从他们手里拿走任何东西都是错误的。中农并不雇长工，他们和贫雇农是一家人。因此，强迫他们交出任何多余的土地都是错误的。有些人可能觉得，只要贫富没有绝对平均，就是还有窟窿户；然而，由于已经没有地主和富农，我们再也拿不出斗争果实来补窟窿了，就只能拿中农的东西来填补窟窿。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我们绝不能侵犯中农利益。共产党不允许这样做，毛主席不允许这样做。”

“至于结束这场土改运动，确实要两三年的时间才行。但是，那是指整个解放区而言，不是十里店一个村。”

“以武安九区来说，我们五六十个人组成的几个工作队已经开展工作将近四个月了，但土改复查和整党工作还没搞完。而武安一共有十一个区。因而我们没有时间在十里店把运动再搞一遍。”

“从全面看，村里的调剂工作做得是公平的。但你们还可以提意见。我知道有一两户处理得不够公平，村政府正在采取措施解决。总的来讲，由于许多中农户的帮助，十里店已经没有窟窿户了。每户都达到了中农的水平。甚至连剩下的那户地主，也将在年内改变成分。现在，大家的任务是组织生产，使自己富裕起来。”

在冷冰接下去讲第二点党群关系之前，党支部书记王绍贞扼要地谈了党员对这个问题的体会：

“在整党的过程中，”王绍贞说，“我们党员检查了自己的所

作所为，群众对我们作了批评。我们开始认识到自己犯了许多错误。对于大家的批评，我们非常感谢，保证永远不报复。受到这种教育，我们非常高兴。我想，如果我能早两年受到这种教育的话，就不至于犯这么多错误了。借此机会，我想对大家表示感谢，并保证，今后要做个好党员，做人民的忠实的长工。”

冷冰又接着作总结：“党群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自从开展对党员的教育以来，他们有很大提高。

“的确，过去有些党员办过错事。但对这些错误，我们应当把党员自己的责任和上级领导应负的责任区分开来。例如，有的中农被错斗过，我们就不能归罪于十里店的党员干部。因为直到今年一月，我们才收到有关划阶级的文件。

“另一方面，党员应对自己不良的工作作风，如虐待群众和道德败坏等等负责任。但是，即使确是他们的错误，我们也必须分清哪些错误是严重的，哪些是不严重的。”

冷冰接着宣布最近支部会议上通过对一些党员的处分。

然后他说：“为了改善党群关系，正在督促党员实现自己做人民的好长工的保证。

“因此，从现在起，我们要注意党员的具体表现。我们希望他们在生产中起积极作用。他们应当成为助人为乐和团结全村的模范。同时，在同群众的交往中，他们应当谦虚谨慎。

“另一方面，群众应当懂得，只要党员承认错误，并决心做人民的好长工，作为党员，起领导作用仍然是他们的责任。帮助群众富裕起来是党员的责任。村里每个人都应懂得，共产党本身是好的，它是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不要以为党员是开秘密会议的神秘人物。他们开会，是

因为他们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的成员。他们已经作出决定，将邀请群众参加党的有关会议，并且参加讨论。每隔三个月，支部将邀请群众派代表参加支部会议，提出意见和建议。这样，就象在整党和教育党员期间那样，群众将继续帮助党。

“有些批评过党员的人，特别是那些自己的意见不太正确的人，现在有些不敢同党员打交道了。我在这里重申，不论你们的意见是否正确都没有关系。党员应主动和群众建立密切的关系，忘掉不正确的意见。我们希望，将来党员和群众之间，不再发生任何误会。正如我们讲过的，党员对群众不能记仇，报复行为是绝不容许的。

“带领全村群众是党支部的责任。我们十里店支部过去确实带领了群众；他们领导了翻身运动。村里的干部几乎都是党员，总的来讲，他们是为人民做了工作的。将来，他们还要领导全村。

“但是，党支部在过去包办了一切。从现在起，党支部的领导将通过党员在群众中做工作来实现。支部当前的任务是领导生产。这就要党员先在群众中征求意见并给支部汇报。根据这些汇报，支部好决定采取什么措施。支部作出决定后，还应该把它交给各个群众组织考虑。

“例如，王喜堂、傅培常和王守和是党员，同时又是农会委员。因此，他们应把支部的意见传达到农会。如果农会同意的话，那自然好。如果不同意的话，党支部不能简单地向农会或村政府发号施令。它只能通过党员做工作来引导。

“村长也要按这个章程来办事。如果他是一名党员的话，他只能把支部的意见传达给村政府委员会。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他把支部的意见强加于村政府。

“由此可见，支部或党员都没有什么神秘的。他们唯一的任务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利益想办法。所有那些合格的、愿意参加党的，我们都欢迎。因此，村里的党员和全体群众应当团结起来，象一家人一样。他们应当共同加紧生产，使各家各户都富裕起来。”

冷冰接着讲了他要讲的四点中的第三点。

“今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生产。明年，后年也是一样。”

“十里店过去曾是生产模范村，但它有些缺点。举一件事来说，搞互助就不是完全自愿的。参加互助组不都是全凭自愿，而且，一个人一旦加入了互助组，他有时想外出跑点脚的话，就不能了。”

“因此，第七组和第八组的人一直在说：‘互助组有什么用？我想要的东西都有了。没有互助组，我照样过得不错。’他们以为自己就象神话中的八仙一样，各有过海的神通，有的乘船，有的站在叶子上、有的驾云，等等。”

“我听说在别的村里，还有其他种种混乱思想。有人觉得如果生产的粮食太多了，自己可能会被当作‘大户’斗争。因此，他们觉得还不如按老样子办事稳妥。有些人害怕把粮食征走，就拼命吃掉。”

“这一切都表明，过去运动中的错误，至今仍在影响着他们。因此，我要明白地向大家宣布，应当尽最大的努力来提高生产，并且使自己富裕起来。互助就是为了增加生产。”

“但是，互助应当是自愿互利的。因此，我建议现在把互助组重新组织起来，并且，要确保把它们建立在确实自愿的基础上。老互助组长应当帮助各组的组员开会，总结过去的经验，看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然后，再征求组员的意

见，看他们是否愿意再加入互助组。在检查和讨论了过去的经验之后，组员们将会认识到互助组的好处。他们也许会继续留在原来的组里，或许也会另组互助组。今后如果个别人愿意单干的话，也未尝不可。即便有一两个组不想搞下去了，也是可以的。但总的来讲，最好现有的各个组都继续搞下去。

“现在，我要讲第四点，也就是最后一点：民主。通过整党和复查运动，十里店有了进步。这全是靠民主才做到的。

“但我们应当记住，民主必须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而且，民主要有领导。现在，新干部感到在村里办事很难。他们还不是很勇于负责。我提个建议，只要他们干的事是符合大多数群众的意愿的，就应当放手大胆地干。

“少数应当服从多数。这并不是说要剥夺哪个人发表个人意见的权利。但他不能把个人的意见，当作全村的意见提出来。他应当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还是要服从大多数人的决议。村领导应当按照大多数人的意见办事。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允许干部不尊重群众，或以其它粗暴的方式对待群众。

“作决定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搞清这些意见是代表少数人的，还是多数人的；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注意到这些意见是否正确，从长远看是否有利。同时，我们还要执行上级的指示。如果群众不同意上级的指示的话，干部应当教育和说服他们。这就是领导。但如果这些指示确实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话，可以要求上级领导对这些指示加以修改。

“领导并不意味着随意支派群众。另一方面，民主也不等于无视政府。我听说有的村，新干部叫人们开会很难。他们抱怨说，为叫人们来开会，钟都快敲碎了，腿都快跑断了。我请大家注意，不论什么时候开会，那些应当参加的人，都要到会。

但较大的会议，不应当安排在农忙时节召开。

“村里所有人都应坚持真理，不抱个人成见。据我的经验看，十里店群众的确是维护真理的。他们想要增加生产，富裕起来。我希望新干部和党员领导人民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村领导应当有干劲，不能落在群众后头当尾巴。应当区别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

“依我看，今天十里店的问题不在于群众乐意不乐意被领导，而在于新干部和党员怎样去领导。不能放松领导。有能力、有经验的干部应当帮助那些新干部。

“应当由谁来领导，谁应当被领导呢？例如，王喜堂是党员，在党内，他要服从他的党小组长和支部书记王绍贞的领导。但当王绍贞被邀请参加农会委员会的会议时，他应当听从农会委员会主席王喜堂的领导。

“归纳起来就是：既有民主，又有领导。两者相辅相成，缺了任何一个就没法办事了。领导者既不能压制群众，也不能做群众的尾巴。”

会议就以这句警句结束了。

工作队回村检查工作

5月28日

生活和工作在武安九区各个村的所有工作队的成员们，都同农民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即使在工作队由一个村转到另一个村以后也没有中断。当然，工作队没有很多空闲时间参加与运动没有直接关系的日常活动，但他们经常在田间小路上、公路上、集市上或商店里碰到他们的农民朋友。工作队员走后，当村里发生了什么棘手的问题的时候，农民们还会三三两两地到河西的报社去找他们。^①

当九区绝大多数村子的运动结束时，中央局的这个工作团召开会议作了总结。会议的结论是，尽管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新干部还没有能在村里进行坚强的领导。会议还认为，形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工作队领导运动的工作方法不当。

为了解决和改变这种局面，这个工作团分派了几个三人小组，返回各村四、五天。他们的任务是，对运动进行验收，并和农民一起克服工作中的缺点。

派到十里店的小组包括队长罗林、女队员吴舫和她的丈夫李原。李原以前是在别的工作队工作的。他们于1948年5月

^① 当时武安九区各个工作队属于一个工作团，基本上是由晋冀鲁豫中央局的党报《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组成的。——译注

28日下午到达十里店，离运动结束的日子已有六个多星期了。当他们穿过寨的东门往下街去的时候，受到农民们又惊又喜的欢迎。当然，村里也有人开始散布当时国民党制造的谣言，说运动搞得不满意，又要重来一遍。

在解释了检查工作的真实目的之后，这谣言很快就被一连串友好的笑声戳穿了。检查组在下街找到住处后，就召集一连串大大小小的、正式或非正式的会议，有时同干部们一起开，有时同委员们一起开，有时同党员一起开。

工作队很快了解到工作队离村后所发生的问题。当地的算命先生又开始活动了，装神弄鬼地预言，什么时候这个或那个战士要从前线回村；或则求神保佑即将成熟的小麦免遭雹灾。小贩又偷偷地卖起了敬神的线香，还散布谣言说，冶陶镇上那座倒塌了的神农(药王)庙即将重新修复。村北头，就在村长赵正方和农会主席李宝有的鼻子底下，赌博又兴了起来。

村干部对这些事都了解，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加以制止。“我当然知道算命是迷信。”副村长王文盛说，“我告诉我女人不要去。”

“你也劝说别的妇女了吗？”罗林问道。

王文盛尴尬地笑道：“实际上，我没有同任何妇女谈过这类事。我不想让人骂我爱管闲事。”

党支部书记王绍贞也抱同样态度。他说：“我知道迷信是不对的，我还同他们争论过，如果鬼神能使我躺下生病的话，我就信。除此之外，我什么工作也没做。我担心，如果我干涉的话，人们就会象在整党期间那样，对我生气。”

干部和委员们，不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对群众意见都是这样敏感，这样怕被别人说成是独断专行，以致放弃了领导。

在会上，只要一个人有异议，就迟迟不能作出决议。

赵正方说：“我们互助组选举组长时，会开到半夜也没做出任何决定。最后，我只好建议几个人来担当这个职务。可是有些群众就开始咕哝起来：‘干部又想骑在我们头上指手划脚了。’”事实上，到会的八十个人中，只有两人反对，但赵正方就把他们的埋怨当成群众意见了。

干部的被动状态还同另一问题有关：在村政府成员中分工不明确。事无巨细，赵正方都得自己动手干，因为他不敢发号施令。同时，别的干部也得不到协助。

“每个人有问题都来找我，甚至小学教师也来。”财务委员李宝恩埋怨说，“有关保管上的事情都要由我来负责。可是，当我填不了区里要本村填写的一些表格而去找王福星帮忙时，他说他只是村里的文书，不管这些事。然后我又去找财务会计，他说他只管记帐，不管给我填统计表。尽管我家有八口人，但都是小孩子，特别是在我大儿子参军后，更缺少劳动力了。我整天为村里的事东跑西颠，连山坡的地也没种上。我现在真不想干下去了。”

正如村里党员对工作队说的，问题在于村里只有民主没有集中。可惜的是，对工作队讲是一回事，对群众讲是另一回事。

“不当干部的党员不再领头了，”党支部书记王绍贞苦笑着说，“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如果选我们干什么事，尽管别人躲避责任，我们照干不误。当群众看到我们不计报酬地工作时，他们说：‘党员确实肯干，他们还是好样的。’”

“但除了这些外，我们就不知道该做什么好了。例如，叫我参加村政府的会，可是在这之前我们没有在支部会上讨论过这

个问题，因此，我就不知说什么好。我只能提出个人意见。”

在过去，党员不仅事先把事情讨论好，而且还把自己的决定强加给群众。尽管经过运动，他们认识到这样做是不对的，但还没有摸索到新的工作方法。“问题在于，”王绍贞说，“在过去，当党员的身分还没有公开以前，我们的集中太多了。而现在，民主又太多了。我们害怕自己专断，就变得消极起来。”

党员还感到群众不再尊重他们了。其实，他们错了；那些喜欢对党员进行攻击的勇敢分子在村里没有多大市场。新干部特别称赞党员过去的功绩。他们的意见只是党员对他们帮助指导不够。

副村长王文盛说：“新干部觉得，如果他们同党员保持密切联系的话，就能把工作安排好。”

党员李宝恩说：“整党期间，我们被批评得不象样子。其实，我们拼命为群众工作过。我觉得，最好让群众也来当一当‘官’，体会一下做‘官’的味道怎么样。”

其他的党员都点头称是：“他说得对。”

罗林和其他队员意识到，他们自己对党员之所以抱这种态度是有责任的。运动期间，由于怕给群众泼冷水顾虑太多，他们没有能清除“贫农路线”的所有影响，他们对当时普遍夸大党组织不纯的倾向也是跟着走的。这样，就背离了党的路线。部分原因是他们还没有克服掉小资产阶级的通病，即对人家的短处比对人家的长处发现得快。尽管他们指出了村里党员带头进行抗日和反封建斗争的成绩；但在批评党员时，工作队的态度是如此尖锐；相比之下，他们对党员成绩的肯定就显得太抽象了。

党员们在一开始就受到了关门教育，接着又受到公开批

评，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公正的批评，但又不容答辩。之后，又要当众检讨自己的过失。只是到了运动后期，才允许他们对某些无理指责作有分寸的解释。在整个这段时间，他们基本上是被孤立运动的潮流之外了。

以后，作为使党员们“立功赎罪”的手段，才要求他们积极投入运动。参加运动不论多么积极也不等于领导运动；而共产党员的职责在于领导。

回村检查的工作队和党支部一致认为，运动中发扬民主搞过头了，产生了极端民主的现象。目前需要的是这样一种工作方式，即党支部能够把自己的意图交给群众，让他们来讨论、改进，并在绝大多数人同意的情况下执行。换句话说，民主集中制不仅是党支部所需要的，村里所有的组织都需要。然而，应当由党支部树立一个民主集中的榜样，并帮助其它组织来学习这个榜样。

展 望 未 来

“太行第六军分区司令部正在组建一支警卫部队，要求武安县第九区动员五人参军，其中一名由十里店出。”

当这一通知传到村里时，大家对如何征募这名新兵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村长赵正方意见是：“我们明天开一个会，选一个。”

其他人笑道：“什么！选举志愿兵？”

赵正方不好意思地收回了自己的建议。村干部和党员们对这种极端民主化的建议置之一笑的事实表明，检查组同他们交换意见已经产生了效果。

区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给大家上了另一堂民主课。这个代表大会将处理如何更为合理地摊派税款和支前任务、扩大生产和选举新的区干部等问题。极端民主化问题也将成为一个主要议题。

在十里店，区人民代表候选人和代表大会议事日程，首先由村里各片讨论，然后提交村代表大会。在选举的每一阶段，讨论会都涉及到十里店村中存在的极端民主化现象。在这次选举中，不象上次选干部时那么强调候选人的忠厚老实了。现在，人们更加看重的是候选人为人民服务的才干和能力。同时，还指出：凡有赌博、迷信、偷盗、开会不积极和其它有害于公共事业毛病的

人，不适合当候选人。

极端民主化的问题已被提交全村公开讨论，并提出了克服它的措施。有些措施本身就有封建意识的影响，这反映在一位老农民的建议上。他说：“抓住了赌鬼就给他们脸上画眼镜，叫他们游街。”在他看来，眼镜是地主的标记。对其他品行不端的人，也提出了类似的惩罚建议，其中包括强迫他们象牲口似的拴着铃铛、套着缰绳游街。

这一次，党员为引导群众作了特别的努力，而且，是党支部书记王绍贞提出的建议最终得到一致赞同。他的建议是：对初犯者，由个别或几个村干部找他谈话，批评教育；对再犯者，在全村大会上提出批评；对三犯者，由贫农团或农会把他除名；对四犯者，送交区政府法办。

在统计票数的当儿，王喜堂讲了话。他着重讲了思想教育的必要性。

“在下沟固镇，有人抓住一个小偷，并揍了他。但那小偷说：‘你不应该打我。’群众也认为应当教育他，而不是打他。我们十里店的情况也是一样。在讨论如何对付巫婆时，有人开玩笑说：‘可以从寨后的山上，捉几只蝎子放在她裤子里，如果她屁股不来回乱扭的话，就说明她确实有些法力。’还有人建议把那些破坏民主秩序的人，如那个巫婆，捆起来打一顿。

“这些建议，在一方面说明了群众的觉悟提高了，他们不要迷信，并且想制止它。但我们应当正确地处理这些问题。我们可以请巫婆参加村里的会，让她当着大家讲讲，她经常在背地里对妇女们讲的神呀鬼呀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并且，让她解释一下这些神鬼都干些什么，怎样干法。然后，我们可以同她辩论，可以教育她和所有听信她的人。

“我们可以征求大家的意见，看大家要不要她装神弄鬼。如果大多数人愿意的话，按照民主原则，我们当然让她继续干下去。事实上，只有少数人信她。”

工作队员李原带领大家进一步展开讨论。他说：“有些人把最近发生的所有问题都归之于民主；但实际上，错误并不在于民主，而在于滥用民主。”他解释了个人发表意见的权利，以及服从大多数人决定的义务。

李原说：“在教育党员和整顿党的队伍方面，也有些误解。有人似乎认为，‘过去我们斗过地主，现在该轮到斗党员了。’然而，我们解放区所做的每件大事，都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我们村也是这样。如果没有党，我们就不能打败国民党和日本鬼子。没有党，我们也就不会有土地法大纲。没有以前的土改运动，土地法大纲也绝不能实现。谁领导了十里店的运动？村里的党支部嘛！

“确实，我们的十里店党支部犯过一些错误。它的工作作风也有些问题。因此，它没能百分之百，而只能百分之八十地尽了它的职责。这就是说，我们要克服它的缺点，而不应抛弃它的领导。我们教育党员和重建党组织，就是为了铲除坏的工作作风，建立好的领导。

“但是，工作队走得太急了，留下了一些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党员和群众很不理解。现在，我们要向大家讲明：过去是由党支部来领导，现在和将来也是由它来领导。

“村里各个组织在讨论问题和制定计划的时候，应考虑党支部的意见。如果你们认为党支部的意见正确，就应当执行。如果你们觉得这些意见不正确，就要同党支部一起商量。必要的话，党支部可以把意见反映到上级，请上级修改，以适合我

们的需要。

“没有党，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摧毁封建势力，我们也不能翻身。在今后的几天里，我们要帮助你们吸收新党员，加强党支部的力量。”

过后，在村干部会上，罗林说：“在我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区天天都在扩大。不久，党将要领导整个中国。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的党员。党员象长工一样，他们越多，为群众谋利益的人也就越多。

“但是，谁雇长工也不会不加挑选。因此，党支部要求群众来帮助它进行吸收新党员的工作。它已经请贫农团推荐了它认为够条件的人选。”

公开征集新党员在十里店是件新鲜事。过去，在全部或多数共产党员都是做地下工作的时候，这样做是根本不可能的。

“毛主席爱劳动人民，”支部书记王绍贞在贫农团的一次会议上说，“而且，共产党是劳动人民的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请你们来帮助。

“你们推荐的人，就象是没有烧过的砖坯。我们将在支部内把他们推敲一番，看看谁符合党员条件。”

工作队员解释说，共产党员不仅要正直、老实、勤恳，而且还要积极。“有一个村的农民以为，一个好党员就是个老好人。”罗林说，“他们就推荐了一个人，这人同村里的每个人都很亲热，但他同时跟老财也很要好。如果党支部由这样的人组成的话，那么，永远也推翻不了封建势力。这样的人可以当个老好人，但不能当个好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只能同群众一条心，不能同地主一条心。他坚持正确的，反对错误的，而且不怕得罪人。

“一个党员不仅要自己这样做，还要使别人跟着这样做。他应当清楚群众心里想些什么，并且为群众谋利益。

“只有发现这样的人并吸收入党，人民才找到了真正的好长工。”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贫农团推荐了四十多个人；男的、女的、贫农、新中农、老中农都有。党支部已经声明，个人也可以申请入党，不受贫农团是否推荐的限制。结果，提出了四十七名让支部考虑。

当开始衡量哪个够格，哪个不够格入党时，党员的态度是严肃的。参加领导着上亿农民闹翻身的党，决不是闹着玩的。名单上三分之二的人因不够格而被支部否定了。被刷掉的人中，有些是因为自私，不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另一些则因为好计较个人恩怨；但更多的人是由于本人消极，不愿意在可能得罪自己熟人的情况下起来坚持真理。

即使是支部仔细挑选出来的那些人，也没有立即被吸收入党。罗林提醒大家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吸收新党员不要降低标准，只能吸收具备党员条件的人入党。”他还警告说，不要一下子吸收太多的新党员，以免超过支部的吸收能力和教育能力。

村里大多数人都感到，在领导群众斗争时和接受群众的批评意见时，共产党员具有一般人少有的胸怀。大家已经估计到有些候选人可能具有各方面的条件，只是缺乏一条，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勇气。为此，作了如下的安排：对那些看来基本上可以接收入党的人，由最了解他们的支部成员出面进行个别交谈，从中再加以选择。经过这次挑选后，原来的四十七人中只剩下了八个人。

八个人之中有李宝有，他工作出色，也显示出领导才干。另一位在组织往前线送公粮中起了带头作用。还有两位在过去曾被错定为特务，现在已得到纠正。另外一名是妇女，以她为例子可以看出，党员的眼光要比其他农民远大。在他们看来，同她在发动和组织妇女的工作中所表现的能力相比，关于她的一些流言蜚语和所谓过去有过“行为不端，”都是次要的。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个合适的发展对象的，受人爱戴的村会计王福星，也被列入名单。另外，还有村长赵正方和副村长王文盛。他们俩都承认自己有缺点，但支部认为，他们的缺点可以通过各种实际锻炼逐步加以克服。

对李宝有作了长时间的讨论。大家都同意，作为贫农团主席，他很有能力，干得也出色。但王喜堂说：“我们必须对党负责，采取客观态度。如果一个人够格的话，不管他是谁，我们都应当吸收他；如果他不够格的话，我们就不吸收。李宝有工作干得很好，又有领导能力。但他有老好人的毛病。他根本不应该同意给傅高森一份斗争果实。另外，他明知村北头有人在赌博，但他一点也不过问，因为他不想同自己的邻居发生任何争吵。因此，我认为，在吸收他入党之前，应让他先改正自己的缺点。”

王绍贞也认为李宝有有缺点。“但是，”他说，“我们必须考虑全体群众和党的利益。是在党内教育他好呢，还是在党外好？我认为我们应当吸收他入党。必要的话，可以延长他的候补期。”

王喜堂不同意这个意见。最后，罗林加入了讨论。他不仅作为一名工作队员讲话，而且，也作为一名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发言。他支持让李宝有入党的意见，又补充了李宝有的几条优

点：

“象王文盛一样，李宝有是自己主动要求入党的。这表明，他的政治觉悟，在某种程度上比那些没有这种要求的人高。他和王文盛都没有犯过什么大错误。他俩都可以在党内而不是在党外教育好。另外，吸收他们入党，对村里的工作会有很大帮助。”

王喜堂终于被说服了。支部一致同意把李宝有列入发展对象之内。

党支部借用了一个过去地主家的庭院，作为举行新党员入党仪式的场所。那盏在以前的运动中照亮过许多重大会议的会场的汽灯，此时，又被挂在一棵开着花朵的洋槐树上。一面印有金色镰刀斧头的红色党旗，挂在用作讲台的门廊后墙上。一幅毛泽东的像，贴在门上。除了支部成员和发展对象外，贫农团委员、农会委员、村政府成员和村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也参加了这一仪式。

“过去我们接收新党员入党时，”王绍贞对他们说，“可没有这么隆重的仪式。一下子吸收这么多新党员，邀请这么多人参加，举行这么庄严的仪式，还是头一回。这是我们有生以来最高兴的时刻。”

罗林表示同意：“欢迎新党员入党，就象迎接战士入伍或祝贺婴孩诞生一样。人民在运动中获得了斗争果实，现在党支部正以这八名新党员入党的形式，收获自己的果实。”

罗林对贫农团推荐党员表示感谢，并问道：“为什么在你们推荐的四十多名候选人中，只有八名入选呢？”

“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你们所推荐的人，都是群众中的优秀分子。但是，这是头一次用这种方式吸

收党员，我们想在开始时吸收这些合格的人入党。这次没有被吸收的人应该继续努力，使自己具备党员条件，将来还有机会入党。

“党员自己也要不断努力，克服群众指出的一切缺点。党组织和群众要互相帮助，共同前进；要紧密结合在一起，就象一家人一样。”

罗林发言后，新党员和他们的介绍人一个接一个地起来发言。村会计王福星在评价自己的条件和讲入党的原因时说：“我也讲不出有什么优点。我只对自己过去没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感到惭愧。过去当有人找我办事时，我常常不耐烦。但从现在起，我将好好地为人民服务。”

“我入党的动机是为了推翻封建制度，帮助农民和工人翻身。”

“王福星的入党态度端正，而且，他为群众服务得很好。”他的介绍人说道，“他的缺点是怕得罪人，不愿意指出别人的缺点。”

其他新党员也抱着诚恳而严肃的态度作了自我汇报。他们之中唯一的老中农李宝喜看来特别激动。唯一的妇女李云芬由于谦虚，因而她的既能同群众打成一片，又能引导他们前进的优点是由她的介绍人介绍的。

轮到村长赵正方发言时，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说道：“共产党爱穷人，为穷人，我也要为穷人服务。我从心眼里热爱党，自愿加入党。”

王文盛最后一个发言。他说：“如果没有这个热爱人民的共产党的话，我们穷人决不可能当家作主，也决不能翻身。因此，对于入党，我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当所有的人都发过言之后，他们向党宣誓。站在洋槐树下人群的前面，面对着红旗和毛主席像。赵正方和王文盛比站在排尾的李云芬高出许多。他们学着王绍贞的样子，举起右手，握着拳头。王绍贞缓慢地念着誓词，每念完一句，他们也严肃缓慢地重复一句：

“我自愿参加共产党，为人民服务。我愿意服从党的章程，执行党的纲领，交纳党费，接受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不怕困难和牺牲，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如果我的行动违背了这个誓言，我愿接受党的纪律处分。”

党支部书记王绍贞说：“现在我们有了八名新党员。我们新老党员应当团结起来，并且同群众团结起来。我们应当为人民服务，并带领他们朝着最后胜利前进。全国人民翻身解放的日子已经不远了。”